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第七版

第一卷



联合国

纽约，2007年

|  |
| --- |
| 联合国出版物 |
| 出售品编号：C.07.V.9 |
| ISBN 978-92-1-133763-1 |

版权©联合国，2007年

版权所有

在纽约联合国印制

目 录

第一卷

页次

前言 xi

第一部分

国际法发展与编纂的起源和背景

1. 历史前例 1

2. 国际联盟编纂会议 3

3. 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草拟和执行 4

第二部分

国际法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方案和工作方法

1. 国际法委员会的宗旨 7

2.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8

（a） 资格和国籍 8

（b） 选举 10

（c） 国际法委员会的规模 16

（d） 任期和兼职制 17

（e） 特权和豁免 19

3. 国际法委员会的结构 20

（a） 主席团成员 20

（b） 主席团、扩大的主席团和规划小组 21

（c） 全体会议 21

（d） 特别报告员 23

（e） 工作组 26

（f） 起草委员会 29

4. 工作方案 31

（a） 挑选专题的方法 31

（b） 挑选专题的程序和标准 33

（c） 关于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方案的专题 35

5. 工作方法 44

（a） 逐渐发展和编纂 44

（b） 审议过程 46

（c） 特别任务 49

（d） 工作方法的审查 51

6. 国际法委员会的会议 56

（a） 议事规则 56

（b） 议程 56

（c） 语文 57

（d） 决策 57

（e） 委员会的报告 58

（f） 简要记录 59

（g） 委员会年鉴 60

（h） 文件限制 60

（i） 每届会议的会期 63

（j） 分期会议 64

（k） 地点 65

（l） 国际法讨论会 66

7. 同各国政府的关系 67

（a） 同各国政府的直接关系 67

（b） 同大会的关系 69

8. 同其他机构的关系 74

9. 秘书处 78

第三部分

国际法委员会审议的专题与分题

A. 委员会已提交最后报告的专题与分题 81

1. 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 81

2. 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易于查考的方法 82

3. 系统地表述纽伦堡原则 84

4. 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 85

5. 多边公约的保留 88

6. 侵略定义问题 90

7.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92

（a） 治罪法草案（1954年） 92

（b） 治罪法草案（1996年） 96

（c）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 103

（d） 侵略罪 114

8. 国籍，包括无国籍状态 116

（a） 已婚者的国籍 117

（b） 未来的无国籍状态 118

（c） 目前的无国籍状态 120

（d） 多重国籍 121

9. 海洋法 122

（a） 公海制度 122

（b） 领海制度 124

（c） 海洋法合并草案 125

10. 仲裁程序 130

11. 处交交往和豁免 133

12. 领事交往和豁免 136

13. 扩大参加在国际联盟主持下所缔结的一般多边条约 138

14. 条约法 140

15. 特别使团 145

16.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 150

（a） 国家派驻国际组织代表的地位、特权和豁免 151

（b） 国际组织的地位、特权和豁免 155

17. 国家和政府继承 157

（a） 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 159

（b） 条约以外事项的国家继承 162

18. 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和不得侵犯 165

19. 最惠国条款 167

20.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相互间缔结的条约问题 171

21.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 地位 177

22.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181

23.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190

24. 国家继承方面的国籍 196

（a） 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 197

（b） 国家继承涉及的法人国籍问题 199

25. 国家责任 199

26.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209

（a） 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 214

（b） 危险活动产生的越境损害造成损失时的国际责任 216

27. 外交保护 219

28. 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223

29. 国际法不成体系：国际法的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 226

B. 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的专题与分题 229

1. 对条约的保留 229

2. 国际组织的责任 233

3. 共有的自然资源 235

4.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238

5. 对外国人的驱逐 240

6.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 241

附件

一、国际法委员会章程 243

二、国际法委员会现任委员及前任委员名单 251

三、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在委员会永久会址所在地的法律地位 263

四、国际法委员会所拟订的草案 264

1. 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 264

2. 纽伦堡法庭组织法及判决书中所确认的国际法原则 266

3. 治罪法草案（1954年和1996年） 268

（A）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1954年） 268

（B）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1996年） 270

4. 消除未来无国籍状态公约草案 280

5. 仲裁程序规则范本 285

6. 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文草案 297

7. 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及其任择议定书草案 306

（A） 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 306

（B） 关于特别使节团信使和邮袋地位的第一任择议定书草案 318

（C） 关于普遍性国际组织信使和邮袋地位的第二任择议定书草案 319

8.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附件和附录一至附录三 321

（A）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 321

（B） 附件 各项条约下的罪行（见第20条（E）项） 353

（C） 附录一 与规约草案并行的一项条约的可能条款 354

（D） 附录二 本附件中提到的有关条约规定（见第20条（E）项） 356

（E） 附录三 常设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可能方式概要 367

9. 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 372

10.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382

11. 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 399

12. 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 406

13. 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411

14. 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面声明的指导原则 417

15. 国际法不成体系：国际法的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研究小组的工作结论 419

第二卷

文书

附件

五、在联合国主持下并在国际法委员会编写的草案基础上缔结的多边公约 1

A. 关于海洋法的公约及任择议定书 1

1. 领海及毗连区公约 1

2. 公海公约 10

3. 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 20

4. 大陆架公约 27

5. 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签字议定书 31

B. 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 33

C.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及任择议定书 42

1.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42

2. 关于取得国籍之任择议定书 57

3. 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 59

D.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及任择议定书 61

1.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61

2. 关于取得国籍之任择议定书 92

3. 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 94

E. 特别使团公约及任择议定书 97

1. 特别使团公约 97

2. 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 117

F.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119

G.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153

1. 联合国大会1973年12月14日第3166 （XXVIII）号决议 153

2.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154

H. 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 161

I.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 199

J. 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 225

K.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 244

L.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288

M.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306

书目选编 324

前 言

按照大会1965年12月20日第2099（XX）号决议建立的联合国对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的协助方案，其目标之一是通过联合国新闻媒介，传播有关国际法及这一领域活动的信息。根据这一目标，提出了出版一本关于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出版物的提议。依照该提议，秘书处在1966年编写了本出版物的第一版。1972年、1980年、1988年、1996年和2004年，秘书处根据得到大会认可的国际法委员会的请求，先后编写出版了本出版物的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第五版和第六版。目前的第七版补充修订了前一个版本，收入了国际法委员会最近工作进展概要及该委员会新草案的案文和一部新的编纂公约。这一版本反映了截至2007年1月31日的工作进展情况。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大会应“发动研究，并作成建议……以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作为履行这项责任的一项办法，大会在1947年成立了国际法委员会。

本出版物的目的在于一般性地介绍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充足的参考材料。本出版物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概述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开始前为国际法的发展和编纂不断作出努力的历史；第二部分叙述国际法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方案和工作方法，其中特别提到该委员会行使其职能所依据的章程；最后，第三部分简单叙述国际法委员会讨论的国际法各项专题和分题。此外，该部分还叙述了大会在该委员会对专题和分题进行审议后决定采取的行动，以及大会召开外交会议，审议该委员会拟订的草案所取得的结果。

本出版物的附件，载有国际法委员会章程案文、该委员会现任和历任委员名单、瑞士联邦委员会关于该委员会委员在该委员会永久会址所在地的法律地位的决定案文，以及该委员会拟定的最后条款草案全文以及适当情况下由联合国或大会本身主持召开的外交会议所通过的以这些条款草案为基础的多边公约全文。[[1]](#footnote-1)附件五所载的多边公约见第二卷。

第一部分

国际法发展与编纂的起源和背景

1. 历史前例

通过重述现行规则和制定新规则来发展国际法的思想不是近代才出现的，在18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杰里米·边沁就提议编纂整个国际法，尽管他是本着一种空想的精神提出这一建议的。[[2]](#footnote-2)2自那以后，个人、学术团体和各国政府为国际法的编纂作出了许多尝试。

对于“编纂运动”——这种尝试有时被称为编纂运动——的热情一般说来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成文国际法可以通过填补法律的现有空白，及精确地阐述其实际应用尚未确定的抽象一般原则，来消除习惯国际法的不确定因素。

尽管确实只有得到各国政府承认的具体条文才能直接构成成文国际法的实体，但私人为编纂工作作出的努力，即各种团体、机构和学者从事的研究和提出的建议，也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国际法研究院、国际法协会（二者均成立于1873年）和哈佛国际法研究部（建于1927年）草拟的各项法典草案和建议，它们为召集各种外交会议，通过具有造法性质的一般性多边公约[[3]](#footnote-3)3的工作提供了便利。

在政府间就具有普遍意义和永久意义的法律问题制定规章可以说始于维也纳会议（18l4-1815年举行），在该会议上，l8l4年《巴黎条约》的签署国通过了关于国际河流制度、废除奴隶贩卖和外交使节等级的条款。自那以后，在外交会议上就许多其他问题制定了国际法律规则，如陆地和海上战争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统一国际私法，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邮政和电信、航海和航空的管理及各种其他国际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4]](#footnote-4)4

尽管许多这些公约是彼此孤立的，只涉及特定问题，有时仅适用于某些地理区域，但其中很多公约都是各国政府在历次国际会议上不断努力通过缔结多边公约发展国际法所产生的结果。

例如保护工业产权是1880年以来历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有关该主题的《巴黎公约》首先在1883年3月20日获得通过，后来逐渐经过六次修订和一次修正。同样，1949年8月12日通过的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四项日内瓦公约和1977年6月8日[[5]](#footnote-5)5和2005年12月8日[[6]](#footnote-6)6通过的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中对国际法的编纂就是1864年8月22日《日内瓦红十字公约》的直接延续。

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借鉴了前几次有关战争法问题会议的工作和经验及一些国家政府以前和平解决争端的实践，就若干重要公约取得了一致意见，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法的编纂运动。然而，1907年第二次和平会议感到在它之前没有为其讨论作好充分准备，所以建议在预定召开第三次和平会议的大概日期之前两年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其任务是，搜集提交给和平会议的各种建议；确定哪些问题业已成熟，可以写进一项国际规章以及草拟一个计划，各国政府应有足够的时间对其作出决定，以便有关国家可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7]](#footnote-7)7在第三次和平会议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2. 国际联盟编纂会议

1924年9月22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设想创立一个称为国际法逐渐编纂专家委员会的常设机构，其人员组成应能代表“世界主要文明形式和主要法律体系”。[[8]](#footnote-8)8随着这项决议的通过，政府间为促进国际法的编纂与发展作出的努力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十七名专家组成的该委员会将草拟一个“以国际协定加以规定最适宜也最有可能实现”的问题的清单，然后研究各国政府就这一清单提出的意见并就“足够成熟”的问题及准备召开会议解决这些问题应采取的程序提出报告。这是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尝试对所有领域的国际法进行编纂和发展，而不仅仅是就个别和具体的法律问题制定规章。

大会在同各国政府和国际联盟行政院进行一些协商后，在1927年决定召开一次外交会议，对专家委员会认为“足够成熟”的五个专题中的三个进行编纂，这三个专题是：（1）国籍，（2）领水和（3）国家对外国人的人身或财产在其领土内所受损害承担的责任。[[9]](#footnote-9)9该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交给由五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起草可作为“讨论基础”、指明意见一致或意见分歧之处的报告，但它将不像专家委员会建议的那样负责起草公约草案。

1930年3月13日至4月12日在海牙召开了编纂会议，四十七个国家政府的代表参加了这一会议。但是会议的工作只产生了关于国籍专题的国际文书。[[10]](#footnote-10)10该次会议未能就领水或国家责任专题通过任何公约。尽管该会议暂时通过了关于领水的某些条款草案，但就国家责任问题，甚至连一项建议都未通过。那些暂时通过的关于领水的条款草案后来由于各国政府对其予以承认，认为它们重申了现行国际法，因此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0年以后，国际联盟未在编纂国际法方面进行其他的尝试。但是，1931年9月25日，国联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编纂程序的重要决议，其主要精神是增强各国政府在编纂过程每一阶段的影响。[[11]](#footnote-11)11这一基本精神后来体现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章程，同时纳入章程的还有该决议提出的一些其他建议，如由一个专家委员会起草公约草案和同国际和国家科学机构密切协作等。

3. 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草拟和执行

参加草拟《联合国宪章》的各国政府中绝大多数都反对赋予联合国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的立法权力。因而，它们也必然拒绝接受赋予大会通过某种多数票形式规定各国应遵守某些一般性公约的权力的建议。然而，它们却强烈支持赋予大会比较有限的研究与建议权，这便导致通过了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12]](#footnote-12)12

“一、大会应发动研究，并作成建议：

“（子）……并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

1946年12月11日，大会在其第一届第二期会议上通过了第94（I）号决议。规定成立国际法逐渐发展与编纂委员会，有时被称为“十七国委员会”。该委员会奉命审议为履行大会按照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责任拟建议采取的程序。

该委员会在1947年5月12日至6月17日期间共举行三十次会议并通过了一项报告，建议成立一个国际法委员会，并提出一些旨在作为该委员会章程基础的规定。[[13]](#footnote-13)13

该委员会详细讨论了有关国际法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范围、职责及工作方法等若干重要原则问题。该委员会一些成员认为，在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纂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指出，无论是逐渐发展还是编纂，都有必要缔结国际公约工作成果才能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然而，其他多数成员则认为，编纂和逐渐发展之间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尽管他们对这两个概念应以何者为重点意见尚有分歧。[[14]](#footnote-14)14

至于国际法委员会的构成，该委员会的多数成员赞成这样的意见，即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不应为政府代表，而应作为公认胜任的国际法界人士以个人身份担任委员。尽管该委员会一些成员强调指出提议成立的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的学术性和非政治性，但是，该委员会多数成员则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进行应始终同各国政治当局密切合作，应由大会决定对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草案采取何种行动。

在大会第二届会议上，第六（法律）委员会[[15]](#footnote-15)15的大多数成员赞成成立一个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拟订了国际法委员会章程草案。[[16]](#footnote-16)161947年11月21日，大会通过第l74（II）号决议，建立国际法委员会，并通过了该委员会章程。自那以后，大会在该委员会和各国政府的分别倡议下，又先后通过了六项决议，对该章程进行了修改。[[17]](#footnote-17)17委员会现有章程案文转载于附件一。

按照该章程的有关规定（第3至第10条），1948年11月3日，举行了国际法委员会的第—次选举，该委员会于1949年4月12日召开第一届年会。

第二部分

国际法委员会的组织、工作

方案和工作方法

1. 国际法委员会的宗旨

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1条第1款规定，“委员会以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为宗旨”。该章程第15条“为便利起见”在逐渐发展与编纂之间作了如下区分：逐渐发展意指“就国际法尚未订立规章或各国惯例尚未充分发展成法律的各项主题，拟订公约草案”；编纂意指“更精确地制定并系统整理已有大量国家惯例、判例和学说的国际法规则。”实际上，委员会关于某项专题的工作通常包括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的某些方面，两者之间的平衡视具体专题而定。[[18]](#footnote-18)18

尽管该章程的拟订者设想，对于逐渐发展工作与编纂工作使用的方法将稍有不同，但他们认为最好将这两项任务交给一个委员会。此外，他们不赞成分别建立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刑法委员会的建议。因此，该章程第1条第2款指出，该委员会“主要关心的是国际公法，但不妨碍它介入国际私法的领域。”

然而，委员会五十多年的工作几乎全都限于国际公法领域。[[19]](#footnote-19)191996年，该委员会注意到它近年来没有介入国际私法领域，仅在偶然情况下和处理国际公法专题的工作过程中有所例外；此外，除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这类机构的工作之外，似乎不可能要求国际法委员会介入国际私法领域。[[20]](#footnote-20)20

该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在国际刑法领域，它首先制定了纽伦堡原则并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审议了国际刑事管辖问题，它最终在1994年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完成了国际刑事法院章程草案，并在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完成了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委员会着手审议另一个刑法专题，在2005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在其工作方案中列入了“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专题。[[21]](#footnote-21)21在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还在其长期工作方案中列入“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22]](#footnote-22)22

2.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a）资格和国籍

委员会章程第2条第1款规定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应为公认胜任的国际法界人士”。委员会委员在国际法理论和实践方面具有公认的能力和资格，[[23]](#footnote-23)23并经常表现出在国际法领域，包括在国际争端解决程序方面具有广泛的知识和实际经验。[[24]](#footnote-24)24委员来自国际法律界各个部门，如学术机构、外交使团、政府各部和国际组织。[[25]](#footnote-25)25由于委员通常是在学术和外交领域工作、承担外部专业责任的人员，国际法委员会没有在象牙塔内开展工作，而是与国际生活现实保持了密切的联系。[[26]](#footnote-26)26同国际法院法官一样，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作为其国家政府的代表供职。[[27]](#footnote-27)27此外，委员会的委员不得被候补人员或顾问所代替。[[28]](#footnote-28)28

委员会委员不得有两人为同一国家的国民（第2条，第2款）。[[29]](#footnote-29)29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员应视其通常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国家的国民（第2条，第3款）。可被推选者不仅限于联合国会员国国民，但是，迄今为止，尚无任何非会员国的国民被选为该委员会委员。这种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因为联合国会员日益增加，几乎覆盖了全球。[[30]](#footnote-30)30

（b）选举

提议建立国际法委员会（第一部分所述）的十七国委员会曾提议，在选举方法上，委员会也依照国际法院的做法。[[31]](#footnote-31)31然而，大会反对采取由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联合选举的办法的提议，因为国际法院是一个特例，不能作为任命委员会委员的一个先例，而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大会被委托负责国际法的编纂工作。[[32]](#footnote-32)32大会决定，候选人只由联合国会员国政府提名，选举只由大会举行（第3条）。每一会员国提名参加选举的候选人以四名为限，其中两人得为提名国国民（第4条）。[[33]](#footnote-33)33

秘书长向会员国政府发函通知他们即将进行的选举，说明即将选举的席位的地理分布，注意到委员会章程的相关规定，并提请注意候选人提名的最后期限。应于选举年6月1日以前将候选人名单书面送交秘书长（第5条）。[[34]](#footnote-34)34

但在特殊情况下，会员国政府可在大会开幕三十日以前另提候选人（第5条）。[[35]](#footnote-35)35秘书长将名单连同候选人履历一并送交各会员国政府（第6条）。秘书长还向大会提交所有按正当程序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供选举使用（第7条）。

委员会章程第8条（参照《国际法院规约》第九条）规定选举人进行选举时应铭记：凡当选委员会委员的人士，本人必须具备必要的资格（即第2条规定的公认胜任的国际法界人士），而委员会全体则应确实代表世界各主要文明形式和各主要法系（第8条）。

1956年，大会第六委员会达成了一项关于区域集团席位分配的协议，以确保在委员会委员从十五名增加到二十一名的情况下不同文明形式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分配。[[36]](#footnote-36)361961年，当委员会委员从二十一名增加到二十五名的时候，就是否继续执行该协议发表了不同的看法。[[37]](#footnote-37)371981年，大会决定修改委员会章程，以便将委员会委员从二十五名增加到三十四名，并规定每个区域集团最多推选的委员数量。[[38]](#footnote-38)38这样，修改后的章程第9条规定：“候选人中以得票最多并得出席及投票会员国过半数选票者当选，人数可达各区域集团的规定最高名额”。

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39]](#footnote-39)39应宣布候选人中得票最多并得出席及投票[[40]](#footnote-40)40会员国过半数选票者当选（第9条，第1款）。[[41]](#footnote-41)41实际上，委员会所有委员都是在第一轮投票时选出的。但是，必要时可不止一次投票，直至以要求的多数选出所有委员。[[42]](#footnote-42)42。如果剩下的最后一个席位票数相等，大会则仅对获得了法定多数选票且票数相等的候选人（他们来自于为其分配了该席位的区域集团）专门举行一次限制性投票。[[43]](#footnote-43)43

委员会章程规定，在补足大会举行定期选举之间的时间出现的空缺（所谓的“临时空缺”）时采取不同的选举程序。在这种情况下，由该委员会适当遵照委员会章程第2和第8条的各项规定自行选出新的委员补足空缺（第11条）。[[44]](#footnote-44)44委员会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出现委员空缺，如死亡、重病、任命担任新职位或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等。[[45]](#footnote-45)45秘书处列入与填补一个或不止一个临时空缺有关的项目，以此作为委员会临时议程的第一个项目。[[46]](#footnote-46)46秘书处还发出通知，宣布存在一个或不止一个临时空缺，并以普遍分发该委员会文件的形式转载委员会章程的相关规定。

委员会章程没有规定临时空缺的提名程序。实际上，会员国政府和委员会委员均可向秘书处提供候选人名单。[[47]](#footnote-47)47秘书处以情况通报的形式向委员会委员提前发出关于候选人名单的通知，情况通报在会议开幕前发送给各委员。秘书处还以普遍分发的委员会文件的形式发出载有候选人名单和候选人履历的通知，该通知是作为委员会宣布空缺的上一份通知的增编而发布的。[[48]](#footnote-48)48秘书处的候选人名单包括会员国政府或该委员会委员提交的候选人姓名[[49]](#footnote-49)49（指其国籍）。[[50]](#footnote-50)50

选举日期由委员会在委员会主席进行磋商后确定。[[51]](#footnote-51)51委员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52]](#footnote-52)52在非公开会议上选举新的委员来填补空缺。[[53]](#footnote-53)53在1981年以来，该委员会按照1981年11月18日第36/39号决议规定的地域分配选举了填补空缺的委员。[[54]](#footnote-54)54委员会举行了单独选举来填补不同区域集团的空缺。[[55]](#footnote-55)55对不属于为其举行选举的区域集团的候选人的投票或者对超过该区域集团空缺数量的候选人的投票视为无效。得票超过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委员半数的候选人当选。[[56]](#footnote-56)56弃权[[57]](#footnote-57)57的委员被认为没有参加表决。[[58]](#footnote-58)58如第一次投票后无候选人获得法定多数票，则应进行再次投票。[[59]](#footnote-59)59

主席在简要记录正式记录的公开会议上宣布选举结果。[[60]](#footnote-60)60主席向新当选的委员通知选举结果，并邀请他们参加委员会的各项程序。选举补足临时空缺的委员在剩下的任期里任职，在随后举行的委员会选举中有资格连选连任。

1955年，大会在委员任期自三年延长为五年的情况下请该委员会就一项规定由大会而不是委员会填补空缺的提案发表意见。[[61]](#footnote-61)61委员会决定不提出这项提案，因为大会是在委员会届会后召开会议的，因此该空缺应当至少保留一届。[[62]](#footnote-62)62

国际法委员会前任及现任委员的名单列于附件二。

（c）国际法委员会的规模

委员会委员的人数历经三次扩大：按照大会1956年12月18日第1103（XI）号决议，从十五人增加到1956年的二十一人；按照大会1961年11月6日第1647（XVI）号决议，增加到1961年的二十五人；1981年又按照大会1981年11月18日第36/39号决议，增加到现在的三十四人。[[63]](#footnote-63)63之所以提议增加该委员会委员人数是由于联合国会员数从最初的五十一个逐渐增加到1956年的八十个，1961年的一百零四个和1981年的一百五十七个。大会绝大多数代表团认为，增加该委员会委员人数可更好地确保执行委员会章程第8条的规定，即要求“委员会全体代表世界各主要文明形式和各主要法系”。[[64]](#footnote-64)64

（d）任期和兼职制

委员会章程第10条原来规定，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任期应为三年，连选得连任。然而，实际上已证明，更长的任期有利于该委员会工作的进展，所以，委员会委员的任期后来延长至五年，先是临时性的，后成为永久性的制度。[[65]](#footnote-65)65

在1968年其第二十届会议上，委员会提议大会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从五年延长到六或七年。委员会认为，经验表明，鉴于编纂过程的旷日持久性，六或七年是完成一项工作方案的最低年限。[[66]](#footnote-66)66 大会第六委员会注意到该项提案，延迟到下一届会议上就此作出决定。[[67]](#footnote-67)67

根据大会的决定，委员会仅举行年会，其委员不同于国际法院法官，不是全年专门任职的委任，尽管十七国委员会建议委员会委员为专职委员。[[68]](#footnote-68)68因此，国际法委员会是大会的一个常设和非专任的附属机构。[[69]](#footnote-69)69委员会委员支领旅费，并根据委员会章程第13条[[70]](#footnote-70)70领取特别津贴。委员会主席、特别报告员和其他委员在历史上也曾领取酬金。[[71]](#footnote-71)71

依照大会关于重新审查委员会章程并就其修订提出建议的请求，国际法委员会在1951年建议该委员会改为专职制，以便加快其工作。[[72]](#footnote-72)72然而，当第六委员会讨论该问题时，大多数代表团却认为，对国际法委员会结构作如此重大的更改为时尚早。它们特别感到：大量增加该委员会所产生的文件将给大会及根据要求对草案案文提出评论的政府增加过重负担；很难找到愿接受专职职位的合适人选；而且开支是一个严重问题。[[73]](#footnote-73)73因此，大会在1952年1月31日第600（VI）号决议中决定暂时不就这一问题采取任何行动。此后在第六委员会的辩论中，间或也有一些代表团提议将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改为专职制，但大会从未就此采取行动。

（e）特权和豁免

委员会在1978年其第三十届会议上认为有必要更好地确定委员会在瑞士其永久会址所在地的法律地位，包括委员会及其委员有权享受的豁免、特权和便利。[[74]](#footnote-74)74委员会请秘书长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与瑞士当局协商采取适当措施。[[75]](#footnote-75)751979年，瑞士政府决定准许委员会委员在其届会期间享有与国际法院法官在瑞士享有的同样的特权和豁免，即向日内瓦国际组织派驻的特派团团长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见附件三）。委员会和大会对将促进委员会委员在委员会日内瓦届会期间行使职能的这一决定表示欣赏。[[76]](#footnote-76)76

3. 国际法委员会的结构

（a）主席团成员

在每届会议开始时，国际法委员会都从委员中选举主席、第一副主席和第二副主席、起草委员会主席[[77]](#footnote-77)77和该届会议的总报告员。[[78]](#footnote-78)78主席主持全体会议、主席团和扩大的主席团会议。[[79]](#footnote-79)79副主席被指定代理主席时，其权力和职责与主席相同。[[80]](#footnote-80)80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主持起草委员会的会议；就每个专题向起草委员会委员提出建议；并在全体会议审议起草委员会的报告时对该报告进行介绍。总报告员的职责是起草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年度报告。国际法委员会强调总报告员应在起草报告（由秘书处起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81]](#footnote-81)81（见第 页）。

（b）主席团、扩大的主席团和规划小组

在每届会议上，由该届会议选举的五位主席团成员组成的主席团对工作计划表和与该届会议有关的其他组织事项进行审议。扩大的主席团由该届会议选举的主席团成员、目前仍然是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委员会前任主席和特别报告员组成，也可请求该扩大的主席团审议与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组织、方案和方法有关的问题。

自1970年代以来，国际法委员会在每届会议上都成立一个规划小组，[[82]](#footnote-82)82其任务是审议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方法。自1992年以来，规划小组成立了一个长期方案工作组，负责就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的专题提出建议。在五年期的其余届会期间对工作组进行了重组，主席和委员不变（见第33页和34页）。规划小组还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审查和审议按照大会要求或委员会自己的倡议来改进委员会工作方法的途径（见第53和59页）。

（c）全体会议

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的目的主要是审议特别报告员、工作组、起草委员会、规划小组的报告和需要整个委员会审议的任何其他事项。委员会还在全体会议上决定将拟议的条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并通过临时或最终条款草案和评注。[[83]](#footnote-83)83在每届会议结束时，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审议和通过向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

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主要作用是确立国际法委员会处理某一专题的大体做法，其主要目的是向委员会、其附属机构和特别报告员提供指导。[[84]](#footnote-84)84这对确保附属机构如起草委员会或工作组的工作符合整个委员会大体上接受的方针非常重要。委员会指出，委员会主席应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指出全体会议辩论所显示的主要观点趋势，以推动起草委员会的工作。[[85]](#footnote-85)85委员会还建议对全体会议的辩论制度进行改革，以提供更多的结构，使主席能够在辩论结束时作出结论的指示性摘要，[[86]](#footnote-86)86并在必要时以指示性表决为基础。[[87]](#footnote-87)87（见第55页）

委员会在1997年其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引进了全体会议就专题审议中出现的特定事项或问题进行简短的专题辩论或意见交换的机制，即所谓的“小型辩论”，以推动对特定事项进行重点突出的辩论。[[88]](#footnote-88)88在2002年其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委员会认为“小型辩论”是有用的，是委员会工作方法的一个重大创新。但委员会强调，小型辩论应当简短，重点突出，不允许就小型辩论范围之外的问题作冗长的发言。[[89]](#footnote-89)89

委员会公开举行全体会议，[[90]](#footnote-90)90但在委员会作出其他决定，特别是在处理某些组织或行政问题时除外。[[91]](#footnote-91)91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作出关于实质性和程序性问题的决定，如果这些决定是在非公开会议或非正式协商会议上作出的，则由主席在全体会议上宣布。[[92]](#footnote-92)92

（d）特别报告员

特别报告员对委员会的工作起着主要作用。[[93]](#footnote-93)93虽然委员会章程只规定了在逐渐发展的情况下任命特别报告员（第16条（a）），但委员会的惯例是在审议一项专题的最初阶段酌情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无论该专题是属于编纂还是逐渐发展一类。[[94]](#footnote-94)94特别报告员只要仍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就要一直履行其职责，直至委员会完成他们各自分管的专题的工作为止。[[95]](#footnote-95)95如果必须新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委员会通常将其关于该专题的工作暂停一段适当的时间，使新任命的特别报告员能够履行该专题的具体工作阶段所要求的任务。

任用特别报告员是委员会的机构特点之一，这有助于委员会有效发挥职能，并为委员会提供了良好的服务。[[96]](#footnote-96)96特别报告员执行若干主要任务，包括起草专题报告，在全体会议上参与专题的审议，协助起草委员会的专题工作，以及为条款草案编写评注等。

特别报告员规划和确立专题，说明法律状况并在专题报告中提出关于条款草案的建议。[[97]](#footnote-97)97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是委员会工作的基础，并且是委员会章程确立的委员会工作方法和技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98]](#footnote-98)98委员会建议特别报告员详细说明计划在下一届会议上开展的工作的性质和范围，确保将来的报告能满足整个委员会的需要，并在会议开始前足够长的时间内向各委员分发报告，以便研读和思考。[[99]](#footnote-99)99委员会还建议由委员会任命成立协商小组，就报告的一般方向和特别报告员打算提出的任何具体问题提供帮助。[[100]](#footnote-100)100特别报告员通常在委员会于全体会议上开始审议专题时介绍报告，对辩论期间提出的问题予以答复，并进行总结性发言，在辩论结束时对主要问题和趋势加以总结,酌情建议将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或某个工作组处理。

特别报告员在起草委员会中的作用包括：（a）编写清晰和完整的条款草案；（b）解释起草委员会面前的条款草案的理论基础；以及（c）在修订的条款草案和/或评注中反映起草委员会的意见。[[101]](#footnote-101)101特别报告员应为其各自分管的专题的条款草案编写评注，评注的编写形式和篇幅应尽可能统一。[[102]](#footnote-102)102特别报告员还应尽量在提交条款草案时也提交评注草稿或说明，并根据起草委员会所作的更改予以修订，以确保在全会辩论条款草案时备齐评注[[103]](#footnote-103)103（另见第54和55页）。特别报告员还负责根据委员会关于该专题工作进展的需要，起草国际法委员会及其起草委员会的其他工作文件。

（e）工作组

委员会在特定专题上使用了工作组，有时称为小组委员会、研究小组[[104]](#footnote-104)104或协商小组。[[105]](#footnote-105)105这些特别的附属机构由委员会或规划小组为不同目的设立，执行不同的任务。[[106]](#footnote-106)106工作组的成员可限定名额，也可不限名额。[[107]](#footnote-107)107

委员会还在任命特别报告员开展准备工作或协助确定工作范围和方向前设立了新专题工作组，这些新专题包括：纽伦堡原则的系统表述（1949年）；国家和政府的继承（1962年至1963年）；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相互间缔结的条约问题（1970年至1971年）；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1974年）；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1977年至1979年）；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1978年和2002年（专题的第二部分））；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1978年）；外交保护（1997年）和国家单方面行为（1997年）。[[108]](#footnote-108)108

委员会还在任命特别报告员后设立了工作组[[109]](#footnote-109)109来审议特定问题或决定某一特定专题或分题的未来工作方向，这些专题或分题包括：仲裁程序（1957年）；国家责任（1962年至1963年、1997年，1998年和2001年[[110]](#footnote-110)110）；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1971年（专题的第一部分）和1992年（专题的第二部分）[[111]](#footnote-111)111）；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1982年和1995年至1996年）；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1992年、1995年、1996年和1997年（整个专题），1998年和2000年（专题的预防方面），2003年和2004年（专题的责任方面）；国家单方面行为（1998年至2001年和2003年至2006年）；国家继承方面的国籍（1995年至1996年和1999年（专题的第一部分），1998年（专题的第二部分））；外交保护（1998年和2003年）；国际组织的责任（2002年、2003年[[112]](#footnote-112)112和2005年）；以及共有的自然资源（2002年、2004年至2006年）。[[113]](#footnote-113)113

委员会还进一步为处理整个专题（如在紧急情况下）设立工作组，这些专题包括：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和不得侵犯问题（1972年）；审查多边条约拟定过程（1978年至1979年）；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1990年和1992年至1994年）；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1999年）和国际法不成体系（2002年至2006年）。[[114]](#footnote-114)114

起草委员会就特别报告员编写的条款案文开展工作，而工作组则在意见尚在形成中的早期阶段就着手工作，因此与一种处理办法的形成和草案的拟定关系更加密切。[[115]](#footnote-115)115该工作组的工作可以持续若干届会议，其成员也大多保持连续性，而起草委员会的组成则每年都有变化。[[116]](#footnote-116)116在某些情况下，工作组可以承担全面地对某一专题进行实质性审议的任务。[[117]](#footnote-117)117如果工作组在起草时是认真的，可将最后成果直接在全体会议上提交委员会，而不必提交起草委员会，以避免重复甚至由于起草委员会委员未曾参加对某一案文的详细讨论而造成的失误。但在有些情况下，起草委员会可以从措辞是否充分和一致的角度协助最后审查有关案文。[[118]](#footnote-118)118替代的做法是，也可以临时设立工作组，以拟订随后提交起草委员会的经过修订的条款草案（或关于条款草案系统表述的指导）。在这些情况下，[[119]](#footnote-119)119提交给起草委员会的是工作组的案文而不是特别报告员的提议。

各工作组的授权如此灵活（从着眼于具体问题，有时是程序性问题到更加全面地对某一专题进行实质性审议不等），使得委员会能够根据当前专题的需要调整其工作方法，从而提高其整体效率。

一个工作组，不管其职权如何，始终服从于委员会、规划小组或设立该工作组的其他机构。应由有关机构发布必要的授权，规定研究的范围，审查并在必要时修订提案，并对工作结果作出决定。[[120]](#footnote-120)120

1996年，委员会建议更加广泛地使用工作组，以解决具体的意见分歧，或在适当情况下迅速处理整个专题；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作组通常代替起草委员会采取行动[[121]](#footnote-121)121（见第55页）。

（f）起草委员会

国际法委员会自第一届会议以来，一直通过起草委员会开展工作。[[122]](#footnote-122)122鉴于国际法委员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人数也在逐渐增加。起草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在每届会议上都有所不同，自1992年以来，每届会议的不同专题都有不同的成员参加审议，尽管起草委员会仍然是在一位主席领导下发挥职能的单一机构。[[123]](#footnote-123)123特别报告员在审议其分管的专题时担任起草委员会委员。作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在审议另一个专题时，特别报告员未被剥夺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总报告员依职参加起草委员会在所有专题方面的工作。起草委员会的组成还要公平代表国际法委员会的各主要法系和各种语言，[[124]](#footnote-124)124并且以同其起草任务相称为限。[[125]](#footnote-125)125

起草委员会在协调各种观点和制定可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126]](#footnote-126)126起草委员会不仅受托处理纯文字起草方面的问题，还受托处理一些国际法委员会全体未能解决或似乎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冗长讨论的实质性问题。[[127]](#footnote-127)127实际上，国际法委员会通常在对某一特定条款进行第一次讨论后，不举行表决，而是将该条款提交起草委员会，由它设法就此问题起草一个普遍令人满意的案文。起草委员会的提议常常可得到国际法委员会的一致通过，有时甚至无需进行讨论。不过，起草委员会的案文需要修改，或者被国际法委员会的委员在全体会议上提交的其他案文所取代，并可送回起草委员会进一步审议。[[128]](#footnote-128)128国际法委员会注意到，过早地将条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和送交条款草案与起草委员会实际审议这些草案之间的时间间隔过长，会产生相反的作用。[[129]](#footnote-129)129

起草委员会主席在全体会议上提交给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起草委员会关于每个专题的工作，包括对起草委员会已经通过并提交国际法委员会供其在全体会议上审议和通过的条款草案的说明[[130]](#footnote-130)130（另见第53至56页）。

4. 工作方案

（a）挑选专题的方法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章程，国际法委员会应审议大会交付的（第16条）或联合国会员国、大会以外的联合国主要机构、专门机构或根据政府间协定成立以鼓励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为宗旨的官方机构提出的（第17条）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建议。关于编纂工作，委员会应对整个国际法领域进行调查，以期挑选适当的专题（第18条）。此外，委员会如认为某一专题必须或者适合进行编纂时，应向大会提出建议（第18条）。委员会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决定它有能力开始进行向大会建议的某项专题的编纂工作，而无需等待大会就该建议采取行动。[[131]](#footnote-131)131但实际上，委员会开始就某项专题进行实质性审议前，一般会征得大会的同意。大会也可要求委员会优先处理大会请它处理的任何编纂问题（第18条）。

委员会在早些年收到了大会的若干建议和特别任务，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建议。1996年，委员会对近年来很少使用的章程的相关规定表示关切，建议应该鼓励大会和通过大会鼓励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机构向委员会提交可能采用的涉及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的专题。[[132]](#footnote-132)132

委员会按照章程的规定开展了两次国际法调查，第一次是1949年在其第一届会议上以题为“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编纂工作的国际法概览”的秘书处备忘录为基础的调查，[[133]](#footnote-133)133第二次是在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上以秘书处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为基础进行的调查，[[134]](#footnote-134)134其中主要依据的是秘书长根据大会要求起草的题为“国际法概览”的工作文件。[[135]](#footnote-135)135

委员会在开展了近五十年的工作后，在1996年举行的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分析了逐渐发展和编纂的范围，以便对一般国际公法的主要领域进行全球审查，制定了关于分列在国际公法十三个主要领域下的国际法专题的总体计划，该计划并不是详尽无遗的，其中包括委员会已着手审议的专题，委员会正在审议的专题和今后可能审议的专题。[[136]](#footnote-136)136

除调查外，委员会还对其工作方案进行定期审查，以便考虑到大会的建议和国际社会的现实需要，不断加以更新，并取消那些不再适宜于处理的专题。[[137]](#footnote-137)137这种审查有时是应大会的请求进行的。[[138]](#footnote-138)138

（b）挑选专题的程序和标准

自1992年以来，国际法委员会对其未来工作专题的挑选依据的是委员会或其秘书处[[139]](#footnote-139)139指定的委员据以编写关于预选清单上某一专题的简短概要或解释性概述的程序，[[140]](#footnote-140)140其中说明了：（一）专题提出的主要问题；（二）任何适用的条约、一般原则或相关的国家立法或司法决定；（三）现有的理论；和（四）如委员会决定将该专题列入工作方案，则草拟一项报告、一份研究报告或公约草案有何得失利弊。[[141]](#footnote-141)141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审议了委员会委员编写的关于各项专题的概要或概述，以确定委员会将来可能审议的专题。工作组主席在每届会议上向规划小组作口头年度进展报告，并在五年期最后一年提交最后书面报告，其中载有所建议的专题清单，以便列入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并且附上提交大会的委员会年度报告后附的摘要。[[142]](#footnote-142)142规划小组审议和通过该报告后将其提交给委员会。委员会在全会上审议和通过该报告，并将其载入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专题清单的目的是协助挑选专题以便列入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同时考虑第六委员会的意见。专题清单的作用与五十多年来指导委员会挑选专题的1949年清单相类似。

委员会建议在确定今后可能探讨的专题时继续遵守这一挑选程序，认为这一程序是一个改进。[[143]](#footnote-143)143

在挑选专题时，委员会遵守的标准如下：（一）专题应反映出各国在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方面的需要；（二）专题就国家实践而言处于高级阶段，有可能加以逐渐发展和编纂；（三）专题对于逐渐发展和编纂而言是具体和可行的；以及（四）委员会不应局限于传统的专题，也应考虑反映出国际法新的发展动态和整个国际社会所迫切关注的专题。[[144]](#footnote-144)144

截至2007年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开幕时，下列专题列入了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

⦁ 国家海事管辖范围以外的沉船的所有权及保护；

⦁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 国际组织的管辖豁免；

⦁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 信息跨界流动的个人数据保护；

⦁ 域外管辖权。

（c）关于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方案的专题

该委员会在1949年举行的第一届会议上，以题为“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编纂工作的国际法概览”[[145]](#footnote-145)145的秘书处备忘录为基础，对有可能列入研究专题清单的二十五个专题进行了审查。该委员会在审议这一问题后，草拟了一个临时清单，选定了以下十四个有待编纂的专题：

（1）国家和政府的承认；

（2）国家和政府的继承；

（3）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4）对于在国家领土以外犯罪的管辖权；

（5）公海制度；

（6）领水制度；[[146]](#footnote-146)146

（7）国籍，包括无国籍问题；

（8）外国人待遇问题；

（9）庇护权；

（10）条约法；

（11）外交交往和豁免；

（12）领事交往和豁免；

（13）国家责任；[[147]](#footnote-147)147以及

（14）仲裁程序。

委员会议定了包括十四个专题在内的1949年清单，但认为它只是临时性的，待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后，或依照大会的意愿，还可能进行补充或删减。在委员会审议某些专题的过程中作了一些修改。“国家和政府的继承”这一专题后来被分为三个分题，即关于条约的继承、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148]](#footnote-148)148和国际组织成员资格的继承。[[149]](#footnote-149)149 “公海制度”和“领水制度”基本上是单独审议的，但委员会在其1956年第八届会议上，在关于“海洋法”问题的最后报告中将在这些专题下通过的所有规则系统归集在一起。

委员会就1949年清单所列的除以下专题以外的所有专题提交了最后报告：

⦁ 国家和政府的承认；

⦁ 对于在国家领土以外犯罪的管辖权；

⦁ 外国人待遇问题；和

⦁ 庇护权。

委员会从未对前两个专题本身进行实质性审议。但是，可以将第二个专题视为列入了“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和“域外管辖权”专题范围内。[[150]](#footnote-150)150

委员会对其余两个专题进行了部分审议。委员会在从事“国家责任”专题工作的过程中部分审议了“外国人待遇问题”这一专题，但这一工作未能继续。委员会还在开展“外交保护”专题工作时对该专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审议，该专题也被视为“对外国人的驱逐”专题的一个方面。关于“庇护权”这一专题，在1949年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在讨论《国家权力和责任宣言》草案期间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将与庇护权有关的条款列入宣言草案。最后的决定是不列入这项条款。[[151]](#footnote-151)151后来，大会特别将该专题送交委员会审议。[[152]](#footnote-152)152委员会在1960年其第十二届会议上注意到大会的决议，决定将对这一问题的审议进一步推迟到下一届会议进行。[[153]](#footnote-153)153委员会在1977年其第二十九届会议上认为，在当时看来，该专题无需在不远的将来进行积极审议。[[154]](#footnote-154)154

五十多年来，1949年清单一直是国际法委员会基本的长期工作方案。后来又增加了以下专题：

（15）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

（16）纽伦堡原则的系统表述；

（17）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

（18）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易于查考的方法；[[155]](#footnote-155)155

（19）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156]](#footnote-156)156

（20）多边公约的保留；

（21）侵略定义问题；

（22）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157]](#footnote-157)157（专题的第一和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国际组织成员国代表的地位、特权和豁免，第二部分涉及国际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

（23）历史性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法律制度；

（24）特别使团；[[158]](#footnote-158)158

（25）扩大参加在国际联盟支持下所缔结的一般多边条约；

（26）最惠国条款；

（27）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相互间缔结的条约问题；

（28）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和不得侵犯问题；

（29）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30）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159]](#footnote-159)159

（31）多边条约拟定程序的审查；[[160]](#footnote-160)160

（32）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的第一和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涉及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第二部分涉及这些活动产生的越境损害造成损失时的国际责任）；

（33）对条约的保留；[[161]](#footnote-161)161

（34）国家继承方面的国籍（专题的第一和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涉及自然人的国籍问题，第二部分涉及法人的国籍问题）；[[162]](#footnote-162)162

（35）外交保护；

（36）国家单方面行为；

（37）国际组织的责任；

（38）共有的自然资源；

（39）国际法不成体系：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163]](#footnote-163)163

（40）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41）对外国人的驱逐；以及

（42）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

除1949年的清单所列专题外，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的上述专题可以分为四类：（一）作为委员会关于1949年清单所列某一专题的以往工作之具体后续行动的专题；（二）并非委员会以前工作的具体后续行动，但与1949年清单所列某一专题有一定关系的专题；（三）与1949年清单所列任何专题均无关系的专题；以及（四）大会分配给委员会的特别任务。

第一类由大会作为该委员会对1949年清单所列专题进行审议的后续行动而送交委员会的专题组成，其中包括：（22）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大会1958年12月5日第1289（XIII）号决议）；[[164]](#footnote-164)164（23）历史性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法律制度（大会1959年12月7日第1453（XIV）号决议）；[[165]](#footnote-165)165（24）特别使团（大会1961年12月18日第1687（XVI）号决议）；[[166]](#footnote-166)166（26）最惠国条款（大会1967年12月1日第2272（XXII）号决议）；[[167]](#footnote-167)167（27）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相互间缔结的条约问题（大会1969年11月12日第2501（XXIV）号决议）；[[168]](#footnote-168)168和（32）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大会1973年11月30日第3071（XXVIII）号决议）。[[169]](#footnote-169)169（23）、（24）和（27）项所列的专题是作为大会对以前由全权代表会议通过的有关该内容的决议进行审议的后续行动送交国际法委员会的。

第二类由并非是委员会以前工作的具体后续行动，但与1949年某一专题有关的专题组成，其中包括：（30）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170]](#footnote-170)170与外交信使和豁免专题有关；（33）对条约的保留；和（40）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这两个专题都与条约法专题有关；[[171]](#footnote-171)171（34）国家继承方面的国籍，这与国家和政府的继承专题以及包括无国籍的国籍专题有关；（35）外交保护及（37）国际组织的责任，这两个专题均与国家责任专题有关。[[172]](#footnote-172)172和（41）对外国人的驱逐，部分上与“外国人待遇”专题有关。

第三类由与1949年清单所列任何专题均无关系的新专题组成，其中包括：（29）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36）国家单方面行为；（38）共有的自然资源；[[173]](#footnote-173)173（39）国际法不成体系和（42）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174]](#footnote-174)174

第四类由大会要求委员会报告特定法律问题、审查特定案文或起草特定条款草案[[175]](#footnote-175)175的特别任务组成，其中包括：（15）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大会1947年11月21日第178（II）号决议）；（16）纽伦堡原则的系统表述（大会1947年11月21日第177（II）号决议）；（17）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大会1948年12月9日第260 B（III）号决议）；（19）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大会1947年11月21日第177（II）号决议）；（20）多边条约的保留（大会1950年11月16日第478（V）号决议）；（21）侵略定义问题（大会1950年11月17日第378（V）号决议）；（25）扩大参加在国际联盟主持下所缔结的一般多边条约（大会1962年11月20日第1766（XVII）号决议）；（28）外交代表的保护和不得侵犯问题（大会1971年12月3日第2780（XVV）号决议）；以及（31）多边条约拟定程序的审查（大会1977年12月8日第32/48号决议）。

大多数专题都是大会送交委员会审议的，这往往是委员会本身最初提议的结果。上述（33）-（42）项专题是委员会根据新的专题挑选程序选出的，一开始就列入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关于这些专题，大会核可了委员会对（33）对条约的保留，（34）国家继承方面的国籍，（35）外交保护和（36）国家单方面行为，（40）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41）对外国人的驱逐，（42）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等专题进行研究的决定；注意到委员会决定在其工作方案中列入（38）共有的自然资源，（39）国际法不成体系两个专题；请委员会开始就（37）国际组织的责任专题开展工作。

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当前未进行审议的，在1949年清单外新增加的所有专题和分题的最后报告，但下列专题除外：（22）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国际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23）历史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法律制度；和（34）国家继承方面的国籍专题的第二部分（法人的国籍问题）。[[176]](#footnote-176)176

在2007年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开始时，以下六个专题列入委员会的工作方案：（33）对条约的保留；（37）国际组织的责任；（38）共有的自然资源；（40）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41）对外国人的驱逐；以及（42）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

5. 工作方法

（a）逐渐发展和编纂

《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款（子）项的拟订者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审议了一项提议：不明确提及“修订”现有的国际规则，而是选用“逐渐发展”措辞，因为“它们可以与编纂相提并论，它们暗含对现有规则的修改和补充”，以便“在稳定和变化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而“修订”过于强调变化。[[177]](#footnote-177)177

在起草章程的过程中，十七国委员会认识到，授权委员会完成的各项任务在性质上各不相同：有的任务可能涉及就一项国际法还没有管制的主题或者法律还不太发达或者各国实践中还没有系统表述的主题起草一份公约；而其他任务可能涉及在还没有广泛的国家实践、先例和学说的领域更精确地表述并系统整理法律。与“逐渐发展”和后面的“编纂”相同，前面那种任务也被标榜为“为了便于工作”。[[178]](#footnote-178)178

委员会章程设想，通过草拟公约草案（第15条）逐渐发展国际法，章程还设想了当委员会的任务是编纂时其他两种结束其工作的可能方式：（a）简单地发表其报告；和（b）由大会通过表示注意到该报告或通过该报告的决议（第23条第1款）。[[179]](#footnote-179)179章程还规定了委员会在进行逐渐发展（第16和第17条）和编纂（第18至第23条）工作时所应采取的具体步骤。

尽管对这两个概念作出了区别，但十七国委员会认识到这两个概念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例如，在系统表述和系统整理现行的法律系统时，这可能导致有人建议各国通过某些新的规则。[[180]](#footnote-180)180在实践中这种洞察力已经受到关注。委员会指出，委员会章程对这两个过程的区别是不可行的，可以在对章程的任何审查中予以删除。[[181]](#footnote-181)181实际上委员会是以编纂和逐渐发展相互结合的概念为基点开展工作的。[[182]](#footnote-182)182委员会为其工作方法发展了一种综合程序，并将该方法加以灵活运用，根据有关专题的具体特点或其他情况需要进行调整。[[183]](#footnote-183)183

（b）审议过程

委员会在将某一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后不一定立即对该专题进行审议（自1992年以来，从长期工作方案的专题清单中挑选）。国际法委员会对其工作方案中某一专题的实际审议是在委员会作出将一项专题列入其下届会议议程的进一步决定后进行的。委员会是否决定开始处理某一专题主要受其他专题的审议情况和大会要求（如特别任务或优先处理某些专题或开始就某一特定专题开展工作的要求）的影响。[[184]](#footnote-184)184在有些情况下，将一项专题列入议程之前，必须先由为此目的成立的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开展初步工作（见第26和27页）。

委员会确立了审议其议程上的专题一般经历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步阶段，主要是组织工作和收集相关材料和先例；第二阶段是委员会开始对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条款草案进行一读的阶段；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是对临时通过的条款草案进行二读的阶段。[[185]](#footnote-185)185

第一阶段通常包括下列工作：任命特别报告员；制定工作计划；并在必要或可行时请各国政府[[186]](#footnote-186)186和国际组织提交数据和信息，并请秘书处提交研究计划、研究报告、概览和资料汇编。[[187]](#footnote-187)187

第二阶段通常包括下列工作：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审议特别报告员的报告[[188]](#footnote-188)188和在全体会议上及起草委员会内审议提议的条款草案；拟定条款草案和说明判例、委员会内部的任何意见分歧及考虑采取的各种解决方法的评注；[[189]](#footnote-189)189在起草委员会内批准临时条款草案并随后在全体会议上批准临时条款草案及其评注；作为委员会的文件印发临时草案及其评注并提交给大会，同时提交给各国政府以征求其书面意见。[[190]](#footnote-190)190鉴于经验表明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答复，所以，各国政府一般可有一年或更多的时间来研究这些临时草案并在委员会开始对条款草案进行二读前提供书面意见。[[191]](#footnote-191)191

第三阶段通常包括：特别报告员对各国政府的答复，连同第六委员会辩论中所提出的任何意见一并进行研究；向委员会提交另一份报告，建议对临时草案作出适当的修改；根据各国政府的书面和口头意见在起草委员会审议和批准修改后的草案；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通过最后草案及其评注[[192]](#footnote-192)192以及关于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建议。[[193]](#footnote-193)193

委员会关于某项专题的任务在向大会提交关于该专题的最后报告时即已完成，通常附有委员会就该专题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建议。在有些情况下，大会请委员会对已提交最后报告的专题开展进一步的工作。[[194]](#footnote-194)194

国际法委员会普遍认为，从委员会章程对逐渐发展和编纂这两个概念所下定义的意义上讲，其草案既是对国际法的编纂，也是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它感到很难确定每项条款的类别。[[195]](#footnote-195)195委员会通常建议大会采取章程设想的关于国际法编纂的行动，即（a）报告既已发布，不必采取行动；（b）以决议方式表示注意或通过这项报告；（c）向会员国推荐这项草案，以求缔结一项公约；或（d）召集会议以缔结一项公约（第23条第1款）。

正如第三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国际法委员会曾在括号内标明的年份里，建议大会就各项条款草案采取如下行动：（a）不对毗连区草案采取行动，因为涉及毗连区的报告已经出版（1953年）；（b）通过载有关于大陆架和捕鱼区草案的报告（1953年）[[196]](#footnote-196)196和仲裁程序示范规则（1958年）；（c）以宣言形式通过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的国籍问题条款草案（1999年）；（d）建议会员国就如下专题缔结公约：仲裁程序（1953年），消除或减少未来无国籍状态（1954年），[[197]](#footnote-197)197外交交往和豁免（1958年），特别使团（1967年），[[198]](#footnote-198)198最惠国条款（1978年），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1994年），[[199]](#footnote-199)199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2001年）和外交保护（2006年）；[[200]](#footnote-200)200（e）召集会议以就如下专题缔结公约：海洋法（1956年），领事交往和豁免（1961年），条约法（1966年），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1971年），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1974年），关于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国家继承（1981年），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相互间缔结的条约问题（1982年），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及两项任择议定书（1989年），和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1991年）；（f）注意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并随后考虑召开会议以缔结一项公约（2001年）；以及（g）核准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第二部分的原则草案（2006年）。委员会还提请大会注意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面声明的指导原则（2006年）和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小组的结论（2006年）。[[201]](#footnote-201)201

（c）特别任务

在执行特别任务时出现一个问题，即委员会是否应使用其章程为完成其逐渐发展与编纂的正常工作而规定的方法，或者说它是否可以自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方法。委员会一向决定，它可以自行采取特殊的方法来执行特殊的任务。[[202]](#footnote-202)202委员会经常背离其正常阶段的工作，在没有任命特别报告员或不进行一读和二读的情况下，在整个委员会内或在工作组内审议特别任务。[[203]](#footnote-203)203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只报告其结论供大会审议，而不建议采取委员会章程第23条第1款规定的任何行动方针。在另一些情况下，委员会在执行特别任务时几乎使用了与逐渐发展和编纂同样的工作方法，提交了条款草案及其评注，在有些情况下还提交了大会行动建议。[[204]](#footnote-204)204

委员会在括号内标明的年份里，提交了关于下列特别任务的报告：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1949年）；纽伦堡原则的系统表述（1950年）；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1950年）；侵略定义问题（1951年）；多边条约的保留（1951年）；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1951年、1954年、1994年[[205]](#footnote-205)205和1996年）；扩大参加在国际联盟主持下所缔结的一般多边条约（1963年）；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和不得侵犯问题（1972年）；和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查（1979年）。

委员会就下列特别任务提出的报告中载有附有评注的条款草案：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纽伦堡原则的系统表述，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以及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和不得侵犯问题。根据委员会就其他特别任务取得的结论，是不宜就其拟订条款草案的。

（d）工作方法的审查

委员会应大会要求或按照其自行决定，根据第六委员会或国际法委员会自身的意见和建议，对其工作方法进行了定期审查。[[206]](#footnote-206)206委员会随后进行了旨在加快或简化其程序的若干改革，以便更迅速地对任务作出反应。[[207]](#footnote-207)207

委员会在1958年第十届会议上，以主席参照第六委员会的意见起草的关于前几届会议的工作文件为基础，审议了可以加快其工作的各种方法。[[208]](#footnote-208)208此次审查后，委员会在全体会议、起草委员会和政府评论方面对其工作方法作了一些修改。国际法委员会认为，就一项困难或复杂的专题拟订草案时，在初始阶段更多地使用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可能是有益的。这样，在全体会议上要作的工作就会减少。国际法委员会决定，今后应按照起草委员会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的方式正式组建起草委员会，即该委员会不仅可以负责处理纯属起草方面的问题，还可以负责国际法委员会全体未能解决或似乎可能引起不必要冗长讨论的实质性问题。国际法委员会还决定在起草初稿的届会后举行的第二届会议上起草最后草案，此次会议将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各国政府对委员会拟订的初稿进行评论，让国际法委员会审议这些评论意见和让特别报告员就这些评论意见提出建议。[[209]](#footnote-209)209

在1968年举行的第二十届会议上，委员会以秘书处起草的工作文件为基础审查了其工作方法。[[210]](#footnote-210)210此次审查的结果是委员会提出了如下建议：将委员的任期从五年延长至六年或七年；向特别报告员提供额外的特殊津贴，协助支付与其工作有关的费用；增加编纂司的工作人员人数，从而使该司可以向委员会及其特别报告员提供更多的帮助。[[211]](#footnote-211)211

委员会在1975年第二十七届会议上成立了扩大的主席团的规划小组，以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并就其工作提出建议。规划小组的初步计划是对委员会的现有工作量进行审查，以便提出委员会在其截至1981年的五年任期中进行努力的总的目标。[[212]](#footnote-212)212委员会为完成其正在审议的专题的工作而确立的总目标得到了大会的认可。[[213]](#footnote-213)213自1977年以来，委员会的每届年会都成立一个规划小组，[[214]](#footnote-214)214并责成该小组审议委员会的工作方案、组织和方法。

委员会在1978年第三十届会议和197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在根据大会1977年12月8日第32/48号决议审议“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查”这一专题的背景下审查了其工作方法。[[215]](#footnote-215)215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审议该专题提出的初步问题，并就按大会要求准备采取的行动向委员会提出建议。委员会随后通过了工作组的报告，[[216]](#footnote-216)216该报告载有关于下列内容的详细意见：（1）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机构的国际法委员会；（2）委员会的目标和职能；（3）委员会的作用及其通过拟订条款草案对条约拟订程序所作的贡献；（4）委员会通常用于拟订条款草案（不区分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的综合方法和技术，包括特别报告员、起草委员会和委员会在审议一项专题的三个阶段中各自发挥的职能；（5）委员会使用的其他方法和技术（例如在特别任务方面）；（6）委员会与大会的关系；和（7）以委员会起草的条款草案为基础，按照大会的有关决定拟订和缔结公约。委员会除其他外认为，章程提供的技术和程序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非常适于实现章程第1条规定的委员会的宗旨，即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委员会注意到可能有必要向特别报告员提供更多的协助和便利，使他们能够在今后履行职责和对各国政府使用比过去更多的调查表。但委员会未建议对其工作方法进行任何重大修改。

委员会在1987年第三十九届会议上按照大会1986年12月3日第41/81号决议的要求全面审议了其工作方法的一切方面。规划小组为此目的成立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工作组。结果，国际法委员会尽管坚持认为不应对经过检验的方法进行根本性的或草率的改动，但同意可对其程序的某些具体方面进行有益的重新审查。委员会认为起草委员会在协调各种观点和制定可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法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应在最佳条件下工作。至于起草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国际法委员会意识到，尽管存在实际限制因素，但必须对两种合理的考虑加以协调，这两种考虑是：起草委员会中各大法系和各种语言应具有公平的代表性，而且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人数应以同起草任务相称为限。为方便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起见，国际法委员会主席应在可能的情况下指出全体会议辩论中所显现的主要意见倾向。国际法委员会意识到，过早地将条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以及送交条款草案与起草委员会实际审议这些草案之间的时间间隔过长，会产生相反的作用。[[217]](#footnote-217)217

国际法委员会在1992年第四十四届会议上按照大会1991年12月9日第46/54号决议的要求，全面审议了其工作方法的一切方面。按照规划小组的建议，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了与起草委员会有关的准则和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关于起草委员会之组成和工作方法的准则规定如下：（a）起草委员会将继续是由一个主席领导的单一机关，但可以由不同的成员研讨每一专题；（b）在国际法委员会的任何一届会议上，起草委员会通常应集中研讨两个到三个专题，以便达到较高的效率；（c）起草委员会主席应同国际法委员会的其他主席团成员磋商，然后推荐研讨每一专题的成员；（d）研讨每一专题的成员应不超过14名，并应尽可能包括熟悉各种不同工作语文的委员；（e）不是起草委员会某一专题研讨成员的委员可列席会议，偶尔可以准许其发言，但建议加以限制；（f）应给起草委员会必要的时间，以便及时完成受托的工作；（g）必要时可以给起草委员会更多的时间来集中完成工作，这些时间最好安排在某一届会议的开始阶段；（h）起草委员会应于结束对每一专题的审议后，尽早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交报告。与国际法委员会年度报告的编写方式和内容有关的准则除其他外规定如下：（a）总报告员在编写委员会报告中应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必要的协调和一致，要谨记继续努力避免编写过于冗长的报告；（b）报告应扼要阐述本届会议的工作，并编列一份问题清单，第六委员会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有帮助。[[218]](#footnote-218)218

国际法委员会在1994年第四十六届会议和1995年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审议了与条款草案有关的工作方法。委员会审查了讨论和通过评注的条件，议定在每届会议上尽早处理条款草案的评注，以求得到必要的注意程度，并进行单独讨论，而不是在通过委员会年度报告的框架内处理。委员会注意到附于条款草案的评注的内容和篇幅部分取决于专题的性质和判例及其他有关资料的范围。不过，委员会鼓励特别报告员起草尽可能简短的评注，并适当注意各专题的条款草案的评注在格式和篇幅上要尽量统一。[[219]](#footnote-219)219

委员会在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审查了其工作程序，以便按照大会1995年12月11日第50/45号决议的要求，进一步增进其对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的贡献。规划小组成立了一个非正式工作组，该工作组讨论了一切相关问题。委员会通过了规划小组的报告，[[220]](#footnote-220)220其中载有与全体会议、起草委员会、工作组、特别报告员和国际法委员会年度报告有关的如下建议：（a）应对全会的辩论制度作出变革，以提供更多的结构，考虑到由主席在辩论结束时作出结论的指示性摘要，必要时以指示性表决为基础；（b）应维持起草委员会对不同专题有不同成员的制度；（c）应该更加广泛地使用工作组，以解决特定的意见分歧，并在适当情况下以之作为处理整个专题的迅速方式，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作组通常代替起草委员会采取行动；（d）特别报告员应说明计划于下一届会议开展的工作的性质和范围，同由委员组成的协商小组一起工作，在提交条款草案时也提交评注草稿或说明，并根据起草委员会所作的更改予以修订，在全会辩论时备齐评注，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应在届会开始前准备好；（e）如有可能，委员会应在通过条款草案前确定需要征求第六委员会意见的具体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应该简短，侧重主题，尽量突出关键问题并加以说明，以期有助于作出在第六委员会就报告进行辩论的安排。[[221]](#footnote-221)221委员会还建议应在每个五年期开始时确立目标，并在五年期结束时进行审查，同时审查应该进行的任何准备工作，以便能够在下一个五年期的第一年年初通过该五年期的计划。[[222]](#footnote-222)222大会赞同地欢迎国际法委员会为提高其效率和生产率就其内部事项采取的步骤，鼓励委员会继续采取这些措施。[[223]](#footnote-223)223

6. 国际法委员会的会议

（a）议事规则

作为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国际法委员会的议事程序依据大会与委员会议事程序有关的议事规则（第九十六条至一三三条）和第四十五条（秘书长的职责）及第六十条（公开和非公开会议），除非大会或国际法委员会另有决定。[[224]](#footnote-224)224委员会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决定这些议事规则适用于委员会的议事程序，委员会应在必要时通过自己的议事规则。[[225]](#footnote-225)225

（b）议程

国际法委员会在每届会议开始时通过本届会议的议程。临时议程由秘书处根据委员会的决定和章程的相关规定制定。通过的议程上所列各项目的顺序不一定代表委员会对这些项目进行实际审议的顺序，后者往往属于临时决定的结果。每届会议的议程将同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区分开来。工作方案的所有专题未必都列入某届会议的议程。[[226]](#footnote-226)226委员会会认真考虑大会提出的将某项专题列入其下一届会议的建议。但委员会在决定是否应采纳在秘书处拟订的临时议程中没有反映的这一建议时，会参照它以前作出的与本届会议的工作计划有关的决定。[[227]](#footnote-227)227

（c）语文

国际法委员会的官方语文同联合国一样，即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228]](#footnote-228)228附属机构的讨论主要用英语和法语，恰好与讨论中的案文的工作语文一致，但成员可随时使用其他正式语文。[[229]](#footnote-229)229

（d）决策

国际法委员会主席可宣布会议为公开会议，在至少有四分之一成员出席时允许进行辩论。但委员会作出决定时要求委员会过半数的成员出席。此外，可以不时地吁请委员会主席或附属机构视情况作出裁定（一般都是对程序事项作出裁定）。[[230]](#footnote-230)230决定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过半数成员作出。弃权的成员视为没有参加表决。[[231]](#footnote-231)231

在委员会成立的早期，决定通常以表决方式作出。后来，委员会更常见的做法是不表决而按照共同理解或协商一致意见作出关于程序和实质性事项的决定。[[232]](#footnote-232)2321996年，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和附属机构中讨论了表决的方法，并提出了一些建议。[[233]](#footnote-233)233委员会注意到，尽管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234]](#footnote-234)234目前希望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但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就临时和暂定问题或详细问题作出决定时，进行指示性表决会减轻负担，而且不太费时。少数人的意见可以在简要记录和委员会的报告中反映出来。“如果最后要作出决定，则也应尽力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但如果在现有时间内不能作到这一点，也许需要进行表决。”[[235]](#footnote-235)235

（e）委员会的报告

委员会在每届会议结束时都会以总报告员在有关特别报告员和秘书处协助下拟订的草案为基础，通过提交给大会的关于本届会议工作的报告。[[236]](#footnote-236)236

报告包括与本届会议的组织、工作进展情况[[237]](#footnote-237)237和委员会关于本届会议期间进行实质性审议的专题的未来工作等有关的信息，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和评注，委员会吁请大会作出决定的程序性建议，以及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238]](#footnote-238)238

报告的结构不时作出调整。[[239]](#footnote-239)239目前，报告主要分为以下各章：第一章讨论组织问题；第二章总结本届会议的工作；第三章确定各国政府的评论对委员会特别有意义的具体问题；后面各章分别讨论本届会议期间审议的不同专题中的一个专题；最后一章包含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委员会有时也可决定在报告附件中列入其他相关文件，如工作组的报告，或者委员会对个别专题编写的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并作为其报告附件的纲要。[[240]](#footnote-240)240

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是委员会定期向大会通报其当前工作方案中各项专题的工作进展情况和它在拟订这些专题的条款草案方面取得的成就的一个途径。该报告还是按照委员会章程第16和第21条规定对委员会草案进行必要宣传的一种手段。[[241]](#footnote-241)241

（f）简要记录

自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向其提供临时形式和最终形式的会议简要记录，[[242]](#footnote-242)242这符合大会的一贯政策。[[243]](#footnote-243)243委员会在1980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认为，提供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是委员会工作程序和方法以及编纂一般国际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委员会注意到，从其工作程序和方法来看，对简要记录的需要是由委员会的职责和组成等条件决定的。由于它的任务主要是拟订草案，为各国制定法典文件提供基础，委员会内就建议的各种方案进行的辩论和讨论，从实质内容和措辞来看，对理解委员会向各国提出的规则是极其重要的。根据委员会的章程，委员会委员都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工作，不代表政府。因此，各国理所当然不仅要知道载入委员会报告的整个委员会的结论，而且还要知道委员会简要记录所载的每一个成员的结论，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委员会委员是大会选举出来的，为的是要确保委员会有世界各主要文明形式和各主要法系的代表。委员会的简要记录也是使各国际机构、学术界、大学和一般公众得以了解委员会讨论情况的一种办法。在这一点上，它们在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方面，对促进人们了解和重视这项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委员会强调了以临时和最后形式提供其会议简要记录的重要性，并对大会这样作表示感谢。[[244]](#footnote-244)244

（g）委员会年鉴

大会应国际法委员会的请求，在1955年12月3日第987（X）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安排下列文件的印制：（a）以其原件所用语文印刷前七届会议的主要文件（即向委员会提出的研究文件、报告、主要决议草案及修正案），并先以英文印刷这些会议的简要记录；和（b）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印制以后各届会议的主要文件和简要记录。根据上述决议，便印制了一种题为《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的年度出版物，每届会议分为两卷（只有一卷的第一届会议除外）。年鉴自1969年起还以俄文出版，自1982年起以阿拉伯文出版，自1989年起以中文出版。年鉴第一卷载有委员会各次会议的简要记录，第二卷转载主要的文件，包括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报告。第二卷现分为两部分出版，自1976年以来，第二部分转载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年度报告。[[245]](#footnote-245)245

（h）文件限制

委员会时常讨论联合国的文件管制和限制规定是否适用于它自己的文件这一问题。[[246]](#footnote-246)246委员会注意到其文件的篇幅取决于一系列可变因素，例如：（一）在年度报告方面：届会的持续时间，审议的专题，条款草案及其评注以及委员会对需要向大会和会员国说明在本届会议上完成的工作和说明年度报告中所载的条款草案合理性的认识；[[247]](#footnote-247)247（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的相关信息数量：因为委员会完全需要以委员会使用的各种工作语文全文刊出的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其提供信息的要求所作的答复；[[248]](#footnote-248)248（三）在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工作文件方面：有关专题的范围和复杂性，委员会关于该专题的工作阶段，特别报告员所提建议的性质和数量，尤其是具有来自国家惯例和原则的辅助资料的条款草案，其中包括对大会有关辩论的分析，以及各国政府提交的评论和意见；[[249]](#footnote-249)249和（四）在秘书处进行的调查研究方面：通常反映对委员会研究其方案各种专题并就其根据章程第20条提交大会的草案编写评注必不可少的“条约、司法裁决和原则”以及“国家实践”的各项研究的性质。[[250]](#footnote-250)250委员会多次指出，文件的管制和限制规定如果适用于它自己的文件，将会使有关文件不适合其预期目的。“在法律研究工作上——编纂国际法需要进行法律研究——不能对文件的长短加以限制。”[[251]](#footnote-251)251大会在若干场合核可了这一结论。[[252]](#footnote-252)252

委员会在2003年第五十五届会议上回顾了使篇幅限制不适合其文件的委员会工作的某些特点。[[253]](#footnote-253)253委员会特别指出，成立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协助大会履行其依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所承担的义务。这项义务的产生是由于参与起草《宪章》的人们认识到，如果要以一致意见达成国际法律规则，那么在国际法的许多领域，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中必须对国家惯例进行分析和确切阐述。因此，按照其章程，委员会必须根据现有法律和有关依照国际社会当前需要而逐渐发展的要求，证明其向大会并最终向各国提出的建议是正确合理的。这意味着特别报告员报告中所载的条款草案或其他建议以及委员会报告本身都必须援引大量的国家惯例、原则和判例作为依据，并根据其章程第20条的要求附上大量评注。委员会指出，其文件出于下述原因也是必不可少的：（1）它们是向各国咨询并获得其意见这个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2）它们能协助每个国家理解并解释各项编纂的公约中规定的规则；（3）它们是这些公约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并且在各国的外交信函、在国际法院面前辩论时和在国际法院自己的判决中经常被提及或引用；（4）它们有助于根据联合国的有关方案传播关于国际法的信息；以及（5）它们与条款草案本身一样是委员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并且使委员会能够根据其章程履行大会交付的任务。[[254]](#footnote-254)254

委员会因此重申了它以前得出的结论，即企图预先抽象地限制其文件的最大篇幅是完全不适当的。[[255]](#footnote-255)255同时，委员会再次强调，委员会及其特别报告员充分意识到有必要在联合国文件总量方面尽可能节约，并将继续铭记这一点。[[256]](#footnote-256)256

（i）每届会议的会期

委员会的章程没有规定其每届会议的会期。至1973年，委员会的会议通常持续十个星期。1973年，大会批准委员会1974年第二十六届会议的会期为12个星期。[[257]](#footnote-257)257后来，大会“鉴于国际法委员会现有工作方案的重要性，核可该委员会每年为期十二个星期的会期，但必要时可由大会加以复核”。[[258]](#footnote-258)258

自1974年以来，委员会的届会通常持续十二个星期。[[259]](#footnote-259)259大会最近在1995年12月11日第50/45号决议中表示，由于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工作的需要以及委员会议程上各项主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应维持其惯常的会期。

委员会在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应大会第50/45号决议的要求审查其工作程序时对其会期进行了审议。委员会表示，原则上委员会应该能够逐年决定下一届会议可能需要的会期（即十二个星期或少于十二个星期），需要考虑到工作状况和大会为完成某些专题所规定的任何优先次序。委员会愿意恢复到每届会议十个星期的老做法，但在某些年份，特别是五年期的最后一年，如有需要，则可以延长至十二个星期。[[260]](#footnote-260)260自1996年以来，委员会在1997年、2002年、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举行的第四十九届、第五十四届、第五十五届、第五十六届和第五十七届[[261]](#footnote-261)261会议持续了十个星期；1998年举行的第五十届会议持续十一个星期；1999年、2000年、2001年和2006年举行的第五十一届至五十三届和第五十八届会议持续了十二个星期。

（j）分期会议

没有将委员会的年度届会分为两期的法定规定。委员会通常一次性举行年度届会，但1965和1966年在日内瓦和摩纳哥举行的第十七届会议例外。

委员会在1992年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在审查其工作方案、程序和方法的背景下审议了将年度届会分为两期的可能性。委员会审议了其工作效能方面的优点和行政与经费问题方面的缺点。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将年度届会分为两期的建议当时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因此应该暂时按照现有的安排提高委员会的工作效能。[[262]](#footnote-262)262

委员会在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重新讨论了与届会的组织和会期长短有关的分期问题。赞成届会一次性举行者认为，要保证优先专题产生最好的结果，包括认真审议提议的条款草案，同时保持其他专题的进展和方向，届会必须连续不断。赞成届会分期者认为，届会分期有利于委员会委员的思考和研究，能够作好闭会期间的准备工作，使第二期会议更富有成果；可以鼓励举行非正式的闭会期间工作，使特别报告员有时间重新考虑提议；使起草委员会或工作组在第一期会议结束时或第二期会议开始时可以集中工作；并使得委员会委员的出席情况更好，更连续。委员会注意到分期举行届会与持续举行相比不会明显多花钱，决定建议在1998年试行分期举行届会，以便在实践中评估这个办法的优点和缺点。[[263]](#footnote-263)263

委员会1998年第五十届会议分两期举行，第一期在日内瓦举行，第二期在纽约举行。委员会议定继续分期举行届会至2000年，每届会议以均匀分配的两期举行，两期会议期间具有合理的时间间隔。[[264]](#footnote-264)264

委员会在1999年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应大会1998年12月8日第53/102号决议的要求审查了分期届会的优缺点。委员会根据1998年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分期举行届会更加切实有效，便于成员持续出席会议。委员会不认为分期会议有任何缺点。分期会议可能需要较多的经费，但提高工作效率和采取节约成本的措施就能弥补这一点。委员会特别建议调整两期会议间的工作组织情况，使前期会议最后一两周和/或后期会议开头一两周用于只需要有限的委员会委员出席的会议。[[265]](#footnote-265)265根据大会1999年12月9日第54/111号决议和2000年12月12日第55/152号决议，这一措施在2001年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上被付诸实施。[[266]](#footnote-266)266

委员会得出这些结论是基于以下理解，即它可以在其会议的性质和会期方面根据需要保持一种灵活的做法。[[267]](#footnote-267)2672000年至2006年举行的委员会第五十二届至第五十八届会议都是分两期举行的。

（k）地点

委员会除了第一届会议是1949年在纽约（成功湖）举行，第六届会议是1954年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第十七届会议的第二期会议是1966年1月在摩纳哥举行和第五十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是1998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以外，其他所有会议都是在日内瓦举行的。

委员会章程第12条最初规定委员会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同时承认委员会经与秘书长协商后，有权在其他地方举行会议。但委员会与秘书长协商后，决定1950至1955年的第二届至第七届会议在日内瓦举行。[[268]](#footnote-268)268同纽约相比，委员会更愿选择日内瓦，这是因为日内瓦的氛围和法律图书馆更有利于一个法律专家机构的研究工作，并且因为日内瓦所处的位置简化了秘书处为举行会议所作的安排。[[269]](#footnote-269)2691955年，大会按照委员会的建议，[[270]](#footnote-270)270修改了章程第12条，规定委员会应在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开会。[[271]](#footnote-271)271

在推行分期届会这一做法的过程中，委员会考虑在五年期的中期在纽约举行分期届会第二期会议，以加强委员会与大会及其第六委员会之间的关系。[[272]](#footnote-272)272

（l）国际法讨论会

自1965年以来，国际法讨论会一直是委员会各届会议的一个特色部分，有数百名青年专业人员通过讨论会被介绍到联合国和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在讨论会期间，与会者作为观察员出席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听取特别安排的演讲，并参加关于特定专题的小组讨论。

7. 同各国政府的关系

各国政府在委员会关于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工作的每一阶段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就各个政府而言，它们可以向委员会提交提议或公约草案供其审议，在委员会开始工作时提供资料，并随着工作的进展对其草案发表评论。就各国政府集体而言，它们有时决定一项工作是否开始或置于何等优先地位，并一直就工作成果作出决定。

（a）同各国政府的直接关系

章程规定委员会应审议联合国会员国直接提交的提议和多边公约草案（第17条，第1款）。[[273]](#footnote-273)273实际上，委员会从未收到会员国直接提交的这种提议或草案，而是由大会通常在第六委员会审议后转交的。

委员会章程还载有旨在使各国政府在委员会工作的每一阶段都有机会表明其意见的规定。委员会在开始工作时应：（a）向各国政府寄发调查表，请它们提供与其逐渐发展工作计划所列的项目有关的资料和情报（第16条（c））；或（b）向各国政府提出具体详尽的要求，请它们提供法律案文、法令、司法判决、条约、外交信件和其他与为了编纂目的而研究的专题有关的文件（第19条，第2款）。委员会还应邀请或请求各国政府提供关于委员会载有初步草案并附带适当解释、补充材料和各国政府提交的资料的文件的评论（第16条（g）至（h）和第21条）。最后，委员会在编写最后草案和解释性报告时应考虑这些评论（第16条（i）和第22条）。

委员会注意到各国政府提交的材料、评论和意见在委员会的编纂方法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委员会是一个由以个人身份参加工作的法律专家组成的常设机构，它与各国政府间通过提交材料和书面评论和意见等各种方法互相发生影响，这是大会创立的在委员会协助下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和编纂的制度的核心。[[274]](#footnote-274)274

委员会指出，令它感到关注的是，实际上各国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提供的有关特定专题的数据和评论都是有限的。[[275]](#footnote-275)275委员会力求使送交各国政府的调查表比较“方便用户”，确切说明要问些什么和为什么要问。[[276]](#footnote-276)2761958年，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它“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的工作往往由于在获取和处理各国政府的评论的程序方面存在不足而受到妨碍”，因此，它决定给予各国政府更多的时间来起草其评论。[[277]](#footnote-277)277大会曾多次指出，同关注国际法的国家组织和个别专家协商可帮助各国政府考虑是否就委员会提出的草案发表评论和意见，并帮助它们拟定其评论和意见。[[278]](#footnote-278)278这些书面评论中补充了在第六委员会就国际法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进行年度辩论期间作出的评论。[[279]](#footnote-279)279

在委员会将关于某一专题的最后草案提交大会后，大会通常都要求得到各国政府有关该草案的评论。大会第六委员会在召开外交会议前对该专题进行进一步审议时，或者在由大会本身对公约进行拟订（如特别使团、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外交代表和其他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和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时，或被请求就有关专题起草公约的外交会议对公约进行拟订时都要审议这些评论。偶尔也请各国政府在召开外交会议前提出其对该委员会条款草案的修正意见（如领事交往和豁免，以及条约法）。这些修正意见随后送交给外交会议。

（b）同大会的关系

大会通常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议，请求国际法委员会研究或继续研究若干专题，或优先处理国际法委员会本身业已选定的专题中的某些专题；大会曾拒绝，或推迟就国际法委员会的某些草案和建议采取行动；曾将草案交回国际法委员会重新审议和重新起草；曾请国际法委员会就与条款草案有关的悬而未决的实质性问题提出评论；曾决定召集外交会议以研究和通过委员会拟订的公约草案；也曾决定审议和通过委员会起草的公约草案（见第 页）。[[280]](#footnote-280)280在作出这些集体决定前，有时常常要对大会及其第六委员会在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中应起的适当作用进行讨论，这些决定有时也引起这方面的讨论。这类辩论以及由此产生的若干决议便逐步形成了这两个机构间工作关系的总的格局。

尽管委员会章程并未就有关问题作出规定，但委员会自第一届会议以来，都向大会提交一项有关每届会议工作情况的报告。第六委员会每年都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这种已经确定的惯例促进了大会同该委员会现有关系的发展。委员会主席在第六委员会介绍了其报告，并出席了审议该报告的会议，委员会还根据大会1989年12月4日第44/35号决议第5段的条款指派了一位特别报告员出席第六委员会的会议。主席和特别报告员可在会议期间就各代表团的评论发表意见，还可与各代表团进行非正式会晤。每年都有一些国际法委员会的委员由其本国指派到第六委员会担任代表。当选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人中有一些曾担任过其国家在第六委员会的代表。[[281]](#footnote-281)281

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编写形式和内容方面作了一些改变，以便在第六委员会进行结构更合理、重点更突出的辩论。1992年，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其报告的编写方式和内容的准则，这些准则除其他外规定如下：（a）继续作出努力以避免编写一份过于冗长的报告；（b）报告应辟一专章，扼要阐述对报告所涉本届会议工作的总的看法，包括编列一份问题清单，委员会认为第六委员会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有帮助；（c）报告陈述关于每个专题以前工作的那些部分仍应尽量简要；（d）辩论摘要应更加紧凑简洁，着重叙述意见的倾向性，而不是详细记载个人的看法。但是应该载明委员们就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所表示的保留意见；和（e）对第六委员会只能在补充进一步内容后才能作出正式评价的零碎成果的表述应当非常简要，并说明这个问题将在未来的报告中加以更充分的陈述。[[282]](#footnote-282)282委员会请秘书处在届会结束后不久，在印发报告前分发报告中载有委员会工作摘要和各国政府就其发表的意见将特别有益的具体专题的章节（第二章和第三章），以及每届会议上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283]](#footnote-283)283

第六委员会也曾努力改进其本身审议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方法，以便为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有效的指导，其中采用的方法有：（a）说明在大会下一届会议上在第六委员会内审议国际法委员会年度报告的日期；[[284]](#footnote-284)284（b）安排在10月底审议报告，以便代表们有时间仔细审查和起草关于9月印发的报告的发言；[[285]](#footnote-285)285（c）请国际法委员会在情况准许时，要求特别报告员在大会讨论该特别报告员负责的专题时出席大会会议；[[286]](#footnote-286)286（d）鼓励在第六委员会委员与出席大会会议的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之间举行非正式讨论；[[287]](#footnote-287)287以及（e）关于报告的辩论的结构安排应集中注意报告涉及的每一个主要专题。[[288]](#footnote-288)288第六委员会还就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报告的篇幅和内容提出了建议，包括缩短报告，重点讨论需要各国政府发表评论的问题。[[289]](#footnote-289)289大会建议继续努力改进第六委员会审议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方式，以便对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有效指导。[[290]](#footnote-290)290

第六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进行审议后，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291]](#footnote-291)291其中载有它审议议程项目的摘要，包括相关文件，以及建议大会通过的一项或多项决议草案。大会通常按照第六委员会的建议，并在不作任何修改的情况下，审议和通过关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指出大会收到的与国际法委员会的实质性和程序性工作有关的任何建议或指示。大会还按照第六委员会的建议，在必要时通过与涉及委员会工作的某项专题有关的一项单独决议或决定。[[292]](#footnote-292)292

第六委员会在向国际法委员会分配专题或确定某些专题为优先次序时曾指出总的政策方针，并运用其判断力来断定应对国际法委员会的最后草案和建议采取何种行动。然而，第六委员会倾向于很有节制地行使这种政策监督。尽管国际法委员会是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但是第六委员会仍然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国际法委员会应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大会不应对其下达详细的指示。[[293]](#footnote-293)293另一方面，委员会在其每届会议上，都充分考虑到大会向其提出的建议和第六委员会就委员会总的工作或其具体草案提出的意见。

第六委员会尽管认真地审议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却从未就其临时草案的形式或内容的改动作出过确切的指示，而且在编纂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前，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通过相应的编纂公约前，不对委员会提出的最后草案进行修改。对该委员会最后草案如果进行修改也是交给受托拟订公约的机构负责。有四次，即在处理“特别使团”、“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和不得侵犯问题”、“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和“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专题时，第六委员会本身受托担负拟订公约的任务，以便使这四项公约得到大会的通过。在拟订公约过程中，第六委员会大致上是参照发挥一个法典编纂会议的作用，它详尽地研究国际法委员会草拟的每一项条款草案的规定，并作了一些修改。[[294]](#footnote-294)294大会随后通过了第六委员会拟订的特别使团公约和有关该公约的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以及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公约（分别见附件五，E、G、L和M节）。

大会还经常邀请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某一专题的特别报告员作为咨询专家出席负责拟订相应的编纂公约的机构的讨论。[[295]](#footnote-295)295那些最后将国际法委员会的条款草案定稿并作为公约通过这些草案的国际会议一向十分敬重委员会在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展方面作出的努力。

大会还通过其各项决议促进在国际法委员会和各国政府之间建立和改善对话。秘书长将大会的相关决议以及与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有关的第六委员会的报告和会议简要记录转交委员会，并在必要时向其成员分发。此外，秘书处还起草了第六委员会审议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专题摘要，这是国际法委员会每届会议文件的一部分。

8. 同其他机构的关系

委员会章程的一些条款设想委员会可同各种其他机构建立关系，包括官方和非官方机构。委员会可审议大会以外的联合国主要机构、专门机构或根据政府间协定成立以鼓励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为宗旨的官方机构提出的提议或公约草案（第17条，第1款）。[[296]](#footnote-296)296此外，委员会还可：（a）就任何问题向主管该问题的联合国机构进行协商（第25条，第1款）；（b）与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的国际与国家组织进行协商（第26条，第1款）；[[297]](#footnote-297)297以及（c）与科学研究机构和个别专家协商（第16条（e））。[[298]](#footnote-298)298另外，委员会关于联合国机关主管范围内问题的文件被分发给可以向委员会提供资料或提出建议的有关机关（第25条，第2款）。章程还规定委员会应向关心国际法问题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分发文件（第26条，第2款）。

委员会只在其工作的早期收到过两次大会以外的官方机构提出的提议。委员会在其1950年和1951年的第二和第三届会议上获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了两项决议（1950年7月17日第304 D（XI）号决议和1950年8月11日第319 B III（XI）号决议），该理事会在这两项决议中请委员会研究两项主题：已婚妇女的国籍和消除无国籍状态。委员会结合1949年已经选定编纂的“国籍，包括无国籍问题”这一综合专题，研究了这两个主题。

委员会建议，应该鼓励大会和通过大会鼓励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向委员会提交可能采用的涉及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展的专题。委员会还建议，委员会应争取与在自己的领域内负有制定法律职责的联合国其他专门机构发展关系，特别应探讨在选定的专题方面交换资料甚至进行合作的可能性。[[299]](#footnote-299)299

委员会还就特定专题与各种官方和非官方机构进行了协商，其中包括：与粮食及农业组织就海洋法[[300]](#footnote-300)300和共有的自然资源[[301]](#footnote-301)301进行协商；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就国籍，包括无国籍状态[[302]](#footnote-302)302和国家继承方面的国籍问题[[303]](#footnote-303)303进行协商；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进行协商；[[304]](#footnote-304)304与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粮食及农业组织就共有的自然资源进行协商；[[305]](#footnote-305)305与一批专家就海洋法进行协商；[[306]](#footnote-306)306与哈佛商学院教授[[307]](#footnote-307)307和各研究小组[[308]](#footnote-308)308就国家责任进行协商；与禁止酷刑委员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儿童权利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就对条约的保留进行协商；[[309]](#footnote-309)309与法国国际法学会的成员就国际法不成体系进行协商；[[310]](#footnote-310)310与国际法协会就外交保护、国际组织的责任和长期工作方案进行协商；[[311]](#footnote-311)311以及与欧洲国际法学会就国际组织的责任进行协商。[[312]](#footnote-312)312

在有些情况下，委员会请有关组织提交有助于委员会确定今后专题工作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以及关于工作进展的评论和意见，[[313]](#footnote-313)313其中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相互间缔结的公约问题和对条约的保留。[[314]](#footnote-314)3142003年，委员会请秘书处每年将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专题的一章发给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以征求它们的意见。[[315]](#footnote-315)315

委员会还不断与科研机构和国际法教授进行协商、交流意见和互相交换资料，从而使委员会了解国际法学术研究的新发展和新趋势。例如，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联合国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问题座谈会，[[316]](#footnote-316)316以及关于国际法委员会在第一个五十年期间工作的讨论会，两者都是为了纪念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而举行的。[[317]](#footnote-317)317

在这些年里，委员会一直与国际法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18]](#footnote-318)318委员会通常邀请国际法院院长将法院的近期活动和目前接受的案例通知委员会，委员会委员有机会与院长交换意见。

委员会还与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和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美洲法律委员会及其他区域和区域间组织建立和保持了合作关系。这些委员会和组织的代表将其近期活动通知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的成员有机会与他们交换意见。国际法委员会经常派一名成员出席这些机构的届会和会议。委员会还建议进一步鼓励和发展与区域法律机构等其他机构的关系。[[319]](#footnote-319)319

委员会若干年来还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国际法委员会审议的专题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问题进行了协商。[[320]](#footnote-320)320

大会请委员会继续执行其章程的有关规定，以进一步加强委员会与关注国际法的其他机构间的合作。[[321]](#footnote-321)321

9. 秘书处

根据委员会章程第14条，联合国秘书长提供委员会完成任务所需的工作人员和设施。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编纂司担任委员会的秘书处。委员会认识到编纂司所作的重要贡献。[[322]](#footnote-322)322编纂司成员除其他外协助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拟订议程，进行记录和起草提交给委员会的报告草案。他们还协助编写条款草案的评注，尽管委员会一致认为这是特别报告员的主要职责。在可能没有特别报告员的工作组中，这种帮助是非常宝贵的。委员会建议应鼓励编纂司成员对委员会的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323]](#footnote-323)323

除了为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提供这种实质性服务外，编纂司还从事大量的研究工作，以便于委员会的工作。[[324]](#footnote-324)324在审议一项专题的初步阶段，编纂司可应委员会的要求或自行决定编写实质性的研究报告和开展研究项目，以方便委员会和有关报告员开始关于该专题的工作。委员会或有关报告员也可在审议一项专题的其他阶段要求秘书处编写研究报告和开展研究项目。在其1980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编纂司编写的研究报告和研究项目是委员会的综合工作方法和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是委员会的工作所不可或缺的。[[325]](#footnote-325)325

编纂司就有关逐渐发展和编纂的一般性问题[[326]](#footnote-326)326及委员会方案中的特定专题或其方面编写了许多研究报告和调查报告。[[327]](#footnote-327)327除1948年和1949年编写的报告外，所有这些研究报告和调查报告一般都刊登在《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上，或作为销售出版物发行。

主要为了协助委员会，编纂司还在《联合国法律丛书》中出版关于如下主题的法律、法令和条约规定汇编：公海制度，船舶国籍，领海制度，外交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特权和豁免，国籍，条约的缔结，为除航行以外的其他目的利用国际河流，国家的继承，海洋法，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和多边条约拟定程序的审查。[[328]](#footnote-328)328编纂司还在《国际仲裁裁决》上刊载仲裁决书原文。编纂司还建立和开通了国际法委员会的汇编综合网站[[329]](#footnote-329)329

委员会认识到，编纂司在为委员会及其特别报告员提供帮助，尤其是在研究领域提供帮助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委员会建议保持和加强编纂司对委员会工作的贡献。[[330]](#footnote-330)330大会在其1977年以来通过的关于委员会报告的各项决议中，都对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扩大编纂司的作用的建议表示赞同。

第三部分

国际法委员会审议的专题与分题

A. 委员会已提交最后报告的专题与分题

现将国际法委员会已向大会[[331]](#footnote-331)331提交最后报告的专题与分题方面的工作简述如下。[[332]](#footnote-332)332

1．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

大会1947年11月21日第178（II）号决议责成国际法委员会以巴拿马就这一议题所提出的宣言草案[[333]](#footnote-333)333和某些其他有关的文件进行的讨论为基础，草拟一份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

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逐条审议了巴拿马提出的草案。委员会还收到了秘书长的备忘录，备忘录特别转载了会员国对巴拿马草案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对联合国就这一主题进行的讨论的详细分析。[[334]](#footnote-334)334

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在三读后通过了带有评注的十四条条文形式的国家权利义务宣言最后草案，[[335]](#footnote-335)335宣言草案的全文转载于附件四第1节。委员会决定将草案转交给大会，认为应由大会来决定关于宣言草案应采取什么进一步的行动方案。[[336]](#footnote-336)336委员会还指出：

“宣言草案提出的权利和义务是以笼统的措词表述的，不带有限制的条件或例外，这种措词适合于一份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宣言。宣言草案的各条阐述了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方式将由更为准确的规则来规定。宣言草案第14条承认了这一事实。的确，这是一项支配整个草案的全面条款，委员会认为，在宣告‘国际法的至高地位’方面，它适宜于成为宣言草案其他各条的指针”。[[337]](#footnote-337)337

大会1949年12月6日第375（IV）号决议敦请各会员国及各国法学家对宣言继续予以注意并要求会员国对该草案提出意见。它还请会员国对下列问题提出建议：（1）“大会对该宣言草案应否再采取行动”；（2）“若然，将来供研讨之文件其确实性质应为如何，对此问题将来应采取何种程序。”

鉴于已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国家为数不多，不足以形成就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作出任何确定的决定的基础，因此大会1951年12月7日第596（VI）号决议决定暂缓审议该事项，“直至足数国家已提出了意见及建议，惟无论如何当于多数会员国业已提出此项答复时，立即着手审议。”

2．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易于查考的方法

国际法委员会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24条开始审议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易于查考的方法。在1950年第二届会议上委员会完成了这一专题的审议工作，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载有委员会所提议的具体方法。[[338]](#footnote-338)338

委员会建议：联合国机构发行的有关国际法的出版物应尽可能广泛地分发，尤其是国际法院的《裁决集》和其他出版物，《联合国条约汇编》以及《国际仲裁裁决集》。委员会还建议大会授权秘书处编写以下出版物：

（a） 一部法律年鉴，着重阐述各国重要的立法发展、临时国际仲裁庭当前的仲裁裁决和各国法院有关国际法问题的重要判决；

（b） 一套法律丛书，刊载各国关于当前具有国际意义的问题的立法案文，尤其是执行多边国际协定的立法；

（c） 一本各国宪法汇编，并不时地发行增补卷，以反映最近的状况；

（d） 一本由各国政府发行载有它们所缔结条约案文的出版物目录，并以在私人主持下发行的主要条约文集的目录进行补充；

（e） 一本《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的综合索引；

（f） 《联合国条约汇编》的不定期索引卷；

（g） 一本联合国关于国际法问题的惯例汇编；

（h） 《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的续编，第一套已经出版，共分三卷。

此外，委员会还建议，国际法院书记官处应出版不定期的国际法院裁决汇编的摘要；大会应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它们发表有关国际法的外交信函和其他材料的摘要是可取的；并且，大会应考虑是否需要缔结一项就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官方出版物进行一般交换的国际公约。

自从提出这些建议以来，大会已授权秘书长发行国际法委员会所建议的大多数出版物以及与委员会建议有关的某些其他出版物。[[339]](#footnote-339)339某些会员国的政府正在出版或编写它们与国际法相关的材料摘要。1958年教科文组织的大会已通过了两个公约，即《国家间交换官方出版物和政府文件公约》和《国际间交换出版物公约》。[[340]](#footnote-340)340

3．系统地表述纽伦堡原则

根据大会1947年11月21日第177（II）号决议，国际法委员会奉命系统地表述纽伦堡法庭组织法和该法庭判决书中所确认的国际法原则。

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对这一议题进行了初步审议。它收到了秘书长提交的题为“纽伦堡法庭组织法和判决书：历史和分析”的备忘录。[[341]](#footnote-341)341在审议过程中出现了委员会是否应该确定纽伦堡法庭组织法和该法庭的判决书中所含有的原则在何种程度上构成国际法原则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既然大会1946年12月11日第95（I）号决议已经一致确认了纽伦堡原则，委托给国际法委员会的任务就不是将这些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进行评价，而仅仅是对它们进行系统的表述。

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小组委员会，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包含对纽伦堡原则的系统表述的工作文件。委员会审议了该工作文件并有意保留了若干条文草案，这些条文草案被退回到小组委员会重新起草。在考虑对小组委员会进一步提交的草案应采取什么行动时，委员会指出系统表述纽伦堡原则的工作似乎与草拟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有密切的联系（见第三部分A，第7节（a））。委员会决定推迟对原则的最后系统表述，直到草拟治罪法草案的工作取得更大进展。委员会任命让·斯皮罗普洛斯为两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并将小组委员会编写的草案转交给他。特别报告员被要求就这一草案向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提交报告。

委员会在特别报告员所提交的报告的基础上，[[342]](#footnote-342)342在1950年第二届会议上通过了系统表述纽伦堡法庭组织法和该法庭的判决书中所确认的国际法原则的最后文本，并将系统表述的文本连同评注提交给大会，没有提出就此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任何建议。[[343]](#footnote-343)343该文本共有七项原则，转载于附件四第2节。

大会1950年12月12日第488（V）号决议决定将这一系统表述文本送交会员国政府征求意见并要求国际法委员会在草拟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时，参照各代表团在大会第五届会议上对这一文本所发表的意见及以后可能从各会员国政府收到的意见。[[344]](#footnote-344)344

4．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

大会1948年12月9日第260 B（III）号决议请国际法委员会“研究宜否及可否设立国际司法机构，以审判被控犯种族灭绝罪者，或被控犯各种国际公约授权该机构管辖之其他种罪行之人”，并请国际法委员会在进行此项研究时“对于在国际法院内设置一刑事分庭之是否可行，特加审议”。

委员会分别在1949年和1950年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上审议了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问题。在第一届会议上，委员会任命里卡多·J. 阿尔法罗和A. E. F. 桑德斯特罗姆为处理这一问题的特别报告员，请他们就此议题向委员会提交一个或多个工作文件。关于该问题的审议，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345]](#footnote-345)345以及秘书处起草的文件。[[346]](#footnote-346)346

在1950年第二届会议上，委员会讨论了特别报告员各自提交的报告并得出结论认为，设立一个国际审判机构来审判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和其他罪行的人是适当的和可能的。然而，它提出建议，反对将该机构作为国际法院内的一个分庭，尽管通过修订《国际法院规约》是可以这么作的，《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四条规定在法院得为诉讼当事国者，限于国家。[[347]](#footnote-347)347

在对国际法委员会有关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的报告进行初步审议之后，大会于1950年12月12日通过了第489（V）号决议，决定设立一个由十七个会员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以草拟有关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和制定其规约的公约和提议的初步草案。1951年8月，该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草拟了建议以及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根据该规约草案，建议该法院应是常设机构，但仅在向它提交案件时才开始活动。

十七国委员会的报告[[348]](#footnote-348)348及该规约草案被送交给各国政府征求意见。但是，对该草案提出意见的政府为数不多，于是大会在1952年12月5日第687（VII）号决议里决定设立一个新的委员会，仍由十七个会员国的代表组成，1953年夏该委员会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为：（1）研究设立国际刑事法院以及设立该法院的各种可能方法所涉及的种种问题和结果；（2）研究这类法院同联合国及其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并（3）重新审查该规约草案。该委员会对1951年的规约草案作了许多更改，为某些条款草拟了备选的案文。一种案文适用于该法院独立于联合国进行活动的情况，另一种适用于如果决定该法院与联合国紧密联系的情况。大会在1954年会议上收到该委员会的报告。[[349]](#footnote-349)349

但是，大会在1954年12月14日第898（IX）号决议中决定推迟审议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问题，直至大会审议过侵略定义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之后（见第 和 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于1957年提交给了大会第十二届会议。在注意到该报告的同时，大会推迟到以后阶段审议侵略定义的问题和治罪法草案（见第90、91和95页）。关于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问题，1957年12月11日大会第1187（XII）号决议作出了类似的决定，认为，既然这一议题同侵略定义问题和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都有关系，那么对它的审议应该推迟，直至大会再次审议这两个相关的项目之时。

随后，秘书长在1968年将该事项提请会员国的注意，[[350]](#footnote-350)350当时正在将有关侵略定义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的议程。但是大会总务委员会决定，在大会完成对侵略定义问题的审议之前，在此阶段将“国际刑事审判机构”和“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两个项目列入议程是不适宜的，这两个项目只有在以后的某一届会议上取得了更大的进展，达成了普遍同意的侵略定义时才能审议。[[351]](#footnote-351)351大会通过了总务委员会所提议的议程。

当一份侵略定义草案于1974年提交给大会时，[[352]](#footnote-352)352秘书长在致总务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再次提请会员国注意这个问题（见第91和92页）。大会将关于侵略定义问题的议程项目分配给第六委员会时评论说，它决定注意秘书长的意见，考虑应否再次开始审议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问题和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353]](#footnote-353)353

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在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工作中再次提出（见第三部分A，第7节）。

5．多边公约的保留

关于多边公约的保留问题是由于秘书长作为《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存人所遇到的困难引起的，该公约已于1948年12月9日由大会通过。[[354]](#footnote-354)354秘书长作为多边公约的保存人曾大体上遵循国际联盟的惯例。根据国联的惯例，如果某一个公约没有关于作出和接受保留所应遵循的程序的规定，秘书长只有在查明直接有关的任何其他国家均无异议之后，才能接受在提交时附有保留的批准或加入书的确定交存。但是，有些会员国对这一惯例提出了疑问，于是秘书长在1950年请求大会就他所应遵循的程序予以指示。[[355]](#footnote-355)355大会1950年11月16日第478（V）号决议请国际法院就《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发表咨询意见。大会还请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编纂条约法工作的过程中，从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着眼，研究一般多边公约的保留问题，并在1951年第六届会议上向大会提出报告。

根据这一决议，委员会在1951年第三届会议期间优先研究了多边公约的保留问题。[[356]](#footnote-356)356委员会收到了条约法专题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有关多边公约的保留的报告”[[357]](#footnote-357)357以及其他两个委员会委员提交的两个备忘录。[[358]](#footnote-358)358委员会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国际法院就《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提出的咨询意见[[359]](#footnote-359)359适用了关于保留应与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相符的标准，但这一标准并不适用于一般的多边公约；虽然没有一项统一适用的单一规则令人完全满意，但是，秘书长迄今所遵循的惯例经一定的修订即可成为适合大多数情况的规则。[[360]](#footnote-360)360

大会在1952年1月12日通过的第598（VI）号决议中，对国际法委员会的如下建议表示赞同，即在以后的公约中应有关于保留的条款；大会指出，国际法院所提出的该咨询意见在《灭绝种族罪公约》方面应得到遵守，并请秘书长对以后的联合国公约，充当载有保留或反对保留的文件的保存人，而不判定这种文件的法律效力。这类文件应送交有关各国，由它们自己得出其法律后果。1959年，大会12月7日第1452（XIV）号决议请秘书长对1952年大会该决议以前和以后缔结的公约遵循同一做法。

国际法委员会在草拟关于条约法的条款草案（见第三部分A，第14节）和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组织之间缔结的条约问题的条款草案（见第三部分A，第20节）时再次涉及这一议题。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361]](#footnote-361)361第19至23条及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362]](#footnote-362)362第19至23条涉及条约的保留问题。委员会还在其关于条约保留专题的工作中讨论了这个问题（见第三部分B，第1节）。

6．侵略定义问题

根据1950年11月17日通过的第378（V）号决议，大会决定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议程项目“战争行为发生时各国应有之义务”所提出的提案连同大会第一（政治和安全）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的全部记录送交国际法委员会，以便该委员会加以考虑，尽快得出结论。苏联的提案规定，“鉴于有必要尽可能精确地规定侵略的概念”，大会特别宣布，“在一场国际冲突中，首先犯有”提案所列举行为之一“的国家将被宣布为侵略者”。[[363]](#footnote-363)363

在1951年第三届会议上，国际法委员会审议了应列举侵略行为还是设法以一般的措词草拟一个侵略定义的问题。[[364]](#footnote-364)364该委员会感到通过详细列举侵略行为来给侵略下定义是不可限的，因为对侵略行为的列举无法作到详尽无遗。它还认为，硬是利用一个显然不完善的侵略行为清单来不适当地限制联合国主管机构的判断自由是不可取的。因而，它决定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以一项一般的抽象定义为目标。但是该委员会拟订一个一般定义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

但是，在同一届会议期间，在草拟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时重新审议了该事项（见第三部分A，第7节（a））。委员会随后决定在该治罪法草案所规定的罪行中列入侵略行为和侵略的威胁。[[365]](#footnote-365)365

大会在第六届会议上审查了侵略定义问题，并在1952年1月31日第599（VI）号决议中得出结论：“为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为发展国际刑法起见，参照侵略要素，厘订侵略定义，仍属可行而必要”。根据大会的请求，秘书长在大会第七届会议上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它包括了该问题的所有方面。[[366]](#footnote-366)366

1952年12月20日，大会第688（VII）号决议设立了一个十五国特别委员会，并要求该委员会在1954年的大会第九届会议上提交“侵略定义草案或关于侵略观念之声明草案”。该特别委员会于1953年8月24日至9月21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提出了旨在阐明侵略定义的几种不同案文。但是，该委员会一致决定不对这些案文进行表决，而将案文提交大会和会员国征求意见。[[367]](#footnote-367)367十一个会员国政府提出了意见。

根据1954年12月4日第895（IX）号决议，大会设立了另一个由十九国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并要求它在1956年向大会第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1956年10月8日至11月9日十九国委员会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了会议。它没有通过一个侵略定义，但决定将其总结该事项各方面看法的报告连同先前向它提出的各种定义草案一并提交大会。[[368]](#footnote-368)368

在1957年第十二届会议上，大会在1957年11月29日第1181（XII）号决议中注意到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根据该决议，大会决定征求1955年12月14日以来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的二十二个国家的意见，并再次征求其他会员国的意见。它还决定将会员国政府的复文提交一个新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最近一届大会常会总务委员会委员国的代表组成，委托给该委员会的程序性任务是研究各国的复文，以“决定大会再次审议侵略定义问题之适当时机”。

该委员会于1959年4月14日至24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它决定，业已收到的十四份答复并未显示出态度有何变化，并同意在1962年4月之前推迟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审议，除非该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国根据情况的新发展赞成早日举行会议。该委员会于1962年、1965年和1967年在联合国总部再次举行会议，但每次都发现它不能为大会恢复审议侵略定义问题确定任何适当的具体日期。这一委员会的活动在1967年停止，当时大会决定再次开始对侵略定义问题的实质性审议。[[369]](#footnote-369)369

大会1967年12月18日第2330（XXII）号决议确认“世人普遍深信亟须迅速订立侵略之定义”，设立了由35名成员组成的侵略定义问题特别委员会“来审议本问题之各方面，以便拟订侵略之恰当定义”。特别委员会举行了七届会议，从1968年至1974年每年一次。在1974年的届会上，特别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一份侵略定义草案并将它提交大会通过。[[370]](#footnote-370)3701974年12月14日，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特别委员会所建议的侵略定义。大会还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该定义，并建议安全理事会酌情考虑将该定义作为根据章程确定侵略行为是否存在的一项准则。[[371]](#footnote-371)371

（国际法委员会对个人对侵略罪的责任问题的审议见第三部分A，第7节（d））。

7．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372]](#footnote-372)372

（a）治罪法草案（1954年）

1947年，要求系统表述纽伦堡原则的1947年11月21日大会第177（II）号决议把起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任务赋予了国际法委员会（见第三部分A，第3节）。

委员会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开始审议治罪法草案，当时委员会任命让·斯皮罗普洛斯为这一议题的特别报告员。委员会分别在1951年、1953年和1954年的第三、第五和第六届会议上开展了工作。在就治罪法草案开展工作方面，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373]](#footnote-373)373来自各国政府的信息[[374]](#footnote-374)374以及秘书处起草的文件。[[375]](#footnote-375)375

在1951年第三届会议上，国际法委员会完成了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并将它连同对它的评注一并提交大会。[[376]](#footnote-376)376

在起草该案文的过程中，国际法委员会认为它无须指出纽伦堡各项原则在何种程度上已纳入该治罪法草案。至于该治罪法草案的范围，该委员会决定将治罪法限于含有某种政治因素和危害或扰乱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罪行。因此，它删去了诸如海盗行为、危险毒品贩运、贩卖妇女儿童、奴隶制、伪造货币和损害海底电缆等事项。国际法委员会还决定，治罪法仅涉及个人的刑事责任，不列入有关抽象实体所犯罪行的规定。[[377]](#footnote-377)377（纽伦堡法庭判决书中曾说，“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人而不是由抽象的实体犯下的，只有惩治犯有这种罪行的个人，国际法的规定才能执行”。[[378]](#footnote-378)378）因而，该治罪法草案所列举的罪行被定性为“依照国际法所应行论处之，犯此类罪行之个人应予处罚”。[[379]](#footnote-379)379

国际法委员会对执行该治罪法的机构性安排未作出规定；它认为，在国际刑事法院建立之前该治罪法可由各国法院实施。[[380]](#footnote-380)380委员会认为对每一种犯罪行为规定一项明确的刑罚措施是不现实的，因此留给各主管法庭根据具体罪行的严重程度，来确定违犯治罪法的罪行的刑罚。[[381]](#footnote-381)381

鉴于该草案近来才送交各国政府征求意见，大会在其1951年第六届会议上暂缓审议该治罪法草案。在1952年第七届会议上，大会从最后议程中删去了这一项目，但有一项谅解，即该问题继续由国际法委员会进行研究。

国际法委员会因此在其1953年第五届会议上再次审议该事项，并要求特别报告员让·斯皮罗普洛斯起草一份新的报告提交给第六届会议。

在1954年第六届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382]](#footnote-382)382报告探讨了来自各国政府的意见，并提议对国际法委员会先前通过的案文作某些更改。国际法委员会决定修改先前案文的某些方面，并在所列的罪行中增加一种新的犯罪行为，即一国当局采取胁迫措施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它还决定略去如下条件，即对平民施行不人道行为仅在犯有该治罪法所规定的其他罪行时才构成罪行。关于在上级指示下所犯罪行的规则重新进行改写，改写成如果犯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可能不遵守上级的命令，就要对此负责。此外，委员会决定删除论及对该治罪法草案所规定的罪行的惩罚条款，因为委员会认为，在决定了该治罪法如何实施之后，刑罚问题在后一阶段就更加便于解决了。[[383]](#footnote-383)383

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修订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和评注。[[384]](#footnote-384)3841954年修订的治罪法草案案文转载于附件四，第3节（A）。

在1954年12月4日第897（IX）号决议中，大会考虑到治罪法草案提出了与侵略定义密切相关的问题，决定推迟对治罪法草案的进一步审议工作，直至新设的侵略定义特别委员会提交它的报告（见第 页）。特别委员会在1957年大会第十二届会议上提交了报告。在该届会议上，大会注意到了报告并且决定推迟至以后的阶段审议侵略问题（见第 页）。鉴于这一决定并且考虑到治罪法草案提出了与侵略定义问题有关的问题，大会在1957年12月11日第1186（XII）号决议中，决定将对治罪法草案的审议推迟到大会再次审议侵略定义问题时进行。在该决议中，大会请秘书长将治罪法草案案文送交各会员国征求意见，并在该项目可能提上大会临时议程的时候，将各会员国的答复提交给大会。

如上所述（见第87和88页），该项目在1968和1974年曾提请大会注意。大会决定在其1968年第二十三届会议上不审议该项目。在1974年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大会决定考虑是否应再次审议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问题。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977年第二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中谈到了大会审议治罪法草案是否可取的问题。包括按照大会的愿望，由国际法委员会对它进行复审的可能性。[[385]](#footnote-385)385

在1977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大会根据七个会员国的请求，决定把题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项目列入大会议程，并将它分配给第六委员会。但是，由于时间不够，大会同意推迟到第三十三届会议再审议该项目。[[386]](#footnote-386)386在那届会议上，大会通过了1978年12月16日第33/97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决议请秘书长邀请各会员国和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对治罪法草案提出评论和意见。包括对应采用的程序的评论，并起草一份报告，提交给1980年的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按照大会第33/97号决议所收到的评论在1980年的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分发。[[387]](#footnote-387)387在同一届会议上，大会1980年12月4日第35/49号决议请秘书长再次邀请各会员国和有关的国际政府间组织提出或修改它们的评论和意见，尤其是请它们对以后审议这一项目所应遵循的程序，包括将该项目送交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发表评论和意见，将它们的观点通知秘书长。

（b）治罪法草案（1996年）

大会在1981年12月10日第36/106号决议中，请国际法委员会恢复该专题的工作，以期拟订一个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并以必要的优先次序加以审查，以便进行复审，同时适当考虑国际法逐渐发展过程中已取得的成果。

因此，委员会1982年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包括“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项目，并且任命杜杜·锡亚姆先生为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委员会从1983年第三十五届会议到1991年第四十三届会议、1994年第四十六届会议和1995年第四十七届会议，就治罪法草案开展了工作。在进一步考虑治罪法草案的过程中，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388]](#footnote-388)388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意见和看法[[389]](#footnote-389)389以及秘书处起草的文件。[[390]](#footnote-390)390

委员会在1982年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特别报告员担任主席，工作组就大会第36/106号决议向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初步交换了意见。根据工作组的建议，委员会表示有意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全体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一次报告进行一般性辩论。委员会还表示将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汇报一般性辩论的结论。

大会在1982年12月16日第37/102号决议中请委员会按照1981年12月10日第36/106号决议规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初步报告，该报告除其他外，述及了治罪法草案的范围和结构。

委员会在1983年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一次报告[[391]](#footnote-391)391进行了一般性辩论，主要涉及三个问题：（1）治罪法草案的范围；（2）拟订草案的方法；（3）治罪法的执行。关于方法问题，委员会认为最好有一个导言，回顾刑法的一般原则，诸如刑法不溯及既往、加重或减轻处罚情节理论、共犯、预备犯罪和正当行为等。[[392]](#footnote-392)392关于另外两个问题，委员会的意见如下：

“（a）国际法委员会认为，治罪法草案应只包括最严重的国际罪行。这些罪行将根据一个一般的标准确定，也参照现有与该专题有关的公约和宣言；

“（b）关于可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法律主体，由于这一问题的政治性质，委员会希望了解大会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c）关于治罪法的执行：

“（一） 有些委员认为，一部既不规定刑罚又无有权限的刑事法院的治罪法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为此，委员会请大会指明委员会的任务是否也包括拟订有权审判个人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二） 此外，鉴于委员会内大多数委员赞成国家应负刑事责任的原则，大会应指明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是否也有权审判国家。”[[393]](#footnote-393)393

大会1983年12月19日第38/132号决议请委员会继续从事其拟订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工作，并按照其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的意见，作为第一步先拟订导言和一份罪行清单。

委员会在1984年第三十六届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394]](#footnote-394)394就治罪法草案进行了一般性辩论，这涉及两个问题，即1954年治罪法草案所包括的那些罪行以及1954年以来应列入的罪行。委员会在其向大会提交的该届会议的工作报告中认为，关于治罪法草案就人而言的内容，它打算限于个人的刑事责任，但不妨碍今后对国际刑事责任这个概念可否适用于国家的问题进行审议，并且打算先拟订一份暂定罪行清单，同时考虑拟订一个概述在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方面的国际刑法一般原则的导言。所提及的可能包括在治罪法中的罪行，除了1954年治罪法草案所包括的罪行之外，还包括殖民主义、种族隔离、严重破坏人类环境、经济侵略、使用原子武器和雇佣兵活动等。[[395]](#footnote-395)395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在1984年12月13日第39/80号决议中请委员会继续进行拟订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工作，参考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所取得的进展，并参考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拟订导言和罪行清单。

委员会在1985年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开始进行治罪法草案的一读。委员会在1986年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再次讨论了治罪法草案的执行问题，并且表示它打算对就各种可能的选择提供的任何指导意见给予认真审议（属地主义制度、属人主义制度、普遍管辖制度和国际刑事法院制度）。

在1987年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委员会建议大会修改该专题的英文题目，改为“Draft Code of Crimes against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Mankind”，[[396]](#footnote-396)396大会在1987年12月7日第42/151号决议中批准了这一建议。

委员会在1991年第四十三届会议上一读通过了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该草案包括以下罪行：侵略；侵略的威胁；干涉；殖民统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国统治；灭绝种族；种族隔离；有计划和大规模侵害人权；特别严重的战争罪行；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恐怖主义；非法贩运麻醉药品；以及故意和严重损害环境。委员会决定将适用的刑罚问题和预备犯罪问题推迟至草案的二读。委员会指出治罪法草案是委员会有关这一专题的工作的第一部分，并且委员会将继续就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问题开展工作（见下文（c）小节）。按照其章程第16和第21条，委员会决定通过秘书处将治罪法草案转送各国政府，征求其评论和意见。[[397]](#footnote-397)397

大会在其1991年12月9日第46/54号决议中，表示赞赏委员会完成了关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暂行条款草案，并且敦促各国政府按照委员会的要求提交有关草案的书面评论和意见。大会在1992年11月25日第47/33号决议中再次请各国政府提交有关草案的评论和意见。大会1993年12月9日第48/31号决议请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六届会议上恢复对治罪法草案的审议。

委员会在1994年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开始治罪法草案的二读，二读工作在1995年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完成。二读所依据的是特别报告员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报告[[398]](#footnote-398)398以及来自各国政府的评论和意见。[[399]](#footnote-399)399委员会在其1994年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审议的第十二次报告只着重讨论了治罪法草案关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定义、定性和一般原则的一般部分。特别报告员还说明他打算将二读期间要审议的罪行清单限制在作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罪行特征不容置疑的罪行范围内。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在审议过报告后，决定将报告中讨论的条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但有一项谅解，即关于治罪法草案的工作和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的工作，应该由治罪法草案特别报告员、起草委员会主席和成员，以及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工作组主席和成员进行协调（见下文（c）小节）。

委员会在1995年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十三次报告。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略去了一读时包括的12条罪行中的6条，即侵略的威胁；干涉；殖民统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国统治；种族隔离；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故意和严重损害环境。一些政府曾就这些罪行提出强烈反对意见、批评或保留，这是对此种情况作出的反映。因此，该报告重点讨论了一读通过的、包括在治罪法草案中的剩余罪行，即侵略；灭绝种族、有计划和大规模 侵害人权；特别严重的战争罪行；国际恐怖主义；非法贩运麻醉药品。[[400]](#footnote-400)400委员会决定把侵略、灭绝种族、有计划或大规模侵害人权行为以及特别严重的战争罪等条款交给起草委员会，其理解是，在拟订这些条款时，起草委员会将铭记并酌情处理一读时通过的以下条款草案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干涉；殖民统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国统治；种族隔离；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关于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及故意和严重损害环境的条款，委员会还决定继续进行协商。

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在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开始时举行会议，审查是否有可能在治罪法草案中包括故意和严重损害环境这一问题。[[401]](#footnote-401)401在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工作组审议了这一问题，并建议委员会将这一罪行作为一种战争罪、一种危害人类罪或一种单独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罪行考虑。委员会通过投票决定只将工作组起草的文本提交给起草委员会，以便将故意和严重损害环境作为一种战争罪行纳入草案。[[402]](#footnote-402)402

在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最后案文及其评注，[[403]](#footnote-403)403该草案包括20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一般性条款（第1-15条）和第二部分，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第16-20条）。第一部分包含的条款涉及治罪法的范围和适用（第1条）、个人责任（第2条）、惩罚（第3条）、国家的责任（第4条）、政府或上级的命令（第5条）、上级的责任（第6条）、官方地位和责任（第7条）、审判机构的设立（第8条）、引渡或起诉的义务（第9条）、案犯的引渡（第10条）、司法保证（第11条）、一事不再理（第12条）、不溯及既往（第13条）、抗辩（第14条）以及减罪情况（第15条）。第二部分包括下述罪行：侵略罪行（第16条）、灭绝种族罪行（第17条）、危害人类罪行（第18条）、危害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罪行（第19条）以及战争罪行（第20条）。1996年通过的治罪法草案案文转载于附件四，第3节（B）。

委员会通过了治罪法草案：

“为了达成协商一致，委员会大大缩小了治罪法的范围。1991年一读时，治罪法草案包含了一个有12类罪行的清单。有些委员对治罪法覆盖范围的缩小表示遗憾。委员会这样作是为了使治罪法获得通过和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有一项理解是，在治罪法中列入某些罪行不影响其他罪行在国际法中的地位，通过治罪法也绝不会阻碍这一重要法律领域的进一步发展。”[[404]](#footnote-404)404

正如在1991年一读通过治罪法草案时一致同意的，委员会在二读期间又回到了刑罚和未遂罪的问题上。关于刑罚，委员会决定纳入一个一般性条款，指出对犯下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个人的惩罚必须与罪行的性质和严重性相称（第3条），而不是对此种罪行规定具体的刑罚。关于未遂罪，委员会决定针对除侵略以外的所有罪行讨论犯下未遂罪的个人的刑事责任（第2条，第3段（g））。

委员会审议了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包括由一个全权代表会议或大会通过一项国际公约，将治罪法纳入一个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或者大会作为一项声明通过治罪法。委员会建议大会选择最适当的形式，确保治罪法草案得到尽可能广泛的接受。[[405]](#footnote-405)405

大会在1996年12月16日第51/160号决议中表示赞赏委员会所完成的治罪法草案方面的工作；提请参加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的国家注意治罪法草案对其工作的相关意义（见第109页）；并且请秘书长邀请各国政府在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结束之前，就治罪法草案方面可以采取的行动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

（c）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

委员会在1983年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收到了治罪法草案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除其他外，重点讨论了治罪法的执行问题。[[406]](#footnote-406)406委员会在该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了一般性辩论之后，请大会指明委员会在治罪法草案方面的任务是否也包括拟订有权审判个人的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因为有些委员认为一部既不规定刑罚又无权限的刑事法院法典是不起什么作用的。[[407]](#footnote-407)407

委员会在1986年第三十八届会议上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报告除其他外，讨论了该法典的执行问题。[[408]](#footnote-408)408委员会在审议过这一报告后指出，它将就该报告中所陈述的执行法典的各种选择，仔细研究可能提供的任何指导意见，并且提请大会注意有关1983年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所含的一部既不规定刑罚又无权限的刑事法院法典不起作用的结论。[[409]](#footnote-409)409

从1986年到1989年，大会请秘书长征求各会员国对委员会治罪法草案执行情况结论的意见。[[410]](#footnote-410)410

委员会在1987年第三十九届会议上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五次报告，[[411]](#footnote-411)411报告包含了有关“不引渡即惩罚”原则的草案第4条，该原则的目的是填补审判机构方面的现有空白。[[412]](#footnote-412)412委员会在讨论草案第4条期间审议了与国际刑事法院有关的问题。委员会将该条款草案提交给了起草委员会，由于没有时间，起草委员会未能针对第4条拟订一个案文。

委员会在1988年第四十届会议上暂时通过了条款草案第4条（审判或引渡的义务），该条规定依靠国内法院来执行刑事法 院法典，而没有就随后有关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院的考虑作出决定。[[413]](#footnote-413)413

1989年，大会审议了一个新的议程项目，题为“从事跨国界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的个人和实体的国际刑事责任：建立一个对这类罪行有司法权的国际刑事法庭”。[[414]](#footnote-414)414大会在1989年12月4日第44/39号决议中，请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题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项目时，讨论设立国际刑事法庭或其他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问题，这种机构应对被指控犯下可能为这类法典所规定的罪行的人，包括从事跨国界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的人具有管辖权，并且应在其关于该届会议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这一问题。

委员会在1990年第四十二届会议上收到了治罪法草案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报告第三部分涉及一个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415]](#footnote-415)415委员会详尽审议了可能设立一个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有关治罪法草案的执行问题，特别是有可能设立一个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来执行其条款的问题，一直是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重点考虑的问题，其次，大会在1989年12月4日第44/39号决议中向委员会提出了具体要求。委员会在审议过该报告后，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来起草委员会对大会要求的回复。[[416]](#footnote-416)416

大会1990年11月28日第45/41号决议和1991年12月9日第46/54号决议请国际法委员会在审议治罪法草案时，进一步审议并分析其报告中关于国际刑事审判机构议题所提出的问题。

从1991年到1993年，治罪法草案特别报告员提交了三份报告，讨论了与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有关的问题。[[417]](#footnote-417)417

在1992年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来进一步审议和分析与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有关的重要问题。工作组在同届会议上起草了给委员会的报告，其中特别载有有关可能建立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若干问题的一组具体建议。[[418]](#footnote-418)418工作组报告中建议的结构基本上是一个由缔约国议定的多边条约形式的规约所建立的国际刑事法院。拟议的法院至少在其活动的初期阶段，只是对私人而不是对国家行使管辖权。其管辖权应当限于在指定的现行国际条约中界定的国际性罪行，包括在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通过生效后该治罪法所界定的罪行，但不限于治罪法的罪行。国家应能成为法院规约的缔约国而不是治罪法的缔约国。法院将是其规约缔约国（根据特定的条件也是其他国家）的一种设施，在需要时即可要求其行使职能。该法院至少在其活动的初期阶段，不应该具有强制管辖权，也不是一个常设的全时制机构。另外，不论法院或其他机制采用何种具体结构，它都必须保证其诉讼程序的正当性、独立性和公正性。[[419]](#footnote-419)419

国际法委员会在同届会议上指出，大致上按工作组所建议的结构，可能是一个可行的体制，但是就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工作需要得到大会再次授权以起草一个规约，现在应该由大会决定国际法委员会是否应该承担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项目和在什么基础上承担。[[420]](#footnote-420)420

大会在1992年11月25日第47/33号决议中，赞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中题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专门讨论可能建立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的章节；请各国政府尽可能在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之前，向秘书长送交其关于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工作组报告的书面评论；并请求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其关于这一问题的工作，承担起拟订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的项目，从其下届会议起以此作为优先事项，从研究工作组报告和第六委员会辩论中所指出的问题开始，以期在工作组报告的基础上，考虑到在第六委员会辩论中表达的观点以及从各国所收到的书面评论，起草一份规约，并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进展报告。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993年第四十五届会议上，决定重新召集它在上届会议上设立的工作组，以继续上述大会第47/33号决议请求委员会进行的工作。[[421]](#footnote-421)421工作组为国际刑事法院起草了一个初步的规约草案及其评注。[[422]](#footnote-422)422尽管委员会在第四十五届会议上未能详细审议和通过草案条款，但它原则上认为拟议的条款草案为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审议打下了基础。委员会因此决定将载有规约草案的工作组报告作为其提交给大会的报告的附件。委员会说，它将欢迎大会和各会员国就各条评注中提及的具体问题以及就条款草案全文提出评论。它还决定通过秘书长将条款草案送交各国政府征求评论意见。[[423]](#footnote-423)423

大会在1993年12月9日第48/31号决议中，赞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中题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专门讨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问题的第二章；请各国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的请求，向秘书长提交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工作组提议的条款草案的书面评论；并请国际法委员会作为优先事项继续其关于此问题的工作，以期尽可能在其1994年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参照在第六委员会辩论中所表达的观点和从各国收到的任何书面评论，拟订一项规约草案。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994年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决定重新设立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工作组。工作组再次研究了附于委员会上届会议报告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初步草案，[[424]](#footnote-424)424并考虑了各国政府对工作组提交委员会上届会议的报告的评论，[[425]](#footnote-425)425以及大会第六委员会在第四十八届会议上讨论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时所表达的观点，[[426]](#footnote-426)426草拟了规约草案。[[427]](#footnote-427)427

规约草案共60条，分为8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法院的建立；第二部分法院的组成和管理；第三部分法院的管辖权；第四部分调查和起诉；第五部分审判；第六部分上诉和复审；第七部分国际合作和司法协助；第八部分强制执行。在起草规约时，工作组并不打算专门适应任何特定的刑事法制度，而是要考虑到现有条约、以前关于国际法院或法庭的建议以及不同法律传统中各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有关规定，将最适合于所设想目标的各项内容合并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此外还审慎地注意到关于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的各项规定。也应该注意到，工作组所设想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是未来关于此问题的国际公约的附件，工作组相应草拟了规约的各项规定。[[428]](#footnote-428)428

委员会通过了工作组起草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及其评注，[[429]](#footnote-429)429并决定按照其章程第23条之规定，建议大会召集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以研究规约草案，并缔结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430]](#footnote-430)430规约草案的全文转载于附件四，第8节。[[431]](#footnote-431)431

大会在1994年12月9日第49/53号决议中，欢迎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包括其中所载的建议，并决定设立一个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均可自由参加的特设委员会，以审查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规约草案所产生的主要实质性问题和行政问题，并根据审查结果，审议关于召开一个国际全权代表会议的安排。它还决定特设委员会在1995年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初期将其报告提交给大会。大会在同一决议中请各国向秘书长提交关于规约草案的书面评论，并请秘书长邀请有关的国际机构提出评论意见。它还请秘书长向特设委员会提交一份初步报告，提出国际刑事法院的人员配备、结构和设立与运作费用的初步估计。大会决定将题为“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以便研究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和各国提出的书面评论，并就召开拟议的国际全权代表会议，包括会议的时间和会期，作出决定。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特设委员会分别于1995年4月3日至13日和8月14日至25日召开了会议，会上委员会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规约草案所产生的问题，并审议了召开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的安排。[[432]](#footnote-432)432

大会1995年12月11日第50/46号决议决定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进一步讨论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规约草案所引起的主要实质性问题和行政问题，并参照会议期间提出的各种不同意见起草案文，以期为设立国际刑事法院拟订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综合公约案文，作为下一个步骤由全权代表会议加以审议。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于1996年3月25日至4月12日和8月12日至30日召开了会议，委员会在会上进一步讨论了规约草案引起的问题，并开始为设立国际刑事法院起草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综合公约案文。[[433]](#footnote-433)433

大会1996年12月17日第51/207号决议决定1998年举行全权代表会议，以期最后拟订和通过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大会还决定筹备委员会于1997和1998年举行会议，以完成提交会议的案文的拟订工作。

筹备委员会于1997年2月11日至21日、8月4日至15日和12月1日至12日举行会议，继续为设立国际刑事法院起草可以普遍接受的综合公约案文。[[434]](#footnote-434)434

大会1997年12月15日第52/160号决议决定于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罗马举行有关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联合国全权代表外交会议，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及各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均可参加。在该决议中，大会请秘书长邀请依照各项有关决议得到大会长期邀请的组织和其他实体的代表出席全权代表会议，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和工作，并邀请有关区域政府间组织和其他有关国际机构，包括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以及起诉应对199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全权代表会议。另外还请秘书长邀请由筹备委员会适当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6年7月25日第1996/31号决议第七编的规定，以及特别考虑到其活动与全体代表会议工作的相关性而认可的非政府组织依照会议通过的决议和议事规则参加全权代表会议。大会还请筹备委员会按照大会第51/207号决议继续开展工作，并在其各届会议结束时，向全权代表会议转递它按照其任务规定拟订的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草案。

筹备委员会于1998年3月16日至4月3日举行会议，会议期间完成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的起草工作并提交给了全权代表会议。[[435]](#footnote-435)435

全权代表会议于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举行会议。[[436]](#footnote-436)436参加会议的有160个国家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十六个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五个专门机构及有关组织以及九个联合国计划署和机构的观察员。另外，有135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按照1997年12月15日大会第52/160号决议参加了全权代表会议的工作。

全权代表会议收到了提交全体委员会审议的规约草案。全权代表会议委托起草委员会，在不重新对任何事项进行实质性讨论的情况下，协调和改进提交给它的所有文本的拟订而不改变其实质，拟订草案并按照全权代表会议或全体委员会的要求，就起草工作提供意见并酌情向全权代表会议或全体委员会报告。

1998年7月17日，全权代表会议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437]](#footnote-437)437规约包括一个序言和128个条文，分为十三编：第一编，法院的设立；第二编，管辖权、可受理性和适用的法律；第三编，刑法的一般原则；第四编，法院的组成和行政管理；第五编，调查和起诉；第六编，审判；第七编，刑罚；第八编，上诉和改判；第九编，国际合作和司法协助；第十编，执行；第十一编，缔约国大会；第十二编，财务事项；以及第十三编，最后条款。

有待批准、接受或核可的规约按照其条款于1998年7月17日到1998年10月17日在意大利外交部开放签署，后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签署，一直到2000年12月31日暂时结束。公约始终开放，供所有国家参加。《罗马规约》于2002年7月1日生效。截止到2007年1月31日，有104个国家批准了《罗马规约》。[[438]](#footnote-438)438

全权代表会议通过的六个决议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会议最后文件[[439]](#footnote-439)439于1998年7月17日签署。在其中一个决议，决议E中，全权代表会议建议根据《罗马规约》第一二三条召开一次审查会议来审议恐怖主义罪行和毒品犯罪，以期得到一个可接受的定义并将它们纳入法院有管辖权的罪行清单中。根据另一个决议，决议F，全权代表会议成立了一个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最后文件的签署国以及应邀参加全权代表会议的其他国家代表组成。筹备委员会受托为法院的设立和运行提出若干实务安排建议，包括程序和证据规则以及犯罪要件规则的文本草案，以及有关侵略条款的建议（见下文（d）小节）。

大会在1998年至2001年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请秘书长召集和再次召集筹备委员会会议，以执行决议F中规定的筹备委员会的任务，并且在会上讨论提高法院的效率和被接受程度的方式。筹备委员会从1999年至2002年举行了十届会议，会议期间拟订了有关法院的设立和运行的若干建议，包括《程序和证据规则》草案和《犯罪要件》草案，并提交给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440]](#footnote-440)440

大会在2001年12月12日第56/85号决议中请秘书长作好必要准备，以依照《罗马规约》第一一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于《罗马规约》生效后，[[441]](#footnote-441)441召开缔约国大会。

缔约国大会自2002年第一届会议以来定期举行会议，审议了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并通过了若干以筹备委员会起草的草案为基础的文件，包括《程序和证据规则》和《犯罪要件》。[[442]](#footnote-442)442

在根据缔约国大会第二届会议于2003年9月12日通过的第ICC-ASP/2/Res.3号决议设立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常设秘书处之后，联合国秘书处自2003年12月31日起不再担任缔约国大会秘书处。

（d）侵略罪

国际法委员会在开展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见上文（a）小节和（b）小节）方面的工作时审议了侵略罪问题，两个草案都包括关于侵略罪的条款。[[443]](#footnote-443)443同样，1994年委员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见上文（c）节）将侵略罪纳入法院管辖权内。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五条规定在制定条款，界定侵略罪的定义，并规定本法院对这一犯罪行使管辖权的条件后，本法院即对侵略罪行使管辖权。这一条款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444]](#footnote-444)444

罗马会议不但通过了该规约，而且还通过了有关成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的决议F，作为会议《最后文件》的附件（见第112 页）。[[445]](#footnote-445)445筹备委员会受托提出有关侵略条款的建议，包括侵略罪的定义和要件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就这一罪行行使管辖权的条件。建议将在一个审查会议上提交给法院缔约国大会，以期制定出一个有关侵略罪的可接受的条款并纳入规约。有关侵略罪的条款将依照规约的相关规定对缔约国生效。[[446]](#footnote-446)446

筹备委员会在其1999年至2002年召开的第二到第十届会议上审议了侵略罪。[[447]](#footnote-447)447在1999年第三届会议上，筹备委员会在其设立的侵略罪工作组背景下进行审议。[[448]](#footnote-448)448在第十届会议上，筹备委员会同意在其提交给缔约国大会的报告中包括工作组协调员起草的有关侵略罪的定义和要件的讨论文件，[[449]](#footnote-449)449以及筹备委员会提供的有关侵略罪的所有建议和相关文件的清单以及秘书处起草的与侵略有关的发展情况的历史回顾，[[450]](#footnote-450)450以便转交给缔约国大会。[[451]](#footnote-451)451

大会2000年12月12日第55/155号决议和2001年12月12日第56/85号决议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侵略罪工作组的工作十分重要。

缔约国大会在2002年9月第一届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有关继续开展关于侵略罪的工作的决议，决议作出了以下决定：（1）设立侵略罪特别工作组，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均可平等参与，以便按照《罗马规约》（第五条第二款）和决议F（第7段）拟订关于侵略的条款提案；（2）特别工作组应向大会提交这些提案，供其在审查会议上审议；以及（3）特别工作组在大会常会期间或大会认为合适和可行的任何其他时间开会。[[452]](#footnote-452)452大会随后决定侵略罪特别工作组在大会年会期间开会，同时保留在某个政府希望提供经费在大会闭会期间举行工作组非正式会议的可能性。[[453]](#footnote-453)453

8．国籍，包括无国籍状态

国际法委员会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将“国籍，包括无国籍状态”选为法典编纂的一项专题，但是没有将它列入委员会给予优先考虑的专题名单之中。

委员会在其1950年第二届会议上获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1950年7月17日通过的有关已婚妇女的国籍的第304 D（XI）号决议，在该决议中，经社理事会提议国际法委员会着手起草一个公约，要体现妇女地位委员会所建议的原则。在考虑该决议后，委员会认为将接受经社理事会的提议与其关于国籍，包括无国籍状态的工作联系起来进行是适当的。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951年第三届会议上获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1950年8月11日通过了另一项决议，第319 B III（XI）号决议，该决议敦促国际法委员会尽早起草消除无国籍状态的公约草案。委员会注意到这一事项可以在国籍，包括无国籍状态的专题范围内考虑。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着手进行有关这一专题的工作。

国际法委员会在1951年第三届会议到1954年第六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一专题。它相继在分别于1951和1952年召开的第三届会议和第四届会议上任命曼利·O. 赫德森和罗伯托·科尔多瓦为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在后一届会议上，该委员会还邀请伊万·S. 克尔诺博士担任委员会消除或减少无国籍状态问题的个人专家。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该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454]](#footnote-454)454各国政府的意见、[[455]](#footnote-455)455秘书处起草的文件[[456]](#footnote-456)456以及专家起草的备忘录。[[457]](#footnote-457)457

（a）已婚者的国籍

在1952年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已婚者国籍的公约草案，作为其有关国籍，包括无国籍状态的报告的一部分。[[458]](#footnote-458)458该草案非常严格地按照妇女地位委员会提出的并且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认可的措词。但是国际法委员会作出决定，已婚妇女的国籍问题不宜单独审议，而应作为整个国籍专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审议国籍专题时审议。因此国际法委员会对这一草案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459]](#footnote-459)459

然而，联合国其他机构仍继续审议已婚妇女的国籍问题。1955年，大会注意到妇女地位委员会起草的已婚妇女国籍公约草案的导言和前三个实质性条款。在第三（社会）委员会草拟了该公约草案的最后条款之后，大会1957年1月29日第1040（XI）号决议通过了该公约，该公约于1958年8月11日生效。[[460]](#footnote-460)460截至2007年1月31日，74个国家成为《已婚妇女国籍公约》的缔约国。

（b）未来的无国籍状态

在1952年第四届会议上，作为特别报告员曼利·O. 赫德森提交的报告的一部分，委员会还收到了涉及无国籍状态的一份工作文件。[[461]](#footnote-461)461委员会随后请特别报告员起草一个消除无国籍状态的公约草案和一个或多个减少未来无国籍状态的公约草案，供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审议。

国际法委员会在1953年第五届会议上根据新任特别报告员罗伯托·科尔多瓦提出的一份载有条款草案的报告，[[462]](#footnote-462)462一读通过了两个公约草案，一个是关于消除未来无国籍状态的，另一个是关于减少未来无国籍状态的，随后这两项公约草案被送交各国政府以征求意见。

国际法委员会在1954年第六届会议上讨论了各国政府就这两个公约草案提出的意见，并根据它们的意见重新草拟了某些条款。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两个公约的最后草案。[[463]](#footnote-463)463委员会在向大会提交这些最后草案时说：

“各国政府所提出的最为共同的意见是它们法律的某些规定与该公约草案的某些条款相抵触。但无国籍状态正是因为国内法中有这些规定才出现的，因此国际法委员会认为这种反对理由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如果各国政府通过了消除，至少是减少未来无国籍状态的原则，它们就应该准备对它们的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464]](#footnote-464)464

这两个公约草案各由十八条条文构成，它们一方面旨在使出生于某国国境内的人容易获得该国的国籍，另一方面旨在避免丧失国籍，除非获得另一个国籍。关于消除未来无国籍状态的公约（其草案转载于附件四，第4节）将对缔约国规定比目标较有限仅想减少无国籍状态的公约更为严格的义务。国际法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应该由大会来考虑这两个公约哪一个应该居优先。[[465]](#footnote-465)465

在1954年的大会会议上，第六委员会的大多数代表认为，立刻审议这些公约草案的实质的时机仍未成熟，会员国对这些公约草案的立场尚未充分查明。然而，第六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草案，根据这一草案，大会将表示：“希望召开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以缔结减少或消除未来无国籍问题之公约，此次会议一俟至少有二十国政府已通知秘书长愿意参与此项会议时，即行召开”。这一决议随后于1954年12月4日由大会通过，即第896（IX）号决议。

联合国关于消除或减少未来无国籍状态会议[[466]](#footnote-466)466于1959年3月24日至4月18日在日内瓦举行，三十五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以国际法委员会所起草的两个公约草案之一，即关于减少未来无国籍状态的公约草案为其讨论的基础，并通过了旨在减少出生时无国籍状态的规定。

但是，该会议未就在剥夺国籍会使公民成为无国籍人的情况下如何限制国家剥夺公民的国籍自由取得一致的意见。结果，该会议向联合国的主管机构提议会议应尽早重新召集以完成它的工作。

三十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第二期会议于1961年8月15日至28日在纽约举行。会议通过了《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467]](#footnote-467)467该公约从1961年8月30日起至1962年5月31日止开放供签署。签字后须经批准，凡有资格成为公约缔约国的任何非签字国均可加入该公约。该公约（转载于附件五，B节）于1975年12月13日生效。到2007年1月31日，该公约共有33个缔约国。

（c）目前的无国籍状态

在1953年第五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罗伯托·科尔多瓦起草了涉及消除或减少目前的无国籍状态的一个临时报告和公约草案。[[468]](#footnote-468)468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进一步深入研究该事项并为委员会在1954年召开的第六届会议起草一个报告。

在1954年第六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469]](#footnote-469)469报告载有关于消除或减少目前无国籍状态的四个文书草案。在委员会审议该报告的过程中，特别报告员撤回了其中三个拟议草案。委员会作为讨论的基础接受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四个文书草案，《减少无国籍状态备用公约》。

委员会认为提出措施来全面、立即消除目前的无国籍状态是不可行的，并且目前的无国籍状态只有在无国籍者获得一个国籍的条件下才能减少，而这个国籍一般是居住国的国籍。不过，由于在所有国家获得国籍都要满足某些法定条件，包括居留资格，所以委员会认为为了改善无国籍状态，最好是在无国籍者获得国籍前给予他们在其居住国 “受保护人”的特殊身份。具有这一身份的无国籍者将拥有一切民事权利，并且还有权得到居住国政府的外交保护；[[470]](#footnote-470)470提供保护的国家可以要求他们承担与国民同样的义务。[[471]](#footnote-471)471

因此，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拟订了其建议，并且以七条条文附有评注的形式通过了这些建议。[[472]](#footnote-472)472这些建议作为关于国籍包括无国籍状态专题最后报告的一部分提交给了大会。委员会在提交建议时指出：“鉴于目前无国籍状态问题所具有的非法律性质的巨大困难，委员会认为所通过的提议虽然其措词采取条文的形式，但它仅应视为各国政府在试图解决这一紧迫问题时或许愿意加以考虑的几点建议”。[[473]](#footnote-473)473

（d）多重国籍

在1954年第六届会议上，委员会就多重国籍专题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并且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罗伯托·科尔多瓦先生的一份报告，[[474]](#footnote-474)474以及秘书处有关该专题的一份备忘录。[[475]](#footnote-475)475许多委员认为委员会应该满足于其在国籍领域里迄今所作的工作，于是委员会决定“推迟对多重国籍和有关国籍的其他问题的进一步审议工作。”[[476]](#footnote-476)476

委员会在就国家继承方面的国籍专题开展工作时又回到了国籍专题（见第三部分A，第24节）和外交保护专题（见第三部分A，第27节）。

9．海洋法

（a）公海制度

国际法委员会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把公海制度选作它优先考虑的编纂专题，并且任命J.P.A.弗朗索瓦为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委员会分别在1950年、1951年、1953年、1955年和1956年的第二、第三、第五、第七和第八届会议上审议了该专题。在就这一专题开展工作期间，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477]](#footnote-477)477来自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信息[[478]](#footnote-478)478以及秘书处起草的文件。[[479]](#footnote-479)479

委员会在其1950年第二届会议上概述了属于公海制度这一总专题范围内的各种问题，例如船舶的国籍、海上生命的安全、奴隶贸易、海底电报电缆、公海资源、追捕权、驶近权、毗邻区、固定捕鱼区和大陆架。

在1951年第三届会议上，委员会以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480]](#footnote-480)480为基础，暂时通过了以下议题的条款草案：大陆架、海洋资源、固定捕鱼区和毗连区。

在1953年第五届会议上，委员会在参照各国政府的评论再次审议这些暂时的条款草案之后，起草了如下三个问题的最后草案：大陆架、捕鱼和毗邻区。委员会建议大会以决议方式通过该报告关于大陆架条款草案的那一部分。[[481]](#footnote-481)481关于捕鱼的条款草案，该委员会建议大会以决议形式认可这些条款，并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进行磋商，按照这些条款所体现的一般原则就这一议题起草一份或几份公约。[[482]](#footnote-482)482由于国际法委员会还未通过关于领海的条款草案，它建议大会不对关于毗连区的条款草案采取行动，因为关于该条款的报告已经发表了。[[483]](#footnote-483)483

然而，大会1953年12月7日第798（VIII）号决议决定，推迟到国际法委员会研究了有关公海制度和领海制度的所有问题并对大会提出报告后再采取行动。在1954年的大会第九届会议上，大陆架问题再次由十个会员国提出，它们请大会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方面避免不适当的耽搁。大会1954年12月14日第899（IX）号决议再次推迟采取行动，并请委员会及时提交其关于公海制度、领海制度和所有有关问题的最后报告，以便大会在其1956年第十一届会议上进行审议。

委员会在1955年第七届会议上审议了其1953年报告没有涉及到的有关公海的某些议题，并且以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484]](#footnote-484)484为基础通过了一个关于公海制度的临时草案，送交各国政府征求意见。委员会还将包含暂时通过的公海制度草案部分内容的关于养护海上生物资源的条款草案及其报告相关章节送达派观察员出席海上生物资源养护问题国际技术会议的各组织，上述会议是由秘书长按大会1954年12月14日第900（IX）号决议召集，于1955年4月18日至5月10日在罗马举行的。委员会在起草关于海上生物资源养护问题的条款时考虑了该会议的报告。[[485]](#footnote-485)485委员会在1956年第八届会议上审查了各国政府和国际西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的复文，并拟订了关于公海这一议题的最后报告，委员会将该报告纳入了其关于海洋法的综合草案中（见下文（c）小节）。

（b）领海制度[[486]](#footnote-486)486

国际法委员会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把领海制度列入编纂法律的专题中，但没有把它包括在优先考虑的专题清单中。在1951年第三届会议上，按照大会1949年12月6日第374（IV）号决议中的建议，委员会决定开始关于领海制度的工作，还是任命J. P. A. 弗朗索瓦先生为该专题特别报告员。

委员会分别在1952年第四届会议、1954年至1956年第六至第八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一专题。在就这一专题开展工作方面，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487]](#footnote-487)487和各国政府提供的信息。[[488]](#footnote-488)488

在1952年第四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交了一份专门阐述基线和海湾问题的报告。[[489]](#footnote-489)489至于划定两个相邻国家的领海界线，国际法委员会在该届会议上决定请各国政府提供其本国实践的资料和它们可能认为有益的任何意见。该委员会还决定，特别报告员应自由地与专家磋商以阐明这一问题的某些技术因素。在特别报告员主持下，专家小组于1953年4月在海牙举行了会议。[[490]](#footnote-490)490特别报告员在其1954年提交给国际法委员会的有关领海制度的第三次报 告[[491]](#footnote-491)491中采纳了专家所建议的更改，而且还考虑了各国政府就划分两个相邻国家的领海所提出的意见。

委员会在1954年和1955年第六届和第七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领海制度的临时条款及评注，并邀请各国政府对这些条款提出意见。

委员会在1956年第八届会议上拟订了关于领海问题的最后草案，该草案采纳了许多来自各国政府复文的更动，委员会将该最后报告纳入了其有关海洋法的综合草案中。[[492]](#footnote-492)492

（c）海洋法合并草案

在委员会1956年第八届会议上，重新编写了委员会已通过的关于海洋法的所有条款草案，以形成一套连贯系统的规则。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有关海洋法的最后草案，其中包含七十三条条文及其评注。[[493]](#footnote-493)493委员会指出，为了使整个草案产生效力，有必要借助常规手段。因此，在1956年向大会提交最后草案时，委员会建议大会召开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494]](#footnote-494)494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大会1957年2月21日第1105（XI）号决议决定召开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来审查“海洋法，请该会议不仅注意问题之法律方面，而同时兼顾其技术、生物、经济及政治方面，并将工作之成果订为一项或数项国际公约，或酌量情形载入其他适当文书”。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于1958年2月24日至4月27日在日内瓦举行。八十六个国家派代表出席，其中七十九个国家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七个国家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却是专门机构的成员国。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海洋法的最后报告由大会送交海洋法会议，海洋法会议以此为基础审议发展和编纂海洋法过程中涉及到的各种问题。此外，该会议还收到了三十多份预备性文件，它们或由联合国秘书处和某些专门机构编写，或由秘书长所邀请就各种专门议题提交研究报告的一些独立的专家编写。有一个问题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没有论及，即内陆国自由出入海洋问题，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之前于1958年2月10日至14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内陆国预备会议提交给海洋法会议的一份备忘录里，论述了这个问题。[[495]](#footnote-495)495

该会议鉴于其工作范围的广泛性，设立了五个主要委员会：第一委员会（领海和毗连区）；第二委员会（公海：一般制度）；第三委员会（公海：渔业和养护生物资源）；第四委员会（大陆架）；第五委员会（内陆国自由出入海洋问题）。每个委员会向该会议全体会议提交一份总结其工作结果并附上业已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报告。会议同意将这些条款草案（其中一些按修正后的形式）纳入以下四个独立的公约：《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大陆架公约》。第五委员会的工作并未产生一个独立的公约，但是，它提出的建议被包括在《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14条和《公海公约》第2、第3和第4条中。[[496]](#footnote-496)496

除了这四个公约以外，海洋法会议还通过了一份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签字议定书，它规定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或者如果当事国愿意，将争端提交调解或仲裁。这些公约和议定书的案文转载于附件五，A节。海洋法会议还就各议题通过了九项决议，包括召集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事项。[[497]](#footnote-497)497

海洋法会议《最后文件》于1958年4月29日签字。在1958年10月31日以前，所有公约均开放供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各专门机构成员和其他受大会邀请成为缔约国的国家签署，自该日后，这些公约开放供所有那些国家加入。该任择议定书对所有成为这些公约中任何一项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开放。公约须经批准。该任择议定书按签字国宪法的要求如有必要即须经批准。每个公约在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第二十二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之后的第三十天生效。

《公海公约》[[498]](#footnote-498)498和《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签字议定书》[[499]](#footnote-499)499于1962年9月30日生效。《大陆架公约》[[500]](#footnote-500)500于1964年6月10日生效；《领海及毗连区公约》[[501]](#footnote-501)501于1964年9月10日生效；《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502]](#footnote-502)502于1966年3月20日生效。截至2007年1月31日，52个国家成为《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缔约国，63个国家成为《公海公约》缔约国，38个国家成为《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缔约国，58个国家成为《大陆架公约》缔约国，38个国家成为《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签字议定书》缔约国。

1958年12月10日，大会第1307（XIII）号决议请秘书长召集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以便进一步审议领海宽度和捕鱼区的界线问题，这些问题在第一次海洋法会议上没有解决。第二次海洋法会议于1960年3月17日至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八十八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对于它所要审议的两个问题没有通过任何实质性建议，但是它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有必要根据国际法和惯例的发展情况在调整近海和远海捕鱼方面提供技术援助。[[503]](#footnote-503)503

大会在其第二十五届会议上以1970年12月17日第2750 C（XXV）号决议决定，除其他事项外，在1973年召开一次海洋法会议，以审议建立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公平国际制度，包括建立一个国际机构在内。该会议还将审议有关公海、大陆架、领海（包括其宽度问题和国际海峡及毗连区问题）、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包括沿海国的优先权问题）、保护海洋环境（除其他问题之外，包括防止污染问题）和科学研究问题。大会以同一决议将1968年12月21日大会第2467A（XXIII）号决议中建立的和平利用各国管辖范围之外海床洋底委员会扩大到八十六个成员国，并指示该委员会充当1973年会议的筹备机构，并草拟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国际制度包括一个国际机构的条约条款草案以及有关海洋法专题和问题的综合清单和关于此类议题和问题的条款草案。[[504]](#footnote-504)504

从1973年至1982年，海洋法会议共举行了十一届会议。1982年12月10日，会议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505]](#footnote-505)505它包括320条条文和九个附件。会议还通过了一项最后文件，它附有四个决议和一份谅解声明。该公约直至1984年12月9日在牙买加外交部开放供签署，又自1983年7月1日至1984年12月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该公约在1994年11月16日即交存第六十份批准或加入书后12个月时生效。截至2007年1月31日，152个国家成为该条约的缔约国。不妨特别提一下，1982年公约的一些条款是以1958年公约的条款为基础的。按照1982年公约第311条第1款，在各缔约国之间，该公约应优于1958年4月29日的《日内瓦海洋法公约》。

10．仲裁程序

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选择仲裁程序作为编纂的一个优先专题，并指派乔治·塞尔担任特别报告员。委员会分别在其1950年、1952年、1953年、1957年和1958年的第二、第四、第五、第九和第十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一专题。在就该专题开展工作期间，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506]](#footnote-506)506各国政府提供的信息[[507]](#footnote-507)507以及秘书处起草的文件。[[508]](#footnote-508)508

在1952年第四届会议上，委员会一读通过了仲裁程序草案并送交各国政府以征询意见。在1953年第五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仲裁程序修订案，当时是打算把它作为最后草案。[[509]](#footnote-509)509在其向大会提交的有关第五届会议的报告中，委员会认为最后草案如通过，就要求大会方面采取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23条第1款（c）项设想的那种行动，即应该向会员国推荐该草案，以便缔结一项公约。委员会提出了相应的建议。[[510]](#footnote-510)510

委员会强调指出，该草案有双重性质，它既是关于国际仲裁的现有法律的编纂，也是委员会认为这个方面可取的发展的系统表述。因此，委员会将解决国际争端的仲裁程序的传统特点，诸如同进行仲裁的承诺，仲裁庭的组成和权限，证据和程序的一般规则，以及与仲裁员的裁决有关的传统特点作为基础。与此同时，委员会还规定了某些程序性保障，以确保按照当事方最初的共同意向进行仲裁的承诺的效能。例如，为防止一方声称该争端不属于仲裁承诺范围之内而逃避仲裁，草案规定由国际法院对争端的可仲裁性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同样，为了防止由于一方撤回仲裁员而可能造成的仲裁失败，草案规定，除特定情况外，仲裁庭一经组成就不可改变。草案还包括在当事方未能就此问题达成协定的情况下，由仲裁庭草拟仲裁协定的规定，仲裁协定即关于仲裁承诺，以及仲裁员的提名、仲裁日期和地点等仲裁程序的安排的协定。[[511]](#footnote-511)511

大会在1953和1955年第八届和第十届会议上审议了该草案，草案受到了很多批评，特别是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建议缔结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项公约的意见。在1955年12月14日第989（X）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各国政府所提出的评论及在大会第八届会议及第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所发表的意见，曾提出若干改进该草案的建议，并且请国际法委员会就各国政府的评论以及在第六委员会讨论时所发表的意见，择其对仲裁程序草案的价值可能有所增益者，加以审议，并向大会第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在1957年第九届会议上，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根据大会决议审议该事项。按照该委员会的结论，委员会审议了在审查仲裁程序草案中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特别是，最终目标应是缔结一项公约，还是简单地提出一组供各国在拟订国际条约或具体仲裁协定的条款时可能全部或部分采用的示范规则。委员会决定支持第二种选择。在这样作的时候，委员会承认，照该草案当时的样子，它超出了大多数国家政府准备预先接受作为一项关于仲裁的一般多边公约的范围。但是委员会认为，为了得到大多数国家政府的签署和批准而重新改写该草案，将意味着对草案进行全面修订，很有可能要改变作为草案基础的整个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更可取的做法是，不触动该草案的实质，作为一组条款草案向大会提出该草案，各国在缔结双边或多边仲裁协定，或将特定争端提交临时仲裁时，可以利用它们作为示范条款。

在1958年第十届会议上，委员会在特别报告员报告[[512]](#footnote-512)512的基础上，拟订了一组“仲裁程序示范规则”以及后面的一般评注。[[513]](#footnote-513)513在向大会提交载有这些规则的最后报告时，委员会建议大会以决议形式通过该报告。[[514]](#footnote-514)514关于仲裁程序的示范规则案文转载于附件四，第5节。

关于打算适用于国家间仲裁的示范规则的范围和宗旨，委员会指出：

“……现在不再以可能的一般仲裁条约的形式提出该草案了，提请各方注意该事实可能是有所助益的，即如果各方有些愿望，经必要的改动，草案的规定也能够用于各国与国际组织间以及国际组织相互间的仲裁。

“关于国家同外国私人公司或其他法律实体间的仲裁，法律上的考虑是不同的。但草案的某些条款经过改动也能够用于这个目的。”[[515]](#footnote-515)515

在第六委员会进行了大量讨论后，大会在1958年11月14日第1262（XIII）号决议中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第十届会议工作报告关于仲裁程序的第二章；促请各会员国注意仲裁程序条款草案，以便考虑和使用；并且请各国政府将其愿对此项草案提出之意见，尤其关于拟订仲裁协定及实行仲裁程序经验之意见，送交秘书长，以便联合国于适当时间对这一事项进行重新审查。

11．外交交往和豁免

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期间，委员会选择了外交交往和豁免作为编纂的专题之一，但没有把它包含在优先考虑的专题清单中。委员会在1953年第五届会议上获悉大会1952年12月5日第685（VII）号决议，大会在该项决议中要求委员会在它认为可能的时候，尽快着手编纂外交交往和豁免专题，并将它作为优先考虑的专题对待。

在1954年第六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着手从事该专题的工作，并指派A. E. F. 桑德斯特罗姆担任特别报告员。委员会分别在其1957年和1958年第九届和第十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一专题。在就这一专题开展工作方面，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516]](#footnote-516)516各国政府提供的信息[[517]](#footnote-517)517以及秘书处起草的文件。[[518]](#footnote-518)518

在1957年第九届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报告，[[519]](#footnote-519)519委员会一读通过了附有评注的一组条款草案。该草案被分发给了各国政府，以征求它们的评论意见，并被纳入1957年委员会向大会第十二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在1958年第十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外交交往和豁免的最后草案，包括四十五条条文草案以及评注。[[520]](#footnote-520)520在向大会提交最后草案时，委员会建议大会向各会员国推荐该草案，以便缔结一项公约。[[521]](#footnote-521)521

委员会指出，该草案仅涉及常驻外交使团。不过，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对其他形式的外交关系，即包括巡回使节、外交会议和为有限目的派往一个国家的特别使团在内的所谓的“特别外交”进行研究，并在将来一届会议上，就这些形式的外交关系提出一份报告。委员会的报告也提及国家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组织的特权和豁免。在这方面，委员会只是指出，对于大多数国际组织，这些问题是由特别公约规定的。[[522]](#footnote-522)522

在1958年第六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报告展开辩论期间，一些代表对于用公约形式编纂关于外交特权和豁免的规则是否可取表示怀疑。他们的论点是，惯例和习惯对此已有充分的规定，通过公约来加以规定会出现僵化。他们还争论说，试图为这个问题规定严格的条约规则，甚至有可能导致减少外交使团成员目前实际享有的特权和豁免。由于这些原因，重申现行惯例法将比用公约的形式来加以规定更为可取。[[523]](#footnote-523)523

但是，大多数委员赞成用公约形式编纂该问题，不过对要采取的程序步骤有两类不同的看法。一些委员建议应该将草拟公约的工作委托给第六委员会；另一些委员赞成为此目的召开一次全权代表会议。大会1958年12月5日第1288（XIII）号决议推迟到1959年第十四届会议再采取行动。1959年大会该届会议最终批准了委员会的建议并在1959年12月7日第1450（XIV）号决议中作出决定，在不迟于1961年春季的时候，召开一次全权代表会议。委员会载有条文草案的关于外交交往和豁免的最后报告由大会送交全权代表会议。一年后大会1960年12月12日第1504（XV）号决议，还向该会议送交了1960年国际法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通过的关于特别使团的三项条款草案（见第 和 页），以便该会议可与关于经常外交关系的条款草案一起审议。

1961年3月2日至4月14日，在维也纳召开了联合国外交交往和豁免会议，[[524]](#footnote-524)524八十一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七十五个国家是联合国会员国，六个国家是有关机构的成员国或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该会议设立了全体委员会，会议将议程的实质性项目送交该委员会审议，即审议外交交往和豁免问题，审议关于特别使团的条款草案，以及通过关于审议的问题的文件和会议的最后文件。全体委员会将关于特别使团的条款草案送交关于特别使团的小组委员会审议。

该会议通过了题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公约，[[525]](#footnote-525)525它共有五十三条，涉及各国间经常外交关系的最主要的方面。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取得国籍的任择议定书》[[526]](#footnote-526)526和《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527]](#footnote-527)527公约和任择议定书的案文转载于附件五，C节。根据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特别使团的问题送还大会，建议大会将进一步研究该专题的任务委托给国际法委员会（见第三部分A，第15节）。

1961年4月18日签署了会议《最后文件》。在1961年10月31日以前，在奥地利联邦外交部，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开放供签署，其后至1962年3月31日止，则在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其任何专门机构的所有成员国、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及经大会邀请成为公约缔约国的任何其他国家均可随时加入该公约。公约及两项任择议定书于1964年4月24日生效。截至2007年1月31日，185个国家成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缔约国，52个国家成为《关于取得国籍的任择议定书》缔约国，65个国家成为《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缔约国。

12．领事交往和豁免

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选择了领事交往和豁免问题作为编纂的专题之一，但没有把它列入优先考虑的专题清单中。在1955年第七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开始研究这个专题并且指派亚罗斯拉夫·祖雷克担任特别报告员。

委员会在其1956年第八届会议以及从1958年第十届会议到1961年第十三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个专题。在就这一专题开展工作方面，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528]](#footnote-528)528以及各国政府提供的信息。[[529]](#footnote-529)529

在1960年第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六十五条条款草案及其评注，并将该草案送交各国政府征求意见。在1961年第十三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有关领事关系的最后草案，包括附有评注的七十一项条款。[[530]](#footnote-530)530在向大会提交最后草案时，委员会建议大会召开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研究委员会的草案，并就此问题缔结一项或多项公约。[[531]](#footnote-531)531

大会在1961年12月18日第1685（XVI）号决议中，“满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关于领事关系的条款草案构成了拟订关于该问题的一项公约的可靠基础”，决定应在1963年3月初在维也纳召开国际全权代表会议，并将委员会通过的载有关于领事关系的条款草案的报告送交会议。与此同时，为了“提供机会，在[1962年]第十七届会议上通过就条款草案进一步发表意见，交换看法来完成筹备工作”，大会还请会员国在1962年7月1日以前提交关于条款草案的书面评论，以便在第十七届会议开始前分发给各国政府，并决定将“领事关系”的项目列入该届会议临时议程。

1962年，在第六委员会对关于领事关系的条款草案进行讨论之后，大会以1962年12月18日第1813（XVII）号决议，要求秘书长向全权代表会议送达同大会第十七届会议审议此项目有关的简要记录和文献，并请打算参加全权代表会议的国家尽快向秘书长提出在会议召开前它们可能要对条款草案进行的任何修正，以便向各国政府分发这些修正案。

1963年3月4日至4月22日，在维也纳召开了由95个国家代表出席的联合国领事关系会议。[[532]](#footnote-532)532会议委派两个各由全体与会国组成的主要委员会，审议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条款草案，以及某些其他的提案。两个主要委员会对条款和提案进行讨论后，将它们送交起草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拟订案文，提交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533]](#footnote-533)533它共有七十九项条款，《关于取得国籍的任择议定书》[[534]](#footnote-534)534和《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535]](#footnote-535)535这些条款和议定书的案文转载于附件五，D节。

1963年4月24日，签署了会议《最后文件》。到1963年10月31日止，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在奥地利联邦外交部开放供签署，其后直至1964年3月31日止，在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或其任何有关机构的成员国，或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以及经大会邀请成为本公约当事国的任何其他国家均可签署。公约及两项任择议定书于1967年3月19日生效。截至2007年1月31日，已有171个国家成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缔约国，39个国家成为《关于取得国籍的任择议定书》缔约国，45个国家成为《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缔约国。

13．扩大参加在国际联盟主持下所缔结的一般多边条约

大会根据1962年11月20日第1766（XVII）号决议，要求国际法委员会研究新的国家参加在国际联盟主持下所缔结的某些一般多边条约的问题，根据条约的条款，国际联盟行政院受权邀请其他国家参加作为条约缔约国，但是在国际联盟解散前未经国联行政院邀请的国家却无法成为缔约国，因为缺乏邀请。最初国际法委员会曾提请大会注意这个问题。在1962年国际法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第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中，委员会指出，有一些困难阻碍通过关于条约法的条款草案的途径，迅速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令人满意的办法。因此，委员会建议，应该考虑通过其他程序，诸如保存机关的行政行动和大会的一项决议，更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关于此决议的规定，可望获得有权就此问题发言的所有国家的同意。[[536]](#footnote-536)536

依照大会第1766（XVII）号决议，1963年，国际法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恢复了对该问题的审议。在审查了1946年国际联盟解散时作出的安排，以及联合国承担同在国际联盟主持下所缔结的条约有关的某些职能与权限后，委员会得出结论，如果大会有此愿望，看来它有权指派联合国的一个机构，承担和履行根据所述条约的参加条款以前可由行政院行使的权力。委员会赞同这个程序，作为实现扩大参加这些条约目标的简便办法。因此，委员会在其向大会提出的列举各种可能供选择的办法的报告中提到了该程序。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还指出，各国可能对许多上述条约不感兴趣，建议由主管机关进一步审查问题的这个方面。此外，委员会建议大会采取步骤，审查这些条约，以便确定可能采取哪些必要的行动，修改这些条约使它们适应现代情况。[[537]](#footnote-537)537

在委员会得出的结论的基础上，大会在1963年11月18日第1903（XVIII）号决议中决定，大会为联合国行使在国际联盟主持下所缔结的并邀请各国加入的二十一个技术性而非政治性的一般多边条约赋予国际联盟行政院的职权的适当机构；决议还载明作为有关条约缔约国的联合国会员国同意该项决定。

根据同一项决议，大会请秘书长：（a）将本决议的规定通知非联合国会员国的缔约国；（b）将本决议送交联合国会员国中这些条约的缔约国；（c）在必要时，同这些国家并同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及各专门机构磋商，查明任何有关条约是否业已停止生效，或由以后的条约替代，或因其他原因已无再由他国加入之必要，或需要另采取行动；使之适应现代情况；（d）向1964年大会第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最后大会请秘书长邀请“如不邀请即无资格成为有关条约缔约国之联合国各会员国，或专门机构各成员国，或国际法院规约各当事国或大会为此目的指定之各国，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加入书，加入各该条约。”

1965年，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依照第1903（XVIII）号决议提出的报告，[[538]](#footnote-538)538并于1965年11月5日通过了第2021（XX）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确认“本决议案附件所列九项条约可能为其他国愿加入”，并提请“各当事国注意这些条约中若干条约允宜按现时情况加以调整，倘有新当事国作此请求时，尤应如此办理”。

14．条约法

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选择条约法作为优先编纂的专题。委员会分别在1949年、1952年、1955年和1961年的第一、第四、第七和第十三届会议上指定J. L. 布赖尔利、赫希·劳特帕赫特爵士、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和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担任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委员会分别在1950年、1951年、1956年、1959年和1961至1966年的第二、三、八、十一和十三至十八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一专题。在就这一专题开展工作方面，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539]](#footnote-539)539各国政府提供的信息[[540]](#footnote-540)540以及秘书处起草的文件。[[541]](#footnote-541)541

委员会最初设想在关于条约法的工作中采取“一般性法典”，而不是一项或多项国际公约的形式。在向大会提交的1959年第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中，委员会指出：

“简而言之，条约法本身不依条约而定，只是一般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如果将条约法载入一项多边公约，但一些国家未成为公约缔约国，或成为公约缔约国随后又宣布废弃公约，那就会产生疑问；因为这些国家实际上受或依然受条约规定的约束，由于这些规定体现了现行法的习惯国际法。毫无疑问，每当一项公约包含习惯国际法的规则，总会引起这种困难。实际上这往往无关紧要。但就条约法来说可能有关系，因为条约法本身是所有条约的效力的基础。因此假如作出决定，将条约法或其任何部分，写成一项国际公约，那么几乎肯定需要在文字上进行大量的改动，可能还要删去一些材料。”[[542]](#footnote-542)542

在1961年第十三届会议上，委员会改变了它的工作计划，由仅仅解释说明条约法，转到拟订可以作为国际公约基础的条款草案。在1962年第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中，委员会对此决定作了如下解释：

“首先，一项解释性法典，不管拟订得多么妥善，必然不能像加强法律的一项公约那样有效；而加强条约法在目前如此众多新国家最近成为国际社会成员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其次，通过多边公约编纂国际法将使所有的新国家有机会直接参加拟订法律的工作，如果它们愿意的话；而在委员会看来，它们参与编纂法律的工作是极其可取的，以便使条约法置于最广泛和最可靠的基础之上。”[[543]](#footnote-543)543

大会在1962年11月20日第1765（XVII）号决议中建议委员会继续进行条约法的工作，考虑到在大会发表的意见及各国政府提出的书面评论。

在1962至1964年第十四届至第十六届会议上，委员会对条款草案进行了一读，并且将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送交各国政府征求意见。委员会在1964年第十六届会议上完成了条款草案的一读。

根据各国政府的评论，委员会在1965年第十七届会议上开始了条款草案的二读。委员会重新审查了条款草案最终要采取的形式问题，并坚持它在1961年和1962年表述的赞成采取公约形式的看法。委员会注意到，在1962年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上，第六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说绝大多数代表赞同国际法委员会以公约的形式编纂条约法的决定。

在1966年第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完成了条款草案的二读并且通过了关于条约法的最后报告，报告提出了七十五项条款草案以及这些条款的评注。[[544]](#footnote-544)544在将最后报告提交大会时，委员会建议大会召开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研究委员会关于条约法的条款草案，并就此问题缔结一项公约。[[545]](#footnote-545)545

委员会在拟打条款草案时决定，这些条款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国与国之间缔结的条约，而不适用于国家同其他国际法主体（例如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其他主体（见第三部分A，第20节）相互间缔结的条约。委员会还决定不涉及非书面形式的国际协议。此外，委员会决定条款草案不应有与下列专题有关的任何规定，即关于发生敌对行动对条约的影响（见第三部分B，第4节）；条约的国家继承（见第三部分A，第17节（a））；国家在不履行条约义务方面的国际责任问题（见第三部分A，第25节）；“最惠国条款”（见第三部分A，第19节）；以及规定个人要履行的义务与享有的权利的条约的适用。[[546]](#footnote-546)546

继第六委员会讨论国际法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后，大会1966年12月5日第2166（XXI）号决议决定召开国际全权代表会议，以审议条约法，并将其工作成果载入一项国际公约及其认为适当的其他文书。大会请秘书长在1968年初召开该会议第一届会议，并于1969年初召开会议第二届会议。根据同一项决议，大会请各会员国、秘书长及担任条约保管人的各专门机构总干事提出关于条款的书面评论和意见。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提出了书面评论和意见。

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议，在下一年，大会根据1967年12月6日第2287（XXII）号决议决定于1968年3月在维也纳召开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第一届会议。

于是，自1968年3月26日至5月24日，在维也纳召开了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第一届会议，103个国家的代表和13个专门机构及政府间机构的观察员出席了会议。1969年4月6日至5月22日，还是在维也纳召开了第二届会议，110个国家的代表和十四个专门机构及政府间机构的观察员出席了会议。[[547]](#footnote-547)547会议第一届会议主要是由全体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审议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一组条款草案。第二届会议的第一期会议由全体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举行会议，完成了对上届会议保留的条款的审议工作。第二届会议的剩余部分举行了三十次全体会议，审议了全体委员会通过、经起草委员会审查的条款。

1969年5月22日，会议通过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548]](#footnote-548)548公约由序言、八十五项条款和一个附件组成。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条款草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适用于国家间的条约，该公约为“条约”一词下的定义是，“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如何”。公约明确规定适用于为一国际组织组织约章的任何条约，以及在一国际组织内议定的任何条约。公约第一部分还规定该公约不适用于国家同其他国际法主体间所缔结的国际协定，或此种其他国际法主体相互间的国际协定或非书面国际协定，这个事实并不影响：（a）此类协定的法律效力，（b）本公约所载任何规则应依照国际法而无须基于本公约原应适用于此类协定者，对于此类协定的适用，以及（c）本公约适用于国家间以其他国际法主体亦为其当事方的国际协定为根据的关系。最后，公约还规定本公约仅对各国于本公约对各该国生效后所缔结的条约适用，但不妨碍本公约所载任何规则依国际法而无须基于本公约原应适用于条约者之适用。

公约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条约的缔结和生效（第二编），包括条约的保留及暂时适用；条约的遵守、适用和解释（第三编），其中包括条约与第三国；条约的修正与修改（第四编）；条约的失效，终止及停止施行（第五编），包括该编规定适用的程序，以及解决关于这些规定的适用或解释的争端的程序，条约失效、终止或停止施行的后果；杂项规定（第六编），国家继承，国家责任及发生战争行动问题，以及侵略国问题，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或无此种关系不妨碍此等国家间缔结条约的问题；以及保存机关、通知、更正及登记（第七编）。公约的附件详细说明了第五编第66条所提及的调解程序。公约全文转载于附件五，F节。

按公约的最后规定该公约开放供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或任何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全体成员国，或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及经大会邀请成为本公约缔约国的任何其他国家签署、批准或加入。1969年5月23日公约开放供签署。至1969年11月30日止，公约在奥地利联邦外交部开放供签署，其后至1970年4月30日止在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签署须经批准。公约开放供有资格成为公约缔约国的任何非签署国加入。公约于1980年1月27日生效。至2007年1月31日止，108个国家已成为公约的缔约国。

除《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外，该会议还通过了两个宣言（《禁止使用军事、政治或经济压力强迫缔结条约宣言》和《普遍参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宣言》），以及在会议《最后文件》中所附的五项决议。[[549]](#footnote-549)549

在《普遍参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宣言》中，该会议指出它深信涉及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展的多边公约，或其客体和目标同整个国际社会有关的条约，应该开放供普遍参加；会议指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81至83条条款使大会能够向非联合国会员国、非任何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或非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的国家发出特别邀请，使它们成为公约缔约国；会议请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发出邀请的问题，以确保各国尽可能最广泛地参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将此问题交由第六委员会审议，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将发出邀请的问题推迟至第二十五届会议审议。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大会通过了该建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大会在1970年、1971年、1972年和1973年进一步推迟审议该问题，直至下一年才审议该问题。1974年11月12日，大会通过了第3233（XXIX）号决议，决定邀请所有的国家成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缔约国。

15．特别使团

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在向大会第十三届会议提出关于外交交往和豁免的最后草案（见第133和134页）时说，虽然该草案仅涉及常驻外交使团，但是外交关系也采取可能列在“特别外交”标题下的其他形式，包括巡回使节、外交会议和为有限目的而派往一国的特别使团。1958年，委员会认为应该对这些外交形式加以研究，以便制定指导它们的法律规则，于是委员会请负责“外交交往和豁免”专题的特别报告员A. E. F. 桑德斯特罗姆着手进行研究，并在下一届会议上提出报告。1959年，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决定将特别外交问题作为特别专题列入第十二届会议议程，并指派桑德斯特罗姆先生为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1960年，在特别报告员报告[[550]](#footnote-550)550的基础上，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通过了关于“特别使团”的三条条款草案及其评注。委员会在关于第十二届会议工作的报告中说，应该将该草案视为“仅构成初步的研究”；不过，委员会建议大会应将该草案送交订于1961年春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外交交往和豁免会议。该草案第1条第1款给“特别使团”下的定义如下：

“‘特别使团’一词意指为了执行特别任务由一国派往另一国由国家代表组成的官方使团。它也适用于在他前往的国家执行特别任务的巡回使节。”[[551]](#footnote-551)551

国际法委员会在同一届会议上指出，“外交会议”问题不仅同“特别使团”问题有联系，而且也同“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关系”问题有联系，委员会决定暂时不处理“外交会议”问题。

大会1960年12月12日第1504（XV）号决议决定应将关于特别使团的条款草案送交维也纳会议，这样会议可以与关于常驻外交使团的条款草案一起来审议特别使团的条款草案。

维也纳会议将特别使团问题送交全体委员会设立的小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强调特别使团问题的重要性，但指出，由于时间不够，在最后起草关于特别使团的条款草案之前，没有按通常的做法将它们提交各国政府征求评论意见，并指出，该条款草案仅仅表明关于常驻使团的哪些规则适用于特别使团，哪些规则不适用于特别使团。小组委员会认为，尽管基本规则实际上可能相同，但是不能设想这样的办法就一定适用用于整个特别使团领域。继小组委员会和全体委员会审议该专题后，维也纳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大会将该专题送还国际法委员会。[[552]](#footnote-552)552

大会第十六届会议通过了1961年12月18日第1687（XVI）号决议，要求国际法委员会进一步研究特别使团问题，并将关于该问题的报告提交大会。

1963年，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指派米兰·巴托斯担任特别使团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并决定他应该在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基础上拟订条款草案，但是他应该铭记根据特别使团的职能和性质，它是有别于常驻使团的一种制度。委员会还一致同意，等待特别报告员的建议，然后再决定条款草案是应该采取1961年维也纳公约附加议定书的形式，还是应该载入一项单独的公约，还是采取任何其他适当的形式。关于该专题的范围，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认为关于特别使团的研究暂时不应包括参加国际会议的政府代表的地位问题。

委员会在1964年第十六届会议到1967年第十九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一专题。在就这一专题开展工作方面，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553]](#footnote-553)553各国政府提供的信息[[554]](#footnote-554)554以及秘书处起草的文件。[[555]](#footnote-555)555

在1964年第十六届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556]](#footnote-556)556并暂时通过了十六项条款，随后将条款提交大会和各国政府参考。在1965年第十七届会议的第一期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557]](#footnote-557)557并继先前通过的十六条条款后暂时通过了二十八项条款。委员会将在第十六届和第十七届会议上通过的所有条款草案提交大会审议，并送交各国政府征求评论意见。

在1966年第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研究了第六委员会发表的意见以及各国政府书面评论中产生的有关特别使团的某些一般性质的问题，首先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条款草案以后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大会1966年12月5日第2167（XXI）号决议请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其有关特别使团的工作，并在其下一次报告中提交关于该专题的最后草案。

随后在1967年，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在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558]](#footnote-558)558并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在第六委员会发表的看法后，通过了包含五十项条款草案及评注的关于特别使团的最后草案，[[559]](#footnote-559)559将其提交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并建议“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缔结一项关于特别使团的公约。”[[560]](#footnote-560)560

第六委员会随后建议将题为“特别使团公约草案”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以便大会通过这样的一项公约。大会1967年12月1日第2273（XXII）号决议采纳了第六委员会的建议，请会员国对条款草案提出它们的评论和意见。

在1968年和1969年的大会第二十三届和第二十四届会议上，第六委员会在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草案的基础上，审议了“特别使团公约草案”的项目。这两届会议都邀请瑞士[[561]](#footnote-561)561作为观察员参加第六委员会有关的讨论，但无表决权。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议，大会1969年12月8日第2530（XXIV）号决议通过了《特别使团公约》，[[562]](#footnote-562)562及同公约有关的《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563]](#footnote-563)563该公约及议定书转载于附件五，E节。在1969年12月8日大会通过《特别使团公约》的同一天，还在第2531（XXIV）号决议中建议，“派遣国应在放弃其特别使节团人员之豁免无碍特别使节团职务之执行时，对在接受国内之人之民事请求案件放弃此种人员之豁免，又如豁免不予放弃，派遣国应尽最大努力使请求案件获得公允解决。”公约内“特别使团”一语是指，“一国经另一国同意，派往该国交涉特定问题，或执行特定任务，而具有代表国家性质之临时使团”。

按照公约的最后条款公约开放供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或任何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或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及经大会邀请成为本公约缔约国的任何其他国家签署、批准或加入。任择议定书的最后条款规定议定书开放供可能成为公约缔约国的所有国家签署、批准或加入。公约和任择议定书自1969年12月16日起开放供签署，至1970年12月31日止。签署须经批准。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开放供有资格成为缔约国的任何非签署国加入。公约和任择议定书于1985年6月21日生效。到2007年1月31日止，38个国家已成为公约的缔约国；17个国家成为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

大会第2530（XXIV）号决议还决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审议发出邀请的问题，以确保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该公约。大会在1970年、1971年、1972年和1973年均推迟到下一年审议该问题。1974年11月12日，大会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了第3233（XXIX）号决议，该决议注意到联合国条约法会议通过的《普遍参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宣言》，宣言请大会审议发出邀请的问题，以确保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该公约。大会以该项决议决定邀请所有的国家成为《特别使团公约》及其《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

16．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564]](#footnote-564)564

1958年，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十三届会议期间审议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外交交往和豁免最后报告的过程中（见第134页），法国代表建议大会应请国际法委员会将研究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的问题列入其议程。为支持这个建议，他指出国际组织的发展扩大了国际组织和国家间关系产生的法律问题的数目和范围，而关于国际组织特权和豁免的特别公约仅部分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他强调说，因此不仅有必要编纂这些特别公约，而且有必要拟订将作为该领域国际法逐渐发展的基础的一般原则。

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议，大会通过了1958年12月5日第1289（XIII）号决议，请国际法委员会“俟联合国完成关于外交往来与豁免，领事往来与豁免及特种外交之研究后，参加各项研究结果及大会讨论情形，于适当时期，进一步审议国家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关系问题。”

1959年，国际法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注意到该项决议，并决定在适当时期审议该问题。1962年，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决定将该问题列入其下届会议议程，并指派阿卜杜拉·埃里安担任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根据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报告和工作文件，委员会分别在1963年和1964年的第十五和十六届会议上审议了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关系这一专题的范围及处理方法。[[565]](#footnote-565)565委员会委员大多数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同意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关系的专题原则上范围是广的，但是就目前对该专题的研究而言，“应该优先考虑外交法适用于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关系问题”，随后，国际法委员会将其专题工作的重点放在关于国家派驻国际组织代表的地位、特权和豁免的研究方面。在完成有关该专题第一部分的工作后，委员会在1976年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开始审议该专题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涉及国际组织及其职员、专家和其他不作为国家代表参加其活动的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566]](#footnote-566)566

（a）国家派驻国际组织代表的地位、特权和豁免

委员会在1968年第二十届会议到1971年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一专题的第一部分。在审议该专题方面，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567]](#footnote-567)567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的信息[[568]](#footnote-568)568以及秘书处起草的文件。[[569]](#footnote-569)569

在1968年第二十届会议到1970年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对条款草案进行了一读，并且将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连同评注送交各会员国政府和瑞士以及联合国秘书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征求意见。

大会在1969年11月12日第2501（XXIV）号决议和1970年11月12日第2634（XXV）号决议中建议委员会应继续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关系的工作，以期在1971年提出关于该专题的最后草案。大会还建议国际法委员会考虑到大会会议期间发表的看法以及各国政府提交的书面评论。

在1971年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委员会对条款草案进行了二读。它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工作组从其一般经济和结构的观点出发研究了整个草案，并据此向委员会提出了建议。[[570]](#footnote-570)570

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共八十二条条款的最后草案以及评注，[[571]](#footnote-571)571并将其提交给了大会，同时建议召开国际全权代表会议来研究条款草案并就此问题缔结一项公约。[[572]](#footnote-572)572根据最后草案的内容，标题改为“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条款草案”。[[573]](#footnote-573)573

该草案的范围限于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和国家为其成员的组织的机构，以及在这些组织主持下召开的会议。因为在委员会送交各国政府的国际组织的暂时条款草案中不包括关于派往各机构和会议的观察团的规定，国际法委员会认为以最后条款草案的附件形式提出关于观察团的规定是适当的。[[574]](#footnote-574)574

大会1971年12月3日第2780（XXVI）号决议表示希望在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的基础上，迅速拟订和缔结一项国际公约。决议请会员国和瑞士提出关于条款草案以及拟订和缔结关于该问题的一项公约要采取的程序的书面评论及意见。大会也请秘书长和专门机构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提出关于条款草案的书面评论和意见。

下一年，大会1972年12月14日第2966（XXVII）号决议决定在切实可行时迅速召开国际会议。1973年，大会11月30日第3072（XXVIII）号决议决定于1975年初在维也纳召开该会议。

1975年2月4日至3月14日在维也纳召开了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575]](#footnote-575)575八十一个国家的代表，以及两个国家、七个专门机构和有关机构、三个其他政府间组织和经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认的七个民族解放运动的观察员出席了会议。会议设立了全体委员会，指定该委员会审议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会议还设立了起草委员会，除委托该委员会负责起草、协调和审查会议通过的所有案文外，该委员会还要拟订公约的标题、序言和最后条款，以及会议《最后文件》。

1975年3月13日，会议通过了《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576]](#footnote-576)576公约共有九十二项条款，其案文转载于附件五，H节。1975年3月14日公约开放供签署。至1975年9月30日止，公约在奥地利共和国联邦外交部开放供签署，随后到1976年3月30日止，在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签署须经批准。公约开放供任何国家加入。公约将于交存第三十五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后第三十天生效。到2007年1月31日止，已有33个国家成为公约缔约国。

除了维也纳公约外，会议还通过了两项分别同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地位，以及公约适用于国际组织将来的活动有关的决议。这些决议是作为会议《最后文件》的附件。[[577]](#footnote-577)577根据这些决议的规定，将题为“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通过的决议：（a）关于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观察员地位的决议；（b）关于公约适用于国际组织将来活动的决议”的项目列入大会1975年第三十届会议议程。自第三十届到第三十四届会议，大会将此项目的审议推迟到下一届会议。大会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七、第三十九、[[578]](#footnote-578)578第四十一、第四十三、第四十五、第四十七和第四十九届会议审议了该项目，并通过了1980年12月15日第35/167号决议、1982年12月16日第37/104号决议、1984年12月13日第39/76号决议、1986年12月3日第41/71号决议、1988年12月9日第43/160号决议、1990年11月28日第45/37号决议和1992年11月25日第47/29号决议以及第34/433号决定和第49/423号决定。大会通过第49/423号决定将该项目的审议工作推迟到以后的届会进行。

（b）国际组织的地位、特权和豁免

在1976年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请该专题特别报告员阿卜杜拉·埃里安编写一份初步报告，以便它能够作出必要的决定，并确定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这一专题第二部分的行动方针，这一部分涉及国际组织及其职员、专家和其他不作为国家代表参加其活动的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

在1977年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授权特别报告员依照初步报告[[579]](#footnote-579)579中所说的方针继续进行研究，并编写进一步的报告，报告要考虑到在第二十九届会议讨论期间表达的意见和提出的问题。它还决定授权特别报告员索取补充资料，并希望他会遵循通常途径进行研究，包括调查联合国系统内外各国际组织的协定和惯例以及各国的立法和惯例。

在1977年12月19日第32/151号决议中，大会核可了委员会就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这一专题第二部分得出的结论。

在委员会1978年第三十届会议上，委员会同意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580]](#footnote-580)580中提出的如下结论和建议：

（a） 国际法委员会和大会第六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宜于着手研究“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都有普遍一致的意见；

（b）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该专题第二部分的工作应极为审慎地进行；

（c） 鉴于这项研究应包括区域性组织，委员会进行该专题第二部分的初期工作中，眼界应该广一些。至于最终编纂时是否包括这类组织，只有在研究工作完成后才能最后决定；

（d） 鉴于优先次序问题需推迟到研究工作完成后才能确定，对专题研究的内容，眼界也应该广一些。

在197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任命莱昂纳多·迪亚斯-冈萨雷斯为该专题部分的特别报告员。

根据新任特别报告员的报告[[581]](#footnote-581)581以及秘书处起草的文件，[[582]](#footnote-582)582委员会分别在1983、1985、1987、1990和1991年的第三十五、第三十七、第三十九、第四十二和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审议了该专题。根据特别报告员的第四、第五和第六次报告，[[583]](#footnote-583)583委员会分别在1990和1991年的第四十二和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对条款草案进行了一读。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992年第四十四届会议上注意到规划小组已设立一个工作组来审查迄今为止就这一专题所取得的进展，并就委员会是否应该继续这一专题，如果继续应朝哪个方向继续进行，提出建议。委员会说，关于专题第一部分的讨论，涉及国家驻国际组织代表的地位、特权和豁免，导致产生形成1975年《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基础的条款草案。由于各国迟迟不批准或加入该公约，人们也就产生怀疑是否应该继续这项于1976年进行的关于这一专题第二部分的工作，以研讨国际组织及其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这个问题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由现有协定所包括。委员会也注意到，时间的推移并未表明有更多的国家接受该公约，委员会也一直没有积极地审议这一专题。前后两任特别报告员提出了八份报告，其中所载的22项条款已全部送交起草委员会，但是起草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无论是在国际法委员会中还是在第六委员会中，都没有人表达应该更积极地审议这个专题的看法。在此情况下，国际法委员会接受了规划小组关于目前不再进一步探讨这一专题的建议，决定在委员们任期内不再进一步审议这一专题，除非大会另有决定。

大会以1992年11月25日第47/33号决议认可了国际法委员会的上述决定。

17．国家和政府继承

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选择国家和政府继承问题作为编纂专题之一，但没有把它列入优先考虑的清单中。委员会在1962年其第十四届会议上得知大会1961年12月18日第1686（XVI）号决议，其中建议委员会将国家和政府继承的专题列入优先专题清单内。委员会的所有委员原则上都赞成将该专题列入优先专题清单内，但是对于该专题的范围和进行该专题研究的最好方法意见有分歧。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国家和政府继承小组委员会，其任务是向委员会提交一份载有关于该问题的范围，进行这项研究的方法和提供必要文件的方法的各种建议的初步报告。[[584]](#footnote-584)584

在1963年第十五届会议上，委员会审议并一致同意了小组委员会的报告。[[585]](#footnote-585)585委员会认为，优先研究国家继承问题是完全合理的，大家一致认为对政府继承问题的审议暂时只应以补充关于国家继承的研究所必需的程序为限。委员会中好几位委员都强调，鉴于非殖民化这个新现象，国家继承目前对新独立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该小组委员会的意见，即在研究中应特别注意与新独立国家有关的各种问题。

委员会表示同意该小组委员会建议的大纲、标题的优先次序和专题的详细划分：关于条约的继承；条约以外其他来源所产生权利和义务的继承（1968年改为“条约以外事项的国家继承”[[586]](#footnote-586)586）和各国际组织成员资格的继承。委员会赞成该小组委员会关于国家继承专题和委员会议程上的其他专题之间关系的建议，特别是条约方面的继承将在国家继承的范围内，而不是条约法的范围内审议。

委员会所有委员都赞成该小组委员会提议的任务——调查并评估在国家继承方面的法律和惯例的现状，根据国际法的新发展起草关于该专题的条款草案。委员会任命曼弗雷德·拉克斯为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大会1963年11月18日第1902（XVIII）号决议建议委员会“参酌各方在大会第十八届会议上所表示的意见、国家和政府继承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及各国政府可能提出的评论，并妥为顾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获得独立各国之意见，继续进行国家和政府继承方面的工作”。

在拉克斯先生辞职之后，委员会在1967年第十九届会议上决定根据该小组委员会1963年报告中规定的该专题的大纲，讨论该专题的三个方面。委员会为该专题的前两个方面，即关于条约的继承和条约以外事项的国家继承，分别任命了特别报告员，并且决定暂时撇开第三个方面，即国际组织成员资格的继承，不将其分配给任何一位特别报告员。委员会认为第三个方面既涉及到条约方面的继承，也涉及到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根据1963年作出的决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要优先进行国家继承的研究，只是在补充国家继承研究所必需的范围内才考虑对政府继承的研究。

（a）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

委员会分别在1968年、1970年、1972年和1974年的第二十届、第二十二届、第二十四届和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审议了该分题。委员会分别在1967年和1973年的第十九届和第二十五届会议上任命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和弗朗西斯·瓦莱特爵士为继承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审议该专题方面，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587]](#footnote-587)587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的信息[[588]](#footnote-588)588以及秘书处起草的文件。[[589]](#footnote-589)589

在1972年第二十四届会议上，委员会对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条款草案进行了一读。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带评注的临时草案，并且按照章程第16和第21条，决定将草案送交各会员国政府征求意见。

大会1972年11月28日第2926（XXVII）号决议建议委员会根据会员国对临时草案提出的意见继续就分题开展工作。大会在1973年11月30日第3071（XXVIII）号决议中建议委员会根据各会员国的评论，在其1974年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完成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的草案的二读。

在1974年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带评注的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条款草案最后案文，[[590]](#footnote-590)590并将其连同一项建议一起提交大会，建议大会请各会员国对该条款草案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并召开一次全权代表会议来研究该草案和缔结一项关于该主题的公约。[[591]](#footnote-591)591

在1974年12月14日第3315（XXIX）号决议中，大会请各会员国提出其对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条款草案以及该条款草案的工作应按何种程序并以何种形式完成的书面评论和意见。次年，大会在1975年12月15日第3496（XXX）号决议中决定于1977年召开全权代表会议，以审议条款草案，并将其工作成果纳入一项国际公约或它可能认为适当的其他文书。在这项决议中，大会还敦促那些尚未提交它们对条款草案的书面评论和意见的会员国，尽快提出评论和意见。1976年11月24日，大会通过了第31/18号决议，决定联合国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的会议于1977年4月4日至5月6日在维也纳举行。

该会议如期举行，但是由于在规定的时间内没能完成工作，它于1977年5月6日建议大会决定在1978年上半年再召开这个会议的最后一届会议。[[592]](#footnote-592)592

经大会1977年12月8日第32/47号决议中核准的这次会议的续会于1978年7月31日至8月23日在维也纳举行。[[593]](#footnote-593)593

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1977年会议有89个国家参加，续会有94个国家参加）。在1977年会议和续会上各有两个国家派观察员参加。此外，联合国纳米比亚[[594]](#footnote-594)594理事会参加了这次会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派有观察员参加，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仅参加了1977年那届会议。四个专门和有关机构及另一个政府间组织向1977年那届会议派遣了观察员，还有两个政府间组织向1977年那届会议和续会都派遣了观察员。

这次会议将审议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的任务分配给一个全体委员会并委托一个起草委员会除负责起草、协调并审查已通过的所有案文外，还要起草该公约的标题、序言和最后条款以及会议《最后文件》。会议建立了一个非正式协商小组以便审议第6、7和12条，在续会上建立了一个和平解决争端特设小组。1978年8月22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595]](#footnote-595)595包括一个序言，五十项条款和一个附件，其全文转载于附件五，I节。该公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国际法委员会所通过的条款草案的结构和案文。公约附件详细说明了该公约第42条涉及的调解程序。

会议《最后文件》——会议通过的五项决议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于1978年8月23日签署。该公约自1978年8月23日至1979年2月28日在奥地利共和国联邦外交部开放供签署，后来又在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直至1979年8月31日止。签字须经批准。该公约一直开放供任何国家加入。公约于1996年11月6日生效。到2007年1月31日，已有21个国家成为该公约缔约国。

会议通过的五项决议中有一项关于由于国家的合并所产生的相互矛盾的条约义务和权利的决议，它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国和该条约其他缔约国竭尽全力通过共同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另一项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中，会议决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对该公约的有关条款的解释应符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南非不是未来独立的纳米比亚国的被继承国。[[596]](#footnote-596)596

（b）条约以外事项的国家继承

在1967年第十九届会议上，委员会任命穆罕默德·贝贾维为“条约以外其他来源所产生权利和义务的继承”分题特别报告员。[[597]](#footnote-597)597

委员会分别在1968、1969、1973和1975至1981年的第二十届、第二十一届、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七至三十三届会议上审议了该分题。在审议该分题的过程中，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598]](#footnote-598)598各国政府提供的信息[[599]](#footnote-599)599以及秘书处起草的文件。[[600]](#footnote-600)600

在1973年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研究暂时局限于公共财产的一个种类，即国家财产。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开始了条款草案的一读。

在197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完成了有关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方面的国家继承条款草案的一读，在1980年的下一届会议上完成了有关国家档案方面的国家继承条款草案的一读。根据委员会章程第16和第21条，委员会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由秘书长转交给了各会员国政府以征求意见。

大会1980年12月15日第35/163号决议第4段（a）建议国际法委员会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在大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意见，在其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完成委员会第三十一届和第三十二届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条约以外事项的国家继承的条款草案的二读。

在1981年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委员会参照各国政府的评论重新研究了该条款草案并通过了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的最后案文全文及其评注。[[601]](#footnote-601)601委员会依照其章程将最后的条款草案提交大会，并建议大会召开一次全权代表会议来研究该草案，并缔结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公约。[[602]](#footnote-602)602

大会在1981年12月10日第36/113号决议中决定召开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审议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并将其工作成果载于一项国际公约及其认为适当的其他文书。在该项决议中，大会还请各会员国就该最后条款草案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在1982年11月15日第37/11号决议中，大会决定联合国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会议定于1983年3月1日至4月8日在维也纳举行。

因此，会议于1983年3月1日至4月8日在维也纳举行。九十个国家代表团以及代表纳米比亚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参加了会议。此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出席了会议。两个有关的专门机构和另外两个政府间组织派观察员参加。

会议收到了各国政府依照大会1981年12月10日第36/113号决议提交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最后条款草案的书面评论以及在大会第三十六届和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第六委员会中口头发表的关于该条款草案的评论。这些评论载于联合国秘书处编写的一份分析汇编。[[603]](#footnote-603)603

会议指定由全体委员会审议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它委托起草委员会除负责起草、协调和复审已通过的所有案文外，还负责草拟该公约的标题、序言和最后条款以及草拟会议《最后文件》。会议于1983年4月7日通过了《关于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604]](#footnote-604)604包括序言、五十一项条款和附件，其全文载于附件五，J节。该公约附件具体说明了公约第43条涉及的调解程序。该公约自即日起至1983年12月31日在奥地利共和国外交部开放供签署，以后在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直至1984年6月30日为止。该公约须经批准。该公约一直开放供任何国家加入。该公约应自交存第十五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的三十日后开始生效。截至2007年1月31日，已有七个国家成为该公约缔约国。

会议《最后文件》，其中包括会议通过的六个决议，于1983年4月8日签署。会议通过的决议之一承认，该公约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阻碍为反对殖民主义、外国统治、外国占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民，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与《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行使合法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并且承认这些人民对其资源和自然财富拥有永久主权以及他们发展的权利、了解其历史的权利和保护其文件遗产的权利。另一项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规定，关于纳米比亚，该公约有关条款的解释应与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一致，因此应保留未来独立的纳米比亚国的一切权利。[[605]](#footnote-605)605

国际法委员会在1995年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开始讨论国家和政府继承专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国家继承方面的国籍”（见第三部分A，第24节）。

18．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和  
不得侵犯

在1971年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上，有人建议委员会考虑是否有可能起草关于像杀害、绑架或伤害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这种罪行的条款草案。委员会虽然承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鉴于必须把另一个专题摆在优先位置，不得不推迟作出决定。不过，委员会在审议1972年的工作方案时决定，如果大会要求它拟订一组关于该主题的条款草案，它可在1972年会议上拟订该条款草案。

大会1971年12月3日第2780（XXVI）号决议请国际法委员会尽快研究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和不得侵犯问题，以期草拟一组关于侵害这种代表和人员的罪行的条款草案，在委员会认为妥善的最早日期向大会提出。大会还请秘书长邀请各会员国对保护外交人员问题提出意见，并将其送交国际法委员会审议。

在1972年第二十四届会议上，委员会在进行了初步的一般性讨论之后建立起一个工作组，审查有关问题并草拟一组条款草案提交委员会。[[606]](#footnote-606)606与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并草拟条款草案的传统程序不同，这一步骤是根据参加一般性讨论的大部分委员的意见采取的，他们认为该问题是一个十分紧迫和重要的问题，委员会完全有理由采用一种更快的方法起草一组条款草案，提交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

该工作组在其工作的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向委员会提交了第一次报告，[[607]](#footnote-607)607其中载有一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的十二条条款草案。在委员会审议了该条款草案之后，工作组对其进行了修订并在以后的两份报告中又将其送交给委员会。[[608]](#footnote-608)608委员会审议了这两份报告并暂时通过了十二条条款的草案，它把该草案提交大会及各国政府，征求它们的意见。

大会在1972年11月28日第2926（XXVII）号决议中，决定在其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审议防止和惩处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行公约草案，以期由大会最后拟订这一公约。大会还请各国、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对国际法委员会所草拟的条款草案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

在1973年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第六委员会分两个阶段审议了该公约草案的条款。[[609]](#footnote-609)609在第一阶段，第六委员会审议了所有条款草案和建议的新条款以及前言和最后条款，并将除它已决定删去的第9条以外的所有条款原文或修正案文送交起草委员会，适当情况下附上所提出的修正意见。在第二阶段，第六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起草委员会推荐的所有案文的原文或修正案文。该起草委员会当时受托在第六委员会最终通过该草案并把其推荐给大会之前协调并进一步审查该案文全文。1973年12月14日，大会通过了《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610]](#footnote-610)610该公约包括一个序言和二十项条款，附在1973年12月14日第3166（XXVIII）号决议之后。该公约以及第3166（XXVIII）号决议案文[[611]](#footnote-611)611转载于附件五，G节。

须经批准的该公约在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至1974年12月31日止。它一直开放供任何国家加入。该公约于1977年2月20日生效。到2007年1月31日为止。已有164个国家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

19．最惠国条款

最惠国条款的专题是在1964年国际法委员会审议条约同第三国的问题时第一次提出来的。经过审议，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不宜在编纂一般条约法时处理最惠国条款问题，尽管它认为这种条款在以后的某个时候可能会适当地构成一项专门研究的主题。

在1967年第十九届会议上，鉴于该专题的范围不大，各国代表在第六委员会对其表示感兴趣以及澄清它的法律方面也许有助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工作这一事实，国际法委员会决定把条约法中最惠国条款的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

大会1967年12月1日第2272（XXII）号决议建议委员会研究条约法中最惠国条款的专题。

委员会分别在1968年第二十届、1969年第二十一届、1973年第二十五届、1975年第二十七届、1976年第二十八届和1978年第三十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一专题。委员会分别任命安德烈·乌什托尔和尼古拉·A. 乌沙科夫为1967年第十九届会议和1977年第二十九届会议该专题的继任特别报告员。在审议该专题时，委员会收到了工作文件和特别报告员的报告、[[612]](#footnote-612)612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的资料[[613]](#footnote-613)613以及秘书处编写的文件。[[614]](#footnote-614)614

在1968年第二十届会议上，经过对该问题的一般性讨论，委员会指示特别报告员乌什托尔先生不要把他的研究局限于国际贸易的范围，而要探索适用该条款的各主要领域。委员会认为应该从最惠国条款实际应用的所有方面澄清该条款作为一项法律体制的范围和效力。

在1973年第二十五届、1975年第二十七届和1976年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继续进行条款草案的一读。在1976年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根据其章程第16和第21条通过秘书长把一读时已通过的条款草案送交各会员国政府，征求它们的意见。

大会1976年12月15日第31/97号决议欢迎完成了条款草案的一读，并建议委员会根据从各会员国、对这个问题负有职责的各联合国机构和各有关政府间组织收到的评论，在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上完成该条款草案的二读。大会在1977年12月19日第32/151号决议中重申了这一建议。

在1978年第三十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新的报告员乌沙科夫先生提交的第一次报告[[615]](#footnote-615)615、某些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评论和某些委员提出的以下几项新条款的建议重新审查了该条款草案：第21条之二，“最惠国条款同发展中国家之间安排的关系”；[[616]](#footnote-616)616A条，“最惠国条款和根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给予的待遇”，[[617]](#footnote-617)617第21条之三“最惠国条款和根据商品协定给予的待遇”[[618]](#footnote-618)618第23条之二“最惠国条款同关税同盟的一个成员国给予另一个成员国的待遇的关系”[[619]](#footnote-619)619和题为“解决争端”的第28条及附件。[[620]](#footnote-620)620

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最惠国条款的三十条条款草案的最后案文及其评注。[[621]](#footnote-621)621最后草案案文转载于附件四，第6节。

在审议最惠国条款和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同水平之间的关系时，委员会发现该条款在特别涉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领域的实施并不是一个容易按照委员会章程第15条所说编纂的含义进行国际法编纂的问题，因为该条所述编纂进程的要求，即存在大量的国家惯例、判例和学说并不容易辨别。因此，委员会试图进入逐渐发展领域，办法是除其他外还通过第24条，这一条的根据是上述关于新的第21条之二的建议。不过，委员会关于在其最后草案中增列基于A条和第21条之三的两项建议的条款是否适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它决定提请大会注意这两条案文，以便各会员国在对该专题进行最后编纂时可以对其加以适当的考虑。关于最惠国条款同关税同盟和类似的国家联盟 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此已提出了一项关于新的第23条之二的建议——委员会考虑到关于这一点的评论尚不足以作出结论而且缺乏时间，同意不把关于关税同盟的例外条款列入该最后草案。根据委员会的谅解，条款草案未作规定不能解释为默示这样一条规则的存在或不存在，而应该解释为意味着最后决定要由收到该草案的各国在该专题编纂的最后阶段作出。同样，委员会决定不把诸如关于新的第28条的建议所载的关于解决争端的一条条款列入其最后草案，而是把这个问题提交大会和各会员国，并最终提交给可能受托最后完成该条款草案的机构。[[622]](#footnote-622)622

委员会遵照其章程第23条决定建议大会向各会员国推荐该条款草案，以期缔结一项关于这个主题的公约。[[623]](#footnote-623)623

大会在1978年12月19日第33/139号决议特别请所有国家、其权限与这个主题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各有关政府间组织对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以及对国际法委员会未能作出决定与最惠国条款有关的若干规定提出书面评论。大会还请各国对国际法委员会缔结一项关于这个主题的公约的建议提出评论。大会在分别于1980年、1981年、1983年和1985年举行的第三十五届、第三十六届、第三十八届和第四十届会议上重申了这些请求。[[624]](#footnote-624)624

在1988年12月9日第43/429号决定中，大会注意到关于最惠国条款国际法编纂或逐渐发展的复杂性，并考虑到应给予各国政府更多时间，以便彻底研究条款草案，并确定其关于未来工作最适当程序的各自立场，决定将该项目列入1991年第四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大会1991年第四十六届会议进一步审议了该专题。大会1991年12月9日第46/416号决定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关于最惠国条款所作的宝贵工作，以及各会员国、联合国机构、专门机构或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的意见和评论，决定将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工作报告[[625]](#footnote-625)625所载的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文草案提请各会员国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注意，供其在此种情况下及在其认为合适时考虑。

委员会在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审议了将“最惠国条款”专题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的提议。委员会回顾了其以前审议该专题的成果，并且指出，委员会一些委员认为委员会不应当重启该专题，理由是：导致大会没能就委员会条款草案采取行动的基本政策分歧尚未得到解决，这些分歧应当首先在一个具有必要技术专长和负有讨论政策任务的国际论坛上处理。另一些委员认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最惠国条款在当代条约中，特别是在贸易法和国际投资方面依然重要，对该专题开展进一步工作时机已经成熟。[[626]](#footnote-626)626

20．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相互间缔结的条约问题

1969年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条约法会议通过了一项题为“有关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条的决议”的决议，该项决议是《最后文件》的附件，它建议大会委托委员会研究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相互间缔结的条约问题（见第 页）。根据这一建议，大会在1969年11月12日第2501（XXIV）号决议中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同各主要国际组织咨商，研究这个问题。

委员会在1970年其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将这个问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并建立一个小组委员会审议该专题的研究所涉的初步问题。委员会通过的该小组委员会的报告[[627]](#footnote-627)627请求秘书处进行某些准备工作，特别是关于联合国惯例的准备工作，并要求小组委员会主席向该小组委员会各位成员提交一份关于探讨该专题的方法及其范围的调查表。

在1971年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上，该小组委员会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628]](#footnote-628)628其中载有该小组委员会委员的回答其主席准备的调查表时发表的意见的摘要和对委员会的建议，特别是任命该专题特别报告员以及就某些准备工作向秘书长提出请求的建议。委员会审议并未加改动就通过了该报告。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任命保罗·勒泰为该专题特别报告员。

委员会分别在其1973年第二十五届至1975年第二十七届会议及其1977年第二十九届至1982年第三十四届会议上审议了该专题。在审议该专题时，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629]](#footnote-629)629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的资料[[630]](#footnote-630)630以及秘书处编写的文件。[[631]](#footnote-631)631

在1973年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在其头两份报告和在这届会议中所发表的评论的基础上开始起草一组条款草案。

在1974年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委员会开始进行条款草案的一读，并在1980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完成了一读。按照1978年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的决定，委员会在临时通过若干组条款草案后，应将这些草案送交各国政府和主要国际组织，[[632]](#footnote-632)632由它们提出评论意见，然后再在一读时通过整个草案。人们认为，采用这一程序，委员会的二读工作就不会拖延过久。

大会1980年12月15日第35/163号决议请委员会开始对条款草案进行二读。

按照大会1981年12月10日第36/114号决议的建议，委员会分别在1981年第三十三届和1982年第三十四届会议上继续进行条款草案的二读。在后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的条款草案最后案文及其评注，并提交给大会，委员会根据其章程第23条第1款（d）项，建议大会召开一次会议，就此题目缔结一项公约。[[633]](#footnote-633)633

大会1982年12月16日第37/112号决议决定，应该以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为基础，缔结一项国际公约。此外，大会还请各国和主要国际组织对最后草案，以及对其他问题，如国际组织参加会议和解决国际组织如何参加公约的问题，提出它们的评论意见。

大会在第三十八届会议上，以1983年12月19日第38/139号决议决定，对条款草案进行最后审议的适当机构，是一个全权代表会议，应该在不早于1985年的时间召开。大会也吁请可能参加会议者在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前就条款草案和有关问题进行协商，以便使会议能够顺利完成工作。第二年，大会在1984年12月13日第39/86号决议中决定，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会议于1986年2月18日至3月21日在维也纳举行，并将委员会在其1982年第三十四届会议上通过的最后条款草案送交会议，作出会议审议的基本提案。大会也吁请与会者在会议召开以前主要就会议的组织和工作方法其中包括议事规则，并就包括最后条款和解决争端在内的主要实质问题组织协商，以便通过促进普遍协议而使会议工作取得圆满成果。

1985年3月18日至5月1日和7月8日至12日之间举行了非正式协商，[[634]](#footnote-634)634大会在1985年12月11日第40/76号决议中认为，这些非正式协商确实有助于为该会议的顺利进行作出充分准备。大会决定将非正式协商期间所拟订的会议议事规则草案（决议附件一）送交该会议，并建议会议予以通过。大会也决定将认为必须对其进行实质性审议的一份基本提案的条款草案清单（决议附件二）送交该会议，供其进行审议并斟酌情况采取行动。最后，大会将非正式协商联合主席所提出并已就其交换意见的最后条款草案（决议附件三）送交会议，供其审议。

1986年2月18日至3月21日在维也纳举行了该会议。九十七个国家参加了会议，纳米比亚也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参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派观察员出席了会议。十九个国际政府间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指定全体委员会审议需要进行实质性审议的基本提案条款草案，以及序言和公约最后规定的草拟工作。会议将基本提案的所有其他条款草案直接送交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还负责审议全体委员会向它送交的条款草案，并负责协调和审查所通过的全部案文的起草工作，以及负责拟订会议《最后文件》。

1986年3月20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635]](#footnote-635)635公约由序言、86项条款和一个附件组成。公约案文转载于附件五，K节。

公约适用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和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为本公约的目的，“条约”一词的定义为受国际法支配的国际协定，并在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以书面形式缔结，不论协定是载于一个单独的文书或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关的文书内，也不论其特定的名称为何。公约不适用于缔约方为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非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的国际协定，不适用于缔约方为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非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的国际协定，不适用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非书面国际协定，不适用于非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相互间的国际协定，这一事实应不影响（a）这些协定的法律效力；（b）本公约所载任何依照国际法，无须根据本公约，本应支配这些协定的规则对这些协定的适用；或（c）本公约对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或各组织相互间的关系的适用，如果这种关系受还有其他国际法主体为缔约方的国际协定的支配。

公约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条约的缔结和生效（第二部分）；条约的遵守、适用和解释（第三部分）；条约的修正和修改（第四部分）；条约的无效、终止和中止施行（第五部分）；杂项规定（第六部分），特别涉及本公约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关系，并对由于国家继承、由于国家的国际责任、或由于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由于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由于国际组织终止存在或由于国家终止参加国际组织可能引起的有关条约的问题，以及根据一个国际组织为缔约方的条约确立该国际组织各成员国的义务和权利而可能发生的问题作了保留；以及保存机关、通知、更正和登记（第七部分）。公约第66条中提到的司法解决、仲裁和调解程序，在公约的附件中详细规定。

1986年3月21日，公约开放供所有国家、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纳米比亚和应邀参加会议的国际组织签署，[[636]](#footnote-636)636直到1986年12月31日止，公约在奥地利共和国联邦外交部开放供签署。此后在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至1987年6月30日止。公约须经各国批准，并须由各国际组织采取正式确认行动。公约一直开放供任何国家以及具有缔约能力的任何国际组织加入。公约自由国家交存三十五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后第三十天开始生效。到2007年1月31日，已有28个国家交存了批准书、加入书或继承书。[[637]](#footnote-637)637

此外，会议通过了作为会议最后文件附件的五项决议。[[638]](#footnote-638)638按照其中的一项决议，根据公约第66条建立的任何仲裁庭和调解委员会的费用应由联合国负担。

21．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大会1975年12月15日第3501（XXX）号决议重申各国必须严格执行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同时对违反外交法规则，尤其是违反上述公约规定的事例表示遗憾。此外，它请会员国向秘书长就确保公约中的规定得以执行的方法以及拟订有关外交信使地位的规定是否可取提出评论和意见。

大会1976年12月13日第31/76号决议对继续违反特别有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外交法规则表示关注，再次请会员国就拟订有关外交信使的地位是否可取提出评论，并适当考虑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大会请求国际法委员会在适当的时候研究各会员国就拟订关于这种信使和邮袋的地位的议定书已经提出的或将要提出的建议，该议定书将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发展和具体化。

国际法委员会为此将题为“关于拟订有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议定书的建议”的项目列入其1977年第二十九届会议议程，并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以确定处理这一专题的最适当的方式。工作组同意向委员会提出一些结论，[[639]](#footnote-639)639其中包括以下结论：（1）按照大会的要求，应该将该专题纳入委员会的工作方案，以供研究；（2）委员会应在其下届会议上对该专题开展研究，同时不减少为审议本工作方案各专题所分配的时间，因为这是根据大会相关建议和委员会相关决定确定的优先事项；及（3）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外交代表等人的保护和不可侵犯方面，委员会对它所遵循的程序作了必要的变通并采取了类似的程序（见第 和 页），让工作组完成该专题的第一阶段研究工作，并就此向委员会提交报告，但不任命特别报告员。委员会批准了工作组就处理该项目的方法和措施得出的结论。[[640]](#footnote-640)640

在1978年第三十届会议上，委员会再次成立了工作组，工作组在该会议上研究了拟订议定书的建议以及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641]](#footnote-641)641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642]](#footnote-642)6421969年《特别使团公约》[[643]](#footnote-643)643和1975年《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的相关条款。[[644]](#footnote-644)644工作组采取的基本立场是，上述公约的相关条款（如果有的话）应构成对该问题作任何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工作组暂时确定了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方面的相关问题，并考虑了上述公约涉及这些问题的范围。尽管按照大会的要求，拟订这些问题是为了适用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但工作组的一些成员认为，这些问题也适用于其他信使和邮袋，最终也应该扩展至它们。委员会将工作组的报告[[645]](#footnote-645)645列入其提交大会该届会议的报告中。[[646]](#footnote-646)646

大会1978年第三十三届会议在第六委员会的两个议程项目下讨论了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结果。这两个议程项目题为“各国执行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项规定的情况：秘书长的报告”（项目116）和“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的工作报告”（项目114）。大会1978年12月19日就后一个项目通过的第33/139号决议建议国际法委员会根据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第六委员会辩论该项目期间提出的评论以及会员国将来提出的评论，就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开展研究，包括已经认明的问题，以便在可能时拟订一个适当的法律文书。关于前一个项目，大会在同一天通过了第33/140号决议。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对关于拟订可能进一步发展国际外交法的议定书的建议进行的研究，并决定它将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并表示认为，除非会员国表明宜于更早一些审议，就应该等到国际法委员会向大会提交其就该专题可能拟订一个适当的法律文书的工作成果时再审议这一问题。

委员会197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再次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负责研究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问题。研究结果载于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报告中。[[647]](#footnote-647)647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任命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为该专题报告员。

委员会分别在1980年第三十二届至1986年第三十八届会议和1988年第四十届会议及1989年第四十一届会议上继续该专题方面的工作。在审议该专题时，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648]](#footnote-648)648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649]](#footnote-649)649以及秘书处编写的文件。[[650]](#footnote-650)650

委员会在1981年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开始进行条款草案的一读，并于1986年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完成了一读。委员会一读通过了该项草案并按照委员会章程第16和第21条，决定通过秘书长将该草案送达各国政府征求它们的评论和意见。

大会1986年12月3日第41/81号决议和1987年12月7日第42/156号决议，特别敦促各国政府充分注意委员会征求关于它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意见的请求。

在1988年第四十届会议上，委员会开始进行条款草案的二读。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651]](#footnote-651)651重新研究了条款草案，在该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分析了各国政府对每一条草案提出的评论和意见，并提议对某些条款草案进行修订。他认为，拟订条款草案应该基于全面的方针，导致产生一个关于各类信使和邮袋的连贯的尽可能统一的制度，他还强调必须重视职能的必要性，这是确定各类信使和邮袋地位的基本因素。委员会一般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考虑。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989年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全文通过了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三十二项条款的最后案文，以及关于特别使节团信使和邮袋地位的任择议定书草案和关于普遍性国际组织信使和邮袋地位的任择议定书草案及其评注。[[652]](#footnote-652)652最后条款草案和任择议定书案文转载于附件四，第7节。委员会按照其章程第23条，决定建议大会召集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以研究条款草案和任择议定书草案，并就此缔结一项公约。[[653]](#footnote-653)653

大会以1989年12月4日第44/36号决议，决定在1990年其第四十五届会议上，在第六委员会内举行非正式协商，以便研究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及其任择议定书草案，以及研究如何进一步处理这些文书草案的问题，以就后一方面达成普遍接受的决定。按照大会1990年11月28日第45/43号和1991年12月9日第46/57号决议，在第四十六届和第四十七届会议上继续磋商。已经提出一些建议以调和关于某些条款，特别是关于邮袋不得侵犯的第28条的意见分歧，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议，大会以1992年11月25日第47/415号决定，决定在1995年第五十届会议上恢复非正式协商。

在1995年第五十届会议上，大会通过了1995年12月11日第50/416号决定，其中大会决定提请会员国注意这些条款草案以及在第六委员会辩论期间就此提出的意见，并提醒会员国这个领域的国际法以及这个领域内的任何进一步发展在将来一个适当的时候或可予以编纂的可能性。

22．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选定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为编纂专题之一，但未将其列入它优先考虑的专题的清单。委员会在其1977年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审议了有可能进行研究的额外专题。考虑到“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专题日常的实际重要性以及适宜于编纂和逐渐发展，有人建议委员会在不久的将来选择这个专题进行积极的审议。

大会在1977年12月19日第32/151号决议中，请国际法委员会根据议程上其他专题的进展情况，在适当时间开始进行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专题的工作。

委员会在1978年第三十届会议上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以审议委员会有关该专题的未来工作的问题，并且向委员会提出报告。工作组向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654]](#footnote-654)654除其他外，述及了该专题的一般方面并载有一些建议。委员会注意到工作组提交的报告，并且根据该报告所载的各项建议，决定开始审议“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专题。委员会还任命颂蓬·素差伊库为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并请他及早准备一份初步报告供委员会进行审议。委员会还要求秘书长请各会员国政府提交关于该专题的有关资料，其中包括国家立法、国家法庭的判决、外交和官方函件等，并且请秘书处在需要时和委员会或特别报告员提出要求时，草拟关于该专题的工作文件和资料。[[655]](#footnote-655)655

委员会在1979年第三十一届至1986年第三十八届会议和1989年第四十一届至1991年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审议了该专题。委员会在1987年第三十九届会议上任命小木曾本雄先生为该专题新的特别报告员。在审议该专题时，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656]](#footnote-656)656和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657]](#footnote-657)657

委员会在197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素差伊库先生就该专题提出的初步报告。[[658]](#footnote-658)658该报告的目标是对该专题进行全面的介绍，而没有对所指明的任何实质性问题提出任何解决办法。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对报告进行讨论时，出现了一种共同意见，意即在最近的将来，特别报告员应继续其研究工作，将注意力集中于一般原则部分，因而在初期重点将限于国家管辖豁免一般规则的实质性内容及组成因素方面。委员会还有一个谅解，即对待国家豁免规则的适用范围或限制的问题，需要采取极为审慎和均衡的态度，而且在该初步报告中指明的例外仅仅是作为可能的限制而指出，并没有对其在国家实践中的重要性作出任何估价或评价。委员会进一步商定，从处理该专题方面所采取的优先程序来说，特别报告员应该继续其关于国家管辖豁免的工作，暂时把执行判决的豁免问题放在一边。所注意到的另外一点就是国家职能的扩大，这增加了国家豁免问题的复杂性。在过去，关于国家职能可否进行区分问题或者关于现代国家在从前由个人进行的诸如贸易和金融等活动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之间的种种区别问题，曾经有过争议。关于如何鉴别可以援引或给予国家豁免的情况或领域还没有发现一个普遍接受的标准。因此，在处理该专题这一特定方面时就需要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

委员会在其1980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开始进行条款草案的一读，并在1986年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完成了一读。在该届会议上，按照其章程第16和第21条，委员会通过秘书长将一读时通过的条款草案送交各国政府，请其提出评论和意见。

大会在其1986年12月3日第41/81号决议和1987年12月7日第42/156号决议中，除其他事项外敦促各国政府充分注意委员会的要求，即对委员会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提出评论和意见。

委员会在其1989年第四十一届会议上根据新任特别报告员小木曾本雄先生的三次报告开始进行条款草案的二读，并在1991年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完成了二读。特别报告员在其初步报告中分析了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和意见，并提议根据这些评论修改或合并某些条款草案。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中根据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意见和他对有关条约、法律和国家实践的分析，进一步审议了某些条款草案，并提议作某些修改、增补或删节，作为对其初步报告中这类提议的补充。按照委员会某些委员的请求，特别报告员还简要评述了关于国家豁免的一般国家实践的最近发展情况。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中再次审查了全部条款草案，并参照委员会委员在1989年第四十一届会议上表达的观点，以及各国政府在其书面评论中和在大会第六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所表达的观点，提出了修改措词的一些提议。

委员会在其1989年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在进行条款草案的二读时，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应当避免再次对国家豁免的一般原则进行理论性辩论，因为委员会对此已进行过长期的辩论，而且委员会内部对此观点仍然不一致；委员会应当集中讨论各条款，以便形成关于国家的哪一类活动应该或不应该享有另一国管辖豁免的共同意见。按照委员会的观点，这是拟订一份能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公约的唯一务实的方法。委员会也注意到，国家管辖豁免法正处于变动状态，因为一些国家正在修改其基本法或最近刚刚修改过，从而必须使条款草案有机会反映这些政府实践，而且要为国家管辖豁免法的进一步发展留有余地。[[659]](#footnote-659)659

委员会在其1991年第四十三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一组二十二项条款草案的最后案文及其评注。[[660]](#footnote-660)660委员会按照其章程第23条将条款草案提交大会，同时建议大会召开国际全权代表会议，以审查该条款草案并就此缔结一项公约。[[661]](#footnote-661)661

大会1991年12月9日第46/55号决议，请各国提出对条款草案的书面评论和意见，并决定在其第四十七届会议上设立一个第六委员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参照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及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辩论中表达的观点，审议：（a）条款草案引起的实质性问题，通过促进普遍协议以便利公约的成功缔结；和（b）于1994年或以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缔结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问题。

工作组在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开始其工作，[[662]](#footnote-662)662并按照大会1992年11月25日第47/414号决定在第四十八届会议上恢复其工 作。[[663]](#footnote-663)663大会以1993年12月9日第48/413号决定，决定在其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应该在第六委员会内进行协商，以继续审议需要弄清和减少分歧的实质性问题，以便利通过普遍协议，成功缔结一项公约；并决定在其第四十九届会议上，根据迄今所取得的进展和上述协商的结果，充分考虑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召开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以审议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条款草案，并就此题目缔结一项公约的建议。

在1994年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上，第六委员会按照大会第48/413号决定，决定举行非正式协商会议。在1994年9月27日至10月3日的六次会议上举行了协商。在该届会议上，非正式协商会议主席介绍了一份有关文件，[[664]](#footnote-664)664其中载有他从协商中得出的结论。[[665]](#footnote-665)665

大会1994年12月9日第49/61号决议同意国际法委员会的上述建议，请各国对于按照大会1993年12月9日第48/413号决定举行的非正式协商会议主席的结论，以及大会1991年12月9日第46/55号决议和1992年11月25日第47/414号决定所设工作组的报告，向秘书长提出其评论意见，并决定参照上述报告和各国就此提出的评论，在其1997年第五十二届会议上恢复审议实质问题，并在其第五十二届或五十三届会议上决定会议的安排，包括会议的日期或地点，并要适当考虑到确保会议尽可能最广泛地达成协议。它还决定将题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的项目列入其第五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1997和1998年，大会第五十二和五十三届会议审议了该项目。大会1997年12月15日第52/151号决议特别决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参照各国按照1994年12月9日第49/61号决议提出的评论意见，再次审议该项目，以期在第五十四届会议上成立一个工作组。大会在其1998年12月8日第53/98号决议中决定在1999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设立一个第六委员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审议条款草案所涉尚未解决的实质性问题，其中考虑到了国家惯例和立法的最新发展情况以及各国就该专题提出的评论意见，请国际法委员会参照第六委员会1994年根据大会1993年12月9日第48/413号决定举行的非正式协商的结果，就条款草案所涉尚未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提出任何可能的初步评论意见。

在1999年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大会第53/98号决议设立了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工作组。工作组将其工作集中在第六委员会1994年非正式协商会议主席在其结论中确定的五个主要问题上，即：（1）用于豁免目的的国家概念；（2）确定合同或交易的商业特性的标准；（3）涉及商业交易的国家企业或其他国家实体的概念；（4）雇用合同；和（5）针对国家财产的强制措施。工作组还审议了在一国违反国际法绝对规范的情况下是否存在豁免问题，这个问题被视为可参照近期国家实践加以审议的问题。工作组在其提交委员会的报告中，[[666]](#footnote-666)666就解决这五个问题的可行方式提出了一些建议。委员会注意到工作组的报告并通过了其中所载的建议。

在1999年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上，依据大会1998年12月8日第53/98号决议成立的第六委员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审议了这五个悬而未决的实质性问题以及在取得该专题工作结果方面可能采取的形式。第六委员会还审议了委员会工作组确定的一个问题，即在一国违反绝对规范的情况下是否存在豁免确定的问题。[[667]](#footnote-667)667工作组在2000年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按照大会1999年12月9日第54/101号决议，继续审议今后条款草案的格式和未决的实质性问题。[[668]](#footnote-668)668由于后来进行的讨论，主席就这五个未决问题编写了一些案文，作为进一步讨论该专题的一个可能的基础。[[669]](#footnote-669)669

在2000年12月12日第55/150号决议中，大会审议了第六委员会工作组的报告，决定设立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问题特设委员会，也开放给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和各专门机构的成员国参加，以进一步推动已完成的工作，巩固意见一致的方面和解决未决的问题，以期根据条款草案，并根据第六委员会工作组的讨论及其成果，拟定一份一般可以接受的文书。在2001年12月12日第56/78号决议中，大会决定特设委员会应于2002年2月举行会议，特设委员会就其工作结果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问题特设委员会继续分两个阶段在全体工作组中开展工作，首先讨论了五个悬而未决的实质性问题，其次讨论了条款草案的其余部分，以便查明并解决案文中产生的任何其他问题。[[670]](#footnote-670)670这是1991年委员会通过条款草案以来在大会内对条款草案全文第一次进行审议，审议时考虑了后来各国惯例的发展情况。工作组在五个实质性问题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减少了未决问题的数目并缩小了关于其余问题的意见分歧。工作组决定在其报告所载经修订的条款草案案文中反映出对某些条款草案的其余不同意见。特设委员会强调及时拟订一份普遍接受的文书的重要性，并促请各国为了达成协议，尽量解决其余悬而未决的问题。[[671]](#footnote-671)671

大会在2002年审议了特设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之后，通过了2002年11月19日第57/16号决议，其中大会注意到只有几项问题悬而未决，强调适用于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的法律应统一明确，决定特设委员会就在2003年2月再次开会，请特设委员会就其工作结果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2003年，特设委员会在全体工作组继续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工作组成立了两个非正式协商小组，讨论和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特设委员会通过了其载有条款草案案文[[672]](#footnote-672)672的报告，[[673]](#footnote-673)673以及关于以下条款草案的谅解：第10条（商业交易）、第11条（雇用合同）、第13条（财产的所有、占有和使用）、第14条（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第17条（仲裁协定的效果）和第19条[[674]](#footnote-674)674（免于判决后的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以及条款草案没有涵盖刑事诉讼这一基本谅解。[[675]](#footnote-675)675特设委员会建议大会就条款草案的形式作出决定，并指出，如果大会决定通过该条款草案，使之成为一项公约，则该条款草案需有一个序文和若干最后条款，包括一个涉及同一议题、关于这些条款与其他国际协定关系的一般保障协定。[[676]](#footnote-676)676

根据大会2003年12月9日第58/74号决议，特设委员会应在2004年再次开会，任务是拟定序言和最后条款，以期完成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公约。随后，特设委员会召集的全体工作组拟订了国家及其财产司法管辖豁免公约草案的序言和一套最后条款以及该决议草案的某些规定的谅解起首部分。工作组进一步重申了以下一般性谅解：公约草案不涉及刑事诉讼程序，而是建议在大会决议中处理这一问题，这与该公约草案本身相反。特设委员会随后通过了工作组的报告并建议大会通过其报告中所载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司法管辖豁免公约草案。[[677]](#footnote-677)677特设委员会还建议大会在其通过国家及其财产司法管辖管辖豁免公约的决议中列入该公约不涉及刑事诉讼程序这一一般性谅解。

大会在其2004年12月2日第59/38号决议中审议了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报告，高度赞赏国际法委员会和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特设委员会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法律方面所作的宝贵工作。大会还同意在特设委员会达成的一般性谅解，即《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不涉及刑事诉讼程序。

在同一决议中，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包括三十三项条款和关于公约某些条款的谅解的公约附件。公约全文转载于附件五，M节。

该公约自2005年1月17日起到2007年1月17日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公约须经各国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签署须经批准、接受和核准。公约自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三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之日后第三十天开始生效。到2007年1月31日，已有三个国家成为公约缔约国。

23．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大会1970年12月8日第2669（XXV）号决议建议国际法委员会研究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以期逐渐发展与编纂该项法律，并参照该委员会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其认为适当时即考虑可否采取必要行动。

国际法委员会1971年第二十三届会议在其总的工作方案中列入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专题。委员会也同意，为了研究关于这一专题的国际法规则以期逐渐发展与编纂这些规则，一切关于国家实践的有关资料都应加以汇编分折。[[678]](#footnote-678)678

大会1971年12月3日第2780（XXVI）号决议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就该专题所应给予的优先次序作出决定。

委员会1972年第二十四届会议表示，它打算在讨论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时，讨论大会的上述建议。委员会进一步得出结论，国际河道的污染问题既非常紧迫，又非常复杂。因此，委员会请秘书处继续编辑与该专题有关的材料，同时具体提及国际水道的污染问题。

委员会1973年第二十五届会议特别注意该专题所应给予的优先次序问题。但它作出结论说，关于何时开始该专题的实质性工作的问题应等到委员们有机会审查秘书处编写的1974年印发的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方面的法律问题的补充报告后才做出正式决定。[[679]](#footnote-679)679

按照大会1973年11月30日第3071（XXVIII）号决议的建议，委员会在1974年第二十六届会议上设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负责审议这一问题。小组委员会向国际法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680]](#footnote-680)680报告涉及到国际水道的性质，指出需要审查的初步问题是“国际水道”一词的范围。该报告承认实践与理论方面存在着差异，提议请求各国就国际水道非航行的法律问题的研究中有关“国际水道”的适当范围的问题提出意见。它声明，另外一个先决问题是“非航行使用”一词包括哪些类型的活动。由于在使用方面，不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国际一级都可能会有冲突，报告提议征求各国对委员会在其工作中应该考虑哪些种类的使用以及某些特殊问题是否需要审议的意见。此外，报告建议要求各国答复下列问题：委员会是否应该在其研究的初期阶段着手处理国际水道的污染问题，是否应该作出特别的安排来确保委员会得到技术、科学和经济方面的咨询意见。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未加改动通过了该报告。

大会1974年12月14日第3315（XXIX）号决议建议，委员会继续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进行研究，研究时要特别考虑到从各会员国那里收到的关于小组委员会报告中提到的问题的意见。

委员会分别在1976年第二十八届、1979年第三十一届和1980年第三十二届、1983年第三十五届至1991年第四十三届及1993年第四十五届和1994年第四十六届会议上继续就该专题开展工作。委员会分别在1974年第二十六届、1977年第二十九届、1982年第三十四届、1985年第三十七届和1992年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先后任命理查德·D. 卡尼、斯蒂芬·M. 施韦贝尔、延斯·埃文森、斯蒂芬·麦卡弗里和罗伯特·罗森斯托克为该专题特别报告员。在审议该专题时，委员会收到了各特别报告员的报告、[[681]](#footnote-681)681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682]](#footnote-682)682以及秘书处编写的文件。[[683]](#footnote-683)683

委员会1976年第二十八届会议就该专题进行一般性辩论后同意：确定“国际水道”一词的范围的问题不需要在工作开始时解决。注意力应集中于开始拟订适用于这些水道使用法律方面的一般原则。在拟订各项原则时应尽一切努力设计一些在二者之间保持微妙均衡的规则，即不过分详细以致无法普遍应用，又不过分一般化以致不起效用的规则。此外，各项规则的目的应在于倡导设立各个国际河道的制度，由于这个理由，这些规则应是剩余备用性质的规则。应尽力使这些规则尽可能广泛地被接受，必须考虑到各国特别关切其在水方面的利益。

委员会在其1980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开始进行条款草案的一读。它决定至少是在其关于该专题工作的初期阶段使用起草委员会建议的关于“国际水道系统”术语含义的暂时工作假设。[[684]](#footnote-684)684

委员会在其1991年第四十三届会议上一读通过了条款草案全文，委员会按照其章程第16和第21条，决定将条款草案通过秘书长转送各会员国政府征求评论和意见。

大会1991年12月9日第46/54号决议表示赞赏委员会完成关于该专题条款草案的一读，并促请各国政府按照委员会的要求就草案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

委员会在其1993年第四十五届会议和1994年第四十六届会议上，根据该专题新任特别报告员罗森斯托克先生提交的报告，继续进行条款草案的二读。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次报告[[685]](#footnote-685)685中分析了从各国政府收到的书面评论和意见，并提出两个一般性的问题，即条款的最后形式应该是公约还是示范规则的问题和解决争端程序的问题。他也提起将关于“不相连的封闭地下水”的规定纳入条款的可能性。在1993年第四十五届会议上，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对“不相连的封闭地下水”问题进行研究，以便确定将其纳入该专题的可行性。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中[[686]](#footnote-686)686提议对一读时通过的某些条款草案做些修改，列入关于“不相连的封闭地下水”的条款，[[687]](#footnote-687)687以便鼓励以合理的方式对其进行管理并防止其耗尽和污染，并提出了有关解决争端的新条款。

在1994年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委员会在审议过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后，决定将整套条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并请它在没有修正“不相连的封闭地下水”的情况下继续其审议工作，并向委员会提出关于该委员会应该如何处理“不相连的封闭地下水”问题的建议。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一套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三十三项条款草案最后案文及其评注，及一项关于封闭地下水的决议。[[688]](#footnote-688)688委员会按照其章程第23条将条款草案和决议提交大会，同时提交一项关于由大会或由一项国际全权代表会议根据条款草案拟订一项关于此专题的公约的建议。[[689]](#footnote-689)689

大会1994年12月9日第49/52号决议，表示赞赏委员会在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方面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并感谢历任特别报告员为这项工作所做的贡献，请各国对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决定第六委员会在1996年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时召集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均可自由参加的全体工作组，以便在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基础上，参照各国的书面评论和意见以及在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辩论中表达的观点，拟订一项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纲要公约。大会还决定该全体工作组在不妨碍大会议事规则的条件下，遵行决议附件中概述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但可做出工作组认为适当的任何修改，又决定将题为“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第六委员会全体工作组在1996年10月7日至25日和1997年3月24日至4月4日举行了两届会议，第二届会议是依据1996年12月17日第51/206号决议举行的。全体工作组收到了委员会通过的该专题的条款草案和各国的评论、意见和建议。工作组成立了起草委员会。根据大会第51/206号决议的授权，工作组在完成其任务后直接向大会提交报告。[[690]](#footnote-690)690

大会1997年5月21日第51/229号决议根据全体工作组的建议，通过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该公约由序言、三十七项条款和关于仲裁的附录组成。公约全文转载于附件五，L节。

该公约在2000年5月20日之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所有国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签署。公约须经各国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在三十五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后的第十九日生效。截至2007年1月1日，15个国家成为该公约缔约国。[[691]](#footnote-691)691

24．国家继承方面的国籍[[692]](#footnote-692)692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993年第四十五届会议上，根据长期计划工作组的建议，决定在大会认可的条件下，将“国家继承及其对自然人和法人国籍的影响”专题列入委员会的议程。

大会以其1993年12月9日第48/31号决议，认可了委员会的上述决定，但有一项谅解，即该专题工作的最后形式将在向大会提出一项初步研究报告后决定。

委员会在其1994年第四十六届会议上任命瓦茨拉夫·米库尔卡先生为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大会在其1994年12月9日第49/51号决议中，再次根据上述谅解赞同委员会的决定，并请求秘书长邀请各国政府提交有关的材料，包括与专题有关的国家法规、国家法庭的判决和外交及官方信函。

委员会分别在1995年第四十七届和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召集了一个工作组，授权其确定该专题所产生的问题、对与其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分类、就如何根据目前情况以最有利的方式解决各种问题对委员会进行指导并为委员会提供一个行动日历。[[693]](#footnote-693)693根据工作组的结论，[[694]](#footnote-694)694委员会建议大会注意完成该专题的初步研究，并请委员会特别根据以下谅解完成题为“国家继承方面的国籍”这一专题的实质性研究：

（a） 自然人的国籍问题与法人的国籍问题将分开审议，前者优先；

（b） 不妨碍最后的决定，关于自然人国籍问题的工作结果应采用由附带评注的条款构成的一份大会宣言的形式；及

（c） 将在完成关于自然人国籍的工作时，参照大会可能请各国提交的关于国家继承对法人国籍引起的实际问题的评论意见，做出如何着手处理这方面问题的决定。[[695]](#footnote-695)695

大会1996年12月16日第51/160号决议赞同委员会的建议。

（a）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

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的报告、[[696]](#footnote-696)696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697]](#footnote-697)697和秘书处的备忘录，[[698]](#footnote-698)698分别在1997年第四十九届和1999年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就该专题的这一部分开展工作。

在其1997年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委员会在一读时通过了关于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的序言草案和整套二十七项条款草案及其评注。按照其章程第16和第21条，委员会决定通过秘书长将这些资料送交各国政府，供其提出评论和意见。

大会1997年12月15日第52/156号决议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委员会很需要得到它们对条款草案的意见并促请它们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

委员会在1999年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审查一读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审查时考虑到各国政府的评论和意见。根据工作组主席的报告，[[699]](#footnote-699)699委员会将序言草案和整套二十六项条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委员会在审议起草委员会的报告之后，通过了关于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的最后条款草案及其评注。[[700]](#footnote-700)700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以宣言形式通过这些条款草案。[[701]](#footnote-701)701

最后草案由分为两部分的序言草案和二十六项条款草案组成：第一部分为一般规定（第1-19条）、第二部分是与国家继承的具体类别有关的条款（第20-26条）。第二部分包括四节：第1节涉及转让部分领土时的继承；第2节涉及国家统一；第3节涉及国家解体；第4节涉及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条款草案案文转载于附件四，第9节。

大会1999年12月9日第54/112号决议决定将题为“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的项目列入大会2000年第五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以便审议条款草案并以宣言的形式予以通过。大会还请各国政府就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公约的问题提出评论和意见，以供大会未来的一届会议考虑拟订这样一项公约。

大会2000年12月12日第55/153号决议注意到附在决议之后的条款，请各国政府在处理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时，酌情考虑到这些条款中的规定，建议不遗余力地广泛宣传条款案文。大会还决定将题为“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的项目列入大会2004年第五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大会2004年12月2日第59/34号决议重申邀请各国政府在处理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时，酌情考虑大会第55/135号决议附件内的条款规定；鼓励各国在区域或分区域一级酌情考虑拟订关于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特别是防止因国家继承而出现无国籍状态的法律文书。大会还邀请各国政府提交意见，评论是否应当拟订关于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包括避免因国家继承而出现无国籍状态的法律文书；决定将题为“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的项目列入大会2008年第六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b）国家继承涉及的法人国籍问题

委员会在其1998年第五十届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员的报告[[702]](#footnote-702)702审议了该专题第二部分。根据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审议该专题第二部分可能的取向问题，以便促进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做出决定。工作组同意，原则上，有两个备选办法可以扩大属于该专题第二部分的问题的研究范围：一是把法人国籍问题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国家继承范围之外；二是把研究范围限定在国家继承，但是超出国籍问题的范围，而把其他问题包括在内。但是工作组指出，由于没有从各国收到赞成意见，委员会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各国对该专题第二部分的研究不感兴趣。委员会核准了工作组的初步结论。[[703]](#footnote-703)703

在1999年第五十一届会议上，鉴于没有收到各国赞同委员会研究该专题第二部分的意见，委员会建议大会在关于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的条款草案通过之后，将委员会在“国家继承涉及的国籍问题”专题方面的工作视为结束。[[704]](#footnote-704)704

25．国家责任[[705]](#footnote-705)705

1949年，国际法委员会在第一届会议上选定国家责任作为它认为适于编纂的专题之一，但没有将其列入它给予优先考虑的专题清单内。1954年，委员会在第六届会议上注意到大会1953年12月7日第799（VIII）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委员会在它认为适宜时立即着手编纂关于国家责任的国际法原则。[[706]](#footnote-706)706

1955年，委员会在第七届会议上决定开始研究国家责任，并指定F. V. 加西亚·阿马多尔作为该专题特别报告员。在从1956年至1961年委员会的以后六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相继提出六次报告，[[707]](#footnote-707)707大体上涉及的是伤害外国人人身或财产的责任问题。

大会1961年12月18日第1686（XVI）号决议建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关于国家责任问题的工作，按照该决议，委员会在1962年第十四届会议上，就其在国家责任方面的今后工作方案举行了一次辩论。国家责任专题应当是给予优先考虑的专题之一的思想，得到委员会的普遍赞同。然而，对于研究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和研究应当涉及的问题、意见仍有分歧。结果，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小组委员会，其任务是向委员会下一届会议提交一份载有有关今后研究的范围和方针的建议的初步报告。

1963年，委员会在其第十五届会议上审议了国家责任小组委员会起草的报告。[[708]](#footnote-708)708参加讨论的委员会所有委员一致同意报告的一般结论，即（1）对关于国家的国际责任的一般规则定义应当给予优先地位；和（2）在规定一般规则时，不应忽视在某些特定方面，特别是对外国人人身和财产造成伤害的责任这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材料，并应认真注意国际法方面的事态发展可能对国家责任产生的影响。小组委员会关于应当撇开对其他国际法主体如国际组织责任的研究的建议，也得到委员会委员的普遍赞同。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指定罗伯特·阿戈为该专题特别报告员。

大会1963年11月18日第1902（XVIII）号决议建议委员会应“参酌各方在大会第十八届会议所表示之意见及国家责任小组委员会报告书，并充分顾及联合国宪章所载宗旨与原则，继续进行国家责任方面之工作。”大会在1967年12月1日第2272（XXII）号决议中建议，委员会应加快对国家责任专题的研究，并在1968年12月11日第2400（XXIII）号决议中要求委员会从其下一届会议开始“尽力开始进行”关于此专题“之实体工作”。

委员会分别在1967年第十九届、1969年第二十一届和1970年第二十二届、1973年第二十五届至1986年第三十八届、1989年第四十一届和1990年第四十二届及1992年第四十四届至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上继续就该专题开展工作。在罗伯托·阿戈于1978年辞去委员会的工作之后，委员会在其1979年第三十一届、1987年第三十九届和1997年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分别任命威廉·里普汉、加埃塔诺·阿兰焦-鲁伊斯和詹姆斯·克劳福德为该专题特别报告员。委员会在审议该专题时，收到了一份照会和特别报告员的报告、[[709]](#footnote-709)709收到各国政府的评论和意见[[710]](#footnote-710)710以及秘书处编写的文件。[[711]](#footnote-711)711

1969年，在第二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在审查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之后，[[712]](#footnote-712)712请特别报告员阿戈先生起草一份载有有关该专题的第一组条款草案的报告，目的是“在所建议的条款草案开始部分中，确定可以将国际上违法的和因违法产生的一种国际责任的行为归于一个国家的条件。”[[713]](#footnote-713)713委员会为其今后关于该专题工作制定的作为指针的标准概述如下：

（a） 委员会打算将它对国际责任问题的研究暂时限于国家的责任；

（b） 委员会将首先研究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问题。一俟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准许，将研究由于某些合法行为，譬如空间与核活动而产生的责任问题；

（c） 委员会同意其研究的重点是确定支配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原则，在这项任务和确定国家负担义务的规则如果违反即可产生责任问题的任务之间应保持严格的区别；

（d） 对国家的国际责任的研究，将分别包括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研究国际责任的起源，第二阶段研究国际责任的内容。第一项任务是要确定必须证实哪些事实和情况，才能认定一国犯有作为国际责任起源的国际不法行为。第二项任务是确定按照国际法国际不法行为在不同情况下的后果，以便在此基础上规定国际责任的内容、形式和程度。这些工作完成后，委员会将可以决定，是否在同一范围内增加第三阶段，研究有关被称为国家国际责任的“执行”的问题和关于解决有关规则的适用的争端的某些问题。

1970年，在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出了题为“国际责任的起源”的第二次报告，[[714]](#footnote-714)714报告审查了关于整个专题的以下一般规则：国际不法行为作为责任起源的原则，国际不法行为存在的基本条件，和犯有此类行为的能力。在这些基本规则方面提出了条款草案。委员会关于该报告的讨论使它对继续关于国家责任问题的工作非常重要的方法、内容和术语作出一系列结论。

这些条款草案仅仅涉及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它采取的形式使它可成为缔结一项公约的基础（如果这样决定的话）。委员会充分认识到，不仅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问题很重要，而且关于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某些活动（特别是那些因其性质而有某种危险的活动）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给予赔偿的义务问题也十分重要。然而，委员会认为，后一类问题不能和前一类问题一起处理。必须承担本身合法的行为带来的任何损害性后果，和必须承担违反法律义务造成的后果（不一定限于赔偿），是不能相比的两种情况。条款草案限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仅仅表示，委员会将使其对由于某些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的研究，与它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专题的研究分开，以便这两个尽管表面上有些相似然而却大不相同的问题不会在同一个草案中处理。因此，委员会着重指出，草案标题中出现的“国家责任”的措词，应该理解为仅指“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委员会还指出，条款草案的目的不是去规定国家在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或另一个方面应负担义务的规则，违反这些义务则可能产生责任，这种规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初级”规则。相反，委员会在拟订草案时，是要规定另一种规则，它与初级规则截然不同，可能称为“次级”规则，因为这些规则目的在于确定未履行“初级”规则规定的义务时的法律后果。只有这些“次级”规则才属于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实际范围。这并不是说，国际法“初级”规则规定国家应负担的义务的内容、性质和范围，在确定关于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规则时，不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然而，基本事实仍然是，说明一项规则和这项规则规定的义务的内容是一回事，确定是否违反了该义务和这种违反必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则是另一回事。只有后者才属于作为草案主题事项的国际责任的实际范围。

条款草案只是要确定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的规则，也就是说，关于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在不同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所有新的法律关系的规则。条款草案要编纂的是关于国家对“一般”而不仅仅是某些特定方面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规则。构成国家的国际责任，是由于违反任何国际义务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状况，无论这种义务是由关于哪一个特定问题的规则所规定的。[[715]](#footnote-715)715

委员会正是根据这些结论开始编写有关该专题的条款草案，并在1973年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开始进行一读。

在1973年11月30日第3071（XXVIII）号决议中建议，委员会应在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继续优先进行关于国家责任的问题的工作，以期拟订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一组条款草案，并建议委员会在适当时间对于因其他活动产生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一专题分别进行研究。

在1973年第二十五届至1978年第三十届会议上，委员会一读时暂时通过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一部分第一、第二和第三章。1978年，按照委员会章程的相关条款，委员会请各成员国政府传送其关于这三章的意见和评论。

大会1978年12月19日第33/139号决议核可了委员会的决定。

在1980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一读时暂时通过了关于“国际责任的起源”的条款草案第一部分全文。按照章程第16和第21条，委员会决定通过秘书长将第四和第五章条款发送给各成员国政府，并请它们递交其关于这些条款的意见和评论。委员会还决定再次请求各国政府递交其关于第一、第二和第三章的意见和评论。

在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完成了对条款草案第二和第三部分的一读，并按照其章程第16和第21条，决定将委员会一读时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发送给各国政府以便它们提出评论和意见。

大会1996年12月16日第51/160号决议表示赞赏委员会完成暂定条款草案的工作，并促请各国政府按照委员会的要求提交其关于该草案的书面评论和意见。

在1997年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新任特别报告员克劳福德先生提交的四次报告以及各国政府的评论，开始进行条款草案的二读。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成立了国家责任问题工作组，以处理涉及该专题二读的事项。[[716]](#footnote-716)716

在1998年第五十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717]](#footnote-717)717对条款草案中如何处理国家“罪行”和“不法行为”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辩论。[[718]](#footnote-718)718在辩论之后，委员会注意到，各方没有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而且需要更多地研究如何采取可能的办法处理所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因此，委员会同意：（a）在不妨碍任何委员会委员的意见的情况下，委员会将暂时搁置关于国际罪行和不法行为的第19条草案的审议，开始审议第一部分其他方面；（b）应考虑如下问题：在条款草案内系统地拟定一些关键概念，如义务（普遍义务）、强制性规范（强制法）及可能另成一类的极为严重地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是否足以解决第19条引起的问题；（c）这个问题首先将在为此专题设立的工作组内及在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内审议；（d）如无法通过这个进一步审议和辩论的过程达成协商一致，委员会将重新审议第一次报告内就第19条草案提出的问题，就问题作出决定。[[719]](#footnote-719)719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帮助特别报告员在条款草案二读期间审议各种问题。

委员会在其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完成了条款草案二读。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就该专题成立了两个工作组：一个是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处理该专题方面的主要未决问题，另一个工作组审议条款草案的评注。

根据第一个工作组的建议，委员会同意作为对它在二读通过条款草案方面一贯做法的一个例外，按专题的重要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列入对主要未决问题的辩论概况以及工作组关于这些问题的建议。[[720]](#footnote-720)720根据工作组的建议，[[721]](#footnote-721)721委员会达成了下列谅解：

（a） 将保留涉及严重违背整个国际社会义务问题的第二部分第三章；删除关于严重违约赔偿的第42条第1款；以前关于严重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对保护其基本利益至关重要的义务的提法主要涉及国际刑事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案中所表明的援引问题，这些提法将被强制性规范类所取代。采用这类强制性规范较为可取，因为它所涉及的是次级义务的范围，而不是援引。强制性规范的概念已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得到确认（见附件五，F节）。新的案文不应处理无关紧要或次要的违反强制性规范的行为，而只应处理严重违背强制性规范的行为。起草委员会将进一步审议严重违约的后果方面，以简化案文，避免过于模糊不清的说法，并缩小适用范围，以便于审理确属于该章范围的案例。

（b） 反措施：不宜将有反措施的全部条款或大部分条款纳入只处理单方面问题的第23条。这样会使第23条过分冗长，甚至会使它难以理解。第一部分第五章保留第23条。第三部分保留关于反措施的一章，而删除关于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反措施的第54条，代之以一项保留条款，使各方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不受影响。此外，将重新审议关于反措施条件的第53条，并消除反措施与临时反措施之间的区别。该条应简化，使之大体上与仲裁法庭在航空服务案和国际法院在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中的裁决保持一致。关于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的第51和第52条也将作必要的重新审议。

（c） 争端解决规定：委员会不列入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的规定，但将提请注意委员会一读草案中阐述的机制，将其作为国家责任方面解决争端的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并让大会作如下考虑，即在它决定拟订一项公约时，是否应列入争端解决规定和列入何种形式的争端解决规定。

（d） 条款草案的形式：委员会首先应建议大会注意到条款草案并将条款案文附于决议之后，这个程序类似于大会在2000年12月12日第55/153号决议中就“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条款所遵循的程序。这项建议还提议，鉴于该专题的重要性，大会在第二阶段和随后阶段中应考虑通过关于这一专题的公约，该公约将提出上述争端解决问题。

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还决定将该专题的标题修订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以将该专题同国内法中的国家责任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的国际“责任”概念区分开来（见第三部分A，第26节）。[[722]](#footnote-722)722

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由59项条款及其评注组成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全套最后条款草案。[[723]](#footnote-723)723该条款草案分为如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包括：第一章（一般原则）、第二章（把行为归于一国）、第三章（违背国际义务）、第四章（一国对另一国行为的责任）和第五章（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第二部分，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包括第一章（一般原则）、第二章（赔偿损害）和第三章（严重违背在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下所应承担的义务）；第三部分，一国国际责任的履行，包括第一章（一国责任的援引）和第二章（反措施）；及第四部分，一般规定。条款草案案文转载于附件四，第10节。

委员会按照其章程第23条，决定建议大会在一项决议中注意到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并将条款草案列为该项决议的附件。委员会还决定建议大会鉴于这个专题的重要性，在稍后阶段审议能否召开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审查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以期缔结一项关于这一专题的公约。委员会认为，如果它认定应该连同条款草案建立一个解决争端的法律机制，则解决争端的问题可以在上述国际会议中获得解决。[[724]](#footnote-724)724

在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中，大会根据委员会的建议，注意到本决议附件所载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案文，并提请各国政府加以注意，但不妨碍它们将来获得通过的问题或对其采取其他适当行动，并决定将题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项目列入2004年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在2004年12月2日第59/35号决议中，大会请秘书长邀请各国政府就今后对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采取的任何行动提出书面意见；着手收集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提及条款的裁判，并邀请各国提供关于本国在这方面的实践的资料。大会还决定在2007年第六十二届会议上回到该专题上。

26．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委员会在开始其关于国家责任专题的工作时（见第三部分A，第25节），便议定该专题应仅涉及国际不法行为引起的后果，并且议定在规定有关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原则的一般规则时，有必要采取一种不预先判断合法行为责任的存在的方案。在1970年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第六委员会进行的讨论中，这一结论得到了广泛的赞同。

1973年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在委员会开始就关于国家责任的第一套条款草案进行工作时，它用更明确的措词谈到了这一问题：“……如果认为合适的话——过去在国际法委员会和大会第六委员会中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国际法委员会便可以在完成有关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研究之后，着手研究所谓的危险责任，或者可以同时但分别地进行这两件工作。”[[725]](#footnote-725)725

在1973年11月30日第3071（XXVIII）号决议中，大会再次支持了委员会的立场，并且建议委员会应“在适当时间”着手研究这一新的专题。在1974年12月14日第3315（XXIX）号决议和1975年12月15日第3495（XXX）号决议中，大会均重复其关于委员会应“在适当的尽早时间”着手研究这一专题的建议。最后在1976年，大会在12月15日第31/97号决议中用“可能最早的时期”这一措词取代了上面的用语。

根据大会的这些建议，委员会1977年第二十九届会议，在特别考虑到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所取得的进展情况下，同意尽快着手研究这一专题。

大会在1977年12月19日第32/151号决议中认可了委员会的结论，并且请委员会参照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以及目前工作方案内其他专题的进展情况，在适当时间开始进行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的工作。

委员会在1978年第三十届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以便初步审议该专题的范围和性质。在该工作组所提建议的基础上，[[726]](#footnote-726)726委员会任命罗伯特·Q. 昆廷-巴克斯特先生为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并请他尽早拟订一份初步报告。委员会还要求秘书处经常收集并调查有关该专题的资料。

在1985年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上，胡利奥·巴尔沃萨接替罗伯特·Q. 昆廷-巴克斯特担任该专题报告员。在进行有关该专题的工作（以前分为两部分）中，委员会收到了各特别报告员的报告、[[727]](#footnote-727)727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的资料[[728]](#footnote-728)728以及秘书处编写的文件。[[729]](#footnote-729)729

在1983年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委员会同意特别报告员应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拟订一份向选定的国际组织提出的调查表，以便弄清楚各国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彼此应负和应履行的义务，是否可以在那种程度上履行或取代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中所载的专题纲要中所述的一些程序。依照这项决定，拟订了一份调查表并向16个国际组织发出，这些国际组织是根据其活动可能与调查的问题有关而选定的。

在1988年第四十届会议上，委员会开始进行该专题的条款草案的一读。

在1992年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以审议有关专题范围、所采取的方针和专题未来工作的可能方向等一些一般性问题。[[730]](#footnote-730)730委员会就专题的范围决定，在作出最后决定以前，专题应该被理解为既包括预防问题也包括补救措施的问题。可是首先应该审议预防问题；只有在完成其专题第一部分的工作后，委员会才审议补救措施问题。在此情况下的补救措施可包括旨在减轻损害、恢复被损害物和赔偿所造成损害的措施。因此，条款草案应当首先涉及对产生造成越境损害危险的活动的预防措施，其次涉及在这种活动造成越境损害时的补救措施。但是，委员会将其关于对待条款或将草拟的文书性质的方针问题的决定，推迟到完成该专题工作后再做出。条款将根据其实质，其明晰程度和对国际社会当前和未来需要的有用程度，以及其对促进此领域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可能做出的贡献审议和通过。委员会也推迟到条款草案完成之后再做出关于专题标题的决定。[[731]](#footnote-731)731

在1994年第四十六届和1995年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委员会暂时通过了第1条（本条款的范围），第2条（用语），第11条（事先核准），第12条（对危险的评估），第13条（未核准的活动），第14条（预防或尽量减少危险的措施），第14条之二（不转移危险），第15条（通知和资料），第16条（交换资料），第16条之二（向公众公布资料），第17条（国家安全和工业机密），第18条（关于预防措施的协商），第19条（可能受影响的国家的权利）和第20条（公平的利益均衡所涉及的因素）。A（行动自由和对其的限制）、B（预防）、C（赔偿责任和赔偿）和D（合作）的草案及其评注。

在1995年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以确定属于该专题范围内的活动。根据工作组的报告，[[732]](#footnote-732)732委员会同意今后在开展该专题的工作中，要明确了解有关该专题的条款草案适用于哪类活动。委员会认为，关于越境损害问题的各项公约所涉各类活动属于该专题的范围，但条款草案最终可能需要更加具体化，委员会的工作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

在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以根据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多年来有关该专题的讨论审查该专题的所有方面。工作组提交委员会的报告载有单一的条款草案综合案文及其评注，以该专题的范围来看，评注具有局限性，并缺少完整性。[[733]](#footnote-733)733委员会无法在该届会议上审查条款草案，但决定将条款草案发送给大会和各国政府，征求它们的评论意见。[[734]](#footnote-734)734

在1997年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大会1996年12月16日第51/160号决议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以审议如何继续开展该专题的工作。工作组审查委员会1978年以来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它注意到，由于概念和理论上的困难、标题的恰切程度和这个课题与“国家责任”的关系等因素，这个专题的范围和内容还是不明确。工作组还注意到，委员会在这个专题之下处理了“预防”问题和“国际责任”问题，工作组认为，这两个问题虽然相互联系，却互有区别。因此，工作组议定，从今以后，预防问题和责任问题应该分别处理。工作组注意到，委员会就“预防”开展的工作已经处在先进的阶段，委员会完全可以着手专题这方面的工作，并有可能在今后几年中完成对“预防”条款草案的一读。关于第二个方面“责任”，工作组认为可以保留这个专题，不过，委员会应该等待各国政府进一步提出评论意见后，再就这一问题作出任何决定。[[735]](#footnote-735)735

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工作组的报告。[[736]](#footnote-736)736委员会以工作组的建议为基础决定，着手开展关于该专题的工作，首先在“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小标题下处理预防问题。

大会在1997年12月15日第52/156号决议中注意到委员会的决定。

（a）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

在1997年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委员会任命彭马拉朱·斯雷尼瓦萨·拉奥先生为该专题这一部分的特别报告员。

委员会分别在其1998年至2001年的第五十届至第五十三届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员的报告[[737]](#footnote-737)737和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738]](#footnote-738)738着手进行该专题这一部分的工作。

在1998年第五十届会议上，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以弄清楚工作组向1996年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建议的条款草案中是否适当反映了程序原则和预防职责的内容。特别报告员根据工作组的讨论，在该届会议上提出了条款草案的修订案文，[[739]](#footnote-739)739委员会将该案文提交给起草委员会。委员会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并在一读时通过了一套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越界损害的十七项条款草案。按照其章程第16和第21条，上述条款草案发送给政府，征求它们的评论和意见。

在1998年12月8日第53/102号决议中，大会表示赞赏委员会完成了该专题的预防部分条款草案的一读并请各国政府提交条款草案的书面评论和意见。

在2000年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审查各国就条款草案提出的评论和意见。根据工作组的讨论，特别报告员呈交了其第三次报告[[740]](#footnote-740)740以及将条款草案作为一份框架公约而通过的建议，该报告载有序言草案和关于预防的一套修订条款草案。此外，第三次报告讨论了这些问题，如该专题的范围、预防与责任的关系、有关国家之间的利益的公正均衡与预防职责之间的关系以及赔偿责任和国家责任制度的二元性。委员会审议了报告，并决定将其中所载的序言和草案以及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在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并向大会提交了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条款草案的最后案文以及评注。[[741]](#footnote-741)741条款草案由序言和十九项条款组成：第1条（范围），第2条（用语），第3条（预防），第4条（合作），第5条（履行），第6条（核准），第7条（危险的评估），第8条（通知和资料），第9条（关于预防措施的协商），第10条（公平利益均衡所涉及的因素），第11条（没有通知时的程序），第12条（交换资料），第13条（向民众提供资料），第14条（国家安全和工业机密），第15条（不歧视），第16条（紧急备灾），第17条（通知紧急情况），第18条（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关系）和第19条（争端的解决）。条款草案案文转载于附件四，第11节。在向大会送交最后草案时，委员会建议大会根据这些条款草案起草一份公约。[[742]](#footnote-742)742

在2001年12月12日第56/82号决议中，大会表示赞赏国际法委员会并在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越境损害）专题方面，就预防问题做了有价值的工作。[[743]](#footnote-743)743

（b）危险活动产生的越境损害造成损失时的国际责任

在1998年12月8日第53/102号决议中，大会请委员会一方面继续它在预防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考虑到各国政府以书面形式或在第六委员会提出的评论，审查该专题所产生的其他问题，并就今后在这些问题上要做的工作向第六委员会提出建议。

委员会1999年第五十一届会议审议了该专题第一部分（预防，见上文（a）小节），并决定在完成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的条款草案二读之前，延迟国际责任问题的审议。[[744]](#footnote-744)744

在1999年12月9日第54/111号决议和2000年12月12日第55/152号决议中，大会请委员会在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的二读完成后，即恢复审议该专题的责任方面。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2号决议请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恢复审议该专题的责任方面，同时铭记预防和责任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考虑到国际法的发展和各国政府的评论。

委员会在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决定在委员会工作方案中列入“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并恢复审议该专题的第二部分。[[745]](#footnote-745)745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由彭马拉朱·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任主席，审议该专题的概念性纲要。工作组建议继续将该专题关于责任的其余部分的范围局限于专题关于预防的第一部分所涵盖的同样活动，这种办法还会有效地将该专题两个部分的工作相联系。工作组还就该专题阐述了以下的初步理解：（a）必须确定一个起点，以便启用所造成损失的分配制度；（b）所造成损失应该涵盖（一）人身，（二）财产，包括国家世袭财产和国家遗产等要素的损失，以及（三）国家管辖范围内环境的损失。工作组还审议了区别操作者和国家在损失分配中的作用所采用的办法。[[746]](#footnote-746)746

在2002年11月19日第57/21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决定按照大会第56/82号决议的要求，继续就该专题开展工作。

委员会在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任命彭马拉朱·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为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747]](#footnote-747)747并在2003年第五十五届至2004年第五十六届会议和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该专题。委员会分别在2003年第五十五届[[748]](#footnote-748)748和2004年第五十六届[[749]](#footnote-749)749会议上重新设立工作组，主席人选不变。在就这一专题开展工作方面，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750]](#footnote-750)750工作组的报告[[751]](#footnote-751)751、秘书处完成的研究[[752]](#footnote-752)752以及各国政府提出的评论和意见。[[753]](#footnote-753)753

在2004年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委员会对一套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越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原则草案进行了一读。在该届会议上，工作组审查了特别报告员通过其第二次报告[[754]](#footnote-754)754提交的原则草案建议，以便提出成熟的原则草案推荐给起草委员会。在同届会议上，委员会一读通过了一套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越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八项原则草案及其评注。[[755]](#footnote-755)755按照其章程第16和第21条，委员会决定通过秘书长将原则草案发送给成员国政府，征求它们的评论和意见。[[756]](#footnote-756)756

在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757]](#footnote-757)757以及各国政府的评论和意见，[[758]](#footnote-758)758开始并完成了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越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原则草案的二读。

委员会后来二读通过了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越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原则草案，该原则草案由序言案文、以下八项原则草案及其评注组成：原则1（适用范围）、原则2（用语）、原则3（目的）、原则4（及时和充分的赔偿）、原则5（反应措施）、原则6（国际和国内救济）、原则7（拟定专门的国际制度）和原则8（执行）。[[759]](#footnote-759)759原则草案案文转载于附件四，第12节。

委员会将序言草案和原则草案提交大会，并根据其章程第23条的规定，建议大会以决议的方式核准原则草案，并敦促各国在国家和国际一级采取行动予以落实。[[760]](#footnote-760)760

在2006年12月4日第61/36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越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原则，并决定在2007年第六十二届会议上对该专题和预防危险活动的越界损害问题进行审议。

27．外交保护

根据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的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在1995年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决定，经大会批准后，在委员会的议程中列入“外交保护”专题。委员会指出，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将会对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见第三部分A，第25节）起到补充作用，并且应该成为所有会员国关心的问题。除其他事项外，委员会可能会审议当地补救方法用尽规则的内容和范围；适用于申请自然人和法人国籍的规则，包括其与所谓的“职能”保护的关系；以及无国籍人员和双重国籍人员等问题。委员会可能还会审议有关国内补救办法和行使外交保护争端解决条款的效力问题。[[761]](#footnote-761)761

大会在1995年12月11日第50/45号决议中注意到，委员会要求将这一专题列入其议程的建议，并请各国政府就这一建议提出意见，以供大会第六委员会在其1996年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审议。

在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这个专题项下所提主要法律问题的大纲，该大纲由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起草，包括注释在内，以协助各国政府决定是否批准今后的工作。委员会指出，本研究可依循历来的条文加评注的格局，但是把最后形式问题留待将来决定。[[762]](#footnote-762)762

1996年12月16日，大会在第51/160号决议中，请委员会进一步研究该专题，并根据第六委员会就国际法委员会报告进行辩论期间提出的评论和意见以及各国政府所提交的任何书面评论，提出这些专题的范围和内容。

在1997年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大会第51/160号决议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以便进一步研究该专题并指明其范围和内容。工作组力求（a）尽可能澄清该专题的范围；和（b）确定应在该专题范围内研究的问题。委员会通过了工作组提交的报告。[[763]](#footnote-763)763

在1997年12月15日第52/156号决议中，大会赞成委员会关于在其议程中列入“外交保护”专题的决定。

委员会在1997年第四十九届和1998年第五十届会议以及2000年第五十二届至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审议了该专题。委员会分别在1997年第四十九届和1999年第五十一届会议上相继任命穆罕默德·本努纳和克里斯托弗·约翰·R. 杜加尔德先生为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764]](#footnote-764)764在审议该专题时，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八次报告、[[765]](#footnote-765)7651997年第四十九届、1998年第五十届和2003年第五十五届会议分别设立的工作组的三次报告[[766]](#footnote-766)766以及各国政府提供的评论和意见。[[767]](#footnote-767)767

在2000年第五十二届至2004年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杜加尔德先生提交的头五次报告，[[768]](#footnote-768)768对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进行了一读。特别报告员提交了27项条款草案的建议，委员会决定对其中的某些条款不采取行动。[[769]](#footnote-769)769有关具体的条款案文，委员会设立了工作组[[770]](#footnote-770)770或者非正式磋商小组[[771]](#footnote-771)771审议特别报告员的具体建议，然后推荐给起草委员会。

在2004年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委员会完成了关于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一读并且通过了一套19项条款草案及其评注。[[772]](#footnote-772)772按照其章程第16和第21条，委员会将一读时通过的条款草案发送给政府，征求它们的评论和意见。[[773]](#footnote-773)773

在2004年12月2日第59/41号决议中，大会表示赞赏国际法委员会完成了关于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一读。大会还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必须就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及评注提出本国的意见。

在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的第七次报告[[774]](#footnote-774)774和各国政府就2004年一读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提出的评论和意见，[[775]](#footnote-775)775开始并完成了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的二读。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建议二读时根据政府提出的评论和意见对第1至第19条条款草案进行审议。该报告还载有增加受害国民获得赔偿的权利条款草案的建议。

委员会后来在二读时通过了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的关于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第一部分，一般规定，包括第1和第2条；第二部分，国籍，包括第一章（一般原则），涉及第3条；第二章，自然人，涉及第4至第8条；第三章，法人，涉及第9至第13条；第三部分，当地救济，涉及第14至第15条；和第四部分，杂项规定，涉及第16至第19条。[[776]](#footnote-776)776条款草案案文转载于附件四，第13节。

委员会根据其章程第23条，建议大会在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基础上制定一项公约。[[777]](#footnote-777)777

在2006年12月4日第61/35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并邀请各国政府就委员会关于在这些条款的基础上拟订一项公约的建议提交评论。大会还决定在2007年第六十二届会议上回到该专题上。

28．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在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国际法委员会根据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的建议，将“国家单方面行为”的专题确定为适于编纂和逐渐发展的一个专题。工作组注意到该专题与“国际法渊源”这个比较概括的专题（秘书长在1949年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提交的备忘录中所设想的全面编纂专题）之间的关系。[[778]](#footnote-778)778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该专题适于立即审议，原因如下：（1）这是个界定得很清楚的专题，但是从来没有国际正式机构研究过它；（2）国际法院的一些判决书，特别是核试验案件，[[779]](#footnote-779)779已经触及这个专题，但是，这一著名的法官意见还为不确定情况和问题留有余地；（3）各国往往诉诸单方面行为，它们的做法可加以研究，以期拟订一般法律原则；和（4）虽然条约法和适用于国家单方面行为的法律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但现行的条约法提出了拟订单方面行为规则的出发点和参考大纲。工作组就该专题起草了一个暂定大纲，包括注释在内，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1）定义和分类方法；（2）法律作用和适用；（3）效力条件；和（4）持续时间、修正和终止。[[780]](#footnote-780)780

在1996年12月16日第51/160号决议中，大会请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国家的单方面行为”这一专题，并根据第六委员会就委员会报告进行辩论期间提出的评论和意见以及各国政府所提交的任何书面评论，说明这些专题的范围和内容。

在1997年12月15日第52/156号决议中，大会赞成委员会关于在其议程中列入“国家的单方面行为”专题的决定。

委员会在1997年第四十九届会议上，任命维克托·罗德里格 斯-塞德尼奥先生为该专题特别报告员。[[781]](#footnote-781)781并在1998年第五十届至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继续开展该专题方面的工作。在审议该专题时，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782]](#footnote-782)782各国政府的评论[[783]](#footnote-783)783和1997年第四十九届会议设立以及1998年第五十届至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和2003年第五十五届至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每年重新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报告和结论。[[784]](#footnote-784)7841997年第四十九届和1998年第五十届会议由恩里克·坎迪奥蒂担任工作组主席，1999年第五十一届至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由特别报告员维克托·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担任主席，2003年第五十三届至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由阿兰·佩莱担任主席。

在1999年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工作组向委员会报告了与以下内容有关的问题：单方面行为的切实可行之定义的基本内容，作为进一步研讨这一专题和收集相关国家实践经验的出发点；[[785]](#footnote-785)785制定收集相关国家实践的一般标准和特别报告员今后的工作取向。[[786]](#footnote-786)786

委员会在2003年第五十五届会议上，通过了工作组报 告第1和第2部分所载的关于该专题的范围和工作方法的七项建议。[[787]](#footnote-787)787

在2004年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工作组商定，将文献充分的单方面行为样例留下来，以便作深入分析。工作组还确定了一个清单，可采用统一的分析工具来分析。[[788]](#footnote-788)788工作组的成员随后共同作一些研究，将按照确立的清单来进行，并且交送特别报告员供其编写第八次报告。委员会后来在2005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请求工作组审议普遍同意可以形成关于该专题的初步结论或建议的要点。[[789]](#footnote-789)789

在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在对该专题进行广泛审议之后，有必要作出一些结论。委员会认识到单方面行为的概念并不统一。它涵盖的行为范围很广。委员会进一步指出，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部分地造成了该专题所引起的误解，例如有的人认为，法律行为的概念必然意味着明确表示行为国愿受约束的意愿，而另一些人认为，任何在国际上产生法律效力的国家单方面行动都可被归类为单方面行为。[[790]](#footnote-790)790

在同一届会议上，工作组在考虑各方表示的意见、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九次报告[[791]](#footnote-791)791中提出的指导原则草案以及工作组以前就该专题开展的工作之后，按照要求为委员会编写该专题的结论。委员会在审议工作组的报告之后，通过了一套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面声明的十条指导原则及其评注，[[792]](#footnote-792)792并提请大会注意该指导原则。[[793]](#footnote-793)793指导原则全文转载于附件四，第14节。

在2006年12月4日第61/34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面声明的指导原则，并赞扬予以分发。

29．国际法不成体系：国际法的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

在2000年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因国际法不成体系引起的风险”专题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794]](#footnote-794)794委员会指出，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方法和成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正规编纂形式的范畴，但属于其管辖权范畴且符合其规约之规定。[[795]](#footnote-795)795在2000年12月12日第55/152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委员会关于其长期工作方案的报告。在2001年12月12日第56/82号决议中，大会请委员会适当考虑各国政府提出的意见，进一步审议这一专题。

在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该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并将标题改为“国际法不成体系：国际法的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796]](#footnote-796)796委员会在2002年第五十四届至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继续就该专题开展工作。委员会在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设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以后在每届会议上都重新设立，并相继由布鲁诺·辛马（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马尔蒂·科斯肯涅米（2003年第五十五届至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担任主席。[[797]](#footnote-797)797在每届会议上，研究小组都提交报告供委员会审议。[[798]](#footnote-798)798

在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研究小组提出如下建议：应就该专题的各个具体方面开展一系列研究，以协助国际法官和法律从业人员应付国际法多样化的后果：（a）“特别法”规则的职能和范围与“配套制度”的问题；（b）在谈论国际法的一般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时，依照“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对条约进行解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见附件五，F节））；（c）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之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d）仅在若干当事国间修改多边条约（《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41条）；和（e）国际法的等级：绝对法、普遍性义务、作为解决冲突规则的《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799]](#footnote-799)799研究小组指出，在选择研究的题目时，须参照委员会原先与条约法相关的工作以及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委员会在该专题上的工作将以原文的案文作为基础，然后进一步发展。[[800]](#footnote-800)800

在2003年第五十五届会议上，研究小组审议了特别法规则的职能和范围提纲内涉及的初步概念问题，提纲由研究小组主席编制。问题主要有特别法规则的性质、它的接受和理由、“一般”规则和“特别”规则之间关系的区分以及对“同一事项”适用特别法规则。[[801]](#footnote-801)801

在2004年第五十六届和2005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研究小组审议了研究小组挑选的不同专题的一些大纲和研究。研究小组重申，将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而侧重于不成体系问题的实质方面问题，同时搁置与不成体系问题有关的体制方面问题。委员会重申，它计划取得——特别是为外交部门和国际组织的法律专家们——一个具体而有实用价值的工作成果。[[802]](#footnote-802)802

在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完成了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方面的工作并注意到研究小组报告[[803]](#footnote-803)803中所载的一套四十二点结论，这些结论必须与研究小组主席最后定稿的、这些结论所依据的分析研究一起阅读。[[804]](#footnote-804)804该研究根据研究小组各位成员编写的研究报告并在考虑到研究小组提出的意见之后，总结和分析了不成体系现象。

委员会在注意到研究小组的结论之后提请大会注意这些结论。[[805]](#footnote-805)805这些结论转载于附件四，第15节。

在2006年12月4日第61/34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研究小组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专题的结论，以及这些结论所依据的分析研究。

B．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的专题与分题

国际法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的专题和分题的工作简况如下。

1．对条约的保留[[806]](#footnote-806)806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993年第四十五届会议上，根据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的建议，决定在大会认可的条件下，将“与对条约的保留有关的法律和实践”专题列入委员会的议程。委员会注意到，虽然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见附件五，F节）、1978年的《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公约》（见附件五，I节）和1986年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公约》（见附件五，K节），在对条约的保留意见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原则，但在措词上过于笼统，不能指导各国在此问题上的实践，而且忽视了一些重要的方面。这些公约对下列问题的回答模棱两可，其中包括保留意见和解释性声明之间的差别、解释性声明的范围、保留意见的有效性（保留意见合法性的条件问题和保留意见对另一国家适用性的问题）以及有关反对持保留意见的制度（特别是可接受性的问题，对于条约不加禁止并且同条约目标和宗旨不抵触的保留意见可予反对的范围问题）。关于保留意见在条约生效时的效力、与某些条约的特定目标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国际组织的基本约章和有关人权的条约）、对编纂条约的保留意见以及特定的公约技术所引起的问题（拟订附加议定书、双边化的技术），这些文书都没有提及。委员会知道，没有必要重新讨论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9至第23条中所确定的制度。但是，它认为，这些规定或可在现有公约的议定书草案或者实践指南的框架内，加以明确和发展。[[807]](#footnote-807)807

在1993年12月9日第48/31号决议中，大会认可了国际法委员会的上述决定，但有一项谅解，即该专题工作的最后形式将在向大会提出一项初步研究报告后决定。

委员会在其1994年第四十六届会议上任命阿兰·佩莱先生为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808]](#footnote-808)808

大会在其1994年12月9日第49/51号决议中再次根据上述谅解赞同委员会的决定。

在1995年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809]](#footnote-809)809该初步报告详细研究了委员会以前在保留方面的工作及其结果。报告还提供了一份该专题所涉问题方面的清单，包括《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保留规定的含混不清和漏洞方面，以及与某些条约或条款的具体目标有关的方面或某些具体的条约办法所引起的方面。最后，报告阐述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范围和形式，主导思想是保持已有的成果并就委员会取得工作成果的形式提出建议。在委员会审议了报告之后，特别报告员将他得出的结论总结归纳如下：（1）该专题的标题应修正为“对条约的保留意见”；（2）研究结果的形式应成为保留意见方面的实践指南；（3）委员会应采取灵活的方式开展有关该专题的工作；和（4）委员会一致同意，《维也纳公约》有关条款不应改动。实践指南采取条款草案加评注的形式，它为各国和国际组织提出保留意见提供了准则。这些准则在必要时应配备条文范本。[[810]](#footnote-810)810委员会认为，上述结论构成了应大会1993年12月9日第48/31号和1994年12月9日第49/51号决议要求所作初步研究的结果。[[811]](#footnote-811)811委员会授权特别报告员编写一份详尽的有关对条约保留意见的调查问卷，以判明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特别是多边公约保存国的实践和所遇到的问题。[[812]](#footnote-812)812

大会在1995年12月11日第50/45号决议中注意到委员会的结论，请委员会按照报告中所述的方式继续工作，并请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特别是保存者答复该调查问卷。

在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813]](#footnote-813)813和书目。[[814]](#footnote-814)814该报告讨论了对条约，特别是对人权条约提出保留的法律制度的统一性或多样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得出结论认为，尽管条约存在着多样性，但维也纳保留制度具有普遍适用性。此外，监测机制的共存没有影响监测机构对是否允许保留做出决定，即使各国仍能从这种决定中得出他们希望的任何结果并相应地做出反应。特别报告员还提出了国际法委员会对规范性多边条约，包括人权条约的保留的一项决议草案，该草案提交给了大会，以提请注意并澄清该事项的法律问题。委员会没有时间审议报告和决议草案，因此将关于该专题的辩论推迟到下届会议举行。[[815]](#footnote-815)815

在1997年第四十九届会议上，委员会再次收到了特别报告员就保留方面的法律制度的统一性或多样性问题提交的第二次专题报告。委员会愿促进其他论坛就规范性多边条约，特别是人权条约的保留问题进行的讨论，并就该问题通过了一些初步结论。[[816]](#footnote-816)816委员会欢迎各国政府对这些初步结论提出的评论意见，并请根据相关的人权条约设立的监测机构也这样做。[[817]](#footnote-817)817

在1997年12月15日第52/156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委员会的初步结论以及委员会请所有愿意这样做的由规范性多边条约设立的条约机构以书面形式就结论提出评论和意见，同时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国际法委员会很需要得到它们对初步结论的意见。

自1998年第五十届到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另外八次报告[[818]](#footnote-818)818（总共有十次报告[[819]](#footnote-819)819）并且通过了78项准则草案及其评注。[[820]](#footnote-820)820

委员会在2003年第五十五届至2005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还同人权条约机构举行了非正式会议，期间它们交换了意见，旨在加深了解各个机构的立场，特别是对于对规范性多边条约，包括人权条约的保留的初步结论的立场。[[821]](#footnote-821)821

如上所述，委员会在开展该专题的工作方面遵循了大会在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有关的项目下通过的相关决议。[[822]](#footnote-822)822

2．国际组织的责任

在2000年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的建议得出结论认为，“国际组织的责任”专题适合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823]](#footnote-823)823

在2000年12月12日第55/152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委员会关于其长期工作方案的报告。在2001年12月12日第56/82号决议中，大会请委员会开始其有关该专题的工作。

委员会在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决定将该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任命乔治·加亚先生为该专题特别报告员，并设立了该专题的工作组。[[824]](#footnote-824)824工作组审议了以下问题：（a）专题的范围，包括责任和国际组织的概念；（b）国际组织的责任专题与国家责任条款之间的关系；（c）归属问题；（d）成员国对归于国际组织的行为的责任问题；（e）对国际组织产生责任的其他问题；（f）国际责任的内容和履行问题；（g）争端的解决；和（h）应予考虑的惯例。工作组建议秘书处与国际组织洽商，以收集有关的资料，尤其侧重探讨行为的归属问题和国际组织成员国对归于该组织之行为的责任问题。[[825]](#footnote-825)825

在2002年11月19日第57/21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委员会将这一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的决定。

委员会在2003年举行的第五十五届会议至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收到并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四次报告，[[826]](#footnote-826)826以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出的四套评论和意见，[[827]](#footnote-827)827并暂时通过了草案第1至第30条及其评注。[[828]](#footnote-828)8282003年第五十五届会议还设立了工作组，审议特别报告员就草案第2条提出的建议以及为特别报告员编写其下一次报告提供指导；[[829]](#footnote-829)829在2005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工作组还按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审议草案第8和第16条。[[830]](#footnote-830)830

如上所述，委员会在开展该专题的工作方面遵循了大会在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有关的项目下通过的相关决议。[[831]](#footnote-831)831

3．共有的自然资源

在2000年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的建议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源”专题适于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832]](#footnote-832)832

在2000年12月12日第55/152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委员会关于其长期工作方案的报告。在2001年12月12日第56/82号决议中，大会请委员会适当考虑各国政府所提出的意见，进一步审议这一专题。

在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国际法委员会决定将“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源”列入其工作方案，任命山田中正为这一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并设立一个工作组协助特别报告员开展工作。[[833]](#footnote-833)833在2002年11月19日第57/21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委员会关于将这一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的决定。

在2003年第五十五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834]](#footnote-834)834报告介绍了有关这一专题的背景，并提出专题的范围应限定于研究封闭的跨界地下水、石油和天然气，从封闭的跨界地下水开始工作。特别报告员还提交了一份增编，该增编是一份技术性文件，力求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什么是封闭的跨界地下水。特别报告员指出，委员会在编纂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律的过程中首次处理了共有的自然资源问题。（见第192（脚注681）、193和194页）。当时，委员会已经决定，将与地表水无关的封闭地下水从该专题中排除在外，但认为，鉴于封闭的地下水在世界许多地方的重要性，因此有正当理由开展单独研究。特别报告员认为，为了弄清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所载的原则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必须首先准确地了解这里所说的地下水指的是什么（见附件五，L节）。特别报告员指出，为管理地下水而作出的国际努力是在各个不同的场合展开的，与地下水有关的法律同适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法律比较类似，委员会有关国际责任专题，特别是有关预防方面的工作，将与该专题相关。[[835]](#footnote-835)835

在2003年12月9日第58/77号决议中，大会请各国政府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供与该专题相关的，有关使用和管理跨界地下水，特别是涉及此种地下水的质量和数量的国家立法、双边及其他协定和安排的资料。在2004年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委员会商定，由特别报告员拟订一个调查表，发给各国政府和有关政府间组织，就地下水问题征求意见和资料。[[836]](#footnote-836)836在2004年12月2日第59/41号决议中，大会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必须就涉及该专题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就下列方面向国际法委员会提出本国的意见：在该专题方面，关于跨界含水层系统地下水的分配以及关于不可再生跨界含水层系统的管理的双边或区域实践。

委员会在2004年第五十六届至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对条款草案进行了一读。在此期间，委员会收到并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另两次报告（总共有三次），其中载有对条款草案的提议。[[837]](#footnote-837)837委员会还收到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提出的、在2005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散发的一套评论和意见。[[838]](#footnote-838)838委员会还设立了三个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2004年设立的第一个工作组由特别报告员担任主席，协助委员会进一步开展对这一专题的审议；2005年设立的第二个工作组由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担任主席，负责根据委员会的辩论情况审查和修订特别报告员在第三次报告中提出的25条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2006年设立的第三个工作组仍由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担任主席，负责完成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条款草案的审查和修订工作。[[839]](#footnote-839)839

在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含有19项条款草案的跨界含水层法草案[[840]](#footnote-840)840及其评注。委员会根据其章程第16至第21条，决定通过秘书长将这些条款草案转发各国政府，征求评论和意见，同时请各国政府将此类评论和意见提交秘书长。[[841]](#footnote-841)841

在2006年12月4日第61/34号决议中，大会表示赞赏完成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的一读。

如上所述，委员会在开展该专题的工作方面遵循了大会在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有关的项目下通过的相关决议。[[842]](#footnote-842)842

4．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委员会2000年第五十二届会议将“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专题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843]](#footnote-843)843委员会该年的报告附有一篇简短的纲要，说明这一专题可能的通盘结构和处理方法。[[844]](#footnote-844)844纲要指出，委员会在进行关于条约法的工作时将该专题搁置，使它成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保留条款[[845]](#footnote-845)845（见附件五，F节）。纲要还承认，这个专题适合编纂和（或）逐渐发展，因为一方面，已有了相当多的实践和经验，另一方面，还有不确定因素。纲要进一步指出，该专题在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中得到广泛的支持，人们普遍认为，持续需要澄清这个领域内的法律。

委员会2004年第五十六届会议决定将“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并任命伊恩·布朗利先生为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846]](#footnote-846)846

在2000年12月12日第55/152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该专题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在2004年12月2日第59/41号决议中，大会赞同国际法委员会决定将该专题列入其议程。

委员会2005年第五十七届和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分别收到和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头两次报告[[847]](#footnote-847)847以及秘书处编写的备忘录。[[848]](#footnote-848)848委员会在2005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批准了特别报告员的一项建议，即请秘书处向各国政府发出照会，请它们就其与该专题有关的实践，特别是较近的实践提供资料。[[849]](#footnote-849)849

如上所述，委员会在开展该专题的工作方面遵循了大会在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有关的项目下通过的相关决议。[[850]](#footnote-850)850

5．对外国人的驱逐

在1998年第五十届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规划小组的报告，其中特别认为对外国人的驱逐专题可以列入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851]](#footnote-851)851这个专题后来列入2000年第五十二届会议的长期工作方案。[[852]](#footnote-852)852委员会该年的报告附有一篇简短的纲要，说明这一专题可能的通盘结构和处理方法。[[853]](#footnote-853)853

委员会2004年第五十六届会议，决定将“对外国人的驱逐”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并任命莫里斯·卡姆托先生为该专题的特别报告员。[[854]](#footnote-854)854

在2000年12月12日第55/152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该专题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在2004年12月2日第59/41号决议中，大会赞同国际法委员会决定将该专题列入其议程。

在2005年第五十七届和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分别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两次报告。[[855]](#footnote-855)855委员会还收到秘书处编写的一份备忘录。[[856]](#footnote-856)8562005年发行的特别报告员初次报告总体上介绍了这一主题，同时突出了该主题提出的法律及审议时遇到的方法难题。该报告涉及了驱逐外国人的概念、驱逐权、驱逐理由、与驱逐有关的法律。报告还进一步审查了一些方法问题并提出了工作计划草案和纲要。

如上所述，委员会在开展该专题的工作方面遵循了大会在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有关的项目下通过的相关决议。[[857]](#footnote-857)857

6．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

委员会在2004年第五十六届会议上根据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的建议，确定将“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专题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858]](#footnote-858)858委员会该年的报告附有一篇简短的纲要，说明这一专题可能的通盘结构和处理方法。[[859]](#footnote-859)859

大会在2004年12月2日第59/41号决议中注意到了委员会关于长期工作方案的报告。

在2005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该专题纳入其工作方案，并任命了兹齐斯拉夫·加利茨基先生为专题报告员。[[860]](#footnote-860)860

大会在2005年11月23日第60/22号决议中赞同委员会决定将该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

在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861]](#footnote-861)861该报告涉及惩治的普遍性和管辖权的普遍性、普遍管辖权与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引渡或起诉的义务的来源以及引渡或起诉的义务的范围。

如上所述，委员会在开展该专题的工作方面遵循了大会在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有关的项目下通过的相关决议。[[862]](#footnote-862)862

附件一

国际法委员会章程[[863]](#footnote-863)\*

第1条

1. 国际法委员会以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为宗旨。

2. 本委员会主要关心的是国际公法，但不妨碍它介入国际私法的领域。

第一章 国际法委员会的组织

第2条[[864]](#footnote-864)

1. 委员会由三十四名委员组成，各委员应为公认胜任的国际法界人士。

2. 委员会委员不得有两人为同一国家的国民。

3. 如候选人具有双重国籍，则候选人应视为其通常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国家的国民。

第3条

委员会委员由大会根据联合国会员国政府所提名单选出。

第4条

每一会员国提名参加选举的候选人以四名为限，其中两人得为提名国国民，两人为其他国家国民。

第5条

会员国政府应于选举年6月1日以前将候选人名单书面送交秘书长，但遇有特殊情况时，会员国政府可在大会开幕三十日以前另提候选人，以代替其6月1日以前提名的候选人。

第6条

秘书长应尽快将名单连同提名政府提出的候选人履历，一并送交各会员国政府。

第7条

秘书长应编制上文第3条所述的名单，将所有按正当程序提名的候选人姓名依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并将名单送交大会，供选举使用。

第8条

选举人进行选举时应铭记：凡当选委员会委员的人士，本人必须具备必要的资格，而委员会全体则应确实代表世界各主要文明形式和各主要法系。

第9条[[865]](#footnote-865)

1. 候选人中以得票最多并得出席及投票会员国过半数选票者当选，人数可达各区域集团的规定最高名额。

2. 如同一国家的国民有一人以上得票超过当选票数，由得票最多者当选；如票数相等，由年龄较高或最高的候选人当选。

第10条[[866]](#footnote-866)

委员会委员任期五年，连选得连任。

第11条

委员会委员出缺时，应由委员会适当遵照上文第2和第8条的各项规定自行补足空缺。

第12条[[867]](#footnote-867)

委员会应以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办事处为活动中心。但委员会经与秘书长协商后，应有权在其他地方举行会议。

第13条[[868]](#footnote-868)

委员会委员应支领旅费，并应领取特别津贴，其数额由大会决定。

第14条

秘书长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提供委员会完成任务所需的工作人员和设施。

第二章 国际法委员会的职责

第15条

为便利起见，下面各条使用的“逐渐发展国际法”一语意指：就国际法尚未订立规章或各国惯例尚未充分发展成法律的各项主题，拟订公约草案。同样地，“国际法的编纂”一语，为使用方便计，意指：更精确地制订并系统整理广泛存在国家惯例、判例和学说的国际法规则。

A. 逐渐发展国际法

第16条

大会将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建议交付委员会后，委员会应大致遵照下列程序开展工作：

（a）任命委员一人担任报告员；

（b）制订工作计划；

（c）寄发调查表，请各国政府在一定期间内提供与工作计划所列项目有关的数据与资料；

（d）可委派部分委员与报告员合作，在收到这项调查表的答复后，着手编写草案；

（e）可向科学研究机构和个别专家协商；专家不必一定为联合国会员国国民。如有必要，秘书长可在预算范围内提供专家咨询所需的费用；

（f）审议报告员提交的草案；

（g）委员会认可的草案，应请秘书长作为委员会的文件分发。秘书处应就这项文件进行一切必要的宣传，文件应附有委员会认为适当的解释和补充材料。这项出版品应载列上文（c）款所述调查表的答复中提供给委员会的任何资料；

（h）委员会应请各国政府在合理期间内提供有关这一文件的评论；

（i）报告员和为此目的委派的委员应参照这些评论重新审议草案并编写最后草案和解释性报告，提请委员会审议和通过；

（j）委员会应将按此程序通过的草案及其建议，通过秘书长提交大会。

第17条

1. 委员会还应审议联合国会员国、大会以外的联合国主要机构、专门机构、或根据政府间协定成立以鼓励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为宗旨的官方机关提出并请秘书长为此目的转交委员会的提议和多边公约草案。

2. 在上述情况下，委员会如认为有必要进行有关这些提议或草案的研究，则应大致遵照下列程序：

（a）委员会应制订一项工作计划，研究这些提议和草案，并与任何其他有关同一主题的提议和草案进行比较；

（b）委员会应寄发一项调查表给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和上文所述关心这一问题的主要机构、专门机构和官方机关，并请它们在合理期间内提出评论；

（c）委员会应向大会提出报告和建议。在此之前，委员如认为有必要，可以向提出提议或草案的机关或专门机构送交临时报告；

（d）大会如请委员会依照建议的计划继续进行其工作，则应适用上文第16条列出的程序。但该条（c）款所提的调查表则可能并非必要。

B. 国际法的编纂

第18条

1. 委员会应对整个国际法领域进行调查，以期选择有待编纂的专题，并应同时顾及政府或非政府方面现有的草案。

2. 委员会如认为某一专题必须和适合进行编纂时，应向大会提出建议。

3. 委员会应优先处理大会请它处理的任何问题。

第19条

1. 委员会应通过配合每一项任务的工作计划。

2. 委员会应通过秘书长向各国政府提出具体详尽的要求，请它们提供法律案文、法令、司法判决、条约、外交信件和其他与委员会研究中的专题有关及其认为必要的文件。

第20条

委员会应以条款形式编写草案，并连同其评注一起提交大会，评注的内容包括：

（a）充分说明判例和其他有关资料，包括：条约、司法判决和学说；

（b）结论确定以下各点：

（一）各国惯例和学说对每项问题的同意程度；

（二）目前存在的不同意见和争执，以及因主张一种或另一种解决办法而生的争论。

第21条

1. 委员会认可的草案，应请秘书长作为委员会的文件分发。秘书处应就这项文件进行一切必要的宣传，文件应附有委员会认为适当的解释和补充材料。这项出版品应载列各国政府依照上文第19条提交委员会的任何资料。委员会应决定这项出版品中是否列入委员会与之咨商的任何科学机构或个别专家提出的意见。

2. 委员会应请各国政府在合理期间内提供有关这一文件的评论。

第22条

委员会应参照这些评论，编写最后草案和解释性报告，并连同其建议，一并通过秘书长提交大会。

第23条

1. 委员会可向大会建议：

（a）报告既已发布，不必采取行动；

（b）以决议方式表示注意，或通过这项报告；

（c）向会员国推荐这项草案，以求缔结一项公约；

（d）召集会议以缔结一项公约。

2. 大会认为合适时，得将草案送回委员会重新审议或重新起草。

第24条

委员会应研究方式和方法，便利各方利用国际习惯法的依据，如搜集和出版有关国家惯例以及各国法庭和国际法庭作出的国际法问题的判决，并应就此事项向大会提出报告。

第三章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第25条

1. 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就任何问题向主管该问题的联合国机构进行协商。

2. 凡经秘书长分送各国政府的委员会文件，也应分送联合国的有关机关。这些机关可以向委员会提供资料或作出建议。

第26条

1. 委员会如认为有助于履行职务，得就交付其处理的任何问题，与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的国际与国家组织进行协商。

2. 为了分发委员会的文件，秘书长与委员会协商后，应拟订一项关心国际法问题的国家组织和国际组织名单。秘书长应力求将每一联合国会员国至少一个国家组织列入名单。

3. 委员会和秘书长适用本条各项规定时，应遵守大会和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涉及佛朗哥西班牙关系的决议，并应将曾与纳粹及法西斯合作的组织排除在协商对象与名单之外。

4. 确认委员会有必要与泛美联盟一类组织在编纂国际法的政府间组织进行协商。

附件二

国际法委员会现任委员及  
前任委员名单

名字前面加星号的是2006年经大会选出的委员，任期从2007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869]](#footnote-869)

| 姓名 | 国籍[[870]](#footnote-870) | 任期[[871]](#footnote-871) |
| --- | --- | --- |
| 伊曼努尔·阿克韦·阿多 | 加纳 | 1997-2006 |
| 罗伯托·阿戈 | 意大利 | 1957-1978 |
| 博拉·阿德苏姆博·阿吉博拉 | 尼日利亚 | 1987-1991 |
| 理查德·奥苏奥拉莱·A. 阿金吉德 | 尼日利亚 | 1982-1986 |
| 侯赛因·M. 巴哈尔纳 | 巴林 | 1987-2006 |
| 费尔南多·阿尔沃尼科 | 智利 | 1967-1971 |
| 贡萨洛·阿尔西瓦 | 厄瓜多尔 | 1970-1972 |
| 乔治·H. 奥尔德里奇 | 美利坚合众国 | 1981 |
| 里卡多·J. 阿尔法罗 | 巴拿马 | 1949-1953 1958-1959 |
| 奥恩·S. 哈索内 | 约旦 | 1987-1999 |
| \* 阿里·穆赫辛·费塔伊斯·马里 | 卡塔尔 | 2002- |
| 里亚德·马哈茂德·沙米·凯西 | 伊拉克 | 1982-1991 |
| 希尔韦托·阿马多 | 巴西 | 1949-1969 |
| 加埃塔诺·阿兰焦-鲁伊斯 | 意大利 | 1985-1996 |
| 若昂·克莱门特·巴埃纳·苏亚雷斯 | 巴西 | 1997-2006 |
| 米库因·莱利埃尔·巴兰达 | 扎伊尔[[872]](#footnote-872) | 1982-1986 |
| 胡利奥·巴尔沃萨 | 阿根廷 | 1979-1996 |
| 尤里·G. 巴尔谢戈夫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873]](#footnote-873) | 1987-1991 |
| 米兰·巴托斯 | 南斯拉夫 | 1957-1973 |
| 穆罕默德·贝贾维 | 阿尔及利亚 | 1965-1981 |
| 约翰·艾伦·比斯利 | 加拿大 | 1987-1991 |
| 穆罕默德·本努纳 | 摩洛哥 | 1987-1998 |
| 阿里·苏阿特·比尔盖 | 土耳其 | 1972-1976 |
|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 埃及 | 1979-1991 |
| 德雷克·威廉·鲍威特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1992-1996 |
| 詹姆斯·莱斯利·布赖尔利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1949-1951 |
| 赫伯特·W. 布里格斯 | 美利坚合众国 | 1962-1966 |
| \*伊恩·布朗利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1997- |
| 马塞尔·卡迪厄 | 加拿大 | 1962-1966 |
| 卢修斯·卡弗利施 | 瑞士 | 2007- |
| 卡洛斯·卡莱罗-罗德里格斯 | 巴西 | 1982-1996 |
| 胡安·何塞·卡列-卡列 | 秘鲁 | 1973-1981 |
| \*恩利克·J. A. 坎迪奥蒂 | 阿根廷 | 1997- |
| 豪尔赫·卡斯塔涅达 | 墨西哥 | 1967-1986 |
| 埃里克·卡斯特伦 | 芬兰 | 1962-1971 |
| 崔正日 | 大韩民国 | 2002-2006 |
| \*佩德罗·科米里萨奥·阿丰索 | 莫桑比克 | 2002- |
| 罗伯托·科尔多瓦 | 墨西哥 | 1949-1954 |
| 詹姆斯·理查德·克苏福德 | 澳大利亚 | 1992-2001 |
| 伊曼努尔·科德齐埃·达德齐 | 加纳 | 1977-1981 |
| 里亚德·达乌迪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2002-2006 |
| 约翰·德萨拉姆 | 斯里兰卡 | 1992-1996 |
| 莱昂纳多·迪亚斯-冈萨雷斯 | 委内瑞拉 | 1977-1991 |
| \*克里斯托弗·约翰·罗伯 特·杜加尔德 | 南非 | 1997- |
| 康斯坦丁·P. 伊科诺米季斯 | 希腊 | 1997-2001  2003-2006 |
| 道格拉斯·L. 埃德蒙兹 | 美利坚合众国 | 1954-1961 |
| 古德蒙杜尔·埃里克松 | 冰岛 | 1987-1996 |
| 阿卜杜拉·埃里安 | 埃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874]](#footnote-874) | 1957-1958  1962-1978 |
| 纳比尔·埃拉兰比 | 埃及 | 1994-2001 |
| 塔斯林·奥拉瓦莱·伊莱亚斯 | 尼日利亚 | 1962-1975 |
| 法里斯·库里 | 叙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875]](#footnote-875) | 1949-1961 |
| 卡拉法拉·拉希德·穆哈迈德-阿赫迈德 | 苏丹 | 1982-1986 |
| 尼哈特·埃里姆 | 土耳其 | 1959-1961 |
| \*保拉·埃斯卡拉梅亚 | 葡萄牙 | 2002- |
| 康斯坦丁·埃夫斯塔西亚季斯 | 希腊 | 1967-1971 |
| 延斯·埃文森 | 挪威 | 1979-1984 |
| 路易吉·费拉里·布拉沃 | 意大利 | 1997-1998 |
| 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1955-1960 |
| 孔斯坦廷·弗利坦 | 罗马尼亚 | 1982-1986 |
| \*萨利福·冯巴 | 马里 | 1992-1996  2002- |
| 劳雷尔·B. 弗朗西斯 | 牙买加 | 1977-1991 |
| J. P. A. 弗朗索瓦 | 荷兰 | 1949-1961 |
| \*乔治·加娅 | 意大利 | 1999- |
| \*兹齐德拉夫·加利茨基 | 波兰 | 1997- |
| 弗朗西斯科·V. 加西亚·阿 马多尔 | 古巴 | 1954-1961 |
| 劳尔·I. 戈科 | 菲律宾 | 1997-2001 |
| 伯恩哈特·格雷夫拉特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876]](#footnote-876) | 1987-1991 |
| 安德烈·格罗斯 | 法国 | 1961-1963 |
| 穆罕然德·居内 | 土耳其 | 1992-1996 |
| 格哈德·哈夫纳 | 奥地利 | 1997-2001 |
| 爱德华·汉布罗 | 挪威 | 1972-1976 |
| \*侯赛因·哈苏纳 | 埃及 | 2007- |
| 弗朗西斯·马洪·海斯 | 爱尔兰 | 1987-1991 |
| 贺其治 | 中国 | 1994-2001 |
| 毛里西奥·埃多西亚·萨卡萨 | 尼加拉瓜 | 1997-2001 |
| \*马哈茂德·哈穆德 | 约旦 | 2007- |
| 徐淑希 | 中国 | 1949-1961 |
| 黄嘉华 | 中国 | 1985-1986 |
| 曼利·O. 赫德森 | 美利坚合众国 | 1949-1953 |
| 卡米勒·E. 易德里斯 | 苏丹 | 1992-1996 |
| 阿德戈基阿吉博拉·伊盖[[877]](#footnote-877)i | 尼日利亚 | 2000-2001 |
| 路易·伊格纳西奥·平托 | 达荷美[[878]](#footnote-878)j | 1967-1969 |
| 豪尔赫·E. 伊留卡 | 巴拿马 | 1982-1991  1997-2001 |
| \*玛丽·G. 雅各布松 | 瑞典 | 2007- |
| 安德里亚斯·J. 雅乔维德斯 | 塞浦路斯 | 1982-1996 |
| S. P. 贾戈达 | 印度 | 1977-1986 |
| 爱德华多·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 | 乌拉圭 | 1960-1969 |
| 彼得·C. R. 卡巴齐 | 乌干达 | 1992-2001  2002-2006 |
| \*莫里斯·坎托 | 喀麦隆 | 1999- |
| 维克托·坎加 | 喀麦隆 | 1962-1964 |
| 詹姆斯·卢塔奔齐巴瓦·卡特卡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1997-2006 |
| 理查德·D. 卡尼 | 美利坚合众国 | 1967-1976 |
| \*法蒂·凯米沙 | 突尼斯 | 2002- |
| 他纳·科曼 | 泰国 | 1957-1959 |
| \*罗曼·阿纳托利耶维奇·科洛德金 | 俄罗斯联邦 | 2003- |
| 弗拉基米尔·M. 科列茨基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e | 1949-1951 |
| 阿卜杜勒·G. 科罗马 | 塞拉利昂 | 1982-1993 |
| 马尔蒂·科斯肯涅米 | 芬兰 | 2002-2006 |
| 费奥多尔·I. 科热夫尼科夫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e | 1952-1953 |
| 谢尔盖·B. 克雷洛夫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e | 1954-1956 |
| 莫赫塔尔·库苏马-阿特马贾 | 印度尼西亚 | 1992-2001 |
| 瓦列里·I. 库兹涅佐夫 | 俄罗斯联邦 | 2002- |
| 曼弗雷德·拉克斯 | 波兰 | 1962-1966 |
| 何塞·M. 拉克莱塔·穆诺兹 | 西班牙 | 1982-1986 |
| 赫希·劳特帕赫特爵士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1952-1954 |
| 刘锴 | 中国 | 1962-1966 |
| 伊戈尔·伊凡诺维奇·卢卡舒克 | 俄罗斯联邦 | 1995-2001 |
| 安东尼奥·德卢纳·加西亚 | 西班牙 | 1962-1966 |
| 艾哈迈德·马希乌 | 阿尔及利亚 | 1982-1996 |
| 沙菲克·马莱克 | 黎巴嫩 | 1982-1986 |
| 威廉·曼斯菲尔德 | 新西兰 | 2002-2006 |
| 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莫雷诺 | 萨尔瓦多 | 1973-1976 |
| 迈克尔·J. 马西森 | 美利坚合众国 | 2003-2006 |
| 艾哈迈德·马蒂纳-达夫塔里 | 伊朗[[879]](#footnote-879)k | 1957-1961 |
| 斯蒂芬·C. 麦卡弗里 | 美利坚合众国 | 1982-1991 |
| 唐纳德·麦克雷 | 加拿大 | 2007- |
| \*特奥多尔·维奥雷尔·梅莱什卡努 | 罗马尼亚 | 1997-2001  2003- |
| 瓦茨拉夫·米库尔卡 | 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880]](#footnote-880)l | 1992-1998 |
| 贾姆奇德·蒙塔兹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2000-2006 |
| 倪征噢 | 中国 | 1982-1984 |
| \*贝恩德·H. 尼豪斯 | 哥斯达黎加 | 2002- |
| 弗兰克·X. J. C. 恩詹加 | 肯尼亚 | 1976-1991 |
| \*乔治·诺特 | 德国 | 2007- |
| 小木曾本碓 | 日本 | 1982-1991 |
| \*巴约·奥霍 | 尼日利亚 | 2007- |
| 迪迪埃·奥佩蒂·伯丹 | 乌拉圭 | 1997-2006 |
| 路易斯·帕迪利亚·内尔沃 | 墨西哥 | 1955-1963 |
| 拉哈比诺德·帕尔 | 印度 | 1952-1966 |
| 纪尧姆·庞布-奇文达 | 加蓬 | 1992-2006 |
| 安赫尔·M. 帕雷德斯 | 厄瓜多尔 | 1962-1966 |
| 约翰·J. 帕克 | 美利坚合众国 | 1954- |
| 斯坦尼斯拉夫·M. 帕夫拉克 | 波兰 | 1987-1991 |
| \*阿兰·佩莱 | 法国 | 1990- |
| 罗汉·佩雷拉 | 斯里兰卡 | 2007- |
| 奥贝·佩苏 | 达荷美 | 1962-1966 |
| \*埃内斯特·彼得里奇 | 斯洛文尼亚 | 2007- |
| 克里斯托弗·沃尔特·平托 | 斯里兰卡 | 1973-1981 |
| 西埃德·沙里福丁·皮尔扎达 | 巴基斯坦 | 1982-1986 |
| 罗伯特·Q. 昆廷-巴克斯特 | 新西兰 | 1972-1984 |
| 阿尔弗雷德·拉曼加索维纳 | 马达加斯加 | 1967-1976 |
| 佩马拉朱·斯里尼瓦萨·拉奥 | 印度 | 1987-2006 |
| 贝内加尔·N. 劳爵士 | 印度 | 1949-1951 |
| 埃迪伯特·拉扎凡德拉朗博 | 马达加斯加 | 1982-1996 |
| 保罗·勒泰 | 法国 | 1964-1989 |
| 威廉·里普哈根 | 荷兰 | 1977-1986 |
| 帕特里克·利普顿·鲁宾逊 | 牙买加 | 1992-1996 |
| 维克多·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 | 委内瑞拉 | 1997-2006 |
| 沙卜泰·罗森内 | 以色列 | 1962-1971 |
| 罗伯特·罗森斯托克 | 美利坚合众国 | 1992-2003 |
| 泽农·罗西季斯 | 塞浦路斯 | 1972-1976 |
| 埃曼努尔·J. 鲁库纳斯 | 希腊 | 1985-1991 |
| 何塞·马里亚·鲁达 | 阿根廷 | 1964-1972 |
| 希尔维托·贝尔涅·萨博亚 | 巴西 | 2007- |
| 米兰·萨霍维奇 | 南斯拉夫 | 1974-1981 |
| 卡洛斯·萨拉曼卡·菲格罗亚 | 玻利维亚 | 1954-1956 |
| A. E. F. 桑德斯特罗姆 | 瑞典 | 1949-1961 |
| 乔治·塞尔 | 法国 | 1949-1960 |
| 斯蒂芬·M. 施韦贝尔 | 美利坚合众国 | 1977-1980 |
| 贝尔纳多·塞普尔韦达 | 墨西哥 | 1997-2006 |
| 塞萨尔·塞普尔维达·古铁雷斯 | 墨西哥 | 1987-1991 |
| 何塞·塞特-卡马拉 | 巴西 | 1970-1978 |
| 史久镛 | 中国 | 1987-1993 |
| 布鲁诺·西马 | 德国 | 1997-2002 |
| 伊恩·辛克莱爵士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1982-1986 |
| 纳金德拉·辛格 | 印度 | 1967-1972 |
| \*纳林德尔·辛格 | 印度 | 2007- |
| 路易斯·索拉里·图德拉 | 秘鲁 | 1987-1991 |
| 让·斯皮罗普洛斯 | 希腊 | 1949-1957 |
| 康斯坦丁·A. 斯塔夫罗普洛斯 | 希腊 | 1982-1984 |
| 颂蓬·素差伊库 | 泰国 | 1977-1986 |
| 阿尔伯特·塞克利 | 墨西哥 | 1992-1996 |
| 阿卜杜勒·哈基姆·塔比比 | 阿富汗 | 1962-1981 |
| 阿诺尔德·J. P. 坦梅斯 | 荷兰 | 1967-1976 |
| 杜杜·锡亚姆 | 塞内加尔 | 1970-1999 |
| 彼得·托姆卡 | 斯洛伐克 | 1999-2002 |
| 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h | 1985-1996 |
| 鹤冈千仞 | 日本 | 1961-1981 |
| 格里戈利·I. 童金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e | 1957-1966 |
| 尼科莱·A. 乌沙科夫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e | 1967-1986 |
| 安德烈·乌什托尔 | 匈牙利 | 1967-1976 |
| \*爱德华德·巴伦西亚-奥斯皮纳 | 哥伦比亚 | 2003- |
| 弗朗西斯·瓦莱特爵士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1973-1981 |
| \*埃德孟多·巴尔加斯·卡雷尼奥 | 智利 | 1992-1996  2007- |
| \*斯蒂芬·瓦夏尼 | 牙买加 | 2007- |
| \*马塞洛·巴斯克斯-贝穆德斯 | 厄瓜多尔 | 2007- |
| 阿尔弗雷德·弗尔德罗斯 | 奥地利 | 1957-1966 |
| 弗拉德连·韦列谢金 | 俄罗斯联邦 | 1992-1994 |
| 斯特凡·费罗斯塔 | 奥地利 | 1977-1981 |
| 弗朗西斯科·比利亚格兰·克拉梅尔 | 危地马拉 | 1992-1996 |
| \*阿莫斯·瓦科 | 肯尼亚 | 2007- |
| 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1961-1972 |
| \*努格罗霍·维斯努穆尔蒂 | 印度尼西亚 | 2007- |
| \*薛捍勤 | 中国 | 2002- |
| \*山田中正 | 日本 | 1992- |
| 亚历山大·扬科夫 | 保加利亚 | 1977-1996 |
| 穆斯塔法·卡米勒·亚辛 | 伊拉克 | 1960-1976 |
| 赫苏斯·马里亚·耶佩斯 | 哥伦比亚 | 1949-1953 |
| 横田喜三郎 | 日本 | 1957-1960 |
| 亚罗斯拉夫·祖雷克 | 捷克斯洛伐克 | 1949-1961 |

附件三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在委员会永久

会址所在地的法律地位[[881]](#footnote-881)\*

瑞士政府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份通告中转达了瑞士联邦委员会关于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在委员会永久会址所在地日内瓦的法律地位的决定。决定案文如下：

“联邦委员会根据联邦政治部的建议，于1979年5月9日做出决定，对于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在委员会于日内瓦开会期间，授予类似国际法院法官在瑞士时所享受的特权和豁免，即派驻日内瓦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团长享受的特权和豁免。为此，将发给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红色特别身份证。”

附件四

国际法委员会所拟订的草案

1. 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882]](#footnote-882)\*

世界各国组成社会，共受国际法之约束，

而国际法之逐渐发展有赖于国际社会之有效组织，

兹者世界大多数国家已遵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国际新秩序，而世界其他各国亦多已宣告愿意在此新秩序中相与共处，

按联合国之本旨在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法治与正义实为达成此项宗旨之要素，

是以亟需依据《联合国宪章》，参照国际法之新发展，厘订国家之基本权利和义务，

联合国大会通过国家权利义务宣言并公布周知。

第1条

各国有独立权，因而有权自由行使其一切合法权力，包括其政体之选择，不接受其他任何国家之命令。

第2条

各国对其领土以及境内一切人与物，除国际法公认豁免者外，有行使管辖之权。

第3条

各国对任何他国之内政外交，有不加干涉之义务。

第4条

各国有不在他国境内鼓动内乱，并防止本国境内有组织鼓动此项内乱活动之责任。

第5条

各国有与他国在法律上平等之权利。

第6条

各国对其管辖下之所有人民，有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尊重其人权及基本自由之义务。

第7条

各国有保证其领土内之情况不危害国际和平与秩序之义务。

第8条

各国有以和平方法解决其与他国之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之义务。

第9条

各国有责不得借战争为施行国家政府工具，并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国际法律秩序抵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他国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第10条

对于任何国家正在采取违反第9条之行动者，或正由联合国对其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者，各国有不予协助之义务。

第11条

各国对于他国采取违犯第9条之行动而获得之任何领土，有不予承认之义务。

第12条

各国受武力攻击时，有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权利。

第13条

各国有一秉信诚履行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生之义务，又不得借口于其宪法或法律之规定而不履行此种责任。

第14条

各国有责遵照国际法及国际法高于各国主权之原则，处理其与他国之关系。

2. 纽伦堡法庭组织法及判决书  
中所确认的国际法原则[[883]](#footnote-883)\*

原则一

凡犯下在国际法上构成犯罪之行为者均应负其责任并受处罚。

原则二

凡犯下在国际法上构成犯罪之行为者，其依据国际法应负之责任，不因国内法之不加处罚而免除。

原则三

凡以国家元首或政府负责官员身份犯下在国际法上构成犯罪之行为者，其在国际法上应负之责任，不得因而免除。

原则四

凡因执行政府或上级命令而行动者，如其本人确曾有自作道德上抉择之可能，则其在国际法上应负之责任不得免除。

原则五

凡被控曾犯国际法上之罪者，在事实及法律上均有受公平审判之权利。

原则六

下列罪行为国际法上应受处罚之罪行：

（a） 危害和平罪：

（一） 计划、准备、发起，或实施侵略战争，或违犯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之战争；

（二） 参与为实现上述（一）款所称任何行为之共同计划或阴谋。

（b）战争罪：

违犯战争之法律或惯例，包括屠杀，虐待，为迫令从事奴隶劳动或为任何其他目的而放逐属于占领区或在占领区之平民，屠杀或虐待俘虏或海上人员，杀死人质，劫掠公私财产，肆意毁坏城镇乡村或作军事上非必要之破坏，但不以此为限。

（c）危害人类罪：

对任何一地平民之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不人道之行为，基于政治、人种或宗教原因之迫害，而此种行为之发生或迫害之实施，系随实施任何危害和平罪或战争罪而起或与之有关者。

原则七

共同实施原则六所称危害和平罪、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之行为在国际法上为犯罪行为。

3. 治罪法草案（1954年和1996年）

（A）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1954年）[[884]](#footnote-884)\*

第1条

本治罪法所定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之罪，系依照国际法应行论处之罪，犯此类罪行之个人应予处罚。

第2条

下列行为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之罪：

（1） 任何侵略行为，包括一国当局为任何目的对他国使用武力之行为，但使用武力系为国家或集体自卫，或遵行联合国主管机关之决议或建议者，不在此限。

（2） 一国当局以对他国实施侵略行为相威胁。

（3） 一国当局为任何目的准备对他国使用武力，但作此准备系为国家或集体自卫，或遵行联合国主管机关之决议或建议者，不在此限。

（4） 一国当局在其本国领土内或任何其他领土内组织武装部队或鼓励组织此种部队以谋侵入他国领土，或纵容在其本国境内组织此种部队，或纵容此种武装部队利用其领土作为活动基地或侵入他国领土之出发点，以及直接参与或支助此种侵入行为。

（5） 一国当局从事或鼓励旨在煽动他国内乱之活动，或纵容旨在煽动他国内乱之有组织活动。

（6） 一国当局从事或鼓励他国境内之恐怖活动，或纵容意图在他国境内实施恐怖行为之有组织活动。

（7） 一国当局违反其依条约所负之义务，而此项条约系借限制军备、军事训练，或设防、或借其他性质相同之限制，以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者。

（8） 一国当局借违背国际法之行为，兼并他国领土。

（9） 一国当局借经济或政治性质之胁迫措施干涉他国内政或外交，以图强制贯彻其意愿从而获取某种利益。

（10）一国当局或个人怀着消灭某一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之全部或一部之意图而犯下之行为，包括：

（一） 杀害该团体之分子；

（二） 使该团体之分子在遭受身体上或精神上之严重伤害；

（三） 故意以某种生活状况加于该团体意图使其全部或一部在形体上归于消灭；

（四） 强制施行办法企图阻碍该团体内之生育；

（五） 将该团体之儿童强迫转移至另一团体。

（11）一国当局或受其教唆或纵容之个人因社会、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关系，谋杀、灭绝、奴役、放逐或迫害任何一地平民之不人道行为。

（12）违反战争法规或习惯之行为。

（13）构成下列各罪之行为：

（一） 暗中结合图谋实施本条上列各项所定罪行之一者；或

（二） 直接教唆实施本条上列各项所定罪行之一者；或

（三） 共同实施本条上列各项所定罪行之一者；或

（四） 着手实施本条上列各项所定罪行之一不遂者。

第3条

凡以国家元首或政府负责官员身份犯本治罪法所定任何罪行者，其应负之责任不得因其身份关系而免除。

第4条

凡因执行政府或上级命令被控犯本治罪法所定之罪者，如在当时情况下其本人有不遵行此项命令之可能，则其依国际法应负之责任不得免除。

（B）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1996年）[[885]](#footnote-885)\*

第一部分

一般规定

第1条

本治罪法的范围和适用

1. 本治罪法适用于第二部分中载述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

2.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是在国际法范围内、就此而论可予处罚、而不论是否可依国内法予以处罚的罪行。

第2条

个人的责任

1.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引起个人的责任。

2. 个人应按照第16条对侵略罪行负责。

3. 个人应对第17、第18、第19或第20条所载罪行负责，如果该个人：

（a） 故意实行该罪行；

（b） 下令实行实际发生或未遂的该罪行；

（c） 在第6条所述情况下没有防止或制止该罪行；

（d） 在知悉的情况下帮助、唆使或以其他方式直接和实际地协助实行该罪行，包括提供实施该罪行的手段；

（e） 直接参与计划或共谋实行实际发生的该罪行；

（f） 直接和公开地煽动另一个人实行实际发生的该罪行；

（g） 企图实施已经采取行动开始执行、而由于不以其意图为转移的情况才没有实际发生的该罪行。

第3条

惩 罚

应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负责的个人应该受到与该罪行的性质和严重性相称的惩罚。

第4条

国家的责任

本治罪法规定了个人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责任这一事实不妨碍国家依国际法应有之责任的任何问题。

第5条

政府或上级的命令

被控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个人系按照政府或上级命令行事的事实并不免除其刑事责任，但如公理如此要求则可以考虑减刑。

第6条

上级的责任

如果上级知道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当知道其下级正在或将要实行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而且如果他们不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预防或制止该罪行，则该罪行系由下级实行的事实并不免除其上级的刑事责任。

第7条

官方地位和责任

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个人，即便是以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身份行事，其官方地位并不免除其刑事责任或宽减其刑罚。

第8条

管辖权的确定

在不妨害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情形下，每一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定其对第17、第18、第19和第20条所载罪行的管辖权而不论这些罪行的实施地点或实施者为何人。对第16条所载罪行的管辖权应归于国际刑事法院。但不排除由第16条中所指的一国就该条所载罪行审判其国民。

第9条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在不妨碍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的情形下，在其领土上发现据指控有第17、第18、第19或第20条所述罪行之个人的缔约国应引渡或起诉该个人。

第10条

案犯的引渡

1. 如果各缔约国之间的任何现行引渡条约未将第17、第18、第19和第20条所述罪行列为可引渡的罪行，应将这些罪行视为包括在这些条约中的可引渡的罪行。各缔约国承诺在将来彼此间所签定的每一项引渡条约中都将这些罪行列为可引渡的罪行。

2. 以订有引渡条约作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如接到未与其订有引渡条约的另一缔约国的引渡请求，可自行决定视本治罪法为就这些罪行进行引渡的法律根据。引渡应依照被请求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办理。

3. 不以订有引渡条约作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应承认这些罪行是彼此之间可引渡的罪行，但应依照被请求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办理。

4. 对各缔约国彼此之间进行引渡来说，其中每一项罪行应视为不但发生于实际犯罪地点，而且发生于任何其他缔约国境内。

第11条

司法保证

1. 被指控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个人在被证明为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应不受歧视地享有对人类所有人提供的在法律和事实方面的最低限度保证，并应有权：

（a） 在一个根据法律正式建立的有管辖权的、独立和公正法庭上接受公平而公开的审理，由该法庭确定对他的指控有无根据；

（b） 以他所懂的语文迅速详尽地获悉对自己提出的控诉的性质与理由；

（c） 具有必要的时间和便利条件为自己的辩护做好准备，并与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系；

（d） 不过分迟延地接受审判；

（e） 在本人出庭的情况下接受审判，并亲自或通过自己选择的法律协助为自己辩护；如果没有法律协助，应通知他有权获得法律协助；如果他无力支付法律协助的报酬，则应免费为他提供法律协助；

（f） 讯问控诉证人或使其接受讯问，并在适用于控诉证人的同样条件下使辩护证人出庭并接受讯问；

（g） 如果他不懂或不会说法庭所使用的语文，应免费得到口译员的协助；

（h） 不被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明或供认有罪。

2. 已被判罪的个人应有权要求对其定罪和刑罚依法进行复审。

第12条

一事不再理

1. 任何人不得就已由一个国际刑事法院对其最终定罪或宣告无罪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而受审。

2. 已就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由一个国家法院最终定罪或宣告无罪的个人，即不应就该罪行再度受审，但下列情况除外：

（a） 由国际刑事法院受理，如果：

（一）作为该国家法院审判和判决之主题的行为已由该法院定性为普通罪行而不是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或

（二）该国家法院的诉讼不公正或不独立、蓄意使被告逃避国际刑事责任、或不曾认真诉究此案。

（b） 由另一国的国家法院受理，如果：

（一）作为前一判决的主题的行为发生在该国境内；或

（二）该国是该罪行的主要受害国。

3. 如果一个人随后按本治罪法被定罪，法院在判刑时应将国家法院对这个人的同一行为所判处并已执行的任何刑罚扣除。

第13条

不溯及既往

1. 任何人不得因本治罪法生效前的行为而被依照本治罪法定罪。

2. 本条的任何规定不排除对任何人的、在实行时根据国际法或国内法构成犯罪的任何行为进行审判。

第14条

抗 辩

主管法院应按照每一罪行的特性决定是否允许依照一般法律原则抗辩。

第15条

减罪情况

法院在判刑时应按照一般法律原则酌情顾及减罪情况。

第二部分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

第16条

侵略罪行

作为领袖或组织者积极参与或下令计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一国实行之侵略行为的个人应对侵略罪行负责。

第17条

灭绝种族罪行

灭绝种族罪行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群体而实行任何下列行为：

（a） 杀害该群体的成员；

（b） 使该群体的成员在身体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c） 故意使该群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之下，企图从形体上全部或局部消灭该群体；

（d）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群体内的生育；

（e） 强迫转移该群体的儿童至另一群体。

第18条

危害人类罪行

危害人类罪行是有计划或大规模实行由某一政府或任何组织或团体唆使或指挥的任何下列行为：

（a） 谋杀；

（b） 灭绝；

（c） 酷刑；

（d） 奴役；

（e） 基于政治、种族、宗教或族裔原因进行迫害；

（f） 基于种族、族裔或宗教原因进行侵犯人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致使全体居民中的一部分处于严重不利地位的体制化歧视；

（g） 任意驱逐出境或强迫转移人口；

（h） 任意拘禁；

（i） 迫使人员失踪；

（j） 强奸、逼良为娼和其他形式的性虐待；

（k） 截肢和严重伤害身体等严重损害身体或精神完整、健康或人性尊严的其他不人道行为。

第19条

危害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罪行

1. 故意和有计划或大规模地对参与联合国行动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实行的任何下列罪行构成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

（a） 对任何此类人员实行谋杀、绑架或对其人身或自由的其他攻击行为；

（b） 对任何此类人员的办公房地、私人住所或交通工具实行有可能危害其人身或自由的暴力攻击。

2. 本条不适用于经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为强制行动授权的、有任何人员作为与有组织的武装部队作战的战斗人员参与并且适用国际武装冲突法的联合国行动。

第20条

战争罪行

有计划或大规模实行的任何下列战争罪行构成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

（a） 实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任何下列行为：

（一）故意杀人；

（二）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包括生物学实验；

（三）故意使身体或健康遭受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

（四）无军事上之必要而以非法和横蛮之方式对财产进行大规模的破坏与占用；

（五）强迫战俘或其他受保护的人员在敌对国军中服务；

（六）故意剥夺战俘或其他受保护的人员受到公平和正常审讯的权利；

（七）将受保护人员非法驱逐出境或移送或非法禁闭；

（八）劫人为质；

（b） 故意实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造成死亡或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任何下列行为：

（一）使平民居民或平民个人成为攻击的对象；

（二）知悉攻击将造成过分的平民生命损失、平民伤害或民用物体损害，却发动使平民居民或民用物体受影响的不分皂白的攻击；

（三）知悉攻击将造成过分的平民生命损失、平民伤害或民用物体损害，却发动对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或装置的攻击；

（四）知悉为失去战斗力的人而使其成为攻击的对象；

（五）背信弃义地使用红十字、红新月或红狮与太阳的特殊标志或其他公认的保护记号；

（c） 故意实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任何下列行为：

（一）占领国将其本国平民居民的一部分迁往所占领的领土；

（二）对遣返战俘或平民的无理延迟；

（d） 实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对于人性尊严的侵犯，特别是羞辱和贬损、强奸、逼良为娼以及任何形式的粗鄙攻击；

（e） 实行违反战争法或惯例的任何下列行为：

（一）使用有毒武器或其他武器，以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二）无军事上之必要，横蛮地摧毁城市、乡镇或村庄，或予以破坏；

（三）以任何手段攻击或轰炸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或建筑物或非军事化地区；

（四）夺取、摧毁或故意损坏专门用于宗教、慈善事业和教育、艺术与科学的机构、历史纪念物和艺术及科学作品；

（五）劫掠公私财产；

（f） 违反适用于不具国际性质之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而实行的任何下列行为：

（一）残暴对待人的生命、健康以及身体或精神福祉，特别是谋杀以及诸如拷打、截肢或任何形式的体罚等酷刑；

（二）集体处罚；

（三）劫人为质；

（四）恐怖主义行为；

（五）对人性尊严的侵犯，特别是羞辱和贬损、强奸、逼良为娼以及任何形式的粗鄙攻击；

（六）掠夺行为；

（七）事先未经正规组成的、提供文明人所承认且不可或缺的司法保证之法院的审判而径行宣判和执刑。

（g） 在武装冲突的情形下，无军事上之必要而使用意图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从而严重妨害居民的健康或生存的作战方法或手段。

4. 消除未来无国籍状态公约草案[[886]](#footnote-886)\*

序 言

鉴于《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鉴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承认无国籍人的问题“要求各会员国与联合国合作，采取共同和分别的行动，确保人人有取得国籍的实际权利”，

鉴于无国籍状态往往产生令人震惊、有损人的尊严的痛苦和困难，

鉴于无国籍状态时常引起国与国之间的摩擦，

鉴于无国籍状态与现有的规定国籍是个人享受国际法承认的某些权利的条件的原则不相容，

鉴于许多国家的实践越来越倾向于逐渐消除无国籍状态，

鉴于有必要通过国际协定消灭无国籍状态的祸害，

缔约各国特议定如下：

第1条

在一个缔约国领土上出生的人，如果不能取得该缔约国国籍即会成为无国籍人，则应自出生取得该国的国籍。

第2条

为第1条的目的，对出生地不明的弃儿，应定其出生地为发现弃儿时所在的缔约国领土。

第3条

为第1条的目的，在船舶上出生应视为在该船旗国领土上出生。在飞机上出生应视为在飞机登记国领土上出生。

第4条

非出生于本公约缔约国家领土上的人，在否则即会成为无国籍人的条件下，可取得其父母一方为缔约国国民的缔约国国籍。父母国籍不同时以父亲的国籍为准。

第5条

如果缔约国的法律规定，由于个人的身份变更，如婚姻、婚姻关系终止、准正、认领或收养，导致丧失国籍，则此种丧失应以取得另一个国籍为条件。

第6条

配偶一方或父母改变国籍或丧失国籍，不应使其配偶另一方或子女丧失国籍，除非后者有另一国籍或取得另一国籍。

第7条

1. 放弃国籍不应导致丧失国籍，除非放弃国籍的人有另一国籍或取得另一国籍。

2. 谋求加入外国籍的人或为此获得出籍许可的人不应丧失其国籍，除非该人取得该外国的国籍。

3. 不得因为离开本国、在外国居留、未登记或任何类似原因而丧失其国籍，以致成为无国籍人。

第8条

缔约国因施行惩罚或因其他原因剥夺其国民的国籍，如果会使该国民成为无国籍人，则不得剥夺其国籍。

第9条

缔约国不得基于种族、民族、宗教或政治原因剥夺任何个人或任何群体的人的国籍。

第10条

1. 凡规定转让领土的条约均应有确保在行使选择权的条件下使该领土居民不致成为无国籍人的规定。

2. 如无此种规定，接受领土转让的国家，或以其他方式取得领土的国家，或在原属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形成的新国家，应对该领土的居民赋予其国籍，除非这些居民根据选择或其他方式保有其原国籍，或具有或取得另一国籍。

第11条

1. 缔约国承诺在联合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机构，在其认为适当时，代表无国籍人在各国政府或第2款所提到的法庭面前采取行动。

2. 缔约国承诺在联合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法庭，该法庭应有权裁决缔约国之间关于本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裁决第1款提到的机构代表声称在本公约规定被破坏的情况下被剥夺国籍的人所提出的控诉。

3. 如果在本公约生效后两年内，缔约国仍未建立第1款和第2款提到的机构或法庭，任何缔约国均有权请求大会建立这种机构或法庭。

4. 缔约国同意，它们之间关于本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如不提交第2款提到的法庭，即应提交国际法院。

第12条

1. 本公约在经大会通过后，应直至……（大会通过后一年）开放供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和大会邀请签署的任何非会员国签署。

2. 本公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3. 在（上述日期）……以后，本公约可由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和上述大会邀请的任何非会员国加入。加入书应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第13条

1. 任何国家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时，均可作出保留，准许该国在制定必要的法律之前，在不超过两年的期限内，推迟公约的适用。

2. 对本公约不得提出其他的保留。

第14条

1. 本公约应在交存（……如第三或第六）份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第九十天开始生效。

2. 对于在上述日期以后批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公约应在该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第九十天开始生效。

第15条

本公约任何缔约国可随时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此项退出应在秘书长收到通知后一年对该缔约国生效。

第16条

联合国秘书长应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第12条提到的非会员国通知以下事项：

（a） 第12条规定的签署、批准和加入；

（b） 第13条规定的保留；

（c） 按照第14条本公约生效的日期；

（d） 按照第15条的退出。

第17条

1. 本公约应交联合国秘书处保存。

2. 本公约经核证的副本应送达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第12条提到的非会员国。

第18条

本公约应在开始生效之日由联合国秘书长登记。

5. 仲裁程序规则范本[[887]](#footnote-887)\*

序 言

交付仲裁之承诺以下列基本原则为依据：

1. 凡为解决国与国间之争端承诺诉诸仲裁，即构成法律上之义务，必须诚意履行。

2. 此项承诺由关系各方协议而生，对于现有争端或嗣后发生之争端均得适用。

3. 承诺应以文书为之，文书之形式不拘。

4. 本规则范本为争端当事国所拟议之程序，除经关系国家于仲裁协定或其他承诺文书中同意援用外，不得强制适用。

5. 关系各方在仲裁庭之全部程序中均处于平等地位。

争端之是否存在及承诺交付仲裁之范围

第1条

1. 仲裁庭未设立前，关于争端之是否存在或已有之争端是否全部或一部分属于应交仲裁之义务范围内，承诺交付仲裁之各方尚不能获得同意，而对于此事又未能同意采用另一程序时，此项先决问题经任何一方之请求，应提交国际法院依法院简易程序裁判之。

2. 国际法院如认情形有必要时，有权指示关系各方应行遵守以保全彼此权利之临时办法。

3. 仲裁庭倘已设立，关于可否交付仲裁之争议应提请该庭处理之。

仲裁协定

第2条

1. 除先期已有足供援用之协定，诸如交付仲裁之承诺本身所载之协定等外，援用仲裁办法之各方应订立仲裁协定，其中最低限度应载明：

（a） 争端提请仲裁员裁决所依据之交付仲裁承诺；

（b） 争端之主题，尽可能叙明各方意见一致或歧异之点；

（c） 组设法庭方法及仲裁员人数。

2. 此外，仲裁协定应列载各方认为宜有之其他规定，尤其关于下列事项之规定：

（一） 该庭应适用之法律规则与原则，及赋予该庭本公允及善良原则酌订法律裁判案件之任何权利；

（二） 该庭向各方提出建议之任何权力；

（三） 赋予该庭自行制订程序规则之权力；

（四） 该庭应采用之程序；但该庭一经设立，得权宜撤销仲裁协定中有碍其作成裁决之规定；

（五） 该庭审讯所需之法定人数；

（六） 该庭之裁决所需多数之人数；

（七） 作成裁决之期限；

（八） 该庭仲裁员于裁决书内附载异议或个别意见之权，或对此项异议或意见之禁止；

（九） 审理案件所用之语文；

（十） 公摊费用之方法；

（十一）可请国际法院担任之事务。

前列各项非谓规定事项仅以此为限。

仲裁庭之组设

第3条

1. 一俟争端当事国一方请求将争端提交仲裁后，或关于争端可否交付仲裁问题已有判决后，承诺交付仲裁之各方应即以订立仲裁协定或特别协定之方法，采取必要步骤，俾便组设仲裁庭。

2. 倘自请求将争端提交仲裁之日起，或自争端可否交付仲裁问题判决之日起三个月内，仲裁法庭未经组设，国际法院院长经任何一方之请求应指派未经派定之仲裁员。院长未能执行此项职务或为关系一方之国民时，由副院长指派之。副院长未能执行此项职务或为关系一方之国民时，由年事最高且非一方或他方国民之法官指派之。

3. 本条第2款所称仲裁员之指派应在与关系各方商议后，依仲裁协定或因承诺交付仲裁而订立之任何其他文书之规定为之。倘无此项规定，法庭之组织应由国际法院院长或代行职务之法官与关系各方商议后确定之。遇此情形，仲裁员人数须为单数，且以定为五人为宜。

4. 遇有规定该庭长由其他仲裁员推举之情形，庭长一经选定，该庭即视为成立。该庭长倘于仲裁员指派后两个月内尚未选定，则依本条第二项规定之办法派定之。

5. 除因案件情形特殊外，仲裁员应自公认之国际法法学家中遴选之。

第4条

1. 仲裁庭一经设立，于作成裁决前，其组织不得变更。

2. 关系一方得更易其所派仲裁员，但须于仲裁庭未开始审理前为之。仲裁庭开始审理后，一方所派仲裁员非经各方彼此同意不得更易。

3. 仲裁员由各方彼此同意指派者或由已派定之仲裁员同意推选者，在仲裁庭开始审理后不得更易，但遇有例外情形，不在此限。仲裁员依第3条第2款规定指派者不得更易，纵令各方同意，亦所不许。

4. 仲裁庭庭长或独任仲裁员颁发第一次程序命令后，即视为已开始审理。

第5条

在仲裁庭开始审理之前或之后，仲裁员如因死亡、或不能执行职务、或辞职而有出缺，应依原来指派仲裁员之办法予以补实。

第6条

1. 关系一方基于仲裁庭设立后发生之事实，得提议将仲裁员之一取消资格。一方基于仲裁庭设立前发生之事实提议将仲裁员之一取消资格，惟有于确能证明该仲裁员之指派系因未悉此项事实或受诈欺所致时，始得为之。遇有前述任一情形，应由仲裁庭其他仲裁员作成决定。

2. 关于独任仲裁员或仲裁庭庭长之取消资格问题，于各方对此事未有协议时，应由国际法院依任何一方之申请决定之。

3. 因前述情形而有仲裁员一人或数人出缺时，应依照原来指派仲裁员之办法来指派仲裁员予以补实。

第7条

遇仲裁员缺额在法庭开始审理后补实之情形，仲裁庭之审理应自出缺时停顿之处起继续进行。惟如言词辩论业已开始，新任仲裁员得要求重新自始举行。

仲裁庭权力及仲裁程序

第8条

1. 倘交付仲裁之承诺或任何补充协定所载规定似足以构成仲裁协定，且仲裁庭业已设立，则任何一方得申请仲裁庭裁决争端。倘他方以前述规定不足构成仲裁协定为理由，对此项申请拒不答辩，仲裁庭应决定各方是否已就第2条所载之仲裁协定必备要件获有充分协议。倘仲裁庭决定已有充分协议，应即规定开始或继续审理之必要措施。倘仲裁庭作成相反决定，应命各方在仲裁庭认为适当之期限内补足或订立仲裁协定。

2. 倘各方在依前项规定所订期限内未能议定或补足仲裁协定，则仲裁庭应于据各方报告未能协议后——或关于争端可否交付仲裁问题作有任何判决后——三个月内，依任何一方之申请，对案件进行审讯及裁判。

第9条

仲裁庭为判断其本身权限之机关，具有解释其权限所依据之仲裁协定及其他文书之权力。

第10条

1. 关于仲裁庭应适用之法律，各方无协议时，仲裁庭应适用：

（a） 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则者；

（b） 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

（c） 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

（d） 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

2. 各方间之协定有许可之规定时，仲裁庭亦得本公允及善良原则裁判案件。

第11条

仲裁庭不得以适用之法律无规定或规定不明为理由而为案情不明之裁定。

第12条

1. 关于仲裁庭之程序，各方无协议，或其所订规则不完备时，仲裁庭应有权制订或补足程序规则。

2. 仲裁庭一切决定应以仲裁员过半数可决票为之。

第13条

仲裁庭所用语文若未经仲裁协定指明，此项问题应由仲裁庭决定之。

第14条

1. 关系各方应向仲裁庭派代理人作为其与仲裁庭间之中介。

2. 各方得聘用律师及辅佐人向仲裁庭辩护其权利及利益。

3. 各方有权经由代理人、律师或辅佐人向仲裁庭提出其认为有利于本身主张之书面及言词辩论。各方有提出异议或附带声明之权。仲裁庭对此等事项之决定系属确定。

4. 仲裁庭仲裁员有向代理人、律师或辅佐人诘问及要求解释之权。审讯时之诘问及评议不得视为仲裁庭或仲裁员表示其意见。

第15条

1. 仲裁程序通常分陈诉与审讯两不同方面。

2. 陈诉系指各方代理人分别以诉状、辩诉状、及必要时之答辩状及驳辩状送达仲裁庭仲裁员及他方。各方应附具其所引证之一切文件及公文书。

3. 仲裁协定规定之期限，关系各方彼此同意时，或于仲裁庭认为须予延展始能作成公正裁判时，得予以延展。

4. 审讯系指向仲裁庭作言词辩论，发挥各方之论据。

5. 凡一方所提出之文书，应以证明无讹之副本一份送达他方。

第16条

1. 审讯应由庭长主持。审讯非经仲裁庭征得关系各方同意后决定公开举行，不得公开行之。

2. 审讯应备记录，由庭长、书记官长或书记官签名。记录经签名后始为作准记录。

第17条

1. 仲裁庭宣告书面陈诉终结后，倘任何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欲将前未提出之文件及公文书送交仲裁庭，仲裁庭有权拒予接受。但此项文件及公文书经任何一方代理人、辅佐人或律师提请仲裁庭注意、且经告知他方者，仲裁仍得自由加以审酌。他方有权要求将书面陈诉期间再度延展，俾提出书面答辩。

2. 仲裁庭亦得要求各方提出一切必要之文书及提供一切必要之解释。如经拒绝，仲裁庭应将此情备案。

第18条

1. 仲裁庭对于所举证据应断定其可否接受并判断其证明力如何。仲裁庭有权于审理之任何阶段中命专家鉴定或令证人出庭。仲裁庭于必要时且得决定视察与其受理之案件有关之地点。

2. 关系各方对于有关证据之事项及本条第一项规定之其他措施，应与仲裁庭合作。倘任何一方不履行本项所规定之义务，仲裁庭应将此情备案。

第19条

除交付仲裁之承诺默示各方另有相反之协议或仲裁协定载有此种协议外，仲裁庭对于任何附加要求如认为其与争端主题不可分离，且为求争端最后解决计确有必要时，应予裁判。

第20条

仲裁庭如认情形有必要时，有权指示关系各方应行遵守以保全彼此权利之临时办法；在紧急情形下，庭长得行使此权，但须经仲裁庭追认。

第21条

1. 代理人、辅佐人及律师在仲裁庭指挥下陈述其主张已完毕时，仲裁庭应正式宣告辩论终结。

2. 惟仲裁庭在未作成裁决前，如认定有决定性之新证据尚待审酌，或于审慎考虑后认为某数点尚须究明时，有权重开业已终结之辩论。

第22条

1. 除原告自认被告主张确有理由之情形外，原告申请停止仲裁程序时，非经被告同意，仲裁庭不得接受。

2. 仲裁案件因各方之同意而停止时，仲裁庭应将此事实备案。

第23条

倘各方达致解决，仲裁庭应将此情备案。仲裁庭经任何一方之请求，于认为适当时，得将解决办法载入裁决书。

第24条

裁决通常应于仲裁协定规定期间内作成，但仲裁庭遇此项期间非予延展即不能作成裁决时，得决定予以延展。

第25条

1. 一方不到庭或不陈述其主张时，他方得请求仲裁庭对其本身主张为有利之裁判。

2. 仲裁庭得于未作裁决前，对于缺席之一方给予宽限期间。

3. 宽限期间届满后，仲裁庭如查明其对本案确有管辖权，应即作成裁决。仲裁庭须查明到庭一方之主张在事实及法律上具有根据，始得为有利于此项主张之裁判。

仲裁庭之评议

第26条

仲裁庭之评议应永守秘密。

第27条

1. 仲裁庭之决定应由全体仲裁员参与。

2. 除仲裁协定规定有法定人数之情形外，如仲裁员未经仲裁庭庭长许可而缺席，缺席之仲裁员应由国际法院院长指派之另一仲裁员替代。对于替代之仲裁员，适用第7条之规定。

裁 决

第28条

1. 仲裁员之裁决应以仲裁员过半数可决票为之。裁决应作裁决书，其上注明作成日期。裁决书应载明各仲裁员姓名，由仲裁庭庭长及投可决票之仲裁员签名。仲裁员于表决时不得弃权。

2. 除仲裁协定另有规定外，仲裁庭任何仲裁员得于裁决书内附载其个别意见或异议。

3. 裁决书经在仲裁庭内、于各方代理人在场或经正式传唤到庭时公开宣读后，即视为业已作成。

4. 裁决书应立即送达各方。

第29条

裁决书应就裁定各点逐一叙明其所根据之理由。

第30条

裁决一经作成，即对各方有拘束力。各方应立即诚意执行，但仲裁庭对于裁决全部或一部分之执行定有期限者，不在此限。

第31条

裁决作成并经送达各方后一个月内，仲裁庭得自动或根据任何一方请求更正裁决书内之抄写错误、排印错误、计算错误或其他类似之显然错误。

第32条

仲裁裁决构成争端之确定解决。

裁决之解释

第33条

1. 各方关于裁决之意义或范围之争执，经一方之请求，应于裁决作成后三个月内提交原为裁决之仲裁庭。

2. 倘由于任何原因不可能将此项争执提交原为裁决之仲裁庭，而各方又未能于前述期限内议定其他解决办法，则此项争议经一方之请求，得向国际法院提出。

3. 裁决经提请解释后，应视情形由仲裁庭或由国际法院决定在此项请求未经裁判前应否中止裁决之执行及在何种范围内中止执行。

第34条

如无请求解释之情事，或于此项请求经裁判后，凡与案件有关之书状及文件应由仲裁庭庭长交存常设仲裁法院国际事务处，或交存各方同意选定之其他保管人。

裁决之效力及废弃

第35条

任何一方得根据下列理由之一项或数项，对裁决之效力提出异议。

（a） 仲裁庭逾越权限；

（b） 仲裁庭仲裁员有舞弊行为；

（c） 裁决书未叙明理由，或有与基本程序规则相乖离之情事；

（d） 交付仲裁之承诺或仲裁协定系属无效。

第36条

1. 倘自对裁决效力提出异议之日起三个月内各方未能同意由另一仲裁庭处理，国际法院经任何一方之申请，有权宣告裁决全部或一部分无效。

2. 对裁决效力提出异议如系以第35条（a）、（c）两项所称情形为理由者，应于裁决作成后六个月内为之，如系以（b）、（d）两项所称情形为理由者，应于发现舞弊行为或发现关于无效之主张所依据之事实后六个月内为之；不论在何种情形下提出异议，应于裁决作成后十年内为之。

3. 国际法院经关系一方之请求，于情形有必要时，得核准在申请废弃草案未经最后裁定前，中止裁决之执行。

第37条

裁决如经国际法院宣告无效，争端应提交新仲裁庭，新仲裁庭由各方同意组设之；不能同意时，则依第3条规定方法组设之。

裁决之复核

第38条

1. 任何一方得以发现具有决定性之事实为理由，申请仲裁庭复核裁决，但以此项事实在作成裁决时为仲裁庭及申请复核一方所不知，且非因申请复核一方之过失而不知者为限。

2. 申请复核应于新事实发现后六个月内为之，无论如何应于裁决作成后十年内为之。

3. 复核程序之进行应首由仲裁庭核定所称新事实是否存在并裁定复核之申请可否接受。

4. 倘仲裁庭核定此项申请可予接受，应进而裁判争端之实况。

5. 申请复核应于可能情形下向原为裁决之仲裁庭为之。

6. 倘由于任何原因不能向原为裁决之仲裁庭申请复核时，除各方另有协议外，此项申请得由任何一方向国际法院为之。

7. 仲裁庭或国际法院经关系一方之请求，于情形有必要时，得核准在申请复核案未经最后裁定前，中止裁决之执行。

6.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文草案[[888]](#footnote-888)\*

第1条

本条文的范围

本条文适用于国家间条约所包含的最惠国条款。

第2条

用 语

1. 为本条文的目的：

（a） “条约”是指国家间以书面缔结并受国际法支配的国际协定，不论是包括在一个单一文件内，还是包括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有关的文件内，也不论使用什么特定名称；

（b） “施惠国”是指承担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国家；

（c） “受惠国”是指施惠国已向之承担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国家；

（d） “第三国”是指施惠国和受惠国以外的任何国家；

（e） “补偿条件”是指包括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的或其他方式的施惠国和受惠国之间约定的任何种类的给予补偿的条件；

（f） “互惠待遇条件”是指一种补偿条件，规定受惠国给予施惠国或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的待遇，相同于或视情况相等于施惠国给予第三国或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的待遇。

2. 第1款中关于本条文各用词的规定，不影响任何国家国内法对各该词的使用或可能赋予各该词的意义。

第3条

不在本条文范围内的条款

本条文不适用于第4条所指的最惠国条款以外的关于最惠国待遇的条款的事实不影响：

（a） 该条款的法律效力；

（b） 本条文所载明的任何规则对该条款的适用，而该条款根据本条文以外的国际法应服从该规则。

第4条

最惠国条款

最惠国条款是指一项条约规定，依据这项规定，一国向另一国承担义务，在约定的关系范围内给予最惠国待遇。

第5条

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是指施惠国给予受惠国或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的待遇不低于施惠国给予第三国或与之有同于上述关系的人或事的待遇。

第6条

国际法其他主体也是缔约方的国家间协定中的条款

不论第1、2、4及5条规定如何，本条文各条应适用于国际法其他主体也是缔约方的、包括有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国际协定所规定的国家间关系。

第7条

最惠国待遇的法律依据

本条文各项规定不应含有一国有权享受另一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超出该另一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所依据的范围。

第8条

最惠国待遇的来源和范围

1. 受惠国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只来自施惠国与受惠国之间有效的第4条所提及的最惠国条款或第6条所提及的关于最惠国待遇的条款。

2. 受惠国为了自身或为了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的利益，根据第1款所提及的条款有权享受的最惠国待遇，决定于施惠国给予第三国或与之有同于上述关系的人或事的待遇。

第9条

依据最惠国条款享有的权利的范围

1. 依据最惠国条款，受惠国仅为了自身或为了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的利益，取得该条款的主题范围内的权利。

2. 受惠国仅就该条款所规定的或该条款的主题所默示的人或事，依据第1条款取得权利。

第10条

依据最惠国条款取得的权利

1. 依据最惠国条款，受惠国只有在施惠国给予第三国以该条款主题范围内的待遇的条件下，才取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

2. 受惠国就与其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依据第一款取得权利，但以该人或事属于下列各类者为限：

（a） 与从施惠国给予的待遇获得利益的与第三国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属于同类者。

（b） 同受惠国的关系与（a）目所指的人或事同该第三国的关系相同者。

第11条

不以补偿为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的效力

如果最惠国条款不以补偿为条件，受惠国取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无须承担给予施惠国以任何补偿的义务。

第12条

以补偿为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的效力

如果最惠国条款以补偿为条件，受惠国只在给予施惠国以议定的补偿的情况下，取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

第13条

以互惠待遇为条件的最惠国条款

如果最惠国条款以互惠待遇为条件，受惠国只在给予施惠国以议定的互惠待遇的情况下，取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

第14条

对议定条件的遵守

如果受惠国或为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行使来自最惠国条款的权利，应遵守包括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所规定或施惠国和受惠国之间另行议定的条件。

第15条

与有偿给予第三国以待遇的事实无关

受惠国依据不以补偿为条件的最惠国条款，为了自身或为了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的利益无偿地取得权利，不单纯因施惠国给予第三国或与之有上述同样关系的人或事以有偿的待遇这一事实而受影响。

第16条

与施惠国和第三国之间议定的限制无关

受惠国依据最惠国条款，为了自身或为了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的利益取得权利，不单纯因施惠国已依据其与第三国之间的国际协定，给予第三国或与之有上述同样关系的人或事，以协定规定的限于适用施惠国和第三国之间关系的那种待遇这一事实而受影响。

第17条

与依据双边或多边协定给予第三国的待遇的事实无关

受惠国依据最惠国条款，为了自身或为了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的利益取得权利，不单纯因施惠国已根据一项双边或多边国际协定，给予第三国或与之有上述同样关系的人或事的待遇这一事实而受影响。

第18条

与给予第三国以国民待遇的事实无关

受惠国依据最惠国条款，为了自身或为了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的利益取得权利，不单纯因施惠国已给予第三国或与之有上述同样关系的人或事以国民待遇这一事实而受影响。

第19条

主题相同的最惠国条款与国民待遇或其他待遇

1. 受惠国根据最惠国条款，为了自身或为了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不单纯因施惠国已同意也给予受惠国以与最惠国条款的主题相同的国民待遇或其他待遇而受影响。

2. 受惠国依据最惠国条款，为了自身或为了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不妨碍施惠国已同意也给予受惠国以最惠国条款的主题相同的国民待遇或其他待遇。

第20条

依据最惠国条款产生的权利

1. 受惠国为了自身或为了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依据最惠国条款享受不以补偿为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的权利，产生于施惠国给予第三国或与之有上述同样关系的人或事以有关待遇之时。

2. 受惠国为了自身或为了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依据以补偿为条件的最惠国条款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产生于施惠国给予第三国或与之有上述同样关系的人或事以有关待遇和受惠国给予施惠国以议定的补偿之时。

3. 受惠国为了自身或为了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依据以互惠待遇为条件的最惠国条款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产生于施惠国给予第三国或与之有上述同样关系的人或事以有关待遇和受惠国给予施惠国以议定的互惠待遇之时。

第21条

最惠国条款权利的终止或中断

1. 受惠国为了自身或为了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的利益，依据最惠国条款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在施惠国给予第三国或与之有上述同样关系的人或事的有关待遇终止或中断之时终止或中断。

2. 受惠国为了自身或为了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的利益，依据以补偿为条件的最惠国条款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在受惠国给予施惠国以议定的补偿终止或中断之时同样终止或中断。

3. 受惠国为了自身或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的利益，依据以互惠为条件的最惠国条款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在受惠国给予施惠国以议定的互惠待遇终止或中断之时同样终止或中断。

第22条

施惠国的法律规章的遵守

为受惠国和为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而行使依据最惠国条款产生的权利，应遵守施惠国的有关法律规章。但这些法律规章的适用不应使受惠国或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所受的待遇低于第三国或与之有上述同样关系的人或事所受的待遇。

第23条

最惠国条款对普遍优惠制的关系

受惠国无权依据最惠国条款享受发达的施惠国在制订的普惠计划内给予发展中的第三国的在非对等基础上的待遇，而这项计划是与各国作为一个国际社会整体所承认的普惠制相符合的，或对一个主管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来说，是与该组织通过的有关规则和程序相符合的。

第24条

最惠国条款对于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安排的关系

发达的受惠国无权依据最惠国条款享受发展中的施惠国依据各有关国家都是成员的主管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则和程序所给予发展中的第三国的任何在贸易方面的优惠待遇。

第25条

最惠国条款对于为方便边境贸易  
而给予的待遇的关系

1. 非毗连的受惠国无权依据最惠国条款享受施惠国为了方便边境贸易而给予毗连的第三国的待遇。

2. 毗连的受惠国只有在最惠国条款的主题是方便边境贸易的情况下，才有权依据该条款享受不低于施惠国为了方便边境贸易而给予毗连的第三国的待遇。

第26条

最惠国条款对于给予内陆的第三国  
的权利和方便的关系

1. 内陆国以外的受惠国无权依据最惠国条款享受施惠国为了内陆第三国出入海洋的方便而给予该国的权利和方便。

2. 内陆的受惠国只在最惠国条款的主题是方便出入海洋的情况下，才有权依据该条款享受施惠国为了内陆的第三国出入海洋的方便而给予该国的权利和方便。

第27条

国家继承、国家责任和  
爆发战争的情况

本条文不妨碍国家继承、国家的国际责任和国家之间爆发战争所可能引起的有关最惠国条款的任何问题。

第28条

本条文不追溯既往

1. 在不妨碍本条文所载的任何规则的适用而最惠国条款将依据本条文以外的国际法服从该规则的情况下，本条文仅在本条文对有关国家生效后适用于国家间缔结的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

2. 在不妨碍本条文所载的任何规则的适用而最惠国待遇条款依据本条文以外的国际法服从该规则的情况下，本条文仅在本条文对有关国家生效后，依据各国和其他国际法主体缔结的国际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29条

另行议定的规定

本条文不妨碍施惠国与受惠国另行议定的其他任何规定。

第30条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国际法规则

本条文不妨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国际法规则的制订。

7.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  
地位的条款草案及其任择议定书草案[[889]](#footnote-889)\*

（A） 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  
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

第一部分

一般条款

第1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国家为同无论何处的该国使团、领馆或代表团之间进行公务通讯以及这些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同派遣国之间或彼此之间进行公务通讯所用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

第2条

不属于本条款范围的信使和邮袋

本条款不适用于特别使节团或国际组织公务通讯所用的信使和邮袋的事实不应影响：

（a） 这类信使和邮袋的法律地位；

（b） 本条款中按照国际法不论本条款有无规定均适用的任何规则对这类信使和邮袋的适用。

第3条

用 语

1. 为本条款的目的：

（1） “外交信使”是指经派遣国正式授权，或长期担任或在特殊场合作为特派信使担任：

（a） 1961年4月1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外交信使；

（b） 1963年4月24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领馆信使；或

（c） 1975年3月14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常驻代表团、常驻观察团、代表团或观察团的信使，受托负责保管、运送和递交外交邮袋，用于进行第1条所指公务通讯的人员；

（2） “外交邮袋”是指无论有无外交信使护送的，装载来往公文、公务专用文件或物品，用于进行第1条所指公务通讯，附有外部标记，可资识别其性质为下列邮袋的包裹：

（a） 1961年4月1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外交邮袋；

（b） 1963年4月24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领馆邮袋；或

（c） 1975年3月14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常驻代表团、常驻观察团、代表团或观察团的邮袋；

（3） “派遣国”是指向或从其使团、领事或代表团发送外交邮袋的国家；

（4） “接受国”是指在其领土上驻有派遣国收发外交邮袋的使团、领馆或代表团的国家；

（5） “过境国”是指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途中经过其领土的国家；

（6） “使团”是指：

（a） 1961年4月18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常设外交使团；和

（b） 1975年3月14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常驻代表团或常驻观察团；

（7） “领馆”是指1963年4月24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或领事处；

（8） “代表团”是指1975年3月14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代表团或观察团；

（9） “国际组织”是指政府间组织。

2. 本条第1款有关本条款用语的规定不妨碍其他国际文书或任何国家的国内法对这些用语的使用或给予的含义。

第4条

公务通讯的自由

1. 接受国应允许并保护派遣国如第1条所述通过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进行的公务通讯。

2. 过境国对于派遣国通过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进行的公务通讯应给予与接受国给予的相同的自由和保护。

第5条

尊重接受国和过境国法律和规章的义务

1. 派遣国应确保不以与本条款的目的和宗旨不符的方式使用其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得到的特权和豁免。

2. 在不妨碍给予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的情况下，外交信使有义务尊重接受国或过境国的法律和规章。

第6条

不歧视和对等待遇

1. 在适用本条款的规定时，接受国或过境国不得对不同国家加以歧视。

2. 但下列情况不应视为歧视待遇：

（a） 接受国或过境国限制性地适用本条款中任何规定是由于派遣国对其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限制性地适用该规定；

（b） 国家彼此之间依习惯或协定对其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相互提供比本条款所规定的更为有利的待遇。

第二部分

外交信使和受托送交外交邮袋的船长或机长的地位

第7条

委派外交信使

在第9和第12条规定的限制下，派遣国或其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可自由委派外交信使。

第8条

外交信使的证件

外交信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其身份和主要的个人资料，包括其姓名，适当情况下其官方职位或职级，以及由其护送的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件数、其标记和目的地。

第9条

外交信使的国籍

1. 外交信使原则上应该具有派遣国的国籍。

2. 非经接受国同意，不得委派具有接受国国籍的人为外交信使，此项同意可随时撤销。但当外交信使在接受国领土内执行职务时，撤销同意须待外交信使将外交邮袋递交其收件人后方能生效。

3. 接受国对下列情形也可保留第2款规定的权利：

（a） 派遣国国民但为接受国定居居民者；

（b） 第三国国民而非同时为派遣国国民者。

第10条

外交信使的职务

外交信使的职务为保管、运送委托他的外交邮袋，将邮袋递交其收件人。

第11条

外交信使职务的结束

除其他情况外，在下列情况下，外交信使的职务结束：

（a） 外交信使的职务完成或已返回原来国家；

（b） 派遣国通知接受国，必要时并通知过境国，外交信使职务已予终止；

（c） 接受国通知派遣国，按照第12条第2款的规定，它不再承认该人为外交信使。

第12条

外交信使被宣告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1. 接受国可随时通知派遣国外交信使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而无须解释其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派遣国应视情况召回该外交信使或终止其在接受国执行的职务。可在某人到达接受国领土之前宣告其为不受欢迎或不能接受的人。

2. 如派遣国拒绝或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没有履行第1款规定的义务，接受国可不再承认该人为外交信使。

第13条

给予外交信使的便利

1.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给予外交信使执行其职务所必需的便利。

2.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根据请求尽可能协助外交信使取得临时住处，并通过电信系统与派遣国及其无论何处的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建立联系。

第14条

进入接受国或过境国的领土

1.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允许外交信使为执行其职务而进入其领土。

2. 如需要签证，接受国或过境国应尽快签发外交信使的签证。

第15条

行动自由

在接受国或过境国关于因国家安全理由禁止或管制进入地区的法律规章限制下，接受国或过境国应确保外交信使执行其职务所需在该国领土上的行动和旅行自由。

第16条

人身保护和人身不可侵犯

外交信使在执行其职务时应得到接受国或过境国的保护。他应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不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留。

第17条

临时住处的不可侵犯

1. 携带外交邮袋的外交信使的临时住处原则上不可侵犯，但

（a） 在发生火灾或其他灾害有必要时可立即采取保护行动；

（b） 在有严重的根据可以认为临时住处内有接受国或过境国法律禁止持有或进出口或检疫规章管制持有或进出口的物品时，可以检查或搜查临时住处。

2. 在第1款（a）项所述情况下，应采取为保护外交邮袋及其不可侵犯性所必需的措施。

3. 在第1款（b）项所述情况下，检查或搜查应在外交信使在场时进行，而且检查或搜查不得侵犯外交信使人身或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权，也不得对外交邮袋的递送造成不应有的拖延或障碍。应允许外交信使有机会与其使团联系，以便请该使团的人员在检查或搜查进行时到场。

4. 外交信使应尽可能通知接受国或过境国当局其临时住处所在地。

第18条

管辖豁免

1. 外交信使就执行其职务的行为而言，应享有接受国或过境国的刑事管辖豁免。

2. 外交信使就执行其职务的行为而言，还应享有接受国或过境国的民事和行政管辖豁免。在车辆肇事引起损害，车辆的使用可能使外交信使负有赔偿责任，而不能从保险取得赔偿的范围内，上述豁免不应适用于要求赔偿该项损害的诉讼。根据接受国或过境国的法律和规章，信使驾驶机动车辆时必须具有对第三者风险的保险。

3. 不得对外交信使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但如果属于他按第2款规定不享有豁免的情况，而且采取执行措施时不致侵犯其人身、临时住处或委托他的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权，则不在此限。

4. 外交信使在涉及执行其职务的事项中，没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在其他案件中，可要求外交信使出庭作证，但以不对外交邮袋的递交造成不应有的拖延或障碍者为限。

5. 外交信使对接受国或过境国管辖的豁免并不使其免除派遣国的管辖。

第19条

免除关税和捐税

1.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按照其可能通过的有关法律和规章，允许外交信使个人行李带进的其个人使用的物品入境，并免除对这些物品的一切关税、捐税和有关费用，但为提供特定服务所征的费用除外。

2. 外交信使在执行其职务时应免除其在接受国或过境国的一切全国性、地区性和地方性的捐税，但通常包括在货物或服务价格之内的间接税以及为提供特定服务所征的费用除外。

第20条

免除检查和检验

1. 外交信使应免除人身检查。

2. 外交信使的个人行李应免于检验，除非有严重根据可以认为行李中有不属于外交信使个人使用的物品，或其进出口是接受国或过境国法律规章所禁止或检疫法规所管制的物品。这种检验应在外交信使在场时进行。

第21条

特权和豁免的开始和结束

1. 外交信使应从其为执行职务而进入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之时起享受特权和豁免，或如果外交信使已经在接受国领土内，则应从其开始执行职务之时起享受特权和豁免。

2. 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应于该外交信使离开接受国或过境国领土时停止或在其可以离境的合理期间终了时停止。但作为接受国居民的特派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应在该信使将其照管的邮袋递交收件人时停止。

3. 尽管有第2款的规定，关于外交信使执行其职务的行为，其豁免应始终有效。

第22条

放弃豁免

1. 派遣国可放弃外交信使的豁免。

2. 放弃豁免概须明示，并应以书面通知接受国或过境国。

3. 但如外交信使提起诉讼，即不得对与主诉直接有关的任何反诉援引管辖豁免。

4. 对司法诉讼管辖豁免的放弃，不应视为对判决或裁决执行的豁免也默示放弃，判决或裁决执行的豁免必须另行放弃。

5. 如派遣国不放弃一项民事诉讼中外交信使的豁免，即应尽力谋求该案的公正解决。

第23条

受托送外交邮袋的船长或机长的地位

1. 外交邮袋可委托给按预定航程到达经核准的入境港用于商业的船舶或飞机的船长或机长。

2. 船长或机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构成委托其送交的邮袋的包裹件数，但该船长或机长不得视为外交信使。

3. 接受国应允许派遣国使团、领馆或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无阻碍地登上船舶或飞机，以便直接自由地从船长或机长处领取邮袋，或直接自由地向船长或机长递交邮袋。

第三部分

外交邮袋的地位

第24条

外交邮袋的识别

1. 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应附有关于其性质的外部显著标记。

2. 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如没有外交信使护送，还应附有关于其目的地和收件人的显著标记。

第25条

外交邮袋的内容

1. 外交邮袋只限于装载来往公文和专为公务使用的文件或物品。

2. 派遣国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通过其外交邮袋运送第1款所列物件以外的物体。

第26条

以邮政或任何运输方式传送外交邮袋

有关的国际或国内规则所确定的关于使用邮政或任何运输方式应遵守的条件应适用于传送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以便确保为递交邮袋尽量提供方便。

第27条

外交邮袋的安全和迅速送交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为安全迅速送交外交邮袋提供方便，特别应确保外交邮袋的送交不因形式上或技术性的规定而受到不应有的拖延或阻碍。

第28条

外交邮袋的保护

1. 外交邮袋不论位于何处，均不得侵犯，不得开拆或扣留，并应免除直接或通过电子或其他技术装置的检查。

2. 但是，如果接受国或过境国主管当局确有理由相信领馆邮袋内装载有第25条第1款所指的公文、文件或物品以外的物件，则可要求在该当局在场的情况下，由派遣国一名受权代表开拆邮袋。如果派遣国当局拒绝这一要求，邮袋应退回其发送地。

第29条

免除关税和捐税

接受国或过境国应按照其可能通过的法律和规章，允许外交邮袋入境、过境和出境，并免除关税、捐税和有关费用，为提供存放、车运及类似的服务所征的费用除外。

第四部分

杂项规定

第30条

遇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常情况时的保护措施

1.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原因或其他非常情况，外交信使或受托送交邮袋的用于商业的船舶或飞机的船长或机长或任何其他船员或机组成员无法继续保管外交邮袋，接受国或过境国应将情况通知派遣国，并采取适当措施以便确保外交邮袋的完整和安全，直至派遣国当局重新取得该邮袋。

2.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原因或其他非常情况，外交信使或无人护送的外交邮袋处于原先未预计为过境国的一国领土内，该国如果知情，即应给予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本条款所规定的保护，特别是提供便利，使其迅速安全地离开该国领土。

第31条

不承认国家或政府或没有外交或领事关系

在其领土内设有国际组织的总部或办事处，或举行国际机构的会议或大会的国家，对于派遣国来往于其使团或代表团之间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应给予本条款所赋予的便利、特权和豁免，尽管在该国同派遣国之间不存在外交或领事关系，或者其中一国不承认另一国或另一国的政府。

第32条

本条款同其他公约和协定的关系

1. 本条款在它和第3条第1款第（1）项所列各项公约的当事国之间应是上述公约所载关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地位的规则的增补。

2. 本条款的规定不妨碍其他国际协定当事国之间现行有效的其他国际规定。

3. 本条款的任何规定均不阻碍其当事国缔结有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的国际协定，但这些新协定不得违反本条款的目的和宗旨，而且不得影响本条款其他当事国依本条款享有其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B） 关于特别使节团信使和邮袋地位  
的第一任择议定书草案

本议定书和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以下简称“条款”）的当事国议定如下：

第一条

条款也适用于国家同无论何处的1969年12月8日《特别使团公约》所指该国特别使团之间，以及这些特别使团同派遣国或该国其他使团、领馆或代表团之间进行公务通讯所用的信使和邮袋。

第二条

为条款的目的：

（a） “使团”也指1969年12月8日《特别使团公约》所指的特别使节团；

（b） “外交信使”也指经派遣国正式授权担任1969年12月8日《特别使团公约》所指的特别使节团信使，受托负责保管、运送和递交外交邮袋，用于进行本议定书第一条所指公务通讯的人员；

（c） “外交邮袋”也指无论有无信使护送的，装载来往公文和公务专用文件或物品，用于进行本议定书第一条所指公务通讯，附有外部标记，可资识别其性质为1969年12月8日《特别使团公约》所指的特别使节团邮袋的包裹。

第三条

1. 本议定书在它和1969年12月8日《特别使团公约》的当事国之间应是该公约所载关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地位的规则的增补。

2. 本议定书的规定不妨碍其他国际协定当事国之间现行有效的其他国际协定。

3. 本议定书的任何规定均不阻碍其当事国缔结有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的国际协定，但这些新协定不得违反条款的目的和宗旨，而且不得影响条款其他当事国依条款享有其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C） 关于普遍性国际组织信使和邮袋  
地位的第二任择议定书草案

本议定书和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以下简称“条款”）的当事国议定如下：

第一条

条款也适用于普遍性国际组织以下公务通讯所用的信使和邮袋：

（a） 与其无论何处的使团和办事处以及那些使团和办事处之间的公务通迅；

（b） 与其他普遍性国际组织之间的公务通讯。

第二条

为条款的目的：

（a） “外交信使”也指经国际组织正式授权担任信使，受托负责保管、运送和递交邮袋，用于进行本议定书第一条所指公务通讯的人员；

（b） “外交邮袋”也指无论有无信使护送的，装载来往公文和公务专用文件或物品，用于进行本议定书第一条所指公务通讯，附有外部标记，可资识别其性质为国际组织邮袋的包裹。

第三条

1. 本议定书在它和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或1947年11月21日《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的当事国之间，应是上述公约所载关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地位的规则的增补。

2. 本议定书的规定不妨碍其他国际协定当事国之间现行有效的其他国际协定。

3. 本议定书的任何规定均不阻碍其当事国缔结有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的国际协定，但这些新协定不得违反条款的目的和宗旨，而且不得影响条款其他当事国依条款草案享有其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8.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附件和  
附录一至附录三[[890]](#footnote-890)\*

（A）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

本规约的缔约国，

希望促进国际合作以加强有效起诉和制止受到国际关注的罪行，并为此目的设立国际刑事法院；

强调此法院的目的只是对受到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罪行行使管辖权；

又强调此法院的目的是在国家刑事司法系统可能没有这种审判程序，或者在审判程序可能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对国家刑事司法系统起补充的作用；

兹协议如下：

第一部分

法院的设立

第1条

法 院

兹设立国际刑事法院（“本法院”），其管辖权和运作应由本规约加以规定。

第2条

法院与联合国的关系

院长经本规约缔约国（“缔约国”）批准，可以缔结在本法院与联合国之间建立适当关系的协定。

第3条

法院所在地

1. 本法院应设在……（“东道国”）的……。

2. 院长经缔约国批准，可以与东道国缔结在该国与本法院之间建立关系的协定。

3. 本法院可以在任何缔约国领域内，并根据特别协定在任何其他国家领域内，行使其权力和职能。

第4条

地位和法律行为能力

1. 本法院是常设机构，按照本规约对缔约国开放。本法院应于需要审理提交给它的案件时采取行动。

2. 本法院应在每个缔约国的领域内享有为行使其职能和实现其宗旨所必需的法律行为能力。

第二部分

法院的组成和行政管理

第5条

法院的机关

本法院由以下机关组成：

（a） 第8条规定的院长会议；

（b） 第9条规定的一个上诉分庭、若干个审判分庭和其他分庭；

（c） 第12条规定的检察官处；和

（d） 第13条规定的书记官处。

第6条

法官的资格和选举

1. 法官应为品格高尚、公正、正直的人，具有在其本国担任最高司法职位所需的资格，并应具有：

（a） 刑事审判经验；

（b） 国际法方面公认的胜任能力。

2. 每一缔约国可以提名不超过两名属于不同国籍、具有第1款（a）项或第1款（b）项所述资格、愿意于需要时到本法院服务的人参加选举。

3. 缔约国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以绝对多数选出十八名法官。首先应从具有第1款（a）项所述资格的提名人选中选出十名法官。接着从具有第1款（b）项所述资格的提名人选中选出八名法官。

4. 不得有两名法官为同一国家的国民。

5. 缔约国选举法官时，应当铭记要确保世界上各主要法律体系的代表性。

6. 法官任期九年，除第7款和第7条第2款的情况下，不得连选。但任何案件开始审理后，法官应一直留任至案件结束为止。

7. 第一次选举时，应抽签决定六名法官任期三年，得连选连任；抽签决定另六名法官任期六年；其余法官任期九年。

8. 具有第1款（a）项或第1款（b）项所述资格而获得提名的法官，应根据具体情况由具有同样资格而获得提名的人接替。

第7条

法官职位出缺

1. 出现空缺时，应按照第6条选举接替的法官。

2. 被选出补缺的法官应完成前任法官的任期，如果剩余任期不满5年，则有再当选一任的资格。

第8条

院长会议

1. 院长、第一和第二副院长及两名候补副院长应由法官们以绝对多数选出。他们的任期为三年，或者直至其法官任期届满为止，以较早者为准。

2. 院长不在或者回避时，可以视情况由第一或第二副院长代行院长职务。候补副院长可于必要时代行第一或第二副院长职务。

3. 院长和副院长们组成院长会议，负责：

（a） 适当地管理本法院的工作；和

（b） 履行本规约赋予它的其他职能。

4. 除非另有规定，对于任何案件，在本法院未有分庭审理该事项的情况下，可以由院长会议行使本规约赋予本法院的各种审前职能或其他程序性职能。

5. 在为一宗案件设立审判分庭之前的期间，院长会议可以按照《法院规则》，授权一位或多位法官就该案件行使第26条第3款、第27条第5款、第28条、第29条或第30条第3款赋予院长会议的权力。

第9条

分 庭

1. 每次选举本法院法官后，院长会议应尽快按照《法院规则》设立上诉分庭，由院长和六名其他法官组成，其中至少三名应为从具有第6条第1款（b）项所述资格的提名人选中选出的法官。院长应主持上诉分庭。

2. 上诉分庭的任期应为三年。但任何案件开始审理后，上诉分庭成员应一直留任至案件结束为止。

3. 法官可以连任上诉分庭成员一次或多次。

4. 不是上诉分庭成员的法官，应可担任审判分庭或者本规约规定设立的其他分庭的成员，和在上诉分庭成员不在或者回避时担任该分庭的替代成员。

5. 院长会议应按照《法院规则》，为每一宗案件指定五名这种法官担任审判分庭成员。每一个审判分庭至少应有三名从具有第6条第1款（a）项所述资格的提名人选中选出的法官。

6. 《法院规则》可以规定指派候补法官列席审判，遇有法官在审判期间亡故或者不在时，担任审判分庭成员。

7. 法官若为案件控告国的国民，或者是被告人所属国国民，则不得担任审理该案件的分庭成员。

第10条

法官的独立性

1. 法官应独立地履行职责。

2. 法官不得从事可能干预其司法职能或者影响对其独立性的信心的任何活动。尤其是在他们担任法官职务时，不得担任某一国政府的立法或行政部门的成员，或者担任负责调查或起诉罪行的机构的成员。

3. 同第2款的适用有关的任何问题，应由院长会议决定。

4. 经院长会议建议，缔约国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数决定，鉴于本法院的工作量，法官须为专职担任。在这种情况下：

（a） 选择专职担任的在任法官不得兼任其他职位或职务；

（b） 其后当选的法官不得兼任其他职位或职务。

第11条

法官职责的免除和回避

1. 院长会议得根据某一法官的请求，免除该法官行使本规约下的某一职责。

2. 法官不得参加审理他们先前以任何身份介入过的案件，或者由于任何理由，包括实际、表面或潜在的利益冲突，而可能使其公正性受到合理怀疑的案件。

3. 检察官或被告人可以按照第2款要求某一法官回避。

4. 关于法官回避的任何问题，应由有关分庭的成员以绝对多数决定。受到质疑的法官不得参加作此决定。

第12条

检察官处

1. 检察官处是本法院的独立机关，负责调查根据本规约提出的控告和进行起诉。检察官处的成员不得从任何外部来源寻求或接受指示。

2. 检察官处应由检察官负责，由一位或多位副检察官协助，副检察官可在检察官不在时代行其职务。检察员和副检察官的国籍不得相同。检察官可以任命其他所需的合格工作人员。

3. 检察官和副检察官应为品格高尚的人，并在刑事案件的起诉方面具有高度能力和经验。他们应由缔约国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以绝对多数从缔约国提名的候选人中选举产生。除非在选举时另行决定较短的任期，否则他们的任期应五年，并得连选连任。

4. 缔约国可以在当选人愿意于需要时到任服务的基础上选举检察官和副检察官。

5. 检察官和副检察官不得处理涉及与其具有相同国籍的人的控告。

6. 院长会议可以根据检察官或副检察官的请求，免除他们处理特定案件，并应就特定案件中提出的有关检察官或副检察官回避的任何问题作出决定。

7. 检察官处工作人员应遵守由检察官制定的《工作人员条例》。

第13条

书记官处

1. 法官们应根据院长会议的提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以绝对多数选出书记官长，担任本法院的主要行政官员。他们也可以用同样方式选出副书记官长。

2. 书记官长的任期应为五年，可以连选连任，并应能专职工作。副书记官长的任期应为五年，或为可能另行决定的较短任期，可以在副书记官长愿意于需要时到任服务的基础上选出。

3. 院长会议可以任命或授权书记官长任命书记官处可能需要的其他工作人员。

4. 书记官处工作人员应遵守由书记官长制定的《工作人员条例》。

第14条

宣 誓

本法院的法官和其他官员在开始行使本规约之下的职责以前，应作公开宣誓，保证公正和认真地行使职责。

第15条

免 职

1. 本法院的法官、检察官或其他官员，经查明行为不当或者严重违反本规约的，或者由于长期生病或残疾而无法行使本规约所规定的职责的，应予停职。

2. 根据第1款予以免职的决定，应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

（a） 对于检察官或副检察官，由缔约国以绝对多数作出；

（b） 对于任何其他人员，由法官们以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3. 其行为或者是否适合任职受到怀疑的法官、检察官或任何其他官员，应有充分机会提出证据和辩护意见，但不得以其他方式参与讨论这一问题。

第16条

特权和豁免

1. 法官、检察官、副检察官和检察官处工作人员、书记官长和副书记官长，应享有1961年4月16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意义范围内的外交人员的特权、豁免和便利。

2. 书记官处工作人员应享有为履行其职责所必需的特权、豁免和便利。

3. 出庭的律师、鉴定人和证人应享有为独立行使其职务所必需的特权和豁免。

4. 法官们可以以绝对多数决定取消或放弃本条所赋予的某项特权或豁免，但不包括赋予法官、检察官或书记官长的豁免。对于检察官处或书记官处的其他官员和工作人员，须根据分别由检察官或书记官长提出的建议，才可以这样做。

第17条

津贴和费用

1. 院长应领取年度津贴。

2. 副院长在行使院长职责时，应按日领取特别津贴。

3. 在不违背第4款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在行使职责期间应领取每日津贴。他们可以继续领取在不违背第10条规定的情况下担任另一职位而应得的薪金。

4. 如果按照第10条第4款决定，法官此后应专职担任，则选择专职担任的在任法官和其后当选的所有法官应领取薪金。

第18条

工作语文

本法院的工作语文应为英文和法文。

第19条

法院规则

1. 在符合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情况下，法官们可以以绝对多数，根据本规约制定本法院的运作规则，包括以下方面的规则：

（a） 调查的进行；

（b） 应遵循的程序和适用的证据规则；

（c） 为执行本规约所必需的任何其他事项。

2. 最初的《法院规则》应在举行本法院第一次选举后六个月内由法官们草拟，提交缔约国会议核准。对于其后根据第1款制定的规则，法官们可以决定也提交缔约国会议核准。

3. 根据第1款制定的规则，凡是不适用第2款的，应送交各缔约国，并可由院长会议加以确认，除非在送交后六个月内，有过半数缔约国书面提出异议。

4. 有一项规则中可以规定，该规则在获得核准或确认之前的期间暂时适用。未获核准或确认的规则即应失效。

第三部分

法院的管辖权

第20条

法院管辖权内的罪行

本法院根据本规约，对下列罪行具有管辖权：

（a） 种族灭绝罪；

（b） 侵略罪；

（c） 严重违反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和习惯的行为；

（d） 危害人类罪；

（e） 附件中所列的条约条款所确定的或者根据这些条款确定的、就被指控行为而言构成受到国际关注的异常严重罪行的罪行。

第21条

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

1. 在下述情况下，本法院可以就第20条所述的罪行对某人行使管辖权：

（a） 如果是种族灭绝罪案件，已根据第25条第1款提出控告；

（b） 如果是任何其他案件，已根据第25条第2款提出控告，而且下述国家已按照第22条接受本法院对该罪行的管辖权；

（一）拘留罪行涉嫌人的国家（“拘留国”）；

（二）该项作为或不作为在其境内发生的国家。

2. 对于第1款（b）项所适用的罪行，如果拘留国收到另一国按照一项国际协定提出的交出涉嫌人以便加以起诉的请求，除非该项请求被拒绝，否则该请求国也须接受本法院对该罪行的管辖权。

第22条

为第21条的目的接受本法院的管辖权

1. 本规约的缔约国可以：

（a） 在表示同意接受本规约拘束时，向保存人提出声明；或者

（b） 在以后向书记官长提出声明；

接受本法院对声明中指明的第20条所述罪行的管辖权。

2. 声明可以普通适用，也可以限于特定行为，或者限于在特定时期实施的行为。

3. 声明可以指定期限，但到期前不可以撤销，也可以不指定期限，但须提前六个月向书记官长提出撤销通知才可以撤销。撤销声明不影响根据本规约已开始进行的诉讼。

4. 如果按照第21条，须得到一个不是本规约缔约国的国家接受，该国可以向书记官长提出声明，同意本法院对该罪行行使管辖权。

第23条

安全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虽有第21条的规定，但是如果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将一件事情提交本法院审理，则本法院根据本规约，仍然对第20条所述的罪行具有管辖权。

2. 对于指控侵略行为或同侵略行为直接有关的控告，除非安全理事会先已断定某个国家实施了作为控告事由的侵略行为，否则不可以根据本规约提出这种控告。

3. 对于安全理事会正在按照《宪章》第七章加以处理的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的情况，除非安全理事会另有决定，否则不可以根据本规约予以起诉。

第24条

法院在管辖权方面的责任

本法院应确认它对提交给它审理的任何案件具有管辖权。

第四部分

调查和起诉

第25条

控 告

1. 本规约的缔约国，同时也是1948年12月9日《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缔约国，可以向检察官提出控告，指控有人看来实施了种族灭绝罪行。

2. 按照第22条接受本法院对某一种罪行管辖权的缔约国，可以向检察官提出控告，指控有人看来实施了这种罪行。

3. 控告应尽可能说明所控罪行的详细情节，以及任何涉嫌人的身份和下落，并附上控告国所能得到的任何佐证文件。

4. 对于第23条第1款所适用的案件，未经控告就可以展开调查。

第26条

对指控罪行的调查

1. 检察官一接到控告，或者接到安全理事会作出了第23条第1款所述决定的通知，即应展开调查，除非检察官断定按照本规约没有进行起诉的可能根据，并决定不展开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应将其决定通知院长会议。

2. 检察官可以：

（a） 传讯涉嫌人、被害人和证人；

（b） 收集书证和其他证据；

（c） 进行现场调查；

（d）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资料的机密或对任何人的保护；

（e） 酌情寻求任何国家或联合国的合作。

3. 院长会议应检察官请求，可以发出为了进行调查而可能需要的传票和授权令，包括按照第28条第1款临时逮捕涉嫌人的授权令。

4. 如果检察官调查以后，特别是考虑到第35条所述事项，断定没有按照本规约进行起诉的足够根据，并决定不提出指控，应将其决定通知院长会议，详细说明控告的性质和根据以及不予起诉的理由。

5. 应控告国要求，或者对于第23条第1款所适用的案件，应安全理事会要求，院长会议应复核检察员不展开调查或者不提出指控的决定，并且可以要求检察官重新考虑其决定。

6. 涉嫌犯了本规约范围内某一罪行的人应：

（a） 在接受讯问以前获得告知其为涉嫌人，并享有以下权利：

（一） 有权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成为判定有罪或无罪的考虑因素；并且

（二） 有权得到自己选择的律师协助，没有能力延聘律师的，有权得到本法院指派的法律协助；

（b） 不被强迫作证或认罪；以及

（c） 如果讯问语言不是涉嫌人所通晓和所说的语言，应获得提供合格的口译服务以及据以讯问涉嫌人的任何文件的译本。

第27条

起诉的开始

1. 如果检察官调查以后，断定案件表面证据成立，应向书记官长提交起诉书，内载关于所指控案情和指控涉嫌人犯下的一项或多项罪行的简要陈述。

2. 院长会议应审查起诉书及任何佐证材料，并判定：

（a） 案件是否涉及到属本法院管辖的罪行，而且表面证据成立；以及

（b） 根据所能获得的资料，特别是考虑到第35条所述的事项，案件是否应该由本法院审理。

如果是的话，院长会议应确认起诉书，并按照第9条设立审判分庭。

3. 在为了允许各方提供进一步资料而可能需要作出的延期之后，如果院长会议决定不确认起诉书，应将其决定通知控告国，对于第23条第1款所适用的案件则应通知安全理事会。

4. 院长会议可以应检察官请求修改起诉书，在这种情况下，它应发出必要的命令，确保被告人获悉这项修改的内容，并且有足够时间准备答辩。

5. 院长会议可以为审判的进行发出任何必要的进一步命令，包括下述命令：

（a） 确定审判时使用的一种或多种语言；

（b） 规定要在审判开始前的足够时间之内，将检察官所获得的书证或其他证据告知被告方，以供准备答辩，无论检察官是否打算采用那些证据；

（c） 规定检察官和被告方交换资料，使双方对审判时所要裁定的问题有足够的了解；

（d） 规定向被告人、被害人和证人提供保护，和对机密资料给予保护。

第28条

逮 捕

1. 院长会议可以在展开调查以后的任何时候，应检察官要求，签发临时逮捕某一涉嫌人的授权令，如果：

（a） 有一定的理由相信涉嫌人可能实施了属本法院管辖的罪行；而且

（b） 不暂时加以逮捕的话，涉嫌人可能不会到庭接受审判。

2. 如果起诉书没有在逮捕后90天内或院长会议可能允许的更长时间内得到确认，被临时逮捕的涉嫌人有权获得释放。

3. 起诉书获得确认后，检察官应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请求院长会议发出逮捕和移送被告人的授权令。院长会议应发出这种授权令，除非它确信：

（a） 被告人将会自愿到庭接受审判；或者

（b） 由于存在特殊情况，暂时无须发出授权令。

4. 被逮捕的人应在逮捕时获得告知逮捕的理由，并应迅速获知被控的任何罪名。

第29条

审前拘留或释放

1. 被逮捕的人应迅速被带到逮捕行为发生国的一名司法官员面前。该司法官员应根据该国的适用程序，确定授权令已适当地送达，而且被告人的权利已得到尊重。

2. 被逮捕的人可以向院长会议申请在候审期间予以释放。院长会议如果确信被告人将会到庭接受审判，可以无条件予以释放或者准予保释。

3. 被逮捕的人可以向院长会议申请，请它裁定其逮捕或拘留在本规约下是否合法。如果院长会议裁定该项逮捕或拘留不合法，应指令释放被告人，并且可以判给补偿。

4. 被逮捕的人在候审或者等待保释期间，应羁押在逮捕国、审判地国或于必要时在东道国的适当拘留处所。

第30条

起诉通知

1. 对一个人实施拘捕后，检察官应确保尽快将以该人通晓的语文写成的经核证无误的下列文件副本送达其本人；

（a） 对于涉嫌人是被临时逮捕的，逮捕理由的说明；

（b） 对于任何其他情况，经确认的起诉书；

（c） 关于被告人在本规约下的权利的说明。

2. 对于适用第1款（a）项的任何情况，起诉书得到确认后，应尽快送达被告人。

3. 如果在起诉书得到确认后60天内，尚未根据按照第28条第3款发出的授权令将被告人拘捕到案，或者基于某种原因未能遵行第1款的规定，经检察官提出申请，院长会议可以指定以某种其他方式，让被告人获悉该起诉书。

第31条

提供人员协助起诉

1. 检察官可以要求缔约国提供人员按照第2款协助起诉。

2. 除了另行议定之外，这些人员应该在整个起诉期间提供协助。他们应按照检察官的指导服务，在行使本条下的职责时，不得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者除了检察官以外任何其他来源的指示。

3. 按照本条提供人员的条件和规定，应由院长会议根据检察官的建议核准。

第五部分

审 判

第32条

审判地点

除了院长会议另有决定之外，审判地点将是本法院所在地。

第33条

适用的法律

本法院应适用：

（a） 本规约；

（b） 适用的条约及一般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c） 在适用范围内，任何国内法规则。

第34条

对管辖权的质疑

对本法院管辖权的质疑，可以根据《法院规则》：

（a） 在审讯开始之前或开始时，由被告人和任何有关国家提出；以及

（b） 在审判的任何以后阶段，由被告人提出。

第35条

受理问题

对于提交本法院审理的案件，在审判开始前的任何时候，经被告人申请或者有关国家要求，或者经本法院自己提议，并参照本规约序言中所述的宗旨，本法院可以裁定，基于下述理由不予受理：

（a） 所涉的罪行已经由对该罪行具有管辖权的国家进行适当调查，该国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显然是有充分根据的；

（b） 所涉的罪行正在由对该罪行具有或可能具有管辖权的国家进行调查，本法院没有理由在此时对该罪行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或者

（c） 所涉的罪行尚未严重到有理由需要本法院采取进一步行动。

第36条

第34条和第35条下的程序

1. 在处理第34条和第35条所述问题的程序中，被告人和控告国有陈述意见的权利。

2. 根据第34条和第35条处理的问题，应由审判分庭裁定，除非它考虑到所涉问题的重要性之后，认为应该将事情提交上诉分庭处理。

第37条

被告出庭受审

1. 作为一般规则，审判时被告人应该出庭受审。

2. 如果有下述情况，审判分庭可以命令进行缺席审判：

（a） 被告人处在羁押之中，或者在候审期间获释，以及由于安全或被告人健康不良等原因，被告人不宜出庭；

（b） 被告人继续不断扰乱审判；或者

（c） 被告人已经从根据本规约实行的合法羁押中脱逃，或者已经弃保潜逃。

3. 审判分庭如果根据第2款作出决定，应确保被告人在本规约下的权利得到尊重，特别是：

（a） 已采取一切合理步骤，将所控告的罪名通知被告人；并且

（b） 被告人要有法律代理人，必要时由本法院委派律师担任。

4. 假如由于被告人故意缺席而无法进行审判，本法院可以按照《法院规则》设立一个起诉分庭，以便：

（a） 记录证词；

（b） 根据证据审议这宗属本法院管辖罪行的案件表面证据是否成立；和

（c） 对已确定案件表面证据成立的被告人发出逮捕证，并予以分布。

5. 如果被告人后来根据本规约受到审判：

（a） 在起诉分庭上录取的证词应可接受作为证据；

（b） 任何曾任起诉分庭成员的法官不得担任审判分庭成员。

第38条

审判分庭的职能和权力

1. 在审判开始时，审判分庭应：

（a） 着人宣读起诉书；

（b） 确保第27条第5款（b）项和第30条在审判开始的足够时间之前得到遵行，使被告方能够充分准备答辩；

（c） 确信被告人在本规约下的其他权利都已得到尊重；和

（d） 允许被告人认罪或不认罪。

2. 审判分庭应确保审判的公平和迅速完成，并且根据本规约及《法院规则》进行，而且充分尊重被告人的权利，并适当地顾及对被害人和证人的保护。

3. 审判分庭可以在符合《法院规则》的前提下，审理对同一案情下多于一名被告人的控告。

4. 审判应公开进行，除非审判分庭根据第43条，或者为了保护作为证据提供的机密或敏感资料，决定某些诉讼程序应非公开地进行。

5. 在符合本规约和《法院规则》的前提下，审判分庭除其他外，经当事一方申请或者经本法院自己提议，应具有下列权力：

（a） 对尚未被本法院拘捕到案的被告人发出加以逮捕和移送的授权令；

（b） 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c） 要求提供书证和其他证据材料；

（d） 就证据的可受理性或相关性作出裁决；

（e） 保护机密资料；和

（f） 在审讯过程中维持秩序。

6. 本法院应确保书记官长保有和保存一份准确反映诉讼过程的完整审判记录。

第39条

合法性原则（法无明文不为罪）

除非在所涉的作为或不作为发生之时有下述情况，否则不得判被告人有罪：

（a） 对于涉及第20条（a）项至（d）项所述罪行的起诉，该项作为或不作为构成国际法下的罪行；

（b） 对于涉及第20条（e）项所述罪行的起诉，有关的条约适用于被告人的行为。

第40条

无罪推定

被告人在依法证实有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举证确立被告人有罪已无合理疑问，是检察官的责任。

第41条

被告人的权利

1. 在对根据本规约提出的任何控罪进行裁决时，被告人有权在符合第43条的前提下，受到公正、公开的审讯，并获得下列最低限度的保障：

（a） 以被告人通晓的语言、迅速、详尽地告知所控罪名的性质和原因；

（b） 有充分时间和便利准备答辩，并同被告人所选择的律师联系；

（c） 没有不当拖延地进行审判；

（d） 除第37条第2款所述的情况外，审判时本人在场，亲自或者通过被告人所选择的法律协助进行辩护，如果被告人没有法律协助，应获告知这一权利，并由本法院指派给予法律协助，如果被告人没有足够能力支付法律协助费用，应免费提供；

（e） 讯问或者请他人代为讯问起诉方证人，并让被告方证人在与起诉方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接受讯问；

（f） 如果本法院的任何诉讼程序或者提交本法院的任何文件所用的不是被告人所通晓和所说的语言，应免费获得合格口译员的协助和为了满足公正性的要求而必需的译本；

（g） 不被强迫作证或认罪。

2. 检察官处如果在审判结束前获得开脱罪责的证据，应提供给被告方。假如对本款是否适用或者证据是否可以接受存在疑问，应由审判分庭裁定。

第42条

一罪不二审

1. 对于构成第20条所述罪行的行为，凡是已经在本法院受到审判的人，不应再由任何其他法院加以审判。

2. 对于构成第20条所述罪行的行为，已经在另一个法院受到审判的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可以根据本规约加以审判：

（a） 该项行为被该法院定性为普通罪行，而不是属本法院管辖的罪行；或者

（b） 该另一法院的审判过程不公正或不独立，或者蓄意包庇被告人逃避国际刑事责任，或者案件的起诉做得不认真。

3. 对根据本规约判决有罪的人量刑时，本法院应考虑到另一个法院就同一项行为对同一个人判处的刑罚所执行的程度。

第43条

保护被告人、被害人和证人

本法院应以它所能采取的必要措施，保护被告人、被害人和证人，并且可以为此目的进行非公开审讯，或者允许以电子或其他特别方式提出证据。

第44条

证据

1. 每一个证人在作证之前，应按照《法院规则》，对其所将提供的证言的真实性作出保证。

2. 缔约国应将其关于伪证罪的法律扩大适用于其国民在本规约下提供的证言，并应与本法院合作，对任何涉嫌伪证罪案件进行调查，并在适当情况下加以起诉。

3. 在提出任何证据之前，本法院可以要求说明其性质，以便就其相关性或可受理性作出裁定。

4. 本法院不应要求对属于普通常识的事实提出证明，但可以指出这些事实属于审判上的知识。

5. 以严重违反本规约或其他国际法规则的手段获得的证据，应不予接受。

第45条

法定人数与判决

1. 在审判的每一阶段，必须至少有审判分庭四名法官出庭。

2. 审判分庭的裁定应以过半数法官作出。关于有罪或无罪和所处刑罚的裁定。必须得到至少三名法官的同意。

3. 如果审判分庭只剩下四名法官，而经过足够时间的评议之后，仍不能达成一项裁定，可以决定重新审判。

4. 本法院的评议应秘密进行，并应永守秘密。

5. 本法院的判决应以书面作出，对各项裁决和结论作出完整的、讲明理由的陈述。这应是所发出的唯一判决，并应在公开法庭上宣布。

第46条

判刑

1. 假如判定有罪，审判分庭应再次开庭，听取任何与判刑有关的证言，让检察官和被告方提出意见，并考虑所应判处的适当刑罚。

2. 判刑时，审判分庭应当考虑到罪行的严重性、被定罪者的个人情况等因素。

第47条

适用的刑罚

1. 本法院可以对根据本规约判定有罪的人处以下述一项或多项刑罚：

（a） 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

（b） 罚金。

2. 本法院在决定刑期或者罚金数额时，可以参照下述国家的法律所规定的刑罚：

（a） 被定罪者为其国民的国家；

（b） 犯罪地国家；和

（c） 拘捕被告人并对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

3. 所缴付的罚金可以由本法院指令转交给下述一方或几方：

（a） 书记官长，用来支付审判费用；

（b） 罪行的被害人为其国民的国家；

（c） 联合国秘书长为罪行被害人设立的信托基金。

第六部分

上诉和复核

第48条

对判决或判刑的上诉

1. 检察官和被定罪者可以根据《法院规则》，以程序错误、事实或法律错误、或者罪行与判刑不相称为理由，对根据第45条或第47条作出的裁定提出上诉。

2. 除非审判分庭另有命令，否则被定罪者在上诉期间应继续拘押。

第49条

上诉的审理程序

1. 上诉分庭具有审判分庭的全部权力。

2. 如果上诉分庭裁定上诉所针对的审判过程不公正，或者其裁定因为有事实或法律错误而无效：

（a） 如果上诉是由被定罪者提出，可以推翻或修正裁定，必要时可以指令重新审判；

（b） 如果上诉是检察官不服无罪判决而提出，可以指令重新审判。

3. 对于不服判刑的上诉，如果上诉分庭裁定判刑与罪行明显不相称，可以根据第47条改变判刑。

4. 上诉分庭的裁定应以过半数法官作出，并应在公开法庭上宣布。六名法官构成法定人数。

5. 除了第50条的情况外，上诉分庭的裁定应为最终裁定。

第50条

修改

1. 被定罪者或检察官可以按照《法院规则》，以发现了在宣判或维持定罪时申请人未能获得、而对定罪可能是一个决定因素的证据为理由，向院长会议提出修改定罪的申请。

2. 院长会议应按情况要求检察官或被定罪者就上述申请是否应当受理提出书面意见。

3. 如果院长会议认为，新的证据可能导致修改定罪，可以：

（a） 重新召集原来的审判分庭；

（b） 设立新的审判分庭；或者

（c） 将事情提交上诉分庭；

以便有关分庭在听取各当事方陈述后，判定新证据是否应该导致修改定罪。

第七部分

国际合作和司法协助

第51条

合作和司法协助

1. 在根据本规约进行的刑事调查和诉讼中，缔约国应同本法院合作。

2. 书记官长可以就一项罪行，向任何国家提出给予合作和司法协助的请求，包括但不限于：

（a） 查证某人的身份和所在地点；

（b） 录取证言和提供证据；

（c） 送达文件；

（d） 逮捕或拘留某人；以及

（e） 可能有助于司法执行的任何其他请求，包括在需要时采取临时措施。

3. 接到根据第2款提出的请求后：

（a） 对于属第21条第1款（a）项范围的案件，所有缔约国；

（b） 对于任何其他案件，已接受本法院对有关罪行管辖权的缔约国；

应即对请求作出反应，不得有不当拖延。

第52条

临时措施

1. 如果有需要，本法院可以请求一个国家采取必要的临时措施，包括：

（a） 临时逮捕涉嫌人；

（b） 扣押文件或其他证据；或者

（c） 防止证人受到伤害或恫吓，或者防止证据被销毁。

2. 本法院在根据第1款提出请求后，应尽快并无论如何在28天内，提出符合第57条规定的要求协助的正式请求。

第53条

将被告人移送本法院

1. 书记官长应将根据第28条发出的逮捕和移送被告人的授权令传送给可能在其境内找到被告人的任何国家，并应请求该国合作逮捕和移送该被告人。

2. 接到根据第1款提出的请求后：

（a） 所有缔约国：

1. 对于属于第21条第1款（a）项范围的案件；或者
2. 如果已经接受本法院对有关罪行的管辖权；

除了第5款和第6款所述的情况以外，应立即采取步骤，逮捕被告人并移送本法院。

（b） 对于适用第20条（e）项的罪行，一个缔约国如果也是有关条约的缔约国，但是没有接受本法院对该罪行的管辖权，假如决定不将被告人移送本法院，应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将被告人引渡给一个请求国，或者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进行起诉；

（c）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缔约国应考虑，是否能够按照其法律程序采取步骤，逮捕被告人并移送本法院，还是应该采取步骤，将被告人引渡给一个请求国，或者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进行起诉。

3. 在接受本法院对罪行管辖权的缔约国之间，将被告人移送本法院，就是充分遵从了任何条约中要求引渡涉嫌人或者将案件提交被请求国主管当局进行起诉的规定。

4. 接受本法院对罪行管辖权的缔约国，应尽可能将根据第1款提出的请求列为优先于其他国家提出的引渡请求。

5. 如果被告人处于一个缔约国的羁押或控制下，并且正在由于一项严重罪行而受到起诉，或者正在执行一个法院对一项罪行判处的刑罚，该缔约国可以推迟遵从第2款的规定。

该缔约国应在接到请求后45天内，将延迟的理由通知书记官长。在这种情况下，被请求国：

（a） 可以同意暂时移送被告人来接受根据本规约进行的审判；或者

（b） 应在起诉结束或撤销或者在服刑期满后，视情况遵从第2款的规定。

6. 缔约国可以在接到根据第1款提出的请求后45天内，向书记官长提出书面申请，详细说明理由，请本法院搁置该项请求。在本法院对申请作出决定之前，该国可以推迟遵从第2款的规定，但应采取任何必要的临时措施，确保被告人继续处于其羁押或控制之下。

第54条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对于涉及第20条（e）项所述罪行的案件，拘留国如果是本规约的缔约国，又是有关条约的缔约国，但是没有为第21条第1款（b）项（一）目的接受本法院对该罪行的管辖权，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将涉嫌人引渡给一个请求国进行起诉，或者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进行起诉。

第55条

特定规则

1. 按照第53条移送本法院的人，不得以移送该人时所根据的罪名以外的任何罪行受到起诉或处罚。

2. 按照本部分提供的证据，如果提供国在提供时有此要求，不得用作提供该证据的目的以外任何其他目的的证据，除非为了按照第41条第2款维护被告人的权利而有此必要。

3. 法院可以请求有关的国家基于在请求中详细说明的理由和目的，放弃第1款或第2款的规定。

第56条

与本规约非缔约国的合作

不是本规约缔约国的国家，在本部分所述的事情上，可以在友好礼让的基础上，或者根据单方面声明、特别安排或同本法院达成的其他协议，提供协助。

第57条

联系和文件

1. 本部分所述的各种请求，应采取书面形式，或者随即写成书面形式，并应在主管的国家当局和书记官长之间提出。为此缔约国应将本国主管当局的名称和地址通知书记官长。

2. 在适当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进行联系。

3. 本部分所述的请求应包括以下适用的内容：

（a） 关于该项请求的目的和所寻求的协助的简要陈述，包括提出请求的法律根据和理由；

（b） 在索取证据的请求中载有关于当事人的资料，要足够详细，以便能够查证辨认；

（c） 关于该项请求所根据的基本事实的简要说明；和

（d） 关于该项请求所涉及的控告或罪名以及关于本法院的管辖权依据的资料。

4. 如果被请求国认为所提供的资料不足，因而无法按照请求行事，可以要求提供更多的详情。

第八部分

执 行

第58条

对判决的承认

缔约国承诺，承认本法院的判决。

第59条

判刑的执行

1. 徒刑应在本法院从向其表示愿意接受犯人的国家之中指定的一个国家执行。

2. 如果没有根据第1款指定任何国家，徒刑应在东道国提供的监狱设施中执行。

3. 徒刑应受本法院根据《法院规则》的监督。

第60条

赦免、假释和减刑

1. 如果根据执行徒刑的国家一般适用的法律，一个处于相同情况，因为同一行为而被该国法院判定有罪的人，已合乎赦免、假释或者减刑的条件，则该国应将此情况通知本法院。

2. 如果已按照第1款发出通知，犯人可以根据《法院规则》向本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发出赦免、假释或减刑令。

3. 如果院长会议裁定，按照第2款提出的申请看来有充分理由，就应召集一个由五名法官组成的分庭，审议和决定从司法公正着想，该名犯人是否应该以及在什么基础上获得赦免、假释或减刑。

4. 分庭在判处徒刑时，可以规定，要按照监禁国关于赦免、假释或减刑的具体指定法律来服刑。该国以后遵照这些法律采取的行动，无需征求本法院同意，但是如果作出任何可能对服刑条件或刑期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应至少提前45天通知本法院。

5. 除第3款和第4款规定的情况之外，由本法院判决服刑的人，在刑满之前不得予以释放。

（B） 附件

各项条约下的罪行（见第20条（E）项）

1. 严重违反下列公约和议定书的罪行：

（a） 1949年8月12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罪行定义见该公约第50条；

（b） 1949年8月12日《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罪行定义见该公约第51条；

（c） 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罪行定义见该公约第130条；

（d） 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罪行定义见该公约第147条；

（e） 1977年6月8日《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罪行定义见该议定书第85条。

2. 1970年12月16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第1条所定义的非法劫持航空器的行为。

3. 1971年9月23日《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第1条所定义的罪行。

4. 1973年11月30日《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第二条所定义的种族隔离罪和有关罪行。

5. 1973年12月14日《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2条所定义的罪行。

6. 1979年12月17日《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第1条所定义的劫持人质罪和有关罪行。

7. 1984年12月10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4条规定应受惩处的酷刑罪。

8. 1988年3月10日《禁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第3条和1988年3月10日《禁止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议定书》第2条所定义的罪行。

9. 1988年12月20日《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3条第1款所设想的涉及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罪行，根据该公约第2条，这类罪行具有国际性质。

（C） 附录一

与规约草案并行的一项条约的可能条款

1. 委员会设想规约将附在各缔约国达成的一项条约之后。该条约将为法院的设立以及各缔约国对法院管理的监督等作出规定。条约还将处理供资、规约生效等事宜，建立像法院这样的实体的任何新文书均需这样做。

2. 委员会标准的做法不是为条款草案起草最后条款，委员会也并不试图要为一含有说明的条约起草一套条款（该条约将载有这类条款）。但是，在大会第六委员会的讨论中，讨论了若干有必要在缔结这类条约时解决的事宜，委员会如能概述一下处理这些事宜的可能方法，或许是有益的。

3. 有待处理的问题有：

（a） 生效：法院规约旨在体现和代表整个国际社会在对某些引起国际关切的最为严重的罪行进行起诉方面的利益。因而，规约及其说明性条约应在有大批国家成为缔约国之后才能生效。

（b） 管理：法院作为一个实体在管理上由院长会议负责（见第8条）。不过，缔约国将有必要随时举行会议，以处理法院的财务和管理等事宜，审议法院的定期报告，等等。将有必要确定缔约国据以共同行动的方法。

（c） 供资：必须在对拟议的法院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早期就详细地考虑财务问题。主要有两种可能性：缔约国直接提供资金，或者联合国提供全部或部分资金。如系一个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单独实体（如人权事务委员会），则不一定排除由联合国供资的可能性。在起草规约时考虑到了尽量减少设立法院本身所需的费用这一点。另一方面，一些成员强调，规约之下的调查和起诉活动将会耗费资金。还得作出安排，负担关押根据规约被定罪者所需的费用。

（d） 修改和审查规约：说明性条约自然应为修改规约作出规定。委员会认为，该条约应规定：规约生效5年后，如有一定数目的缔约国提出请求，即可对规约进行审查。在考虑修改和审查规约方面会引起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应修订附件所列的犯罪清单，以收入确定犯罪的新公约。这包括拟订过程中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和拟议中的关于保护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公约这类文书。

（e） 保留：不论规约草案是否被视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0条第3款意义上的“一国际组织的组织文件”，该规约草案无疑已非常类似于一组织文件，促使起草者按照第20条第3款求得“该组织主管机构”的同意的一些考虑，以极类似的方式适用于该规约草案。规约草案被订成一个全面的方案，包含了法院运转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平衡因素和先决条件：该法规是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发挥作用的。这些考虑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对规约及其相关条约的保留要么不允许，要么应有范围限制。当然，这是一个应由缔约国在谈判缔结规约及其相关条约过程中考虑的问题。

（f） 解决争端：法院自然得确定其管辖范围（见第24和第34条），并因此得处理在行使此种管辖权时产生的对规约的各种解释和适用问题。还应考虑据以解决规约缔约国之间引起的其他争端的途径。还应解决各缔约国在体现规约的条约的解释和执行方面引起的争端。

（D） 附录二

本附件中提到的有关条约规定

（见第20条（E）项）

1. 1949年8月12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  
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第50条

上条所述之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应系对于本公约保护之人或财产所犯之任何下列行为：故意杀害，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包括生物学实验，故意使身体及健康遭受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以及无军事上之必要，而以非法与暴乱之方式，对财产之大规模的破坏与征收。

2. 1949年8月12日《改善海上武装部队  
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第51条

上条所述之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应系对于受本公约保护之人或财产所犯之任何下列行为：故意杀害、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包括生物学实验，故意使身体及健康遭受重大痛若或严重伤害，以及无军事上之必要，而以非法与暴乱之方式，对财产之大规模的破坏与征收。

3. 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

第130条

上条所述之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应系对于受本公约保护之人或财产所犯之任何下列行为：故意杀害、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包括生物学实验，故意使身体及健康遭受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迫使战俘在敌国部队中服务，或故意剥夺战俘依本公约规定应享之公允及合法的审判之权利。

4. 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第147条

上条所述之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应系对于受本公约保护之人或财产所犯之任何下列行为：故意杀害、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包括生物学实验，故意使身体及健康遭受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将被保护人非法驱逐出境或移送，或非法禁闭，强迫被保护人在敌国军队中服务，或故意剥夺被保护人依本公约规定应享之公允及合法的审讯之权利，以人为质，以及无军事上之必要而以非法与暴乱之方式对财产之大规模的破坏与征收。

5．《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  
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

第85条

破坏本议定书的行为的取缔

1. 各公约关于取缔破约行为和严重破约行为的规定，经本编加以补充，应适用于破坏和严重破坏本议定书的行为的取缔。

2. 各公约所述的作为严重破约行为的行为，如果是对本议定书第44条、第45条和第73条所保护的在敌方权力下的人，或对受本议定书保护的敌方伤者、病者和遇船难者、或对在敌方控制下并受本议定书保护的医务或宗教人员、医疗队或医务运输工具作出的行为，即是严重破坏本议定书的行为。

3. 除第11条所规定的严重破约行为外，下列行为在违反本议定书有关规定而故意作出，并造成死亡或对身体健康的严重伤害时，应视为严重破坏本议定书的行为：

（a） 使平民居民或平民个人成为攻击的对象；

（b） 知悉攻击将造成第57条第2款（a）项（三）目所规定的过分的平民生命损失、平民伤害或民用物体损害，却发动使平民居民或民用物体受影响的不分皂白的攻击；

（c） 知悉攻击将造成第57条第2款（a）项（三）目所规定的过分的平民生命损失、平民伤害或民用物体损害，却发动对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或装置的攻击；

（d） 使不设防地方和非军事化地带成为攻击的对象；

（e） 知悉为失去战斗力的人而使其成为攻击的对象；

（f） 违反第37条的规定背信弃义地使用红十字、红新月或红狮与太阳的特殊标志或各公约或本议定书所承认的其他保护记号。

4. 除上述各款和各公约所规定的严重破约行为外，下列行为于故意并违反各公约和本议定书作出时，应视为严重破坏本议定书的行为：

（a） 占领国违反第四公约第49条的规定，将其本国平民居民的一部分迁往其所占领的领土，或将被占领领土的全部或部分居民驱逐或移送到被占领领土内的地方或将其驱逐或移送到被占领领土以外；

（b） 对遣返战俘或平民的无理延迟；

（c） 以种族歧视为依据侵犯人身尊严的种族隔离和其他不人道和侮辱性办法；

（d）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敌方违反第53条（b）款的规定，并在历史纪念物、艺术品和礼拜场所不紧靠军事目标的情况下，使特别安排，例如在主管国际组织范围内的安排所保护的，构成各国人民文化或精神遗产的公认历史纪念物、艺术品或礼拜场所成为攻击的对象，其结果使该历史纪念物、艺术品或礼拜场所遭到广泛的毁坏；

（e） 剥夺各公约所保护或本条第2款所指的人受公正和正规审判的权利。

5. 在不妨碍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的适用的条件下，对这些文书的严重破坏行为，应视为战争罪。

6．《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第1条

凡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任何人：

（a） 用暴力或用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恐吓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企图从事任何这种行为，或

（b） 是从事或企图从事任何这种行为的人的同犯，即是犯有罪行（以下称为“罪行”）。

7.《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第1条

1. 任何人如果非法地和故意地从事下述行为，即是犯有罪行：

（a） 对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人从事暴力行为，如该行为将会危及该航空器的安全；或

（b） 破坏使用中的航空器或对该航空器造成损坏，使其不能飞行或将会危及其飞行安全；或

（c） 用任何方法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放置或使别人放置一种将会破坏该航空器或对其造成损坏使其不能飞行或对其造成损坏而将会危及其飞行安全的装置或物质；或

（d） 破坏或损坏航行设备或妨碍其工作，如任何此种行为将会危及飞行中航空器的安全；或

（e） 传送他明知是虚假的情报，从而危及飞行中的航空器的安全。

2. 任何人如果他从事下述行为，也是犯有罪行：

（a） 企图犯本条第1款所指的任何罪行；或

（b） 是犯有或企图犯任何此种罪行的人的同犯。

8．《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第二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所谓“种族隔离的罪行”，应包括与南部非洲境内所推行的类似的种族分离和种族歧视的政策和办法，是指为建立和维持一个种族团体对任何其他种族团体的主宰地位，并且有计划地压迫他们而作出的下列不人道行为：

（a） 用下列方式剥夺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一个或一个以上成员的生命和人身自由的权利：

（一）杀害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

（二） 使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受到身体上或心理上的严重伤害，侵犯他们的自由或尊严，或者严刑拷打他们或使他们受残酷、不人道或屈辱的待遇或刑罚；

（三） 任意逮捕和非法监禁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

（b） 对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故意加以旨在使其全部或局部灭绝的生活条件；

（c） 任何立法措施及其他措施，旨在阻止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参与该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者，以及故意造成条件，以阻止一个或一个以上这种团体的充分发展，特别是剥夺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工作的权利、组织已获承认的工会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离开和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享有国籍的权利、自由迁移和居住的权利、自由主张和表达的权利以及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权利；

（d） 任何措施，包括立法措施，旨在用下列方法按照种族界线分化人民者：为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建立单独的保留区或居住区，禁止不同种族团体的成员互相通婚，没收属于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或其成员的地产；

（e） 剥削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的劳力，特别是强迫劳动；

（f） 迫害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或个人，剥夺其基本权利和自由。

９．《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  
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第２条

1. 每一缔约国应将下列罪行定为其国内法上的罪行，即故意：

（a） 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进行谋杀、绑架、或其他侵害其人身或自由的行为；

（b） 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公用馆舍、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进行暴力攻击，因而可能危及其人身或自由；

（c） 威胁进行任何这类攻击；

（d） 企图进行任何这类攻击；

（e） 参与任何这类攻击为从犯。

2. 每一缔约国应按照这类罪行的严重性处以适当的惩罚。

3. 本条第1款及第2款并不在任何方面减除缔约国依据国际法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防止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人身、自由或尊严受其他侵害的义务。

10．《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第1条

1. 任何人如劫持或扣押并以杀死、伤害或继续扣押另一个人（以下称“人质”）为威胁，以强迫第三方，即某个国家、某个国际政府间组织、某个自然人或法人或某一群人，作或不作某种行为，作为释放人质的明示或暗示条件，即为犯本公约意义范围内的劫持人质罪行。

2. 任何人；

（a） 图谋劫持人质；或

（b） 与实行或图谋劫持人质者同谋而参与其事；

也同样犯有本公约意义下的罪行。

11．《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第1条

1. 为本公约的目的，“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内。

2. 本条规定并不妨碍载有或可能载有适用范围较广的规定的任何国际文书或国家法律。

……

第4条

1. 每一缔约国应保证将一切酷刑行为定为刑事罪行。该项规定也应适用于施行酷刑的企图以及任何人合谋或参与酷刑的行为。

2. 每一缔约国应根据上述罪行的严重程度，规定适当的惩罚。

12．《制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

第3条

1. 任何人如果非法地和故意地从事下述行为，即是犯有罪行：

（a） 用暴力或用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恐吓方式，劫持或控制某一船舶；或

（b） 对船上人员从事暴力行为，如该行为将会危及该船舶的安全航行；或

（c） 破坏船舶或对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造成损坏，从而将会危及该船舶的安全航行；或

（d） 用任何方法在船上放置或使别人放置一种将会破坏该船舶或对该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造成损坏而危及或将会危及该船舶的航行安全的装置或物质；或

（e） 破坏或严重损坏航海设施或妨碍其工作，如任何此种行为将会危及船舶的安全航行；或

（f） 传送他明知是虚假的情报，从而危及船舶的安全航行；或

（g） 在犯下或企图犯下（a）至（f）分款所列的任何罪行过程中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或将任何人杀害。

2. 凡是从事下述行为的，也属犯有罪行：

（a） 企图犯第1款所列的任何罪行；或

（b） 唆使任何人犯下第一款所列的任何罪行或是犯有此种罪行者的同犯；或

（c） 正如国内法所涉及的，不论有无缘由，为了强迫一自然人或法人作或不作任何行为，以犯第1款（b）、（c）和（e）分款所列的任何罪行相威胁，如此种威胁将会危及所涉船舶的安全航行。

13．《禁止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的  
非法行为议定书》

第2条

1. 凡是非法地和故意地从事下述行为的，即属犯有罪行：

（a） 用暴力或用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恐吓方式，劫持或控制一固定平台；或

（b） 对固定平台上的人员从事暴力行为，如该行为将会危及该平台的安全；或

（c） 破坏固定平台或对其造成损坏，从而将会危及平台的安全；或

（d） 用任何方法在固定平台上放置或使别人放置一种将会破坏该固定平台或危及该平台的安全的装置或物质；或

（e） 在犯下或企图犯下（a）至（d）分款所列的任何罪行过程中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或将任何人杀害。

2. 凡是从事下述行为的，也属犯有罪行：

（a） 企图犯第1款所列的任何罪行；或

（b） 唆使任何人犯下任何此类罪行或是犯有此种罪行者的同犯；或

（c） 正如国内法所涉及的，不论有无缘由，为了强迫一自然人或法人作或不作任何行为，以犯下第1款（b）和（c）分款所列的任何罪行相威胁，如此种威胁将会危及固定平台的安全。

14．《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第2条

公约的范围

1. 本公约的宗旨是促进缔约国之间的合作，使它们可以更有效地对付国际范围的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各个方面。缔约国在履行其按本公约所承担的义务时，应根据其国内立法制度的基本规定，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立法和行政措施。

2. 缔约国应以符合各国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方式履行其按本公约所承担的义务。

3. 任一缔约国不得在另一缔约国的领土内行使由该另一缔约国国内法律规定完全属于该国当局的管辖权和职能。

第3条

犯罪和制裁

1. 各缔约国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将下列故意行为确定为其国内法中的刑事犯罪：

（a） （一） 违反《1961年公约》、经修正的《1961年公约》或《1971年公约》的各项规定，生产、制造、提炼、配制、提供、兜售、分销、出售、以任何条件交付、经纪、发送、过境发送、运输、进口或出口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

（二） 违反《1961年公约》和经修正的《1961年公约》的各项规定，为生产麻醉药品而种植罂粟、古柯或大麻植物；

（三） 为了进行上述（一）目所列的任何活动，占有或购买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

（四） 明知其用途或目的是非法种植、生产或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而制造、运输或分销设备、材料或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

（五） 组织、管理或资助上述（一）、（二）、（三）或（四）目所列的任何犯罪；

（b） （一） 明知财产得自按本款（a）项确定的任何犯罪或参与此种犯罪的行为，为了隐瞒或掩饰该财产的非法来源，或为了协助任何涉及此种犯罪的人逃避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而转换或转让该财产；

（二） 明知财产得自按本款（a）项确定的犯罪或参与此种犯罪的行为，隐瞒或掩饰该财产的真实性质、来源、所在地、处置、转移、相关的权利或所有权；

（c） 在不违背其宪法原则及其法律制度基本概念的前提下：

（一） 在收取财产时明知财产得自按本款（a）项确定的犯罪或参与此种犯罪的行为而获取、占有或使用该财产；

（二） 明知其被用于或将用于非法种植、生产或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而占有设备、材料或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

（三） 以任何手段公开鼓动或引诱他人去犯按照本条确定的任何罪行或非法使用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

（四） 参与进行，合伙或共谋进行，进行未遂，以及帮助、教唆、便利和参谋进行按本条确定的任何犯罪。

（E） 附录三

常设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可能方式概要

1. 常设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方式必须与建立法院所采用的方法联系起来考虑。

2. 在这方面可作两种假设：（a）法院成为联合国有机构成的一部分；（b）法院不成为联合国有机构成的一部分。

A．法院成为联合国有机构成的一部分

3. 在这一假设下，作为其建立行为本身的结果，法院已经与联合国建立起关系。做到这一点有两种途径：

1．法院是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机构

4. 这一办法将最大程度地重视法院的建立，将法院置于与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特别是国际法院同等的地位。该办法还将便利法院依法对某些国际罪行进行管辖。根据这一办法，法院所需资金将在联合国经常预算下提供。

5. 另一方面，此种办法会遇到潜在的障碍，因为这需按《联合国宪章》第十八章（第一百零八-一百零九条）修正《宪章》。应当指出，在这方面，联合国历史上尚无增设任何主要机构的先例。

2．法院是联合国的一个附属机构

6. 相反，目前有一项完善的做法，即联合国主要机构根据《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九条）建立附属机构，以便履行《宪章》赋予这些机构或整个联合国组织的职责。在这方面甚至在司法管辖领域已有惯例。一个较早的例子是设立了联合国行政法院。[[891]](#footnote-891)a一个较近的例子是设立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国际法庭（以下称“国际法庭”）。[[892]](#footnote-892)b

7. 通常来说以及就大部分权限而言，所设立的附属机构主要起辅助作用。附属机构的决定通常具有建议性质，有关的主要机构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8. 但在司法领域，一个机构的附属性质主要表现在这一点上，即其本身的存在及其职能的停止均取决于本组织相关的主要机构。然而就行使职能而言，后者的性质（司法性质）使这些职能与设立法院或法庭的主要机构的等级权力的存在不相一致。因此，主要机构无权不接受或修改所设的法庭或法院的裁决。国际法院在联合国行政法庭问题上对此作了明确裁定，[[893]](#footnote-893)c国际法庭的规约中有些条款也表明了这一点（第13、15、25、26条等）。[[894]](#footnote-894)d

9. 关于所需资金问题，联合国组织附属机构的活动所需资金由联合国方面提供，供资方式预算拨款、分摊会费和自愿捐款均可。[[895]](#footnote-895)e

10. 应当指出，有时，大会是依照在联合国以外缔结的条约所载的条款设立法庭，将其作为附属机构的。利比亚问题的联合国法庭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的联合国法庭。就是这种情况。[[896]](#footnote-896)f虽然这两个法庭所处理的问题从广义上讲属于大会在《联合国宪章》第十条之下的总权限的一部分，但导致设立这两个法庭的规定却载于《对意大利和约》附件十一第3段。

11. 前段提到的情形应当与下文第15至17段提到的情形区别开来，在这几段提到的情形中，大会对由一多边条约各缔约方设立的机构承担某些职责。

B. 法院不成为联合国有机构成的  
一部分而系根据一条约设立

12. 按照这一假设，法院将根据一项对缔约国有约束力的条约而设立。可由两种办法使此种法院与联合国建立关系：（一）通过该法院和联合国之间的一项协定；（二）通过一联合国机构（如大会）的一项决议。

1. 法院通过它和联合国之间的  
协定同联合国建立关系

13. 合作协定是专门机构及类似机构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七条和第六十三条同联合国建立关系的典型方式。有关专门机构可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缔结协定，但须经大会批准。这类协定除其他外，管理各专门机构在各自行动领域与联合国合作的事宜和人事政策方面与共同制度有关的问题。各专门机构均为一自主的国际组织，有自己的预算和资金。

14. 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897]](#footnote-897)g关于“同其他组织的关系”的第十六条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该条规定，理事会在经机构大会同意的情况下有权缔结一项或数项协定，据以使机构与联合国以及其工作与机构的工作相关的任何其他组织建立恰当的关系。大会[[898]](#footnote-898)h批准了关于机构同联合国建立关系的协定。这项协定除其他外，对机构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交换信息和文件、互派代表事宜、审议各自议程上的有关项目、与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院的合作、协调与合作事宜、预算和财务安排以及人员安排等作了规定。

15. 同联合国缔结一项国际协定也是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为促使计划中的法庭同联合国建立关系而正在设想采用的方式。这一协定的最后草案[[899]](#footnote-899)i除其他外所设想的问题包括：法律关系和相互承认、合作与协调、同国际法院的关系、同安全理事会的关系、互派代表、交流资料和文件、向联合国提出报告、行政合作以及人事安排。该协定草案中还认识到“宜同联合国建立密切的预算及财政关系，以使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的行政活动以最有效和尽可能节省的方式进行，并在这些行政活动方面求得最大程度的协调和统一”。

2. 法庭因联合国某机关的决议而与联合国产生关系

16. 最后，一项多边条约设立的法院也可能因联合国某机关的一项决议而与联合国产生关系。就常设国际刑事法院而言，此种决议可由大会通过，或许由安全理事会同时参与。

17. 条约机构因大会一项决议而与联合国产生关系的最贴切实例来自人权保护领域的国际实践。典型的情况是，设立某机构的条约本身就订有一些关于为履行条约下的某些职能而求助于联合国组织的规定：例如，请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向缔约国分发与条约机构选举有关的邀请、请联合国秘书长为条约机构有效履行职能提供必要的人员和便利等等。联合国则在大会对有关多边公约予以“通过、开放供签署和批准”的决议中表示承担这类职能。遵照上述程序行事的例子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18. 这类决议的通过一般都会对联合国引起经费问题，这就需要第五委员会在决策过程中出面过问。以人权事务委员会为例，《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36条规定，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委员会提供必要的工作人员和便利，使能有效执行本盟约所规定的委员会的职责，

第35条还规定，

委员会在获得联合国大会的同意时，可以按照大会鉴于委员会责任的重要性而决定的条件从联合国经费中领取薪俸。

19. 设立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设立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都规定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和便利）应由联合国秘书长提供（分别见第10条第3-4款和第18条第3款），尽管《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8条第5款同时规定，

5. 缔约各国应负责支付缔约国以及委员会举行会议的费用，包括偿付联合国……所承付的提供工作人员和设施等任何费用……

不过，这两项公约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同的是规定缔约国而不是联合国承担委员会委员履行委员职务时的费用（分别见第8条第6款和第17条第7款）。

20. 实际上，联合国对条约设立的此类委员会承担的义务可能超过有关条约本身的规定。例如，大会第47/111号决议，

9. 赞同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修正，并请秘书长：

（a） 采取适当措施，自1994-1995两年期预算开始，从联合国经常预算中为根据这两项公约设立的委员会提供经费；

9. 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900]](#footnote-900)\*

序 言

考虑到国家继承引起的国籍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强调国籍问题基本上由国内法在国际法规定的限制范围内加以管辖，

确认在有关国籍问题的事项上，应该适当兼顾国家和个人的正当利益，

回顾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901]](#footnote-901)a中宣布：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又回顾1966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902]](#footnote-902)b和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903]](#footnote-903)c确认每个儿童有权取得国籍，

强调必须充分尊重其国籍可能受到国家继承影响的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铭记1961年《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904]](#footnote-904)d1978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905]](#footnote-905)e和1983年《关于国家对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906]](#footnote-906)f

深信需要编纂和逐渐发展关于国家继承涉及的国籍问题的国际法规则，作为增进国家和个人的法律保障的手段。

第一部分 一般规定

第1条

取得国籍的权利

在国家继承之日具有先前国国籍的每一个人，不论其取得该国籍的方式为何，均有权根据本条款取得至少一个有关国家的国籍。

第2条

用 语

为本条款的目的：

（a） “国家继承”指一国对领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由另一国取代；

（b） “先前国”指发生国家继承时被另一国取代的国家；

（c） “继承国”指发生国家继承时取代另一国的国家；

（d） “有关国家”按情况指先前国或继承国；

（e） “第三国”指除先前国和继承国以外的国家；

（f） “有关的人”指在国家继承之日具有先前国的国籍，其国籍可能受到国家继承影响的每一个人；

（g） “国家继承之日”指先前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由继承国取代的日期。

第3条

适用本条款的国家继承情况

本条款只适用于依照国际法——特别是依照《联合国宪章》体现的国际法原则发生的国家继承的效果。

第4条

防止无国籍状态

有关国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在国家继承之日具有先前国国籍的人由于国家继承而成为无国籍。

第5条

国籍的推定

在本条款的规定的限制下，惯常居所在受国家继承影响的领域内的有关的人，应被推定在国家继承之日取得继承国国籍。

第6条

国籍和其他相关问题的立法

每个有关国家应无不当拖延，就国家继承中引起的国籍和其他相关问题制定符合本条款规定的立法。每个有关国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有关的人在合理期间内获知这种立法对其国籍的影响，可以根据这种立法作出的选择，以及作出的选择将对其地位产生的后果。

第7条

生效日期

如果有关的人在国家继承之日至赋予或获得国籍这段期间可能成为无国籍，国家继承中赋予的国籍，以及因行使选择权而获得的国籍，应在国家继承之日生效。

第8条

惯常居所在另一国的有关的人

1. 如果有关的人的惯常居所在另一国，并且具有该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国籍，继承国没有义务赋予本国国籍。

2. 继承国不得违反在另一国有惯常居所的有关的人的意愿，赋予本国国籍，除非不这样他们会成为无国籍。

第9条

以放弃另一国国籍作为赋予国籍的条件

如果一个有关的人有资格取得继承国国籍，但又具有另一有关国家的国籍，则继承国可以要求该人放弃该另一国的国籍，才赋予国籍。但适用这一要求的方式不应导致有关的人成为无国籍，即使只是暂时的无国籍。

第10条

自愿取得另一国国籍后国籍的丧失

1. 先前国可以规定，在国家继承中自愿取得继承国国籍的有关的人，丧失先前国国籍。

2. 继承国可以规定，在国家继承中自愿取得另一继承国国籍或在某些情况下保留先前国国籍的有关的人，丧失在这一国家继承中取得的该国国籍。

第11条

尊重有关的人的意愿

1. 在有关的人有资格取得两个或多个有关国家国籍的情形下，有关国家应当考虑到该人的意愿。

2. 如果有关的人可能因国家继承而成为无国籍，每一有关国家应当给予与该国有适当联系的任何有关的人选择其国籍的权利。

3. 有选择权的人行使这一权利后，被选择国籍国应将国籍赋予这些人。

4. 有选择权的人行使这一权利后，被放弃国籍国应取消其国籍，除非这些人会因而变成无国籍。

5. 有关国家应为选择权的行使规定一个合理的期限。

第12条

家庭团聚

如果在国家继承中取得或丧失国籍会损害一个家庭的团聚，有关国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使该家庭得以留在一起或团聚。

第13条

国家继承以后出生的子女

有关的人的子女在国家继承之日以后出生，没有取得任何国籍的，有权取得该子女在其领域内出生的有关国家的国籍。

第14条

惯常居民的地位

1. 有关的人作为惯常居民的地位不应受到国家继承的影响。

2. 有关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因为与国家继承有关的事件而被迫离开在该国领域内的惯常居所的有关的人得以返回其惯常居所。

第15条

不歧视

有关国家不得以基于任何理由的歧视，剥夺有关的人在国家继承中保留或取得国籍的权利或作出选择的权利。

第16条

禁止在国籍问题上任意作决定

不得任意剥夺有关的人的先前国国籍，也不得任意拒绝给予他们在国家继承中享有的权利，即取得继承国国籍的权利或任何选择权。

第17条

处理国籍问题的程序

处理在国家继承中取得、保留或放弃国籍或者行使选择权的有关申请，应无不当拖延。有关决定应以书面发出，并可请求对其进行有效的行政或司法复核。

第18条

交换资料、协商和谈判

1. 有关国家应交换资料和进行协商，以便查明国家继承对有关的人的国籍和涉及其地位的其他相关问题所产生的任何不利影响。

2. 有关国家应于必要时设法消除或减轻这种不利影响，为此进行谈判并酌情商定协议。

第19条

其他国家

1. 本条款中的任何规定均不要求各国把与某一有关国家没有任何有效联系的有关的人视为该国国民，除非这一做法会导致这些人被视为相当于无国籍人。

2. 本条款中的任何规定均不阻止各国把由于国家继承而成为无国籍的有关的人视为有资格取得或保留有关国家国籍的国民，但这种做法须有利于有关的人。

第二部分

涉及特定类别国家继承的规定

第1节 领域部分转让

第20条

赋予继承国国籍和取消先前国国籍

如果一国将其部分领域转让给另一国，继承国应将其国籍赋予惯常居所在被转让领域内的有关的人，先前国则应取消这些人的国籍，除非这些人行使了他们应有的选择权而另有表示。但先前国不应在有关的人取得继承国国籍以前取消先前国国籍。

第2节 国家统一

第21条

赋予继承国国籍

在第8条规定的限制下，当两个或多个国家合并组成一个继承国时，无论继承国是一个新国家，还是在特性上与合并的国家之一完全相同，继承国都应将其国籍赋予所有在国家继承之日具有某一先前国国籍的人。

第3节 国家解体

第22条

赋予继承国国籍

在一个国家解体，不复存在，先前国领域的不同部分形成两个或多个继承国的情况下，除非有关的人行使选择权而另有表示，每一继承国应将其国籍赋予：

（a） 惯常居所在其领域内的有关的人；和

（b） 在第8条规定的限制下：

（一） 不适用（a）项，但与成为该继承国一部分的先前国某一组成单位有适当法律联系的有关的人；

（二） 没有资格按照（a）项和（b）项（一）目取得任何有关国家的国籍，惯常居所在第三国的有关的人，如果有关的人在成为该继承国领域的地方出生，或在离开先前国以前最后惯常居所在成为继承国领域的地方，或与该继承国有任何其他适当联系。

第23条

由继承国给予选择权

1. 各继承国应将选择权给予适用第22条的规定，有资格取得两个或多个继承国国籍的有关的人。

2. 每一继承国应将选择其国籍的权利给予不适用第22条规定的有关的人。

第4节 领域一个或多个部分的分离

第24条

赋予继承国国籍

如果一个国家领域的一个或多个部分从该国分离而形成一个或多个继承国，在先前国继续存在的情况下，除非有关的人行使选择权而另有表示，继承国应将其国籍赋予：

（a） 惯常居所在其领域内的有关的人；和

（b） 在第8条规定的限制下：

（一） 不适用（a）项，但与成为该继承国一部分的先前国某一组成单位有适当法律联系的有关的人；

（二） 没有资格按照（a）项和（b）项（一）目取得任何有关国家的国籍，惯常居所在第三国的有关的人，如果有关的人在成为继承国领域的地方出生，或在离开先前国以前最后惯常居所在成为继承国领域的地方，或与该继承国有任何其他适当联系。

第25条

取消先前国国籍

1. 先前国应取消按照第24条有资格取得继承国国籍的有关的人的国籍，但不应在有关的人取得继承国国籍以前取消先前国国籍。

2. 除非有关的人行使选择权而另有表示，在下列情况下，先前国不应取消第1款所指的人的国籍：

（a） 该人的惯常居所在其领域内；

（b） 不适用（a）项，但该人与仍然为先前国一部分的先前国某一组成单位有适当法律联系；

（c） 该人的惯常居所在第三国，但在仍然为先前国领域的地方出生，或在离开先前国以前最后惯常居所在仍然为先前国领域的地方，或与该国有任何其他适当联系。

第26条

由先前国和继承国给予选择权

先前国和继承国应将选择权给予第24条和第25条第2款规定所涉及，有权得到先前国和继承国国籍或者两个或多个继承国国籍的有关的人。

10.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907]](#footnote-907)\*

第一部分

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1条

一国对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一国的每一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

第2条

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

一国国际不法行为在下列情况下发生：

（a） 由作为或不作为构成的行为依国际法归于该国；并且

（b） 该行为构成对该国国际义务的违背。

第3条

把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

在把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时须遵守国际法。这种定性不因国内法把同一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而受到影响。

第二章 把行为归于一国

第4条

一国的机关的行为

1. 任何国家机关，不论行使立法、行政、司法职能，还是任何其他职能，不论在国家组织中具有何种地位，也不论作为该国中央政府机关或一领土单位机关而具有何种特性，其行为应视为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

2. 机关包括依该国国内法具有此种地位的任何个人或实体。

第5条

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的行为

虽非第4条所指的国家机关但经该国法律授权而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其行为应视为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但以该个人或实体在特定情况下以此种资格行事者为限。

第6条

由另一国交由一国支配的机关的行为

由另一国交由一国支配的机关，若为行使支配该机关的国家权力要素而行事，其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支配该机关的国家的行为。

第7条

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

国家机关或经授权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若以此种资格行事，即使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其行为仍应视为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

第8条

受到国家指挥或控制的行为

如果一人或一群人实际上是在按照国家的指示或在其指挥或控制下行事，其行为应视为国际法所指的一国的行为。

第9条

正式当局不存在或缺席时实施的行为

如果一人或一群人在正式当局不存在或缺席和在需要行使上述权力要素的情况下实际上正在行使政府权力要素，其行为应视为国际法所指的一国的行为。

第10条

叛乱运动或其他运动的行为

1. 成为一国新政府的叛乱运动的行为应视为国际法所指的该国的行为。

2. 在一个先已存在的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或其管理下的某一领土内组成一个新的国家的叛乱运动或其他运动的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该新国家的行为。

3. 本条不妨碍把不论以何种方式涉及有关运动的、按照第4条至第9条的规定应视为该国行为的任何行为归于该国。

第11条

经一国确认并当作其本身行为的行为

按照前述各条款不归于一国的行为，在并且只在该国承认和当作其本身行为的行为的情况下，依国际法应视为该国的行为。

第三章 违背国际义务

第12条

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

一国的行为如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即为违背国际义务，而不论该义务的起源或特性为何。

第13条

对一国为有效的国际义务

一国的行为不构成对一国际义务的违背，除非该行为是在该义务对该国有约束力的时期发生。

第14条

违背义务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

1. 没有持续性的一国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行为发生的时刻即为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即使其影响继续存在。

2. 有持续性的一国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行为延续的时间为该行为持续、并且一直不遵守该国际义务的整个期间。

3. 一国违背要求它防止某一特定事件之国际义务的行为开始于该事件发生的时刻，该行为延续的时间为该事件持续、并且一直不遵守该义务的整个期间。

第15条

一复合行为违背义务

1. 一国通过被一并定义为不法行为的一系列作为和不作为违背国际义务的情事，发生于一作为和不作为发生的时刻，该作为和不作为连同其他的作为和不作为看待，足以构成不法行为。

2. 在上述情况下，该违背义务行为延续的时间为一系列作为和不作为中的第一个开始发生到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并且一直不遵守该国国际义务的整个期间。

第四章 一国对另一国行为的责任

第16条

援助或协助实施一国际不法行为

援助或协助另一国实施其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应该对此种行为负责国际责任，如果：

（a） 该国在知道该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下这样做；而且

（b） 该行为若由该国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第17条

指挥或控制一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

指挥或控制另一国实施其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应该对该行为负国际责任，如果：

（a） 该国在知道该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下这样做；而且

（b） 该行为若由该国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第18条

胁迫另一国

胁迫另一国实施一行为的国家应该对该行为负国际责任，如果：

（a） 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该行为仍会是被胁迫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且

（b） 胁迫国在知道该胁迫行为的情况下这样做。

第19条

本章的效力

本章不妨碍实施有关行为的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根据这些条款的其他规定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第五章 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

第20条

同 意

一国以有效方式表示同意另一国实施某项特定行为时，该特定行为的不法性在与该国家的关系上即告解除，但以该行为不逾越该项同意的范围为限。

第21条

自卫

一国的行为如构成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的合法自卫措施，该行为的不法性即告解除。

第22条

对一国际不法行为采取的反措施

一国不遵守其对另一国国际义务的行为，在并且只在该行为构成按照第三部分第二章针对该另一国采取的一项反措施的情况下，其不法性才可解除。

第23条

不可抗力

1. 一国不遵守其对另一国国际义务的行为如起因于不可抗力，即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该国无力控制、无法预料的事件发生，以至该国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不可能履行义务，该行为的不法性即告解除。

2. 在下列情况下第1款不适用：

（a） 不可抗力的情况是由援引此种情况的国家的行为单独导致或与其他因素一并导致；或

（b） 该国已承担发生这种情况的风险。

第24条

危 难

1. 就一国不遵守该国国际义务的行为而言，如有关行为人在遭遇危难的情况下为了挽救其生命或受其监护的其他人的生命，除此行为之外，别无其他合理方法，该行为的不法性即告解除。

2. 在下列情况下第1款不适用：

（a） 危难情况是由援引此种情况的国家的行为单独导致或与其他因素一并导致；或

（b） 有关行为可能造成类似的或更大的灾难。

第25条

危急情况

1. 一国不得援引危急情况作为理由解除不遵守该国某项国际义务的行为的不法性，除非：

（a） 该行为是该国保护基本利益，对抗某项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而且

（b） 该行为并不严重损害作为所负义务对象的一国或数国或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利益。

2. 一国不得在以下情况下援引危急情况作为解除其行为不法性的理由：

（a） 有关国际义务排除援引危急情况的可能性；或

（b） 该国促成了该危急情况。

第26条

对强制性规范的遵守

违反一般国际法某一强制性规范所产生的义务的一国，不得以本章中的任何规定作为解除其任何行为之不法性的理由。

第27条

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后果

根据本章援引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不妨碍：

（a） 在并且只在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不再存在时遵守该项义务；

（b） 对该行为所造成的任何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

第二部分

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28条

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一国依照第一部分的规定对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产生本部分所列的法律后果。

第29条

继续履行的责任

本部分所规定的一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影响责任国继续履行所违背义务的责任。

第30条

停止和不重复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有义务：

（a） 在从事一项持续性的不法行为时，停止该行为；

（b） 在必要情况下，提供不重复该行为的适当承诺和保证。

第31条

赔偿

1. 责任国有义务对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供充分赔偿。

2. 损害包括一国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害，无论是物质损害还是精神损害。

第32条

与国内法无关

责任国不得以其国内法的规定作为不能按照本部分的规定遵守其义务的理由。

第33条

本部分所列国际义务的范围

1. 本部分规定的责任国义务可能是对另一国、若干国家、或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具体取决于该国际义务的特性和内容及违反义务的情况。

2. 本部分不妨碍任何人或国家以外的实体由于一国的国际责任可能直接取得的任何权利。

第二章 赔偿损害

第34条

赔偿方式

对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充分赔偿，应按照本章的规定，单独或合并地采取恢复原状、补偿和抵偿的方式。

第35条

恢复原状

在并且只在下列情况下，一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有义务恢复原状，即恢复到实施不法行为以前所存在的状况：

（a） 恢复原状并非实际上办不到的；

（b） 从恢复原状而不要求补偿所得到的利益不致与所引起的负担完全不成比例。

第36条

补 偿

1. 一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有义务补偿该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害，如果这种损害没有以恢复原状的方式得到赔偿。

2. 这种补偿应该弥补在经济上可以评估的任何损害，包括可以确定的利润损失。

第37条

抵 偿

1. 一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有义务抵偿该行为造成的损失，如果这种损失不能以恢复原状或补偿的方式得到赔偿。

2. 抵偿可采取承认不法行为、表示遗憾、正式道歉，或另一种合适的方式。

3. 抵偿不应与损失不成比例，而且不得采取羞辱责任国的方式。

第38条

利 息

1. 为确保充分赔偿，必要时，应支付根据本章所应支付的任何本金金额的利息。应为取得这一结果规定利率和计算方法。

2. 利息应从支付本金金额之日起算，至履行了支付义务之日为止。

第39条

促成损害

在确定赔偿时，应考虑到提出索赔的受害国或任何人或实体由于故意或疏忽以作为或不作为促成损害的情况。

第三章 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  
规范承担的义务

第40条

本章的适用

1. 本章适用于一国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所产生的国际责任。

2. 如果这种违约情况是由于责任国严重或系统性违约所引起的，则为严重违约行为。

第41条

严重违背依本章承担的一项义务的特定后果

1. 各国应进行合作，通过合法手段制止第40条含义范围内的任何严重违背义务行为。

2. 任何国家均不得承认第40条含义范围内的严重违背义务行为所造成的情况为合法，也不得协助或援助保持该状况。

3. 本条不妨碍本部分所指的其他后果和本章适用的违背义务行为可能依国际法引起的进一步的此类后果。

第三部分

一国国际责任的履行

第一章 一国责任的援引

第42条

一受害国援引责任

一国有权在下列情况下作为受害国援引另一国的责任：

（a） 被违背的义务是个别地对它承担的义务；或

（b） 被违背的义务是对包括该国在内的一国家集团或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而

（一） 对此义务的违背特别影响该国；或

（二） 彻底改变了由于该项义务被违背而受到影响的所有其他国家对进一步履行该项义务的立场。

第43条

一受害国通知其要求

1. 援引另一国责任的受害国应将其要求通知该国。

2. 受害国可具体指明：

（a） 从事一项持续性不法行为的责任国应如何停止该行为；

（b） 应根据第二部分的规定采取哪种赔偿形式。

第44条

可否提出要求

在下列情况下不得援引另一国的责任：

（a） 不是按照涉及国籍的任何可适用的规则提出要求；

（b） 该项要求适用用尽当地补救办法规则，却未用尽可利用的有效当地补救办法。

第45条

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

在下列情况下不得援引另一国的责任：

（a） 受害国已以有效方式放弃要求；

（b） 受害国基于其行为应被视为已以有效方式默许其要求失效。

第46条

数个受害国

在数个国家由于同一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害的情况下，每一受害国可分别援引实施了该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的责任。

第47条

数个责任国

1. 在数个国家应为同一国际不法行为负责任的情况下，可对每一国家援引涉及该行为的责任。

2. 第1款：

（a） 不允许任何受害国取回多于所受损失的补偿；

（b） 不妨碍对其他责任国的任何追索权利。

第48条

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援引责任

1. 受害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有权按照第2款在下列情况下对另一国援引责任：

（a） 被违背的义务是对包括该国在内的一国家集团承担的、为保护该集团的集团利益而确立的义务；或

（b） 被违背的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

2. 有权按照第1款援引责任的任何国家可要求责任国：

（a） 按照第30条的规定，停止国际不法行为，并提供不重复的承诺和保证；和

（b） 按照前几条中的规定履行向受害国或被违背之义务的受益人提供赔偿的义务。

3. 受害国根据第43条、第44条和第45条援引责任的必要条件，适用于有权根据第1款对另一国援引责任的国家援引责任的情况。

第二章 反措施

第49条

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

1. 一受害国只在为促使一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依第二部分履行其义务时，才可对该国采取反措施。

2. 反措施限于暂不履行对责任国采取措施的一国的国际义务。

3. 反措施应尽可能容许恢复履行有关义务。

第50条

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

1. 反措施不得影响下列义务：

（a） 《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不得实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义务；

（b） 保护基本人权的义务；

（c） 禁止报复的人道主义性质的义务；

（d） 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其他义务。

2. 采取反措施的国家仍应履行其下列义务：

（a） 实行它与责任国之间任何可适用的现行解决争端程序；

（b） 尊重外交或领事人员、馆舍、档案和文件之不可侵犯性。

第51条

相称

反措施必须和所遭受的损害相称，并应考虑到国际不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和有关权利。

第52条

与采取反措施有关的条件

1. 一受害国在采取反措施以前应：

（a） 根据第43条要求责任国按照第二部分的规定履行其义务；

（b） 将采取反措施的任何决定通知责任国并提议与该国进行谈判。

2. 虽有第1款（b）项的规定，受害国可采取必要的紧急反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3. 在下列情况下不得采取反措施，如已采取，务必停止，不得无理拖延；

（a） 国际不法行为已经停止；并且

（b） 已将争端提交有权作出对当事国具有约束力之决定的法院或法庭。

4. 若责任国不秉诚履行解决争端程序，第3款即不适用。

第53条

终止反措施

一旦责任国按照第二部分履行其与国际不法行为有关的义务，即应尽快终止反措施。

第54条

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反措施

本章不妨碍依第48条第1款有权援引另一国责任的任何国家，对该另一国采取合法措施以确保停止该违背义务行为和使受害国和被违背之该义务的受益人得到赔偿。

第四部分

一般规定

第55条

特别法

在并且只在一国际不法行为的存在条件或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或履行应由国际法特别规则规定的情况下，不得适用本条款。

第56条

本条款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国家责任问题

在本条款中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关于一国对一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问题，仍应遵守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

第57条

国际组织的责任

本条款不影响一国际组织依国际法承担的，或任何国家对一国际组织的行为责任的任何问题。

第58条

个人的责任

本条款不影响以国家名义行事的任何人在国际法中的个人责任问题。

第59条

《联合国宪章》

本条款不妨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11. 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908]](#footnote-908)\*

缔约各国，

铭记《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其中规定大会应发动研究，并作成建议，以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

考虑到各国对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的自然资源具有永久主权原则，

也考虑到各国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进行或许可进行活动的自由并非是无限制的，

回顾1992年6月13日《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

认识到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兹议定如下：

第1条

范 围

本条款适用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其有形后果有造成重大越境损害的危险的活动。

第2条

用 语

为本条款的目的：

（a） “造成重大越境损害的危险”包括造成重大越境损害的可能性较大和造成灾难性越境损害的可能性较小的危险；

（b） “损害”指对人、财产或环境造成的损害；

（c） “越境损害”指在起源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造成的损害，不论各当事国是否有共同边界；

（d） “起源国”指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计划进行或进行第1条所指活动的国家；

（e） “可能受影响国”指在其领土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有可能发生重大越境损害的国家；

（f） “当事国”指起源国和可能受影响国。

第3条

预 防

起源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预防重大的越境损害或随时尽量减少这种危险。

第4条

合 作

当事国应真诚合作，并于必要时要求一个或多个有关国际组织提供协助，以预防重大越境损害或随时尽量减少这种危险。

第5条

履 行

当事国应采取必要的立法、行政或其他行动，包括建立适当的监督机制，以履行本条款的规定。

第6条

核 准

1. 在下述情形下，须经起源国的事前核准：

（a） 在其境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进行的属本条款范围的活动；

（b） 上文（a）项所述活动的任何重大改变；

（c） 计划作出可能使某项活动转变为属本条款范围之活动的改变。

2. 一国的核准要求亦应适用于属本条款范围的所有在核准前已进行的活动。应审查已由该国签发的有关先前已存在的活动的核准，以确保它符合本条款。

3. 在核准的条件没有获得遵守的情况下，起源国应采取适当行动，包括于必要时撤销核准。

第7条

危险的评估

是否核准属本条款范围的某项活动，应特别根据该项活动可能造成的越境损害的评估，包括任何环境影响评估，作出决定。

第8条

通知和资料

1. 如果第7条所指的评估表明有造成重大越境损害的危险，起源国应及时将该危险和评估通知可能受影响国，并应向其递交评估工作所依据的现有技术和所有其他有关资料。

2. 起源国在收到可能受影响国于不超过六个月的期间内提出的答复以前，不应就是否核准该项活动作出任何决定。

第9条

关于预防措施的协商

1. 各当事国在其中任何一国提出要求时，应进行协商，以期为预防重大越境损害或随时尽量减少这种危险所须采取的措施达成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当事国应在这类协商开始时，就协商的合理时限达成协议。

2. 当事国应参照第10条寻求基于公平利益均衡的解决办法。

3. 如果第1款所指协商未能取得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起源国如果决定核准从事该项活动，也应考虑到可能受影响国的利益，但不得妨碍任何可能受影响国的权利。

第10条

公平利益均衡所涉及的因素

为了达到第9条第2款所提到的公平利益均衡，当事国应考虑到所有有关因素和情况，包括：

（a） 重大越境损害的危险程度以及有办法预防损害，或者尽量减少这种危险或补救损害的程度；

（b） 有关活动的重要性，考虑到该活动在社会、经济和技术上为起源国带来的总利益和它对可能受影响国造成的潜在损害；

（c） 对环境产生重大损害的危险，以及是否有办法预防这种损害，或者尽量减少这种危险或恢复环境；

（d） 起源国和酌情可能受影响国愿意承担预防费用的程度；

（e） 该活动的经济可行性，考虑到预防费用和在别处开展活动或以其他手段开展活动或以其他活动取代该项活动的可能性；

（f） 可能受影响国对同样或可比较的活动所适用的预防标准以及可比较的区域或国际实践中所适用的标准。

第11条

没有通知时的程序

1. 如果一国有合理理由相信，起源国已计划、或已进行一项活动，可能有对该国造成重大越境损害的危险，该国可以要求起源国适用第8条的规定。这种要求应附有具体解释，说明理由。

2. 如果起源国认为它没有义务依照第8条发出通知，则应在合理期间内告知该要求国，并附上具体解释，说明作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如果这一结论不能使该国满意时，经该国请求，两国应迅速按照第9条所述方式进行协商。

3. 在协商期间，如果另一国提出请求，起源国应作出安排，采取适当而且可行的措施，以尽量减少危险，并酌情在一段合理期间内暂停有关活动。

第12条

交换资料

该项活动进行期间，当事国应及时交换该项活动有关预防或随时尽量减少重大越境损害的危险的所有现成资料。即使该项活动已经终止，也应该继续交换这种资料，直到当事国认为合适才停止。

第13条

向民众提供资料

当事国应以适当方式向可能受属本条款范围的某项活动影响的民众提供有关该活动、所涉危险及可能造成的损害的资料，并查明其意见。

第14条

国家安全和工业机密

起源国可以不提供对其国家安全或保护其工业机密至为重要或涉及知识产权的数据和资料，但起源国应本着诚意同可能受影响国合作，视情况许可尽量提供资料。

第15条

不歧视

除非当事国为保护在属本条款范围的某项活动造成重大越境损害时可能受害或已经受害的自然人或法人的利益另有协议，一国不应基于国籍或居所或发生伤害的地点而在允许这些人按照该国法律制度诉诸司法程序或其他程序要求保护或其他适当补偿的机会上予以歧视。

第16条

紧急备灾

起源国应酌情与可能受影响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制订对付紧急情况的应急计划。

第17条

通知紧急情况

起源国应毫不迟延地以可以使用的最迅速方式将有关本条款范围内某项活动的紧急情况通知可能受影响国并向其提供一切有关的现有资料。

第18条

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关系

本条款不影响各国根据有关条约或习惯国际法规则所承担的任何义务。

第19条

争端的解决

1. 在解释或适用本条款方面发生的任何争端，应由争端各方按照相互协议选定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迅速予以解决，包括将争端提交谈判、调停、调解、仲裁或司法解决。

2. 如果未能在六个月内就和平解决争端方式达成协议，争端各方应按其中任何一方的请求设立一个公平的事实调查委员会。

3. 事实调查委员会应由争端每一方指派一人，并由被指派者中将担任主席者选定不具争端任何一方国籍者一人，予以组成。

4. 如果多于一个国家为争端一方，这些国家不同意委员会的一名共同成员而每一国指派一位成员，则争端另一方有权指派相同数目的委员。

5. 如果争端各方指派的成员未能在设立委员会的请求提出后三个月内商定一位主席，争端的任何一方可请求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不具争端任何一方国籍者担任主席。如果争端一方未能在初次请求提出后三个月内根据第2款指派一位成员，争端的任何其他当事方可请求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不具争端任何一方国籍者一人。以这种方式任命的人应构成单一成员委员会。

6. 除了单一成员委员会的情况以外，委员会应以过半票数通过其报告，并将该报告提交争端各方，说明调查结论和建议，争端各方应本着诚意予以审议。

12．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909]](#footnote-909)\*

大会，

重申《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原则13和16，

回顾《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

认识到尽管相关国家遵守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义务，涉及危险活动的事件仍会发生，

注意到由于这种事件，其他国家和（或）其国民可能遭受损害和严重损失，

强调应制定适当而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因这种事件而蒙受损害和损失的自然人和法人，包括国家，能够获得及时和充分的赔偿，

感到关切的是，应采取及时而有效的应对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类事件可能造成的损害和损失，

注意到国家对违反国际法规定的预防义务的行为负有责任，

回顾关于特定类别危险活动的现有国际协定的重要意义，并强调进一步缔结这类协定的重要性，

希望为发展这一领域的国际法作出贡献，

原则1

适用范围

本原则草案适用于国际法未加禁止的危险活动所造成的跨界损害。

原则2

用语

为本原则草案的目的：

（a） “损害”是指对人员、财产或环境所造成的重大损害；包括：

（一） 人员死亡或人身伤害；

（二） 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包括构成文化遗产一部分的财产的损失或损害；

（三） 环境受损而引起的损失或损害；

（四） 对财产或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环境的合理修复措施的费用；

（五） 合理应对措施的费用；

（b） “环境”包括非生物性和生物性自然资源，例如空气、水、土壤、动植物和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景观的特征；

（c） “危险活动”是指具有造成重大损害风险的活动；

（d） “起源国”是指在其境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进行危险活动的国家；

（e） “跨界损害”是指在起源国以外的另一国境内或在该另一国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或环境损害；

（f） “受害人”是指遭受损害的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国家；

（g） “营运人”是指在发生造成跨界损害事件时指挥或控制有关活动的人。

原则3

目的

本原则草案的目的是：

（a） 确保跨界损害的受害人得到及时和充分的赔偿；

（b） 在发生跨界损害时保全和保护环境，特别是在减轻对环境的损害以及恢复或修复环境方面。

原则4

及时和充分的赔偿

1. 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其境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危险活动所造成的跨界损害的受害人获得及时和充分的赔偿。

2. 这些措施应包括规定营运人或酌情规定其他人或实体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赔偿责任不应要求证明过失。关于这种赔偿责任的条件、限制或例外均应当符合原则草案3。

3. 这些措施也应包括要求营运人或酌情要求其他人或实体为偿付索赔建立并维持财务担保，例如保险、保证金或其他财务保证。

4. 适当时，这些措施应包括要求在国家一级设立全行业的同业基金。

5. 以上各款所列措施不足以提供充分的赔偿时，起源国还应确保备有其他财政资源。

原则5

应对措施

发生涉及危险活动的事件时，如果活动造成或可能造成跨界损害：

（a） 起源国应当从速将事件以及跨界损害的可能后果通知所有受影响国或可能受影响国；

（b） 起源国应当在营运人的适当参与下，确保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并应为此目的使用现有最佳科学数据和技术；

（c） 起源国还应酌情与所有受影响国或可能受影响国协商并寻求其合作，以减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消除跨界损害的后果；

（d） 跨界损害的受影响国或可能受影响国应当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减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消除此种损害的后果；

（e） 有关国家应酌情在相互接受的条件基础上寻求主管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协助。

原则6

国际和国内救济

1. 各国应当赋予本国司法和行政部门以必要的管辖权和职权，并确保在其境内的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时，这些部门具备及时、充分和有效的救济手段。

2. 跨界损害的受害人应能够从起源国获得与在该国境内遭受同一事件损害的受害人相等的及时、充分和有效的救济。

3. 第1款和第2款不影响受害人在可以从起源国得到的救济之外，寻求其他救济的权利。

4. 各国可以就采用迅速而又最经济的国际理赔程序作出规定。

5. 各国应保障能够适当获取与寻求救济，包括索取赔偿相关的资料。

原则7

拟订专门的国际制度

1. 如果就特定类别危险活动而言，专门的全球、区域或双边协定能为赔偿、应对措施及国际和国内救济提供有效安排，则应尽一切努力缔结这些专门协定。

2. 这些协定应酌情包括如下的安排：在营运人财力，包括财务担保措施不足以偿付因某一事件而受到的损害的情况下，由同业基金和（或）国家基金提供补充赔偿。这些基金可设定用于补充或取代全国性的同业基金。

原则8

实施

1. 每一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监管和行政措施，实施本原则草案。

2. 本原则草案和用于实施本原则草案的措施在适用时不得有任何基于诸如国籍、居所或住所的歧视。

3. 各国应相互合作，实施本原则草案。

13．外交保护条款草案[[910]](#footnote-910)\*

第一部分

一般规定

第1条

定义和范围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外交保护是指一国对于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给属于本国国民的自然人或法人造成损害，通过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援引另一国的责任，以期使该国责任得到履行。

第2条

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

一国享有按照本条款草案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

第二部分

国籍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3条

国籍国的保护

1. 有权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是国籍国。

2. 尽管有第1款的规定，一国可根据第8条草案为非本国国民的人行使外交保护。

第二章 自然人

第4条

自然人的国籍国

为对自然人行使外交保护的目的，国籍国指该人根据该国法律通过出生、血缘、归化、国家继承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在不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获得了其国籍的国家。

第5条

自然人的持续国籍

1. 一国有权对从发生损害之日到正式提出求偿之日持续为其国民的人行使外交保护。如果在上述两个日期该人都持有该国籍，则推定该国籍是持续的。

2. 尽管有第1款的规定，一国对在正式提出求偿之日为其国民但在受到损害之日不是其国民的人，可行使外交保护，但条件是该人曾具有被继承国的国籍，或者已丧失原国籍，并且基于与提出求偿无关的原因、以不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已获得该国的国籍。

3. 一人在受到损害时为其原国籍国国民，而不是现国籍国的国民，则现国籍国不得针对原国籍国就该人所受到的损害行使外交保护。

4. 一国对于在正式提出求偿之日后获得被求偿国国籍的人不再享有为其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

第6条

多重国籍和针对第三国的求偿

1. 双重或多重国籍国民的任一国籍国可针对该人不属于其国民的国家，为该国民行使外交保护。

2. 两个或多个国籍国可为具有双重或多重国籍的国民共同行使外交保护。

第7条

多重国籍和针对国籍国的求偿

一国籍国不得为同属另一国国民的人针对另一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除非在发生损害之日和正式提出求偿之日，该国的国籍均为该人的主要国籍。

第8条

无国籍人和难民

1. 一国可为无国籍人行使外交保护，但该人须在受到损害之日和正式提出求偿之日在该国具有合法的和惯常的居所。

2. 一国可为被该国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承认为难民的人行使外交保护，但该人须在受到损害之日和正式提出求偿之日在该国具有合法的和惯常的居所。

3. 第2款不适用于该难民的国籍国之国际不法行为造成损害的情况。

第三章 法人

第9条

公司的国籍国

为对公司行使外交保护的目的，国籍国是指公司依照其法律成立的国家。然而，当公司受另一国或另外数国的国民控制，并在成立地国没有实质性商务活动，而且公司的管理总部和财务控制权均处另一国时，那么该国应视为国籍国。

第10条

公司的持续国籍

1. 一国有权为从发生损害之日到正式提出求偿之日持续为该国或其被继承国国民的公司行使外交保护。如果在上述两个日期该公司都持有该国籍，则推定该国籍是持续的。

2. 一国对于在提出求偿后获得被求偿国国籍的公司不再享有为其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

3. 尽管有第1款的规定，一国继续有权为在发生损害之日为其国民，但由于损害的原因，按照成立地国法律终止存在的公司行使外交保护。

第11条

股东的保护

在公司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公司股东的国籍国无权为这些股东行使外交保护，除非：

（a） 由于与损害无关的原因，按照成立地国的法律该公司已不存在；或

（b） 在受到损害之日，该公司具有被指称对造成损害应负责的国家的国籍，并且在该国成立公司是该国要求在其境内经营的前提条件。

第12条

对股东的直接损害

在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对股东本人的权利，而非公司的权利，造成直接损害的情况下，这些股东的国籍国有权为其国民行使外交保护。

第13条

其他法人

本章所载的原则应酌情适用于公司以外的其他法人的外交保护。

第三部分

当地救济

第14条

用尽当地救济

1. 除非有第15条草案规定的情形，一国对于其国民或第8条草案所指的其他人所受的损害，在该受害人用尽一切当地救济之前，不得提出国际求偿。

2. “当地救济”指受害人可以在所指应对损害负责的国家，通过普通的或特别的司法或行政法院或机构获得的法律救济。

3. 在主要基于一国国民或第8条草案所指的其他人所受的损害而提出国际求偿或请求作出与该求偿有关的宣告性判决时，应用尽当地救济。

第15条

当地救济规则的例外

在下列情况下，无需用尽当地救济：

（a） 不存在合理地可得到的能提供有效补救的当地救济，或当地救济不具有提供此种补救的合理可能性；

（b） 救济过程受到不当拖延，且这种不当拖延是由被指称应负责的国家造成的；

（c） 受害人与被指称应负责国家之间在发生损害之日没有相关联系；

（d） 受害人明显的被排除了寻求当地救济的可能性；或

（e） 被指称应负责的国家放弃了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

第四部分

杂项规定

第16条

外交保护以外的其他行动或程序

国家、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实体为国际不法行为所致损害取得补救，根据国际法诉诸外交保护以外的其他行动或程序的权利，概不受本条款草案影响。

第17条

国际法的特别规则

本条款草案在与诸如投资保护条约规定等国际法特别规则不符的情况下，则不适用。

第18条

船员的保护

船舶船员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不因船舶国籍国有权在国际不法行为对船舶造成损害致使船员受到伤害时，为任何国籍的船员寻求补救而受到影响。

第19条

建议的做法

按照本条款草案有权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应：

（a） 充分考虑行使外交保护的可能性，特别是当发生了重大损害时；

（b） 对于诉诸外交保护和寻求赔偿之事，尽可能考虑受害人的意见；并且

（c） 把从责任国获得的任何损害赔偿在扣除合理费用之后转交受害人。

14． 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面声明的  
指导原则[[911]](#footnote-911)\*

国际法委员会，

注意到各国有可能在国际上受自己单方面行为的约束，

注意到能够对各国产生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可采取正式声明的形式，或采取别国可合理地信赖的简单非正式行为的形式，某些情况下的沉默也包括在内，

也注意到国家的单方面行为是否在特定情形中对其具有约束力取决于具体情况，

也注意到在实践中，通常难以确定由一国的单方面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是该国表达的意图的后果，还是取决于该行为使其他国际法主体产生的期望，

通过下述指导原则，这些原则仅涉及严格意义上的单方面行为，即那些以国家出于创立国际法义务之意图而所作的正式声明为形式的单方面行为，

1. 公开作出的并显示受约束意愿的声明可具有创立法律义务的效力。当与此相符的条件得到满足时，这类声明的约束性质便以善意为基础；有关国家然后可考虑到并信赖这类声明；这些国家有权要求尊重这类义务；

2. 任何国家都拥有通过单方面声明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

3. 为确定这类声明的法律效力，有必要考虑其内容、其作出时的所有实际情况及其所引起的反应；

4. 单方面声明只有经有权这样做的主管当局作出，才在国际上对国家有约束力。凭借其职责，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有权作出这类声明。在特定领域代表国家的其他人士，可经授权作出声明，从而在其负责的领域内使国家承担义务；

5. 单方面声明可口头作出，也可书面作出；

6. 单方面声明可针对整个国际社会作出，也可针对一个或数个国家或其他实体作出；

7. 只有以明确、具体的措词作出的单方面声明，才对声明国产生义务。如对这类声明所产生的义务范围有疑问，则必须以严格的方式解释这类义务。在解释这类义务的内容时，应优先重视声明的案文，同时应考虑声明作出的背景和当时的情况；

8. 与一般国际法强行规范冲突的单方面声明无效；

9. 一国的单方面声明不得对其他国家施加义务。然而，其他有关国家如果明确接受这类声明，则可就这类单方面声明承担义务；

10. 不能任意撤销一项已经对声明国创立了法律义务的单方面声明。在考虑一项撤销是否属于任意时，应考虑下述因素：

（一） 声明中与撤销有关的任何具体规定；

（二） 义务的对象对这类义务的信赖程度；

（三） 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根本变化。

15． 国际法不成体系：国际法的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  
困难研究小组的工作结论[[912]](#footnote-912)\*

1． 概 述

（1） 作为一个法律体系的国际法。国际法是一个法律体系。它的规则和原则 （即它的规范）的运作同其他规则和原则有关，并且应该在其他规则和原则的背景之下予以解释。作为一种法律体系，国际法不是这些规范的随机收集。它们之间具有切实的关系。因此，规范可能存在于较高和较低的等级，它们的表述可能涉及较大或较小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它们的效力可能追溯到较早的或较晚的时刻。

（2）在适用国际法的时候，往往必需确定都对某一情况有效和适用的两项或多项规则和原则之间的精确关系。[[913]](#footnote-913)1为此目的，有关的关系属于两个一般类型：

- 解释的关系。这是一个规范有助于解释另一个规范的情况。一个规范有助于解释另一个规范的情况有适用、澄清、刷新、或修正后者等。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规范同时适用。

- 冲突的关系。这是两个都有效和适用的规则指向不一致的决定因此必须在两者之间作一选择的情况。关于解决标准化冲突的基本规则载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3）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寻求确定两个或多个规范相互间关系的时候，这些规范必须按照或者比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尤其是涉及条约解释的第31至第33条的规定予以解释。

（4） 一致的原则*。*公认的原则是，当若干规范涉及单一的问题时，应该尽可能作出能够产生单一的一致性义务的解释。

2．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公理

（5） 一般原则。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公理是国际法中公认的解释和解决冲突的方法。它意味着，每当两个或多个规范涉及同一个案由事项的时候，应该把优先地位给予较具特殊性的那个规范。这个原则可以适用于若干情况：单一条约的各个条款之间、两个或多个条约的条款之间、一个条约和一个非条约标准之间，以及两个非条约标准之间。[[914]](#footnote-914)2该规范的来源（无论是条约、习惯或一般法律原则）对于确定比较特殊的标准来说，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实际上，条约往往提到相关习惯法和一般原则作为特别法实施。[[915]](#footnote-915)3

（6） 境况鉴别。特别法公理和其他解释规范或冲突解决办法之间的关系不能按照一般方式确定。特殊性或规范出现时刻，应该根据境况决定哪一考虑因素居于优先地位。

（7） 原则的基本理由。特别法比一般法优先的正当理由是这些特别法比较具体，通常比任何适用的一般法更好地考虑到境况的特征。它的适用通常也可以产生比较公平的结果，并且通常更好地反映法律主体的意图。

（8） 特别法的功能。大多数国际法是决定性的。这意味着，特别法可以适用、澄清、刷新或修正以及搁置一般法。

（9） 特别法对一般法的影响。特别法的适用通常不会压制相关的一般法。[[916]](#footnote-916)4该一般法仍然有效而且可以适用，仍然根据上述结论（4）为相关特别法的解释和适用指示方向，在一般法没有规定的情形下可以完全适用。[[917]](#footnote-917)5

（10）一般法的特定类型。但是，一般法的若干类型[[918]](#footnote-918)6不得以特别法予以贬损。以下结论（32）、（33）、（40）和（41）明确表明强制法不可贬损。[[919]](#footnote-919)7此外，还有其他考虑因素，说明为何认定，在特别法的假设不适用的情况下，一般法应该居于优先地位。这包括下列情况：

- 在可以适用的情形下，应该确定这种优先是否可从一般法的形式或性质推断、或属于当事方的意图；

- 特别法的适用是否可能挫折一般法的宗旨；

- 第三方受益人是否会受到特别法的不利影响；并且

- 一般法中建立的权利和义务均衡是否会受到特别法的不利影响。

3. 特别（自足）制度

（11）特别（“自足”）制度是特别法。有一组涉及特定案由事项的规则和原则可以形成一个特别制度（“自足制度”）并且可以作为特别法适用。这些特别制度通常由它自己的机构执行相关规则。

（12）可以区别三类特别制度：

- 有时候，违反特定类别（初级）规则时，也伴随着出现关于违反情事和对付违反情事的一套特别的（次级）规则。这是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55条所规定的主要情况。[[920]](#footnote-920)8

- 但是，有时候，特别制度是由涉及特别案由事项的包括权利和义务在内的一套特别规则形成的。这些规则可能涉及一个地理区域（例如关于保护特定河流的条约）或一些实质事项（例如关于管制特定武器之使用的条约）。这样一个特别制度可能在单一条约、若干条约、或条约和条约加上非条约发展（随后的实践或习惯法）的基础上出现的。[[921]](#footnote-921)9

- 最后，有时候，收集了管制若干问题领域的所有规则和原则，以便表示“特别制度”。诸如“海洋法”、“人道主义法”、“人权法”、“环境法”和“贸易法”一类的用语描述了若干此类制度。为了解释的目的，这些制度通常可能被视为一个整体。

（13） 一个制度“特殊性”的效果。一个特别制度的意义在于其规范表述一个统一目的和宗旨的方式。因此，这些规范的解释和适用应当尽可能地反映该目的和宗旨。

（14） 特别制度与一般国际法的关系。一个特别制度通常可在与特别法遇到的相同的条件下减损一般法（见上文结论（8）和（10））。

（15） 一般法在特别制度中的第一个作用：填补空白。依其定义，特别法的范围狭于一般法。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不受特别法管辖的事项出现在负责管理特别法的机构面前。在这类情况下，适用有关的一般法。[[922]](#footnote-922)10

（16） 一般法在特别制度中的第二个作用：特别制度失效。特别制度或特别制度所设立的机构可能未按意图发挥作用。当有充足的理由预见特别法不能达到颁布特别法想要达到的目标时，特别制度可能失效。例如，当无法实现原定的宗旨、一个或数个成员长期不遵守、废除、重要成员的退出以及其他原因，都可能是失效的体现。然而，一个制度是否就此“失效”，则首先需要取决于其章程性文书的解释。如果失效，相关一般法即告适用。

4.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

（17） 体系整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规定了一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框架内的方法，据之可适用（上文结论（2）所提到的）解释的关系。它要求条约的解释者考虑“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该条款表述了“体系整合”的目的：无论事项为何，条约是国际法律制度的产物，而其作用如何则依这一事实预测。

（18） 解释是体系整合的方式。体系整合管辖所有条约的解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和第32条则规定了其另外方面的有关内容。这些条款阐述了一个法律推理过程，即：根据被解释条约之规定的性质，特定因素的相关性有大有小。在许多情况下，解释的问题能够在条约本身的框架内解决。第31条第（3）款（c）项处理条约外的重要渊源涉及条约解释的情况。这可包括其他条约、习惯规则或一般法律原则。[[923]](#footnote-923)11

（19） 体系整合的适用。当一个条约的作用涉及到其他协议时，将同时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推定而适用体系整合之目的：

（a） 缔约方同意根据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处理条约本身未明文解决的一切问题；[[924]](#footnote-924)12

（b） 缔约方承担条约义务时不企图以有悖于公认国际法原则的方式采取行动。[[925]](#footnote-925)13

当然，如果以普通方式解释条约显示了任何其他结果，除非有关原则构成绝对法，否则应当承认该结果。

（20） 适用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对于根据第31条第（3）款（c）项而解释条约尤其相关，特别是有下述情况时：

（a） 条约规则不清或未确定；

（b） 条约用语在习惯国际法或一般法律原则中有公认的含义；

（c） 条约没有就适用的法律作出规定，而解释者有必要采用上述第19段（a）项结论中的假定，寻找国际法另外领域所产生的规则来解决问题。

（21） 适用其他条约的规则。第31条第（3）款（c）项也要求解释者考虑其他条约的规则，从而得出一致的含义。当被解释条约的缔约方也是其他条约的缔约方、当条约规则已经形成或反映习惯国际法、或者当其表明了缔约方对于被解释条约宗旨和目的或特定用语含义的共同理解时，这类其他规则尤其重要。

（22） 相对暂时性。国际法是一个动态的法律制度。解释者在适用第31条第（3）款（c）项时，究竟应援用缔约时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还是也可兼顾法律的后来演变，一般取决于条约的含义。此外，条约某一项之规定的含义也可受后来发展情况的影响，特别是当后来发展情况已反映在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之中时。[[926]](#footnote-926)14

（23） 未定或演变的概念。特别是条约所用概念是未定或演变的，则可考虑被解释的条约自其产生以后出现的国际法规则。下述情况中尤其如此：（a）该概念暗示须考虑后来的技术、经济或法律发展情况；[[927]](#footnote-927)15（b）该概念为缔约方规定了进一步逐渐发展的义务；或者（c）该概念具有非常一般的性质、或者是以必须考虑情况变化的那类一般性用语表述的。[[928]](#footnote-928)16

5. 先后规范之间的冲突

（24） 后法废止前法。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当后来的所有缔约方也是先前条约的缔约方时，而先前条约并未中止或终止，则仅在其规定符合于后来条约规定的范围内适用。这是一个根据“后法废止前法”的原则所做的表述。

（25） “后法”原则的限度。然而，适用后法原则是有限度的。例如，当后来条约的缔约方与先前条约的缔约方并非完全一致时，则不能当然适用。在这类情况下，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第（4）款所规定的，两个不一致条约的缔约国在与其他缔约国的关系上分别受两个条约的约束。如果它无法同时履行两个条约的义务，则对违反其中之一而负有责任。在这类情况下，也可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0条。一般规则无法回答应当履行哪一个不一致条约，以及对哪一条约的违反应当依据国家责任而处罚问题。[[929]](#footnote-929)17下文结论（26）-（27）载述那时可能考虑到的一些因素。

（26） 属于同一“制度”条约之规定与属于不同“制度”之规定之间的区分。在涉及那些属于有机构性联系或试图促进同样目标的条约之冲突重迭规定方面，后来法原则的作用最大（即形成同一制度的一部分）。当不同制度的条约之间出现冲突或重迭时，哪一个在时间上靠后的问题不能用以表明它们之间固有的优先顺序。反之，受到条约义务约束的国家应该尽量着眼于相互适应、试图按照融洽原则加以履行。但是，条约缔约方或第三方受益人的实质权利不应该受到破坏。

（27） 条约或条约规定的特殊类型。当从条款的性质或相关文书，或从其目标和宗旨推断缔约方另有意图时，后法假设不得适用。对结论（10）中的特别法假设适用的限制，对于后法来说，也可能是适切的。

（28） 制度内和制度间争端的解决。国家间涉及条约规定冲突的争端，通常应该由相关条约的缔约方通过谈判解决。然而，当无法谈判解决时，应当酌情诉诸其他现有的争端解决手段。当冲突涉及个别制度（如上述结论（26）中所界定的）内的规定时，可恰当地在具体制度机制内解决。但是，当冲突涉及并非同一制度的条约之规定时，则应特别注意所选择的解决手段的独立性。

（29） 相互间协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41条处理仅由某些缔约方以协议（相互间协议）修正多边条约的情况。这类协议通常是一种在有限的缔约方之间采取更有效履行原始条约的手段：它们愿意采取更有效或更深远的措施来实现原始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如果原始条约有此规定，或者并未具体禁止，并且“（一）不影响其他当事国享有条约上之权利或履行其义务；（二）不关涉任何如予损抑即与有效实行整个条约之目的及宗旨不合之规定”（《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41条第（1）款（b）项）。

（30） 冲突条款。当各国缔结可能与其他条约冲突的条约时，它们应当通过在这些条约中制定冲突条款来确定这类条约之间的关系。当制定这类条款时，应当铭记：

（a） 不得影响第三方的权利；

（b） 应当尽可能明确和具体。尤其是，应当指明条约的具体规定，并且不得削弱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c） 它们应该在适当时同争端解决手段相联系。

6. 国际法的等级：绝对法、普遍义务和  
《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

（31） 国际法规范之间的等级关系。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中所载列的条约、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等级关系。[[930]](#footnote-930)18由于两个制度之间的差异，类比国内法律制度的等级性质总的来说是不恰当的。然而，某些国际法规则比另一些规则更重要，从而在国际法制度中享有更高的地位或特别的地位。有时，表现为指定某些规范是“基本的”或者“人性的基本考虑因素”[[931]](#footnote-931)19或者“不可违犯的国际法原则”来体现。[[932]](#footnote-932)20通常是由出现这类指定的有关情况或文书来决定这类指定的可能效果。

（32） 因规则的实质内容而受公认的等级关系：绝对法。可依据其内容和普遍接受程度来决定一个国际法规则优于另一个规则。这是国际法强制规范（绝对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的情况。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的规范。[[933]](#footnote-933)21

（33） 绝对法的内容。最经常被引述的绝对法规范实例包括禁止侵略、奴役和贩卖奴隶、种族灭绝、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酷刑的规则以及适用于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规则和自决权。[[934]](#footnote-934)22只要是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的，其他规则也可具有绝对法的性质。

（34） 由于条约规定而受公认的等级关系：《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国际法规则也可由于某一条约规定而高于其他规则。这是《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的情况：“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

（35） 《宪章》第一百零三条的范围。第一百零三条的范围不仅涵盖《宪章》各条款，也涵盖安全理事会等联合国机关所做的约束性决定。[[935]](#footnote-935)23鉴于《宪章》中一些规定的性质、《宪章》的宪法性质以及各国和联合国各机关的既定惯例，《宪章》的义务也可能优先于不一致的习惯国际法。

（36） 《联合国宪章》的地位。另外，据公认，《联合国宪章》本身由于其中某些规范的基本性质，尤其是其原则与宗旨以及被普遍接受的事实，享有特殊的性质。[[936]](#footnote-936)24

（37） 规定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的规则：普遍义务。某些义务由于其适用性遍及全球而具有特殊地位。这就是普遍义务的情况，也就是一国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这些规则涉及所有国家，因而认定，所有国家对于保护所涉及的权利具有合法利益。[[937]](#footnote-937)25每一国家都可追究违反这类义务的国家的责任。[[938]](#footnote-938)26

（38） 绝对法规范和普遍义务之间的关系。据公认，尽管上文所述结论（33）提到的绝对法规范所确立的一切义务也具有普遍义务的性质，但反过来却不一定对。[[939]](#footnote-939)27并非所有普遍义务都是一般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所确立的。例如，“关于基本人权的原则和规则”所确立的一些义务[[940]](#footnote-940)28以及同全球公域有关的一些义务[[941]](#footnote-941)29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39） 对普遍义务概念的不同处理方式。普遍义务概念也被用于指一国对所有其他缔约国的条约义务（对每一缔约国的义务）[[942]](#footnote-942)30或对作为第三方受益人的非缔约国的条约义务。而且，领土地位问题经常在普遍义务中处理，指对于所有国家的可反对性。[[943]](#footnote-943)31因此，据认为，边界和领土条约“是[]一个必须会撞击到第三国的法律现实，因为它们具有普遍性的影响。”[[944]](#footnote-94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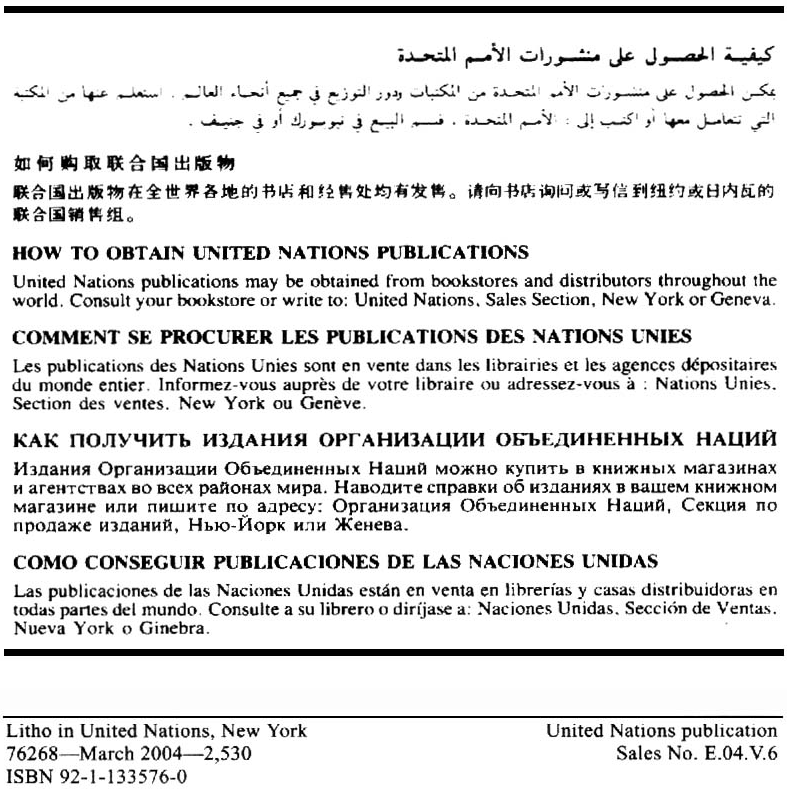
（40） 强制法和《联合国宪章》义务之间的关系。《联合国宪章》得到各国普遍接受，因此强制法规范和《宪章》义务之间的冲突是难以想象的。无论如何，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二项，安全理事会应该根据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其中包括后来被当做强制法处理的规范，采取行动。

（41） 绝对法规范和《宪章》第一百零三条的作用和效果：

（a） 一个与绝对法规范相冲突的规则因此而实际上无效；

（b） 一个与《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相冲突的规则因这一冲突而不可适用。

（42） 等级和一致化原则。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应该根据上文结论（4）中载述的一致化原则来解决。如果在本节提到的一个等级较高的规范和另一个国际法规范之间出现冲突，应该尽量以同前者一致的方式解释后者。如果这一点办不到，等级较高的规范应居于优先地位。



07-28981—March 2007—2,550 Sales No. E.07.V.9

ISBN 978-92-1-133763-1

1. 国际法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关于专题或分题的最后报告不包含某些条款草案（如对多边公约的保留意见），但载有被委员会后来的工作所取代（关于仲裁程序的条款草案）或将被视为建议（当前无国籍状态）的条款草案。附件没有转载这些最后报告。此外，附件也没有转载《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因为该规约是在筹备委员会为国际刑事法院拟定的案文基础上通过的，而该案文又是国际法委员会为国际刑事法院拟定的规约草案的进一步阐述。但由于后者的历史意义以及它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立法历史一部分的相关性，附件对其进行了转载。 [↑](#footnote-ref-1)
2. 2 边沁在其《国际法原则》（写于1786-1789年间）一书中设想，一项以在国际关系中详尽应用他所提出的效用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典无疑将成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大纲。然而，他很少作出努力使制定这一法典的计划建立在现有国际法的基础上。 [↑](#footnote-ref-2)
3. 3 见A/AC.10/25号文件“关于私人编纂国际公法的说明”。 [↑](#footnote-ref-3)
4. 4 见A/AC.10/5号文件，“通过国际会议发展和编纂国际法的历史概览”；和A/AC.10/8号文件，“特别涉及编纂方法的美洲体系国际法编纂概览”。 [↑](#footnote-ref-4)
5. 5 这些公约的案文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2页。这些议定书的案文，见同上，第1125卷，第3和609页。 [↑](#footnote-ref-5)
6. 6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2005年12月8日关于增加一个徽标的第三附加议定书。2007年1月14日生效。该议定书的案文已交存瑞士联邦外交部。 [↑](#footnote-ref-6)
7. 7 见1907年和平会议最后文件，载于J. B. 斯科特：《1899年和1907（1909）年的海牙和平会议》第二卷，第289-29l页。 [↑](#footnote-ref-7)
8. 8 《国际联盟公报，特别补编》第21号，第10页。 [↑](#footnote-ref-8)
9. 9 同上，第53号，第9页。 [↑](#footnote-ref-9)
10. 10 l930年4月12日，该会议通过了以下文书：

    1. 关于国籍法冲突的若干问题的公约（《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179卷，第89页）；

    2. 关于双重国籍某些情况下兵役义务的议定书（同上，第178卷，第227页）；

    3. 关于无国籍的某些情况的议定书（同上，第179卷，第115页）；

    4. 关于无国籍的特别议定书（国际联盟文件C.27.M.16.1931.V）。

    除第4项文件外，上述文件自1937年以来，一直有效。 [↑](#footnote-ref-10)
11. 11 《国际联盟公报，特别补编》，第92号，第9页。 [↑](#footnote-ref-11)
12. 12 见《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文件，1945年，旧金山》第三卷，l和2号文件；第八卷，1151号文件；和第九卷，203、416、507、536、57l、792、795和848号文件。 [↑](#footnote-ref-12)
13. 1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第六委员会，附件一》。 [↑](#footnote-ref-13)
14. 14 见关于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的工作方法的讨论，下文第44-45页。 [↑](#footnote-ref-14)
15. 15 第六委员会是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主要委员会，受托审议法律问题。见大会议事规则第九十八条（A/520/Rev.15/Amend.2号文件）。相关信息和文件见第六委员会的官方网站。见www.un.org/law/cod/sixth。 [↑](#footnote-ref-15)
16. 1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第六委员会，附件1》。 [↑](#footnote-ref-16)
17. 17 见大会1950年12月12日第485 （V）号决议、1955年12月3日第984 （X）号和第985 （X）号决议、1956年12月18日第1103 （XI）号决议、1961年11月6日第1647 （XVI）号决议和1981年11月18日第36/39号决议。修改涉及向委员会委员支付的报酬、委员会的会议地点、委员会委员任期的延长、委员会的人数，以及委员会委员的区域分配（分别见第18、57、17、16-17和11-12页）。1996年，委员会注意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起草的章程从来没有彻底审查和修订过。委员会认为，总的来说，章程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在实践中予以修改。同时，委员会提请注意章程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需要在委员会成立近五十年时进行审查和修订。委员会建议考虑合并和更新委员会章程，以配合1999年纪念委员会五十周年的活动。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7段（a）、148段（s）和241至243段。 [↑](#footnote-ref-17)
18. 18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102段，以及《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56和157段。 [↑](#footnote-ref-18)
19. 19 但是，委员会并非总是在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之间划分严格的界线，在其某些工作中还考虑了后一类的某些方面。例如，见委员会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专题的审议。 [↑](#footnote-ref-19)
20. 20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55段。 [↑](#footnote-ref-20)
21. 2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500段。 [↑](#footnote-ref-21)
22. 2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57段。 [↑](#footnote-ref-22)
23. 23 见《197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9610/Rev.1号文件，第207段。 [↑](#footnote-ref-23)
24. 24 自委员会成立以来，委员会委员就以男性为主（在1961年和1991年选举中才首次提名女候选人），大会在2001年首次选举两名女性担任委员会委员。2006年，三名女委员当选。 [↑](#footnote-ref-24)
25. 25 1976年，某会员国推选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作为填补国际法委员会空缺的候选人。问题是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选举是否会与管理国际公务员活动和行为的工作人员细则和条例相抵触。联合国法律顾问指出，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选举将与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和条例相抵触，特别是条例第1.2条和细则第101.6条（e）（现为第101.2条）。法律顾问还说，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在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成员资格问题上也持有类似的立场。抵触问题并非因委员会章程的规定而起，而是因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的规定和相关做法而起。该工作人员撤销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来自某专门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于1991年被大会选入委员会，委员会于2000年让其填补了一个临时空缺。世界银行的一名工作人员于2006年被提名参加委员会选举，但是没有选上。 [↑](#footnote-ref-25)
26. 26 见《197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9610/Rev.1号文件，第210段。 [↑](#footnote-ref-26)
27. 27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4段。 [↑](#footnote-ref-27)
28. 28 见《197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9610/Rev.1号文件，第210段。 [↑](#footnote-ref-28)
29. 29 委员会章程没有涉及委员会委员在当选后改变国籍的情况。一个例子是，委员会有两名委员在五年期间的第一届会议后成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民，这是因为大会于1956年选出这两名委员后，埃及与叙利亚在1958年2月22日组成了联盟。其中的一名委员提出了辞职。另一个例子是，该委员会有两名委员在五年期间的第四届会议后成为德国国民，这是因为大会于1986年选出这两名委员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90年10月3日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两名委员在五年期间的最后一年继续在委员会供职，并完成了他们当选的职位的任期。在捷克斯洛伐克于2003年1月1日解体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任期内委员继续作为捷克共和国的国民任职。 [↑](#footnote-ref-29)
30. 30 截至2007年1月31日，联合国共有192个会员国。 [↑](#footnote-ref-30)
31. 31 见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第六委员会，附件1》，第5段。 [↑](#footnote-ref-31)
32. 32 见A/C.6/193号文件，第7段。 [↑](#footnote-ref-32)
33. 33 尽管“双重”提名（即一个成员国提名两名本国国民）在委员会早期选举中司空见惯（1948、1953、1956、1961、1966、1971和1976年），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采用过这种作法。 [↑](#footnote-ref-33)
34. 34 在1976、1996、2001和2006年举行选举时，大会决定在委员会选举的候选人总名单中列入几个人的姓名，其提名是在最后期限6月1日之后收到的。见A/31/PV.60、A/51/PV.52、A/56/PV.31和A/61/PV.41号文件。 [↑](#footnote-ref-34)
35. 35 大会在9月的第三个星期二（从至少包含一个工作日的第一周算起）开始举行常会。大会议事规则第一条，A/520/Rev.16号文件。 [↑](#footnote-ref-35)
36. 3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一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9，A/3427号文件，第13段，同上，《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7，A/4779号文件，第4和5段。 [↑](#footnote-ref-36)
37. 37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7，A/4939号文件，第9-12段；以及A/36/371号文件，第4-6段。 [↑](#footnote-ref-37)
38. 38 大会1981年11月18日第36/39号决议规定委员会委员按照下列分配办法选出：八名非洲国家国民；七名亚洲国家国民；三名东欧国家国民；六名拉丁美洲国家国民；八名西欧或其他国家国民；一名非洲国家国民与一名东欧国家国民轮流；一名亚洲国家国民与一名拉丁美洲国家国民轮流。（拉丁美洲国家区域集团的名称后来改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见联合国1988年2月1日第88/19号、1988年2月5日第88/23号和1988年2月8日第88/24号日刊）。这两个轮流席位在2006年的选举中分配给了一名东欧国家的国民和一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国民。见A/61/92号文件，第6-8段，以及大会2006年11月16日第61/411号决定。 [↑](#footnote-ref-38)
39. 39 大会议事规则第九十二条。选票分为五页——每个区域集团一页，载有有资格参加该轮投票的候选人姓名。只给每页上的候选人投票，最多只达到分配给各区域的席位数（即票数不到席位数一半的选票仍被视为有效）。空白页被视为对该区域集团投了弃权票。选票上的票数如果超过分配给某个区域集团的席位数，则被视为无效。 [↑](#footnote-ref-39)
40. 40 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二十五条。为了国际法委员会选举之目的，“出席及投票”是指成员国投票的有效选票数量少于无效选票和弃权票数。见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二六条，在作必要的更改之后适用。 [↑](#footnote-ref-40)
41. 41 如果同一国家的国民不只一人的得票超过当选票数，由得票最多者当选；如果票数相等，由年龄较高或最高的候选人当选（第9条，第2款）。实际上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footnote-ref-41)
42. 42 根据在作必要更改之后适用的大会议事规则第九十四条，后几轮投票仅限于在上一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且数量不超过需要补足的席位数量的两倍。只有在以下选举中举行了多轮选举：1948年（2轮，分别在第154次和第155次全体会议上举行）、1953年（4轮，第453次和第454次全体会议）、1991年（2轮，见A/46/PV.47号文件）和2001年（2轮，见A/56/PV.39号文件）。 [↑](#footnote-ref-42)
43. 43 见作必要的更改之后适用的大会议事规则第九十二至第九十四条。在2001年选举中举行了第二轮投票，仅限于亚洲集团剩下的最后一个席位票数相等的两名候选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候选人随后获得了法定多数选票且得票最多，从而当选。见A/56/PV.39号文件。另一次票数相等情况发生在1976年，有两名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之后在委员会剩下的最后一个席位上得票相等。由于两名候选人中有一人退出，票数相等局面被打破，在区域席位分配方面履行了“君子协定”。大会主席立即宣布剩下的候选人经正式选举当选为委员会委员。见A/31/PV.68号文件。 [↑](#footnote-ref-43)
44. 44 在以下各年的会议上举行了补足委员会临时空缺的选举：1952、1954、1955、1958、1959、1960、1961、1964、1965、1970、1973、1974、1976、1977、1979、1981、1982、1985、1990、1994、1995、1999、2000、2002、2003和2006年。 [↑](#footnote-ref-44)
45. 45 在有些情况下，委员会委员通常以写给主席并由联合国秘书长转交的信函形式发出书面辞职通知。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的委员会委员通常采取这种方式。委员会委员还在不说明原因的情况下提交辞呈。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委员会注意到导致空缺的实际事件，由主席宣布空缺的存在。即该委员会没有明确确定存在一个临时空缺，如果在委员会通过的议程中列入该项目，则可以视为这意味着委员会确定在该届会议上存在一个临时的委员空缺。在这方面，委员会没有对选举或任命到另一实体任职后必须退出委员会的席位制定一般规则或惯例。这方面的做法各不相同。例如，如上所述，在几种情形下，委员会委员在选入国际法院之后退出其席位，但有一名委员在2005年10月1日选入海洋法国际法庭之后，继续担任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直到其任期届满（到2006年年底）。一般说来，在选举进入另一实体之后委员保留其委员会席位是否妥当，根据以下方面来管制：联合国特派专家任职条件（见ST/SGB/2002/9号文件）；另一个实体的规则或惯例；以及另一个实体的工作性质（例如，工作是全职的还是兼职的）。 [↑](#footnote-ref-45)
46. 46 这是在届会之前产生空缺的一种做法，而届会前产生空缺是很常见的。如果在届会期间产生空缺，委员会可决定在该届会议议程上列入一个与填补临时空缺有关的项目，或者将补足空缺延迟到下一届会议上进行。 [↑](#footnote-ref-46)
47. 47 在1952年第四届会议上，委员会选举填补临时空缺的三名候选人分别由委员会委员推荐，选举是在公开会议上举行的。见《195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卷，第136次会议，第5和10段，以及第183次会议，第1段。在1959年第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委员在选举填补临时空缺的过程中举荐了候选人。在该届会议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有关临时空缺的委员会章程第11条没有提及要求各国政府对正规选举进行提名的第3条，因此决定它可以审议委员会委员提交的候选人名单。填补临时空缺的选举是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进行的。在1985年第三十七届会议上，有一名候选人系由委员会委员推荐。另一位由委员会委员提名的人给法律顾问写信，要求取消他的名字。候选人名单中没有出现此人的姓名。填补临时空缺的选举同样是在非公开会议上进行的。 [↑](#footnote-ref-47)
48. 48 发布秘书处候选人名单的做法是1964年开始的。1964年以前，收到的关于候选人的信息是向委员会委员分发的，候选人的非正式名单由秘书处编制，供委员会委员审议。（有时，委员会委员也会从委员会秘书的口头发言中获悉候选人的情况。）根据联合国法律顾问康斯坦丁·A. 斯塔夫罗普洛斯1973年的决定，秘书处的候选人名单包含以下信息：候选人的姓名、国籍和履历。名单中不指明是谁推举的候选人。根据同一决定，秘书处发布了载有来函全文的另一份文件，以仅供委员会委员阅读的该委员会会议室文件的形式提交或补充关于候选人资格的材料。这些函件通常来自各国政府。1985年，秘书处还公布了提交某候选人姓名的委员会某个委员的函件全文。在有些情况下，关于是谁提出的候选人的信息在选举以前应要求向各国政府口头提供。1985年，法律顾问卡尔-奥古斯特·弗莱施豪尔决定秘书处在特定情况下不得采用这一做法，因为这受到某种保密的限制，即提交候选人资格的委员要求，除选举前向委员会委员透露外，不得透露提供候选人资格的来源。 [↑](#footnote-ref-48)
49. 49 秘书处编写的候选人名单仅供了解情况，不一定决定谁的名字将出现在选票上。例如，在2002年补足一个席位的临时空缺的选举之前，秘书处分发了以前说明（宣布该空缺，A/CN.4/522号文件）的增编，载有唯一候选人的名字（A/CN.4/522/Add.1号文件）。后来，在选举之前不久收到了另一份提名。鉴于没有时间分发另一份增编，第二份提名由主席口头宣布，并且向委员会委员散发了一份来文。在选举时，两名候选人的姓名都出现在选票上，随后第二个候选人当选。 [↑](#footnote-ref-49)
50. 50 有时个人，而不是委员会委员推举自己或他人作为临时空缺候选人。1959年，有一名候选人就是由非委员会委员的某个人推举的。秘书处非正式分发了其履历。在委员会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秘书指出“秘书处在编制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时必须依据某种规则，但秘书处可能会收到来自各个来源的候选人名单，从而感到很为难。因此，在他看来，最好由会员国政府或委员会委员推举候选人。”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某个委员推举某个人作为候选人，但没有对该候选人投票。1976年，法律顾问收到了来自某个人的信函，要求将其登记为空缺候选人，并说明委员会某个委员将推举他为候选人。该人的姓名在政府提名后才被列入秘书处的候选人名单。向委员会委员分发的秘书处文件载有该政府的信函，而不是该人的私人来函。（没有委员会任何委员提名的该人的姓名记录。） [↑](#footnote-ref-50)
51. 51 实际上，委员会在不同时期曾在会议开幕前举行过填补临时空缺的选举。委员会可在较晚的时期或者下一届会议上选举填补会议期间出现的临时空缺。 [↑](#footnote-ref-51)
52. 52 这种做法类似于大会的无记名投票选举。见大会议事规则第九十二条。1979年，大会决定“在附属机构的选举中，如候选人数与应填补席位相等，即不必进行无记名投票，这个惯例应订为标准办法，并应适用于大会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但如有代表团特别要求对某一项选举举行投票时，则不在此限。”见大会议事规则附件五，第16段。委员会在1985年（因Ni Jhengyu选入国际法院产生了空缺）、1995年、2003年（因罗伯特·罗森斯托克辞职出现了临时空缺）和2006年审议了填补临时空缺是否应遵守这一惯例的问题。在第一种情况（1985年）下，委员会还是决定继续进行无记名投票，一部分原因是它担心通过鼓掌方式选举产生的委员与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委员可能有所不同（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无记名投票程序选举另三位成员来填补另一个区域集团的临时空缺）。在1999年和2000年届会举行的选举中采用了类似的作法，也涉及不只一个区域集团的若干个席位，有的区域集团只有一位候选人，而别的区域集团有几位候选人竞选：举行了无记名投票（没有考虑能否采用鼓掌程序）。在1995年、2003年和2006年选举中，委员会决定采用鼓掌程序，当时只收到了一个公开席位的一个提名而且根据的是全体委员提出的请求（尽管是暗示的，情况与1995年选举相同），由于赞同鼓掌选举程序而没有采用无记名投票程序。 [↑](#footnote-ref-52)
53. 53 1954年以前，委员会在非公开会议上对候选人进行审议后在公开会议上通过选举来填补临时空缺。自1954年以来，委员会的一贯做法是在非公开会议上通过选举（或在若干情况下通过鼓掌）来填补空缺（1995年会议除外，当时在公开会议上选出了一名委员，见《199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卷，第2378次会议，第7-9段）。没有非公开会议的简要记录。 [↑](#footnote-ref-53)
54. 54 尽管委员会章程没有要求临时空缺的候选人应该来自其前任所在的区域集团，但自1956年制定了区域集团分配办法以来，提名填补临时空缺的人总是来自同一个区域集团。因此，除了遵守第9条第1款，还应适用第11条，因为人们一贯认为，临时空缺的选举程序不能用于颠覆大会第36/39号决议最近制定的区域集团分配办法。秘书处在宣布1985年和1990年选举的临时空缺说明（分别为A/CN.4/386和A/CN.4/433号文件）时阐明了这一点，说明中提及了区域集团分配办法。这种做法已经停用，因为采用区域集团分配办法早已成为一种惯例。 [↑](#footnote-ref-54)
55. 55 在早些年里，委员会通常根据离职委员的姓名字母顺序举行单独选举来填补每个空缺。1973年，委员会决定同时就同一区域集团的两个空缺进行投票。1985年在填补同一区域集团的三个空缺时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但举行了单独选举来填补另一个区域集团的一个空缺。2003年委员会对东欧集团内同时产生的两个空缺再次采用这种程序，而该年内另一个区域集团在不同的时间产生了两个空缺（一个在届会第二期会议之前，一个在届会第二期会议期间），举行了两次单独选举来填补这两个空缺。 [↑](#footnote-ref-55)
56. 56 见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二五条。 [↑](#footnote-ref-56)
57. 57 空白选票视为弃权。 [↑](#footnote-ref-57)
58. 58 见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二六条。 [↑](#footnote-ref-58)
59. 59 见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三二条。 [↑](#footnote-ref-59)
60. 60 主席宣布时并不提及非公开会议上的选票结果，也不提及被审议的人员。直到补足所有空缺后才宣布结果。 [↑](#footnote-ref-60)
61. 61 大会1955年12月3日第986 （X）号决议。另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0，A/3028号文件，第21-26段。 [↑](#footnote-ref-61)
62. 62 见《195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159号文件，第38段。另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一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3，A/3520号文件，第94-100段。 [↑](#footnote-ref-62)
63. 63 见该章程第2条，第1款。 [↑](#footnote-ref-63)
64. 64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一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9，A/3427号文件；《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7，A/4939号文件；和《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第63次会议》第145-172段，以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37，A/36/244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64)
65. 65 大会1950年12月12日第486 （V）号决议将1948年选出的委员会委员的任期延长到五年。1955年，委员会提出一项对其章程第10条的正式修正案，大会在1955年12月3日的第985 （X）号决议接受了该修正案，它于1957年1月1日开始生效。所以，委员会的选举是在如下各年举行的：1948、1953、1956、1961、1966、1971、1976、1981、1986、1991、1996、2001和2006年。 [↑](#footnote-ref-65)
66. 66 见《196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7209/Rev.1号文件，第98段（a）。 [↑](#footnote-ref-66)
67. 67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6和94（b），A/7746号文件，第117段。 [↑](#footnote-ref-67)
68. 68 见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第六委员会，附件一》，第5段（d）。 [↑](#footnote-ref-68)
69. 69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4段。 [↑](#footnote-ref-69)
70. 70 根据大会1950年12月12日第485 （V）号决议的修改。委员会的委员支领旅费，并根据最初通过的章程第13条领取每日津贴。1950年，大会注意到向委员会委员支付的薪酬数额不足，决定修改章程的此项规定，谨记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委员会委员的知名度和选举办法，并考虑到需要各委员花费大量时间出席可能很长的会议的委员会的工作性质和范围，向委员会委员支付旅费和特殊津贴。 [↑](#footnote-ref-70)
71. 71 大会在1968年12月21日第2489 （XXIII）号决议中确定并在1975年12月17日第3536 （XXX）号决议和1980年12月17日第35/218号决议中重申的指导酬金支付的基本原则是，除标准水平的生活补贴外，通常不能向联合国机构或附属机构的成员支付其他费用或任何其他报酬，除非大会有明确规定。向委员会委员支付的酬金由大会特殊授权，其额度由秘书长审查并不时修改。1981年，向委员会委员支付的酬金修改如下：主席-5 000美元；其他委员-3 000美元；在两届会议期间编写报告的特别报告员另外领取2 500美元。1998年，秘书长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大会似宜考虑将薪金增加25%，自1999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A/53/643号文件）。大会2002年3月27日第56/272号决议决定向委员会支付的酬金额度为每年1美元，以便利用节省下来的资源恢复向纽约常驻代表团提供因特网服务，这种服务由联合国秘书处提供，但由于受预算限制必须停止（见大会2002年3月27日第56/254D号决议）。在2002年其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第56/272号决议是在大会选举其委员后通过的，而且作出上述决定时未曾与委员会协商；委员会认为上述决定在程序和内容上既不符合联合国处理事务时所遵循的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委员会委员们花费时间开展其工作所体现出的服务精神；强调上述决议尤其影响到特别报告员，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报告员，因为该决议缩减了对其研究工作的资助；由于对支付象征性酬金所涉的行政费用表示关注而决定不领取这一酬金（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525-531段）。2004至2006年，委员会在其第五十五届至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继续沿用这种不收取象征性酬金的做法。委员会主席写给第六委员会主席一封信，提请其关注这一事项（A/C.6/57/INF/2号文件）。委员会在其第五十五届至第五十八届会议报告中重申了这些观点（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47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69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501段和《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69段）。2006年，委员会促请大会重新审议这一事项，以期恢复特别报告员的酬金。 [↑](#footnote-ref-71)
72. 72 见《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1858号文件，第60-71段。 [↑](#footnote-ref-72)
73. 7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49，A/2088号文件。 [↑](#footnote-ref-73)
74. 74 当委员会在联合国纽约总部或者作为《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缔约国的会员国召集会议时，委员会委员有权享受特派专家的特权和豁免（第六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一卷，第15和26页。 [↑](#footnote-ref-74)
75. 75 见《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9段。 [↑](#footnote-ref-75)
76. 76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13段，以及大会1979年12月17日第34/141号决议。 [↑](#footnote-ref-76)
77. 77 自1974年以来，委员会一直在选举起草委员会主席。以前，委员会第一任副主席也是起草委员会主席。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45段。 [↑](#footnote-ref-77)
78. 78 按照委员会的惯例，主席及其他四位主席团成员的职务是由不同区域集团的国民轮流担任的。 [↑](#footnote-ref-78)
79. 79 大会议事规则第一O六条较详细地说明了主席的职能。 [↑](#footnote-ref-79)
80. 80 见大会议事规则第一O五条。 [↑](#footnote-ref-80)
81. 81 见《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73段（a）。 [↑](#footnote-ref-81)
82. 82 早些年，委员会并非总是成立规划小组，如果成立，也不经常在审查其报告的扩大主席团内开会。近年来，委员会更经常地沿用成立规划小组这种作法，由第一副主席担任小组主席，并且作为委员会的一个附属机构，直接向委员会提交报告。 [↑](#footnote-ref-82)
83. 83 委员会决定条款草案的评注应在每届会议期间尽早在全体会议上进行审议，并同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分开审议。见《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99页。尽管如此，自1990年代以来，委员会的做法一直是审议和通过评注，将此作为其年度报告通过过程的一部分，这主要是为了实际需要。 [↑](#footnote-ref-83)
84. 84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02和204段。 [↑](#footnote-ref-84)
85. 85 见《198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39段。 [↑](#footnote-ref-85)
86. 86 另见下文对特别报告员可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的讨论。 [↑](#footnote-ref-86)
87. 87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i）和第202-211段。 [↑](#footnote-ref-87)
88. 88 在“小型辩论”安排下，主席受权偏离某一专题的既定发言人名单，允许委员们就一位发言人在“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作出反应或提出评论意见。发言引起了“小型辩论”的发言人一般都会得到在小型辩论期间参与辩论并在小型辩论结束时作出反应的机会。 [↑](#footnote-ref-88)
89. 8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523段。 [↑](#footnote-ref-89)
90. 90 见大会议事规则第六十条。 [↑](#footnote-ref-90)
91. 91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8段。 [↑](#footnote-ref-91)
92. 92 这与大会的做法相似。见大会议事规则第六十一条。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简要记录收录在委员会年鉴（第一卷）中。此外，在全体会议上作出的重大决定由提交给大会的委员会年度报告的相关章节作简要介绍。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8段。年度报告也载有在全体会议上进行的每个专题辩论的摘要，但如果委员会通过了条文草案和评注则例外（这反映了整个委员会的立场，并且优先于辩论中所反映的委员个人的观点）。 [↑](#footnote-ref-92)
93. 93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85-201段。 [↑](#footnote-ref-93)
94. 94 实际上特别报告员一职往往在来自不同区域的委员之间进行分配。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85和186段。对本议程的大多数专题，委会员都会任命一位委员来担任特别报告员，但也有例外，如为“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问题”专题任命了两位特别报告员，为“纽伦堡原则的系统表述”和“治罪法草案”两个专题任命了一位特别报告员，为“公海制度”和“领海制度”两个专题任命了一位特别报告员。以下专题没有任命特别报告员：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扩大参加在国际联盟主持下所缔结的一般多边条约；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和不得侵犯问题；审查多边缔约拟订过程；以及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工作组主席履行了一般由特别报告员履行的某些职责。例如，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小组主席对有关该专题的一份详细研究报告定稿，作为该研究小组得出的一套结论的补充文件。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37段。 [↑](#footnote-ref-94)
95. 95 国家责任问题特别报告员罗伯托·阿戈在1978年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后从委员会辞职。委员会主席致函国际法院院长，请求阿戈法官继续以私人身份在委员会供职，以便协助委员会完成国家责任问题草案的第一部分。国际法院同意了这一请求，以便促进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问题的工作，它认为阿戈法官可以以个人和私人身份协助委员会审议他作为主要作者的某项草案的最后几条条款；他不得被任命、指定或授予任何官衔，如“专家顾问”；并且必须首先履行其法官职责。阿戈先生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出席了委员会第三十一届和第三十二届会议。1979年，他向委员会介绍了他的第八份报告并对该报告发表了意见。1980年，他向委员会提交了第八份报告增编。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9段和《198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8段。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特别报告员斯蒂芬·M. 施韦贝尔在1981年从委员会辞职后，继续并完成了他关于该专题的第三份报告的研究工作，他是在从委员会辞职前开始编写这份报告的。见《198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51段。国家继承方面的国籍专题特别报告员瓦奇拉夫·米库尔卡在被任命为编纂司司长（兼委员会秘书）后，在1999年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之前辞去在委员会中的职务。他对各国政府就1997年一读通过的关于国际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的条文草案提出的评论和意见所作的分析随后作为秘书处的备忘录分发（见A/CN.4/497号文件），并在委员会1999年届会上提交委员会。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0段。 [↑](#footnote-ref-95)
96. 96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104段。 [↑](#footnote-ref-96)
97. 97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88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载入了委员会的年鉴。 [↑](#footnote-ref-97)
98. 98 见《198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71段。 [↑](#footnote-ref-98)
99. 99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f）和第189和190段。委员会多次强调它极为重视特别报告员及时提交报告的问题，以便能够及早地处理和分发文件，使委员们有时间研读报告。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498段和《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62段。有时，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或者报告增编是在会议期间根据辩论发展情况提交的。例如，2004年，针对全体会议辩论期间出现的问题，“外交保护”专题特别报告员提交了一份关于“干净的手”原则是否与外交保护专题有关的备忘录，随后作为其第六份报告分发。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54段。 [↑](#footnote-ref-99)
100. 100 委员会还建议，如果对章程进行任何修订，应在不区别编纂和逐渐发展的情况下确认协商小组的原则。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g）和第191-195段。实际中援用这种机制的程度取决于特别报告员，并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专题的复杂性。某些特别报告员情愿独立开展工作基本上不需要指导。其他特别报告员偶尔寻求某些同事的帮助，即使是非正式的帮助。在某些情况下，在“非正式协商”框架内寻求这种指导。例如，在2002年届会上举行了一次非正式协商，为“外交保护”专题特别报告员提供了船员或机组人员以及企业公司人员和股东的外交保护问题方面的指导。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113段。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协商小组设立为形式更为正式的工作组（下节将对此进行讨论）。例如，委员会在2001年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以指导国家责任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评注中采用什么办法。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43段。 [↑](#footnote-ref-100)
101. 101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00段。 [↑](#footnote-ref-101)
102. 102 见《199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08段。评注的主要作用是说明案文本身，适当参照关键的决定、学说和国家实践，说明案文反映、发展或延伸法律的程度。一般说来，这些评论的作用不是反映对二读通过的案文的分歧，这些分歧可以在最后通过案文时在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反映并且在委员会报告中予以反映。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8段。 [↑](#footnote-ref-102)
103. 103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h）。 [↑](#footnote-ref-103)
104. 104 委员会在2002年其第五十四届会议上首次为“国际法不成体系”专题设立“研究小组”，委员会认识到该专题的独特性，认为该专题更适合正式研究，而不是系统地表述条款草案。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493和510段。 [↑](#footnote-ref-104)
105. 105 实际上，“工作组”、“小组委员会”和“研究小组”在程序、文件发放、提交委员会的实体报告结构方面都比协商小组更正规，后者包括“非正式协商”，例如非正式协商一般都得不到口译服务。另见脚注85中的讨论。 [↑](#footnote-ref-105)
106. 106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7段。 [↑](#footnote-ref-106)
107. 107 名额有限的工作组成员名单见委员会关于设立工作组的本届会议报告。 [↑](#footnote-ref-107)
108. 108 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类工作组主席随后被委员会任命为专题特别报告员。 [↑](#footnote-ref-108)
109. 109 这种小组的设立与章程第16条（d）和（i）的逐渐发展有关。 [↑](#footnote-ref-109)
110. 110 委员会在2001年为这一专题设立了两个工作组。 [↑](#footnote-ref-110)
111. 111 该工作组由扩大的主席团规划小组设立。 [↑](#footnote-ref-111)
112. 112 委员会在2003年为这一专题设立了两个工作组。 [↑](#footnote-ref-112)
113. 113 这些工作组通常由指派负责各专题的特别报告员担任主席，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例如，“国家的单方面行为”专题特别报告员在为该专题设立的工作组存在的八年里只担任了三年工作组主席（1999-2001年）。实际上，在工作组存在的后四年（2003-2006年），该工作组破例由另一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担任主席，尽管没有获得这种身份。同样，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1993和1994年）和共有的自然资源（2005和2006年）两个工作组也由相关的特别报告员之外的委员会委员担任主席。 [↑](#footnote-ref-113)
114. 114 这些工作组通常成员较多，没有任命特别报告员。 [↑](#footnote-ref-114)
115. 115 例如，起草国际刑事法院草案的工作组甚至在起草任何条款之前就开始将重点放在可达成一致的某些基本建议上面。 [↑](#footnote-ref-115)
116. 116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7段。在授权和程序方面，起草委员会与工作组也存在着差别。起草委员会主要着眼于起草问题，而工作组的授权往往更为宽泛，涉及审议实质性事项。在程序一级，起草委员会采取更正式的程序，涉及其主席提交书面报告和发表详细的口头声明。各工作组往往采用更加灵活的工作方法，这取决于手头处理的任务性质。同样，工作组的报告程序更加灵活，没有要求报告必须是书面报告，也不需要详细说明工作组作出的决定。 [↑](#footnote-ref-116)
117. 117 例如，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在“共有的自然资源”专题范围内通过的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的一读，（由于该专题的技术性质）主要是在不设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帮助下完成的（见第三部分B，第3节）。 [↑](#footnote-ref-117)
118. 118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8段。 [↑](#footnote-ref-118)
119. 119 例如，委员会在2003年其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员的建议，设立了“国际组织的责任”专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审议草案第2条。该工作组编写的经过修订的条款草案随后提交起草委员会。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7-48段。同样，2004年第五十六届会议上设立的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起草委员会收到了一份在该届会上设立的、审议特别报告员的提议的工作组起草的草案。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170-171段。2000年第五十二届和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为“外交保护”专题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磋商小组也行使类似的职能，以审议特别报告员对具体条款草案提出的建议。在这两种情况下，“非正式协商”中系统表述的案文或者拟订的准则都提交给起草委员会。见《200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12和495段；以及《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166段。 [↑](#footnote-ref-119)
120. 120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9段。一个工作组的最终工作成果可能是该工作组主席在全体会议上向委员会所作的口头报告，它反映在简要记录或可能载于委员会报告的作为文件印发的一份书面报告中。 [↑](#footnote-ref-120)
121. 121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k）。 [↑](#footnote-ref-121)
122. 122 国际法委员会设立起草委员会性质的各委员会，是为了处理其头三届会议上的特定专题或问题。但国际法委员会自1952年第四届会议以来，在每届会议上都使用一个常设起草委员会。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45段。 [↑](#footnote-ref-122)
123. 123 见《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71段和《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j）和第214段。 [↑](#footnote-ref-123)
124. 124 国际法委员会现在习惯采取的多语种起草的做法，不同于仅仅将特别报告员的工作语文译成其他工作语文的做法，这样做常常会显示一些出乎意料的实质性问题。这便为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增加了新的责任。在完成其关于一套条款草案的工作后，起草委员会不同语文小组的成员一般都单独开会，以使其各自语种的案文同委员会通过的权威版本相一致。 [↑](#footnote-ref-124)
125. 125 见《198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38段。 [↑](#footnote-ref-125)
126. 126 见《198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37段和《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2段。 [↑](#footnote-ref-126)
127. 127 见《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859号文件，第65段。 [↑](#footnote-ref-127)
128. 128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47段。实际上在起草委员会上加入协商一致的成员在全体会议的讨论中都不反对这些条款草案。 [↑](#footnote-ref-128)
129. 129 见《198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35-239段。 [↑](#footnote-ref-129)
130. 130 没有关于起草委员会非公开会议的简要记录。但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收录的国际法委员会简要记录反映了起草委员会主席的发言。 [↑](#footnote-ref-130)
131. 131 见《194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提交给大会的报告，第12段。 [↑](#footnote-ref-131)
132. 132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b）和第177段。 [↑](#footnote-ref-132)
133. 133 A/CN.4/1号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48.V.1），以文件编号A/CN.4/1/Rev.1重新印发（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48.V.1（1））。 [↑](#footnote-ref-133)
134. 134 见《196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7209/Rev.1号文件，附件和《1970年……年鉴》，第二卷，A/CN.4/230号文件。 [↑](#footnote-ref-134)
135. 135 见《197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CN.4/245号文件。 [↑](#footnote-ref-135)
136. 136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46-248段和附件二。 [↑](#footnote-ref-136)
137. 137 见《196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5209号文件，第24-62段；《1967年……年鉴》，第二卷，A/6709/Rev.1号文件，第49段；《1968年……年鉴》，第二卷，A/7209/Rev.1号文件，第95-101段；《1969年……年鉴》，第二卷，A/7610/Rev.1号文件，第91段；《1970年……年鉴》，第二卷，A/8010/Rev.1号文件，第87段；《197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8410/Rev.1号文件，第119-128段；《1972年……年鉴》，第二卷，A/CN.4/254号文件；《1973年……年鉴》，第二卷，A/9010/Rev.1号文件，第134-176段；《1977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6-111段；《199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68-370段；《1995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98-503段；《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44-248段和附件二；《1997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38段；《199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51-554段；《199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40-644段；《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26-733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517-521段；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62-364段；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500段；和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56-260段。 [↑](#footnote-ref-137)
138. 138 例如，大会根据1999年12月9日第54/111号决议鼓励委员会着手挑选下一个五年期的符合各国的愿望和密切关注事项的新专题，并提出这些新专题的可能的大纲和相关资料，以便利大会对此作出决定。 [↑](#footnote-ref-138)
139. 139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17条的规定，秘书处有时会应工作组提出的请求提交与可能出现的新专题有关的正式和非正式文件，以列入长期工作方案。例如，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61段。 [↑](#footnote-ref-139)
140. 140 这些专题可从委员会1996年确定的今后可能审议的专题或委员会委员建议的专题中选出。 [↑](#footnote-ref-140)
141. 141 见《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69段。 [↑](#footnote-ref-141)
142. 142 自1992年以来，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列入了下列专题：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法律和惯例（1993年，见《199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27段）；国家继承及其对自然人和法人国籍的影响（1993年，见《1993年……年鉴》，第427段）；外交保护（1995年，见《1995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01段）；国家海事管辖范围以外的沉船的所有权及保护（1996年，见《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48段）；国家的单方面行为（1996年，见《1996年……年鉴》，第248段）；国际组织的责任（2000年，见《2000年……年鉴》，，第729段）；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源（2000年，见《2000年……年鉴》，第729段）；国际法不成体系所产生的风险（2000年，见《2000年……年鉴》，第729段）；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2000年，见《2000年……年鉴》，第729段）；对外国人的驱逐（2000年，见《2000年……年鉴》，，第729段）；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2004年，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62-363段）；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2006年，见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57段）；国际组织的管辖豁免（2006年，见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57段）；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2006年，见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57段）；信息跨界流动的个人数据保护（2006年，见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57段）；以及域外管辖权（2006年，见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57段）。 [↑](#footnote-ref-142)
143. 143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a）和第165段。关于随后几年按照这一程序对长期工作方案进行的审议，见《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38段；《199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51-554段；《199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42段；《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26-733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4/10），第642段；同上，《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5/10），第726-733段；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521号；同上，《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39段；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62-363段；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56-261段。 [↑](#footnote-ref-143)
144. 144 见《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38段；《199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53段和《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56段。 [↑](#footnote-ref-144)
145. 145 A/CN.4/1号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48.V.1），以文件编号A/CN.4/1/Rev.1重新印发（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48.V.1（1））。 [↑](#footnote-ref-145)
146. 146 委员会在1952年第四届会议上决定按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使用术语“领海”而不是“领水”。 [↑](#footnote-ref-146)
147. 147 委员会在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决定将该专题的标题改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68段。实际上，该专题仍然沿用以前的标题“国家责任”。 [↑](#footnote-ref-147)
148. 148 这一分题的原定标题是“国家对条约以外的资料来源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的继承”。委员会在1968年第二十届会议上通过了上述新标题。 [↑](#footnote-ref-148)
149. 149 委员会从未对第三个分题进行实质性审议。 [↑](#footnote-ref-149)
150. 150 列入委员会2006年的长期工作方案（见脚注142）。 [↑](#footnote-ref-150)
151. 151 见《194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提交给大会的报告，第23段。 [↑](#footnote-ref-151)
152. 152 大会在1959年11月21日第1400 （XIV）号决议中请委员会在可行情况下尽快开始编纂与庇护权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 [↑](#footnote-ref-152)
153. 153 见《196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4425号文件，第39段。1967年，大会在考虑了国际法委员会按照大会第1400 （XIV）号决议完成的编纂工作之后，通过了《领土庇护宣言》（大会1967年12月14日第2312 （XXII）号决议）。 [↑](#footnote-ref-153)
154. 154 见《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09段。1977年年初，按照大会1975年12月9日第3456 （XXX）号决议，秘书长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协商后，于1977年1月10日至2月4日在日内瓦召开一次联合国领土庇护问题会议。此次会议结束时没有作出结论。见《1977年联合国年鉴》，第31卷，第625-626页。会议提出的以下建议也没有得到采纳：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在适当时间再召开一次领土庇护问题会议的问题（A/CONF.78/12，第25段）。至于外交庇护问题，大会1975年12月15日第3497 （XXX）号决议决定在以后一届会议上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 [↑](#footnote-ref-154)
155. 155 委员会根据其章程第24条对该专题进行了审议。 [↑](#footnote-ref-155)
156. 156 该专题的原定标题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委员会在1987年其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建议大会将该专题的标题修改如上，以便使不同语文的文本更加统一和对等。大会1987年12月7日第42/151号决议赞同这一建议。 [↑](#footnote-ref-156)
157. 157 委员会在1968年第二十届会议上决定在不改变其含义的情况下修改该专题的标题，将“政府间”改为“国际”。 [↑](#footnote-ref-157)
158. 158 委员会1958年提交了关于外交交往和豁免的定稿后，在特别外交专题下对这一专题进行了初步审议（见第145和146页）。 [↑](#footnote-ref-158)
159. 159 委员会在题为“起草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议定书”的议程项目下初步审议了这一专题。 [↑](#footnote-ref-159)
160. 160 在1977年12月8日第32/48号决议中，大会请秘书长就详细制定多边条约所使用的技术和程序编写一份报告。大会考虑到委员会对于编拟多边条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还在这份决议中规定了委员会可以参加这一审查。委员会同各国政府一样被邀请提出关于该专题的意见，以供载入秘书长的报告。根据这一邀请，委员会在1978年和1979年分别举行的第三十届和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一专题。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84-195段。委员会的意见在1979年题为“工作组关于多边条约拟订程序审查的报告”的委员会文件中转交给了秘书长。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 [↑](#footnote-ref-160)
161. 161 该专题的原定标题是“与对条约的保留有关的法律和实践”。委员会在1995年其第四十七届会议上认为专题标题应当修改如上。 [↑](#footnote-ref-161)
162. 162 委员会在这一标题下对该专题的研究是委员会于1996年在其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完成关于“国家继承及其对自然人和法人国籍的影响”这一专题的初步研究后进行的。 [↑](#footnote-ref-162)
163. 163 该专题的原定标题是“国际法不成体系引起的危险”。在2002年其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专题标题修改如上。 [↑](#footnote-ref-163)
164. 164 该专题是外交交往和豁免专题的后续行动。 [↑](#footnote-ref-164)
165. 165 该专题是海洋法专题的后续行动。 [↑](#footnote-ref-165)
166. 166 该专题也是外交交往和豁免专题的后续行动。 [↑](#footnote-ref-166)
167. 167 该专题是条约法专题的后续行动。 [↑](#footnote-ref-167)
168. 168 该专题也是条约法专题的后续行动。 [↑](#footnote-ref-168)
169. 169 该专题是国家责任专题的后续行动。 [↑](#footnote-ref-169)
170. 170 该专题是大会为了国际外交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而送交委员会的（大会1976年12月13日第31/76号决议和1978年12月19日第33/140号决议）。 [↑](#footnote-ref-170)
171. 171 委员会开展关于“对条约的保留”专题的工作，是为了解决与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特别载有的条约的保留有关的各项规定中出现的含糊和漏洞。《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是以委员会关于条约法的早期条款草案为基础的。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专题，委员会在1966年通过关于条约法的条款草案时，认为条约缔约方之间爆发敌对行动的情况“完全在本条款所要制定的一般条约法的范围以外”。见《196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38段，第69条第（2）段评注。后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采用了同一种办法（见附件五，F节），但其中列入了大意如下的一项明确的保留条款：“本公约之规定不妨碍……国家间发生敌对行为所引起关于条约之任何问题”（第73条）。 [↑](#footnote-ref-171)
172. 172 委员会在其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过程中审议了其中的部分专题。另外，委员会在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这一专题第二部分的工作过程中审议了国际组织责任专题的有些方面，其中涉及到国际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 [↑](#footnote-ref-172)
173. 173 该专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委员会以前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工作有关。 [↑](#footnote-ref-173)
174. 174 委员会以前在以下专题范围内审议过这一问题：依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的外交代表及其他人员的保护和不得侵犯问题（1972年关于防止和惩治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国际保护人员的条款草案，草案第6条，见《197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三章B）；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草案第9条，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0段）和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的罪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草案第54条，见《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1段）。 [↑](#footnote-ref-174)
175. 175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57段。 [↑](#footnote-ref-175)
176. 176 委员会从未对该专题（23）进行实质性审议。见脚注497。委员会在起草任何最终报告前中止了关于另两个专题（22）和（34）的工作。 [↑](#footnote-ref-176)
177. 177 第848号文件；II/2/46，《1945年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第九卷，第177-178页。 [↑](#footnote-ref-177)
178. 178 见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第六委员会，附件一》，第7段。另见委员会章程第15条。 [↑](#footnote-ref-178)
179. 179 与编纂国际法不同，在国际法逐渐发展方面可能产生的后果之间作出这种区别并非总能在委员会获得一致同意。例如，见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关于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时机的辩论，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61-67段。 [↑](#footnote-ref-179)
180. 180 见国际法逐渐发展和编纂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第六委员会，附件1》，第7段。 [↑](#footnote-ref-180)
181. 181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7段（a）和第156-159段。 [↑](#footnote-ref-181)
182. 182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13段。 [↑](#footnote-ref-182)
183. 183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16段。 [↑](#footnote-ref-183)
184. 184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22段。 [↑](#footnote-ref-184)
185. 185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35段。 [↑](#footnote-ref-185)
186. 186 例如，可能会要求各国政府提供法律案文、法令、司法裁决、条约、外交信件和委员会章程第19条规定的其他相关文件。 [↑](#footnote-ref-186)
187. 187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36-43段。 [↑](#footnote-ref-187)
188. 188 应委员会要求或按照其自行决定，特别报告员初次提交的报告可以是一般性和解释性的，可采取工作文件或初步报告的形式。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39段。 [↑](#footnote-ref-188)
189. 189 章程第20条规定了条款草案评注的内容。可以在一读书面评注与描述采用的替代解决办法和二读通过的条款草案评注之间作出区别，第一种情况可能包括委员会内少数人的观点，最后一种情况只反映整个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立场。 [↑](#footnote-ref-189)
190. 190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44-49段。 [↑](#footnote-ref-190)
191. 191 见《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859号文件，第60和61段。 [↑](#footnote-ref-191)
192. 192 对评注进行了修改以解释最后的条款草案，包括在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的解决方法，并进行了更新，以载入最近的判例。 [↑](#footnote-ref-192)
193. 193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50-56段。 [↑](#footnote-ref-193)
194. 194 根据章程第23条第2款，大会可将草案送回委员会重新审议或重新起草。大会在1953年对委员会提交的仲裁程序条款草案采取了这种行动（大会1955年12月14日第989 （X）号决议），还对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采取了这种行动（1998年12月8日第53/98号决议）。 [↑](#footnote-ref-194)
195. 195 例如，见《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卷，第123页，第132-135页；《1953年……年鉴》，第二卷，A/2456号文件，第54段；《1956年……年鉴》，第二卷，A/3159号文件，第25和第26段；《1961年……年鉴》，第二卷，A/4843号文件，第32段；《1966年……年鉴》，第二卷，A/6309/Rev.1号文件，第35段；《1967年……年鉴》，第二卷，A/6709/Rev.1和Rev.1/Corr.1号文件，第23段；《197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8410/Rev.1号文件，第50段；《197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9610/Rev.1号文件，第83段；《197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2段；和《198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5段和《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56和157段。 [↑](#footnote-ref-195)
196. 196 后来被列入包罗万象的海洋法草案的这些草案成为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58年）所通过的两项公约的基础。 [↑](#footnote-ref-196)
197. 197 委员会的这一建议反映在提交给大会的关于该问题的两项公约草案第12条的相同规定中，该条写道：“已经大会通过的本公约应……开放供签署……并须经批准。” [↑](#footnote-ref-197)
198. 198 委员会建议大会采取适当措施缔结一项关于特别使团的公约。 [↑](#footnote-ref-198)
199. 199 委员会建议大会或国际全权代表会议拟定一项公约。 [↑](#footnote-ref-199)
200. 200 委员会建议大会拟定一项公约。 [↑](#footnote-ref-200)
201. 201 关于“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易于查考的方法”这一专题，鉴于该专题工作的性质，没有要求委员会根据章程第23条第1款提出建议。 [↑](#footnote-ref-201)
202. 202 例如见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就关于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的工作中应遵循的程序进行讨论的情况，载于《194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提交给大会的报告，第53段。大会注意到该宣言草案，并敦请各会员国和各国法学家对此予以注意（1949年12月6日第375 （IV）号决议），这表明它似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委员会报告中所说的观点，即在执行特别任务时，委员会有权采取它认为有助于提高其工作效率的程序，即便这种程序不同于章程中关于逐渐发展或编纂工作规定的程序。见《194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提交给大会的报告，第53段。另见《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6和117段。 [↑](#footnote-ref-202)
203. 203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57-61段。 [↑](#footnote-ref-203)
204. 204 关于委员会1994年向大会提交的国际刑事法院章程草案，委员会建议大会召开国际全权代表会议，以研究章程草案和缔结一项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见第108页）。关于委员会1996年向大会提交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委员会建议大会选择最适当的形式，确保对该草案的最广泛的接受（见第103页）。 [↑](#footnote-ref-204)
205. 205 这一年，委员会提交了载有国际刑事法院章程草案最后定本的报告（见第108页）。 [↑](#footnote-ref-205)
206. 206 委员会在1977年第二十九届会议上提出，它打算根据所审议的个别专题的具体特点经常对改进其工作方法和程序的可能性进行审查。见《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20段。委员会在197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对其工作方法进行全面审查并起草关于“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查”这一项目的意见时重申了这一点，并在1980年举行的下一届会议上再次重申这一点。分别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16段和《198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85段。 [↑](#footnote-ref-206)
207. 207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16段。但委员会在1973年注意到，“委员会的工作，不论有什么改进办法，都明显具有固定的周期性，使委员会迅速应付紧急要求的能力受到一些限制。”见《197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9010/Rev.1号文件，第166段。 [↑](#footnote-ref-207)
208. 208 A/CN.4/L.76号文件。 [↑](#footnote-ref-208)
209. 209 见《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859号文件，第59-62段和第65段。 [↑](#footnote-ref-209)
210. 210 见《196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7209/Rev.1号文件，第95-102段和附件。 [↑](#footnote-ref-210)
211. 211 见《196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7209/Rev.1号文件，第98段。 [↑](#footnote-ref-211)
212. 212 见《197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10010/Rev.1号文件，第139-147段。 [↑](#footnote-ref-212)
213. 213 见大会1975年12月15日第3495 （XXX）号决议。 [↑](#footnote-ref-213)
214. 214 如前所述，委员会目前的做法是成立规划小组作为它的一个附属机构（见脚注82）。 [↑](#footnote-ref-214)
215. 215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84-195段。 [↑](#footnote-ref-215)
216. 216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 [↑](#footnote-ref-216)
217. 217 见《198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35-239段。 [↑](#footnote-ref-217)
218. 218 见《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71和373段。 [↑](#footnote-ref-218)
219. 219 见《199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04-508段。 [↑](#footnote-ref-219)
220. 220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2-243段。 [↑](#footnote-ref-220)
221. 221 关于具体建议的完整清单，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 [↑](#footnote-ref-221)
222. 222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l）和第221段。 [↑](#footnote-ref-222)
223. 223 见大会1997年12月15日第52/156号决议。 [↑](#footnote-ref-223)
224. 224 见大会议事规则第一六一条。 [↑](#footnote-ref-224)
225. 225 见《194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提交给大会的报告，第5段。 [↑](#footnote-ref-225)
226. 226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7段。 [↑](#footnote-ref-226)
227. 227 同样，某一专题虽然可能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但在一读通过条款草案之后与提请各国政府对条款草案提出评论意见之前的间隙，可能没有列入会议议程。 [↑](#footnote-ref-227)
228. 228 见大会议事规则第五十一条。 [↑](#footnote-ref-228)
229. 229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6段。 [↑](#footnote-ref-229)
230. 230 大会议事规则第一O六条。 [↑](#footnote-ref-230)
231. 231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8段。又见大会议事规则第一O八条（法定人数）、第一二五条（法定多数）和第一二六条（“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一词的含义）。 [↑](#footnote-ref-231)
232. 232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8段。 [↑](#footnote-ref-232)
233. 233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07-210段。 [↑](#footnote-ref-233)
234. 234 只有附属机构的成员有权参与该机构作出的决定。 [↑](#footnote-ref-234)
235. 235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0段。 [↑](#footnote-ref-235)
236. 236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65段。 [↑](#footnote-ref-236)
237. 237 委员会最近的做法一直是在其报告的相关章节的导言部分对每个专题的审议情况进行更简洁的描述。 [↑](#footnote-ref-237)
238. 238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66段。 [↑](#footnote-ref-238)
239. 239 见第70 -71页。 [↑](#footnote-ref-239)
240. 240 委员会关于第一届和第二十一届会议的报告作为《大会正式记录，补编第10号》出版。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报告作为《补编第12号》出版，第三届至第二十届会议的报告作为《大会正式记录，补编第9号》出版。报告连同届会期间印发的文件一览表后来刊印在《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只有一卷的1949年年鉴除外）中。 [↑](#footnote-ref-240)
241. 241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64段。 [↑](#footnote-ref-241)
242. 242 委员会会议的简要记录以临时形式分发给其成员，并以最后形式刊印在《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中。 [↑](#footnote-ref-242)
243. 243 见大会1977年12月19日第32/151号决议，1979年12月17日第34/141号决议，1980年12月15日第35/163号决议，1981年12月10日第36/114号决议，1982年12月16日第37/111号决议和以后与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年度报告有关的所有决议。另见《198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0段。 [↑](#footnote-ref-243)
244. 244 见《198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88-190段。2004年，委员会记得，委员会曾经数度认定，就其工作程序和方法来说，简要记录是非有不可的。它认为“它们相当于准备工作，是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委员会的工作至关重要。”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67段 [↑](#footnote-ref-244)
245. 245 委员会的文件、报告和出版物也登在委员会的网站上。见www.un.org/law/ilc/。 [↑](#footnote-ref-245)
246. 246 关于委员会的讨论，见《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24-126段；《198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1和192段；《198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71段；和《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40-443段。 [↑](#footnote-ref-246)
247. 247 见《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25和126段。 [↑](#footnote-ref-247)
248. 248 委员会指出，它认为根据各国政府对调查表的答复或联合国各机构和方案提出的意见制定文件的规则，不影响秘书长根据委员会章程所承担的义务，即：只要委员会的工作及其程序和方法有此需要，就应以委员会使用的各种语文全文刊出所有这种答复。见《198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1段。 [↑](#footnote-ref-248)
249. 249 见《198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71段。 [↑](#footnote-ref-249)
250. 250 见《198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2段。 [↑](#footnote-ref-250)
251. 251 见《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23段；《198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2段。 [↑](#footnote-ref-251)
252. 252 见大会1977年12月19日第32/151号决议，1979年12月17日第34/141号决议，1980年12月15日第35/163号决议，1981年12月10日第36/114号决议，1982年12月16日第37/111号决议，1983年12月19日第38/138号决议和以后与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年度报告有关的所有决议。 [↑](#footnote-ref-252)
253. 253 委员会提到了以下文件：其年度报告、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以及各有关研究项目、研究报告和其他工作文件。 [↑](#footnote-ref-253)
254. 254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40-442段。 [↑](#footnote-ref-254)
255. 255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43段。和《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63段（重申“其对提交和开放一切与委员会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任务有关的国家实践和其他国际法渊源之资料的重视。尽管[委员会]了解尽可能简明的益处，但它强烈认为[不能]事先限制文件和研究报告的长度，特别是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footnote-ref-255)
256. 256 见《198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71段。后来在《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43段中重申了这一点。 [↑](#footnote-ref-256)
257. 257 大会1973年11月30日第3071 （XXVIII）号决议。 [↑](#footnote-ref-257)
258. 258 大会1974年12月14日第3315 （XXIX）号决议。 [↑](#footnote-ref-258)
259. 259 由于预算原因，1986年第三十八届会议缩短为十个星期。根据委员会表示的意见，第二年恢复十二个星期的会期。见《198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52段和大会1986年12月3日第41/81号决议。2005年第五十七届会议缩短至十一个星期，作为一项节省费用的措施。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497段。 [↑](#footnote-ref-259)
260. 260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m）和第224-226段。 [↑](#footnote-ref-260)
261. 261 2005年，委员会决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会期缩短一星期，作为一项节省费用的措施。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497段。 [↑](#footnote-ref-261)
262. 262 见《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76段。 [↑](#footnote-ref-262)
263. 263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n）和第227-232段。 [↑](#footnote-ref-263)
264. 264 见《199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62段。 [↑](#footnote-ref-264)
265. 265 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33-639段。 [↑](#footnote-ref-265)
266. 26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260段。 [↑](#footnote-ref-266)
267. 267 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35和638段。 [↑](#footnote-ref-267)
268. 268 见《194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提交给大会的报告，第40段；《1950年……年鉴》，第二卷，A/1316号文件，第22段；《1951年……年鉴》，第二卷，A/1858号文件，第91段；《1952年……年鉴》，第二卷，A/2163号文件，第55段；《1953年……年鉴》，第二卷，A/2456号文件，第173段；《1954年……年鉴》，第二卷，A/2693号文件，第79段；《1955年……年鉴》，第二卷，A/2934号文件，第29段。委员会最初决定在日内瓦举行第六届会议，但该届会议最后是在巴黎举行的。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693号文件，第1段。 [↑](#footnote-ref-268)
269. 269 见《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456号文件，第173段；和《195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934号文件，第26段。 [↑](#footnote-ref-269)
270. 270 见《195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934号文件，第25段。 [↑](#footnote-ref-270)
271. 271 见大会1955年12月3日第984 （X）号决议。 [↑](#footnote-ref-271)
272. 272 见《200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34段。 [↑](#footnote-ref-272)
273. 273 在此情况下应遵循的程序见委员会章程第17条第2款。 [↑](#footnote-ref-273)
274. 274 见《198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1段。委员会强调了各国政府应委员会的要求，就特定专题提出的书面意见的重要性，这是委员会同各国政府进行对话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16段。 [↑](#footnote-ref-274)
275. 275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80段；和《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17段。 [↑](#footnote-ref-275)
276. 276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d）。 [↑](#footnote-ref-276)
277. 277 见《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859号文件，第60和61段。 [↑](#footnote-ref-277)
278. 278 例如见大会1997年12月15日第52/156号决议和以后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有关的决议。 [↑](#footnote-ref-278)
279. 279 1979年以前，第六委员会提交大会的相关报告载有该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报告进行讨论的主要趋势摘要。由于某些实际原因，自1980年以来，该摘要作为委员会文件的一部分印发，题为“专题摘要”。 [↑](#footnote-ref-279)
280. 280 大会通常采取委员会建议的与其各项专题和特别任务的最后产品有关的行动，但以下除外：委员会1953年提交的仲裁程序条款草案，以及关于最惠国条款和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在有些情况下，大会对委员会通过的案文进一步开展工作然后再采取建议行动。例如，委员会在向大会转递关于国家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时，建议召开一次外交会议以通过该条约，大会设立了第六委员会工作组来审议这些条款草案中产生的若干问题。正是遵照关于这些事项的决议，大会本身才通过了一项公约（见第三部分A，第22节）。委员会在转递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时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但是，大会先设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随后又设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后者的规约草案订正文本就是1998年罗马会议审议的案文（见第三部分A，第7节（c））。委员会承认，特定的一套条款草案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是否可被接受或适于通过基本上是各国的政策问题。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82段。在编写本出版物时，大会还没有就以下条款草案的结果做出最后决定：关于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条款草案（1999年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通过）、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2001年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条款草案（2001年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外交保护条款草案（2006年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和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越境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原则草案（2006年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 [↑](#footnote-ref-280)
281. 281 这种做法并未得到所有国家的批准。例如，见联合王国在1999年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在第六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辩论期间表示的反对意见。见A/C.6/54/SR.24号文件，第35段（“作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同时又作为政府代表的这种双重作用……不能确保独立性和客观性”）。 [↑](#footnote-ref-281)
282. 282 见《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73段。委员会扩大了其工作范围，着重确定了一些特别需要评论的问题，在提交给大会的年度报告中，有一章专门用来讨论委员会乐意听取评论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就列入了这一章。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14段。这种做法得到了大会核可，大会请秘书处继续特别注意在年度报告中，就每一专题指出在哪些可能存在的具体问题上，各国政府在第六委员会提出的或以书面形式表述的意见将会特别有助于为国际法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提供有效指导。例如，见大会1989年12月4日第44/35号决议和随后关于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footnote-ref-282)
283. 283 见《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30段和《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45段。会议结束后不久，相关章节还在网站上公布。1996年，委员会建议，如有可能，应在通过有关条款草案以前确定第六委员会特别希望听到评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具有更加普遍的“战略性”，而不是涉及起草的技术问题。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c）和第181段。委员会在2003年进一步指出，特别报告员不妨提供充足的背景资料并作实质性阐述，以便更好地协助各国政府拟定其答复。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46段。 [↑](#footnote-ref-283)
284. 284 这一信息载入了大会通过的与委员会年度报告相关的议程项目决议。 [↑](#footnote-ref-284)
285. 285 2003年，按照瑞典和奥地利的倡议，大会指定在第六委员会讨论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第一个星期为“国际法周”，并且鼓励会员国考虑在第一个星期期间派法律顾问出席。见大会2003年12月9日第58/77号决议及以后的相关决议。 [↑](#footnote-ref-285)
286. 286 大会1989年12月4日第44/35号决议。 [↑](#footnote-ref-286)
287. 287 大会2000年12月12日第55/152号决议和以后的相关决议。自2004年以来，第六委员会委员与出席会议的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每年都在第六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举行非正式协商，以讨论委员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2006年举行的非正式协商还包括在纽约参加2006年选举的国际法委员会的几位委员。大会欢迎这两个机构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加强对话”，并要求继续进行非正式协商。见大会2004年12月2日第59/41号决议及以后的相关决议。 [↑](#footnote-ref-287)
288. 288 第六委员会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做了一些变动。例如见《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27-129段；《198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81和582段；和《198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42段。 [↑](#footnote-ref-288)
289. 289 这是1988年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成立的第六委员会特设工作组就处理改进第六委员会审议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方式问题提出的一个建议，以便对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有效的指导。该工作组的结论摘要见工作组主席向第六委员会所作的口头报告（A/C.6/43/SR.40号文件，第10-18段）。第六委员会第40次会议的简要记录转载于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专题摘要（见A/CN.4/L.431号文件，附件二）。 [↑](#footnote-ref-289)
290. 290 第43/169、44/35、45/41、46/54、47/33、48/31和49/51号决议。 [↑](#footnote-ref-290)
291. 291 第六委员会关于涉及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议程项目的报告指出了相关文件，刊印在每届会议的《大会正式记录》上。相关信息还可查阅第六委员会的网站：www.un.org/law/cod/sixth。 [↑](#footnote-ref-291)
292. 292 在有些情况下，大会可能会作为独立的议程项目审议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某一专题，并就此专题通过单独决议或决定。例如，如果委员会已就某一专题向大会提交了最后报告，则在委员会以后提交给大会的年度报告中不再涉及这一专题。因此，大会将在某个独立的议程项目下审议该专题，直至大会结束对该专题的审议工作。2006年，大会决定将题为“审议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问题和此类损害的损失分配问题”的单一议程项目列入其第六十二届会议（2007年）临时议程，以审议委员会制定的两套不同的条款草案（第一套为2001年通过的“预防”条款，第二套为2006年通过“赔偿责任”条款）。见大会2006年12月4日第61/36号决议。 [↑](#footnote-ref-292)
293. 293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18段。 [↑](#footnote-ref-293)
294. 294 在另一个涉及“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专题的事例中，第六委员会最初是通过为解决国际法委员会条款草案中产生的一些未决事项而设立的两个工作组参加详细制定公约草案任务的（见第三部分A，第22节）。后来，大会设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以对该公约草案案文定稿，该案文由第六委员会审议并由其提交大会审议，成为《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公约》（见附件五，M节）。 [↑](#footnote-ref-294)
295. 295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93和98段（d）。委员会委员有时也参加第六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审议，尽管他们以政府代表身份参加的。例如，在第六委员会及其设立的第一工作组中举行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的非正式协商，由国际法委员会任期内委员主持。为了对这些公约草案定稿，第六委员会于1999年设立的第二工作组和大会于2000年设立的特设委员会也由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担任主席。 [↑](#footnote-ref-295)
296. 296 该条款进一步规定了委员会酌情进行有关这些提议或草案的研究时应遵循的程序，包括向有关机构寄发调查表和在可行情况下向提出提议或草案的机关送交临时报告。 [↑](#footnote-ref-296)
297. 297 委员会章程第26条第4款特别确认委员会有必要与其任务是编纂国际法的政府间组织进行协商。 [↑](#footnote-ref-297)
298. 298 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20-627段。 [↑](#footnote-ref-298)
299. 299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b）和（r），第165段，第177-178和240段。 [↑](#footnote-ref-299)
300. 300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38段（d）。 [↑](#footnote-ref-300)
301. 30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373和453段。 [↑](#footnote-ref-301)
302. 302 见《195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卷，SR.155号文件，第16段。 [↑](#footnote-ref-302)
303. 303 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21段。 [↑](#footnote-ref-303)
304. 304 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22段。 [↑](#footnote-ref-304)
305. 305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373和453段和《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80段。 [↑](#footnote-ref-305)
306. 306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693号文件，第63段。 [↑](#footnote-ref-306)
307. 307 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20段。 [↑](#footnote-ref-307)
308. 308 日本政府、国际法协会和美国国际法学会分别成立的研究小组向国际法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有益的反馈。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21段。 [↑](#footnote-ref-308)
309. 30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53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75段；和《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509段。在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根据委员会章程第25条第（1）款，委员会建议秘书处在2007年与包括人权条约机构代表在内的联合国人权领域专家一起举行一次会议，以便讨论对人权条约的保留所涉及的问题。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68段。大会在2006年12月4日第61/34号决议中注意到建议的会议。 [↑](#footnote-ref-309)
310. 310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54段。 [↑](#footnote-ref-310)
311. 31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54段；和《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76段。 [↑](#footnote-ref-311)
312. 312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507段。 [↑](#footnote-ref-312)
313. 313 委员会注意到各国际组织提交的材料、评论和意见在委员会的编纂方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基本作用。见《198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1段。 [↑](#footnote-ref-313)
314. 314 见《197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8410/Rev.1号文件，第15段；《197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和第150-153段；和《1995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89段。 [↑](#footnote-ref-314)
315. 315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52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66段（要求国际组织再作出贡献）；和《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196段。见大会2003年12月9日第58/77号决议。 [↑](#footnote-ref-315)
316. 316 座谈会的议事录刊印在《完善国际法：国际法委员会五十周年》，1998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98.V.5）。 [↑](#footnote-ref-316)
317. 317 讨论会的议事录刊印在《国际法委员会五十年后：评价报告》，见书目选编。另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23-625段。 [↑](#footnote-ref-317)
318. 318 联系如此密切，其部分原因是国际法院中的许多法官以前是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footnote-ref-318)
319. 319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q）和第239段。 [↑](#footnote-ref-319)
320. 320 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22段，和委员会以后提交给大会的相关报告。 [↑](#footnote-ref-320)
321. 321 见大会1998年12月8日第53/102号决议和以后的决议。 [↑](#footnote-ref-321)
322. 322 例如，见委员会主席在2003年第六委员会上介绍其年度报告时表示的意见，“编纂司在委员会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仅在于该司工作人员水准很高，努力工作，大力支持委员会的工作，而且还在于该司的成员参与处理目录和实质性工作，并且提供程序性和技术性服务。这就在委员会及其秘书处之间开展了持续不断、有效的相互作用和反馈。编纂司还担任第六委员会的秘书处，这为两个机构提供了不可取代的重要联系环节。因此，编纂司可以成为对两个机构都有利的信息和独特专门知识的来源。必须维护服务质量”。见A/C.6/58/SR.14号文件，第6段。 [↑](#footnote-ref-322)
323. 323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34段。 [↑](#footnote-ref-323)
324. 324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34段。 [↑](#footnote-ref-324)
325. 325 见《198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2段。秘书处完成的实质性研究清单，见参考书目（第二卷）。 [↑](#footnote-ref-325)
326. 326 例如，如上所述，编纂司通过在1949年和1971年编写国际法概览来协助委员会审查其长期工作方案。 [↑](#footnote-ref-326)
327. 327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5号文件，第9段。 [↑](#footnote-ref-327)
328. 328 见书目选编。 [↑](#footnote-ref-328)
329. 329 见http://www.un.org/law/ilc。 [↑](#footnote-ref-329)
330. 330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8段（o）和第233-234段。 [↑](#footnote-ref-330)
331. 331 另外，根据大会的要求，委员会向秘书长提交了有关“多边条约签订过程审查”专题的最后报告，以便包含在秘书长有关该主题的报告中（见脚注160）。 [↑](#footnote-ref-331)
332. 332 委员会在各届会议上有关各专题或分题的工作反映在其有关各届会议的年度报告的相关章节中，报告转载于相应的年鉴中。在某届会议上提交委员会的相关文献也在年鉴中作了说明。 [↑](#footnote-ref-332)
333. 333 A/285号文件。 [↑](#footnote-ref-333)
334. 334 A/CN.4/2和Add.1号文件（有关《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的初步研究）。 [↑](#footnote-ref-334)
335. 335 见《194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提交大会的报告，第46-52段。 [↑](#footnote-ref-335)
336. 336 见《194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提交大会的报告，第53段。 [↑](#footnote-ref-336)
337. 337 见《194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提交大会的报告，第52段。 [↑](#footnote-ref-337)
338. 338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1316号文件，第24-94段。 [↑](#footnote-ref-338)
339. 339 即《联合国法律年鉴》（《年鉴》1962年临时卷和其后各年的铅印卷已经发行）；《联合国法律丛书》（已发行了25卷）；《条约汇编目录》（出版于1955年）；《联合国条约汇编累积索引》（最近的一卷为2007年1月31日的第41卷，它包括了《条约汇编》第2201-2250卷的索引）；《安全理事会惯例汇编》（最初出版于1954年，此后发行过补编）；《联合国各机构惯例汇编》（最初出版于1955年，后来发行过补编）；《国际仲裁裁决报告书》（已发行了25卷）。另外，联合国秘书处发行了《国际法院判决书、咨询意见和命令汇辑》（涉及1948-1991年、1992-1996年和1997-2002年期间）。 [↑](#footnote-ref-339)
340. 34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98卷，第9页和第416卷，第51页。 [↑](#footnote-ref-340)
341. 341 A/CN.4/5号文件。 [↑](#footnote-ref-341)
342. 342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22号文件。 [↑](#footnote-ref-342)
343. 343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1316号文件，第97-127段。 [↑](#footnote-ref-343)
344. 344 会员国关于委员会系统表述纽伦堡原则的文本的意见载于《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45和Add.1和2号文件。另外，特别报告员有关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第二份报告（同上，A/CN.4/44号文件）包含各代表团在大会第五届会议期间对委员会系统表述纽伦堡原则的文本提出的意见的摘要。应大会的要求，委员会考虑了各国政府对系统表述纽伦堡原则的文本的意见和建议（见脚注374）。 [↑](#footnote-ref-344)
345. 345 关于里卡多·J. 阿尔法罗的报告，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5号文件，关于A. E. F. 桑德斯特罗姆的报告，同上，A/CN.4/20号文件。 [↑](#footnote-ref-345)
346. 346 题为“国际刑事司法机构问题的历史纵览”备忘录（A.CN.4/7/Rev.1号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49.V.8）；以及有关国际刑法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参考书目（A/CN.4/28号文件）。 [↑](#footnote-ref-346)
347. 347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1316号文件，第128-145段。 [↑](#footnote-ref-347)
348. 348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届会议，补编第11号》（A/2136）。 [↑](#footnote-ref-348)
349. 34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九届会议，补编第12号》（A/2645）。 [↑](#footnote-ref-349)
350. 350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附件》，第一卷，议程项目8，A/BUR/171/Rev.1号文件，第4段。 [↑](#footnote-ref-350)
351. 35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附件》，第一卷，议程项目8，A/7250号文件，第10段。 [↑](#footnote-ref-351)
352. 35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A/BUR/182号文件，第26段。 [↑](#footnote-ref-352)
353. 35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6，A/9890号文件，第2段。 [↑](#footnote-ref-353)
354. 35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8卷，第277页。 [↑](#footnote-ref-354)
355. 355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6，A/1372号文件。 [↑](#footnote-ref-355)
356. 356 在这届会议上，委员会回顾了在1950年第二届会议上根据条约法专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初步讨论（A/CN.4/23号文件）。 [↑](#footnote-ref-356)
357. 357 见《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41号文件。 [↑](#footnote-ref-357)
358. 358 见《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L.9和A/CN.4/L.14号文件。 [↑](#footnote-ref-358)
359. 359 国际法院宣布，一个国家作了并维持对一个公约的保留，该保留遭到一个或多个缔约国的反对，但并非所有其他缔约国都反对，只要保留符合该公约的目的和宗旨，该国就可以被视为公约缔约国，反之亦然。国际法院，《判决、咨询意见和命令汇编》，1951年，第29页。 [↑](#footnote-ref-359)
360. 360 见《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1858号文件，第12-34段。 [↑](#footnote-ref-360)
361. 361 见附件五，F节。 [↑](#footnote-ref-361)
362. 362 见附件五，K节。 [↑](#footnote-ref-362)
363. 36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2，A/C.1/608号文件。 [↑](#footnote-ref-363)
364. 364 委员会在特别报告员题为“侵略定义的可能性和合意性”的有关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第二份报告（见《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44号文件）第二章以及委员会其他委员提交的备忘录和建议（同上，A/CN.4/L.6-8、10-12和19号文件）的基础上审议了这一问题。 [↑](#footnote-ref-364)
365. 365 见《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1858号文件，第53段。 [↑](#footnote-ref-365)
366. 36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4，A/2211号文件。 [↑](#footnote-ref-366)
367. 367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九届会议，补编第11号》（A/2638）。 [↑](#footnote-ref-367)
368. 368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6号》（A/3574）。 [↑](#footnote-ref-368)
369. 369 委员会的报告见A/AC.91/2、3和5号文件。 [↑](#footnote-ref-369)
370. 370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9号》（A/9619）。 [↑](#footnote-ref-370)
371. 371 有关侵略定义的案文载于大会第3314 （XXIX）号决议附件。另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6，A/9890号文件。 [↑](#footnote-ref-371)
372. 372 该专题原定英文标题是“Draft code of offences against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mankind”。委员会在1987年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建议大会将专题的英文标题修改如上。大会在1987年12月7日第42/151号决议中核可了这一修改。 [↑](#footnote-ref-372)
373. 373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25号文件；《1951年……年鉴》，第二卷，A/CN.4/44号文件；《1954年……年鉴》，第二卷，A/CN.4/85号文件。 [↑](#footnote-ref-373)
374. 374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9和Add.1和2号文件；《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4，A/2162和Add.1号文件以及A/2162/Add.2号文件。委员会还审议了各国政府有关系统表述纽伦堡原则的意见和建议（见《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45和Add.1和2号文件）。 [↑](#footnote-ref-374)
375. 375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39号文件以及A/CN.4/72号文件。 [↑](#footnote-ref-375)
376. 376 见《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1858号文件，第57和59段。 [↑](#footnote-ref-376)
377. 377 见《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1858号文件，第52段（a、b和c）。 [↑](#footnote-ref-377)
378. 378 《国际军事法庭对重大战争罪行的审判，纽伦堡，1945年11月14日至1946年10月1日》，1947年在德国纽伦堡出版，第223页。 [↑](#footnote-ref-378)
379. 379 见《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1858号文件，第59段，第1条。 [↑](#footnote-ref-379)
380. 380 见《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1858号文件，第52段（d）。 [↑](#footnote-ref-380)
381. 381 见《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1858号文件，第59段，第5条及其评注。 [↑](#footnote-ref-381)
382. 382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85号文件。 [↑](#footnote-ref-382)
383. 383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693号文件，第50和51段。 [↑](#footnote-ref-383)
384. 384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 A/2693号文件，第49和54段。 [↑](#footnote-ref-384)
385. 385 见《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1段。 [↑](#footnote-ref-385)
386. 38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31，A/32/470号文件。 [↑](#footnote-ref-386)
387. 387 A/35/210和Add.1和2及Add.2/Corr.1号文件。 [↑](#footnote-ref-387)
388. 388 见《198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64号文件；《198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77号文件；《1985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87号文件；《198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98号文件；《1987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04号文件；《198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11号文件；《198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19和Add.1号文件；《199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30和Add.1号文件；《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35和Add.1号文件；《199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42号文件；《199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49号文件（分别在《1992年……年鉴》和《1993年……年鉴》上公布的特别报告员第十和十一次报告全篇讨论了成立一个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可能性问题）；《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60号文件；以及A/CN.4/466号文件。 [↑](#footnote-ref-388)
389. 389 见《198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58和Add.1-4号文件；《198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69和Add.1和2号文件；《1985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92和Add.1和2号文件；《1987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07和Add.1和2号文件；《199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29和Add.1-4号文件；以及《199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48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389)
390. 390 A/CN.4/365和A/CN.4/368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390)
391. 391 见《198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64号文件。 [↑](#footnote-ref-391)
392. 392 见《198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7段。 [↑](#footnote-ref-392)
393. 393 见《198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9段。 [↑](#footnote-ref-393)
394. 394 见《198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77号文件。 [↑](#footnote-ref-394)
395. 395 见《198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5段。 [↑](#footnote-ref-395)
396. 396 见《198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5段。 [↑](#footnote-ref-396)
397. 397 见《199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0-175段。 [↑](#footnote-ref-397)
398. 398 见《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60号文件；以及A/CN.4/466号文件。 [↑](#footnote-ref-398)
399. 399 见《199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48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399)
400. 400 见《199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8和39段。 [↑](#footnote-ref-400)
401. 401 见《199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0段。 [↑](#footnote-ref-401)
402. 402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3和44段。 [↑](#footnote-ref-402)
403. 403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5和50段。 [↑](#footnote-ref-403)
404. 404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6段。 [↑](#footnote-ref-404)
405. 405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7和48段。 [↑](#footnote-ref-405)
406. 406 见《198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64号文件。 [↑](#footnote-ref-406)
407. 407 见《198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9（c）（i）段。 [↑](#footnote-ref-407)
408. 408 见《198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98号文件。 [↑](#footnote-ref-408)
409. 409 见《198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85段。 [↑](#footnote-ref-409)
410. 410 见大会1986年12月3日第41/75号决议，1987年12月7日第42/151号决议，1988年12月9日第43/164号决议和1989年12月4日第44/32号决议。 [↑](#footnote-ref-410)
411. 411 见《198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04号文件。 [↑](#footnote-ref-411)
412. 412 2006年，委员会在其工作方案中列入“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专题（见第三部分B，第6节）。 [↑](#footnote-ref-412)
413. 413 见《198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3和280段（第4条评注）。 [↑](#footnote-ref-413)
414. 414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附件》，第二卷，议程项目152，A/44/195号文件。 [↑](#footnote-ref-414)
415. 415 见《199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30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415)
416. 416 工作组的报告见A/CN.4/L.454号文件。 [↑](#footnote-ref-416)
417. 417 见《199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35和Add.1号文件；《199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42号文件；《199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49号文件。 [↑](#footnote-ref-417)
418. 418 A/CN.4/L.471号文件，转载于《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另见《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9段。 [↑](#footnote-ref-418)
419. 419 见《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段和附件，第4段。 [↑](#footnote-ref-419)
420. 420 见《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和104段。 [↑](#footnote-ref-420)
421. 421 委员会收到了各国政府关于在上一届会议上成立的工作组根据大会第47/33号决议提交的报告的意见（见《199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52和Add.1-3号文件）。 [↑](#footnote-ref-421)
422. 422 关于工作组经过修订的报告，见A/CN.4/L.490和Add.1号文件，转载于《199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 [↑](#footnote-ref-422)
423. 423 见《199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9和100段。 [↑](#footnote-ref-423)
424. 424 见《199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 [↑](#footnote-ref-424)
425. 425 见《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58和Add.1-8号文件。 [↑](#footnote-ref-425)
426. 426 A/CN.4/457号文件，B节。 [↑](#footnote-ref-426)
427. 427 工作组的最后修订报告，见A/CN.4/L.491/Rev.2和Add.1-3号文件。 [↑](#footnote-ref-427)
428. 428 见《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4-86段。 [↑](#footnote-ref-428)
429. 429 见《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8和91段。 [↑](#footnote-ref-429)
430. 430 见《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0段。 [↑](#footnote-ref-430)
431. 431 委员会通过的规约草案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立法史的一部分，它因具有历史意义和相关性而被转载。 [↑](#footnote-ref-431)
432. 43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22号》（A/50/22）。 [↑](#footnote-ref-432)
433. 43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22号》（A/51/22），第一和二卷。 [↑](#footnote-ref-433)
434. 434 A/AC.249/1997/L.5、A/AC.249/1997/L.8/Rev.1和A/AC.249/1997/L.9/ Rev.1号文件。 [↑](#footnote-ref-434)
435. 435 见《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正式记录，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罗马》，第三卷，报告和其他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02.I.5），A/CONF.183/2/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435)
436. 436 见《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正式记录，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罗马》，第一卷，最后文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02.I.5），A/CONF.183/10号文件。 [↑](#footnote-ref-436)
437. 437 见《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正式记录，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罗马》，第一卷，最后文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02.I.5），A/CONF.183/9号文件。 [↑](#footnote-ref-437)
438. 438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未转载于本出版物附件中，因为它是在筹备委员会的案文的基础上通过的，筹备委员会进一步拟订了委员会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 [↑](#footnote-ref-438)
439. 439 见《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正式记录，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罗马》，第一卷，最后文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02.I.5），A/CONF.183/10号文件。 [↑](#footnote-ref-439)
440. 440 见筹备委员会第一、二和三届会议（1999年2月16-26日、7月26日至8月13日和11月29日至12月17日）会议记录（PCNICC/1999/L.5/Rev.1和Add.1和2号文件）；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2000年3月13-31日）会议记录（PCNICC/2000/L.1/Rev.1和Add.1和Add.2号文件）；筹备委员会第五届会议（2000年6月12-30日）会议记录（PCNICC/2000/L.3/Rev.1号文件）；筹备委员会第六届会议（2000年11月27日至12月8日）会议记录（PCNICC/2000/L.4/Rev.1和Add.1-3号文件）；筹备委员会第七届会议（2001年2月26日至3月9日）会议记录（PCNICC/2001/L.1/Rev.1和Add.1-3号文件）；筹备委员会第八届会议（2001年9月24日至10月5日）会议记录（PCNICC/2001/L.3/Rev.1和Add.1号文件）；筹备委员会第九届会议（2002年4月8-19日）会议记录（PCNICC/2002/L.1/Rev.1和Add.1和2号文件）；和筹备委员会第十届会议（2002年7月1-12日）会议记录（PCNICC/2002/L.4/Rev.1号文件）；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的报告（载于PCNICC/2000/1和Add.1和2号文件；PCNICC/2001/1和Add.1-4号文件；PCNICC/2002/1和Add.1和2号文件；以及PCNICC/2002/2和Add.1-3号文件）。另见秘书处编写的筹备委员会报告指南（PCNICC/2002/3和Corr.1号文件）。 [↑](#footnote-ref-440)
441. 441 如上所述，《罗马规约》于2002年7月1日生效。 [↑](#footnote-ref-441)
442. 442 见《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纽约，2002年9月3日至10日》（ICC-ASP/1/3，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03.V.2），第16-23段。 [↑](#footnote-ref-442)
443. 443 1954年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2条第1和第2款将侵略行为和威胁进行侵略定性为一种“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是国际法上的罪行，“应对这种罪行负责的人应受惩罚”（第1条）。1996年通过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6条规定如下：“作为领袖或组织者积极参与或下令计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一国实行之侵略行为的人应对侵略罪行负责”。 [↑](#footnote-ref-443)
444. 444 见《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正式记录，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罗马》，第一卷，最后文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02.I.5），A/CONF.183/9号文件，第5条。 [↑](#footnote-ref-444)
445. 445 见《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正式记录，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罗马》，第一卷，最后文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02.I.5），A/CONF.183/10号文件，附件I、F。 [↑](#footnote-ref-445)
446. 446 《罗马规约》，第121和123条。 [↑](#footnote-ref-446)
447. 447 见筹备委员会第一、二和三届会议（1999年2月16日至26日、7月26日至8月13日和11月29日至12月17日）会议记录（PCNICC/1999/L.5/Rev.1号文件，第12、15、16和20段）；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2000年3月13日至31日）会议记录（PCNICC/2000/L.1/Rev.1号文件，第9和11段）；筹备委员会第五届会议（2000年6月12日至30日）会议记录（PCNICC/2000/L.3/Rev.1号文件，第9和12段）；筹备委员会第六届会议（2000年11月27日至12月8日）会议记录（PCNICC/2000/L.4/Rev.1号文件，第10和11段）；筹备委员会第七届会议（2001年2月26日至3月9日）会议记录（PCNICC/2001/L.1/Rev.1号文件，第9、11和14段）；筹备委员会第八届会议（2001年9月24日至10月5日）会议记录（PCNICC/2000/L.3/Rev.1号文件，第10、11和14段）；筹备委员会第九届会议（2002年4月8日至19日）会议记录（PCNICC/2002/L.1/Rev.1号文件，第14段）；筹备委员会第十届会议（2002年7月1日至12日）会议记录（PCNICC/2002/L.4/Rev.1号文件，第9、10和16段）；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的报告（PCNICC/2002/2号文件，第8和9段以及PCNICC/2002/2/Add.2号文件） [↑](#footnote-ref-447)
448. 448 见筹备委员会第一、二和三届会议（1999年2月16日至26日、7月26日至8月13日和11月29日至12月17日）会议记录（PCNICC/1999/L.5/Rev.1号文件），第16段。 [↑](#footnote-ref-448)
449. 449 PCNICC/2002/WGCA/RT.1/Rev.2号文件。 [↑](#footnote-ref-449)
450. 450 PCNICC/2002/WGCA/L.1和Add.1号文件，转载于《与侵略有关的发展情况的历史回顾》（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3.V.10）。 [↑](#footnote-ref-450)
451. 451 见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的报告（PCNICC/2002/2号文件，第9段，以及PCNICC/2002/2/Add.2号文件）。 [↑](#footnote-ref-451)
452. 452 2002年9月9日第ICC-ASP/1/Res.1号决议。见《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纽约，2002年9月3日至10日》（ICC-ASP/1/3，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03.V.2），第328页。 [↑](#footnote-ref-452)
453. 453 见《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第一次和第二次续会），纽约，2003年2月3日至7日和4月21日至23日》（ICC-ASP/1/3/Add.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03.V.8），第37和38段。 [↑](#footnote-ref-453)
454. 454 关于曼利·O. 赫德森的报告，见《195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50号文件；关于罗伯托·科尔多瓦的报告，见《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64和A/CN.4/75号文件；《1954年……年鉴》，第二卷，A/CN.4/81和A/CN.4/83号文件。 [↑](#footnote-ref-454)
455. 455 A/CN.4/82和Add.1-8号文件，转载于《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693号文件，附件。 [↑](#footnote-ref-455)
456. 456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33号文件；《1951年……年鉴》，第二卷，A/CN.4/47号文件；《1954年……年鉴》，第二卷，A/CN.4/81和A/CN.4/84号文件；以及A/CN.4/56和Add.1号文件。另外，秘书处出版了《联合国法律丛书》中的一卷，题为“有关国籍的法律”（ST/LEG/SER.B/4，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54.V.1）及其补编（ST/LEG/SER.B/9，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59.V.3）。 [↑](#footnote-ref-456)
457. 457 A/CN.4/66和A/CN.4/67号文件。 [↑](#footnote-ref-457)
458. 458 见《195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50号文件，附件二。 [↑](#footnote-ref-458)
459. 459 见《195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163号文件，第30段。 [↑](#footnote-ref-459)
460. 46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09卷，第65页。 [↑](#footnote-ref-460)
461. 461 见《195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50号文件，附件三。 [↑](#footnote-ref-461)
462. 462 见《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64号文件。 [↑](#footnote-ref-462)
463. 463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693号文件，第25段。 [↑](#footnote-ref-463)
464. 464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693号文件，第12段。 [↑](#footnote-ref-464)
465. 465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693号文件，第14段。 [↑](#footnote-ref-465)
466. 466 会议最后文件见A/CONF.9/14号文件。 [↑](#footnote-ref-466)
467. 46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89卷，第175页。 [↑](#footnote-ref-467)
468. 468 见《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75号文件。 [↑](#footnote-ref-468)
469. 469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81号文件。 [↑](#footnote-ref-469)
470. 470 委员会在2006年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8条中列入了无国籍人合法惯常居住的国家对其行使外交保护的可能性（见第三部分A，第27节）。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49段。 [↑](#footnote-ref-470)
471. 471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693号文件，第29和31段。 [↑](#footnote-ref-471)
472. 472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693号文件，第26-37段。 [↑](#footnote-ref-472)
473. 473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693号文件，第36段。被视为建议的条文草案未转载于本出版物的附件。 [↑](#footnote-ref-473)
474. 474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83号文件。 [↑](#footnote-ref-474)
475. 475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84号文件。 [↑](#footnote-ref-475)
476. 476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693号文件，第39段。 [↑](#footnote-ref-476)
477. 477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7号文件；《1951年……年鉴》，第二卷，A/CN.4/42号文件；《1952年……年鉴》，第二卷，A/CN.4/51号文件；《1953年……年鉴》，第二卷，A/CN.4/60和A/CN.4/69号文件；《1954年……年鉴》，第二卷，A/CN.4/79号文件；以及《1956年……年鉴》，第二卷，A/CN.4/97和A/CN.4/103号文件。 [↑](#footnote-ref-477)
478. 478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9号文件；《1953年……年鉴》，第二卷，A/CN.4/70号文件；《1954年……年鉴》，第二卷，A/CN.4/86号文件；以及《1956年……年鉴》，第二卷，A/CN.4/97/Add.1和Add.3号文件、A/CN.4/99和Add.1-9和A/CN.4/100号文件；以及A/CN.4/55和Add.1、Add.1/Rev.1和Add.2-6号文件，载于《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456号文件，附件二。 [↑](#footnote-ref-478)
479. 479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30和A/CN.4/32号文件；以及A/CN.4/38号文件。另外，秘书处出版了《联合国法律丛书》中的若干卷，题为“有关公海制度的法律和条例”（其中第一卷涉及有关大陆架、毗邻区和在公海上监视外国船只的法律和条例（ST/LEG/SER.B/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51.V.2），第二卷涉及有关对在国外或公海上实施的犯罪行使管辖权的法律（ST/LEG/SER.B/2，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52.V.1））和“有关船舶国籍的法律”（ST/LEG/SER.B/5和Add.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56.V.1）以及这几卷的补编（ST/LEG/SER.B/8，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59.V.2）。 [↑](#footnote-ref-479)
480. 480 见《195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42号文件。 [↑](#footnote-ref-480)
481. 481 见《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456号文件，第62和91段。 [↑](#footnote-ref-481)
482. 482 见《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456号文件，第94和102段。 [↑](#footnote-ref-482)
483. 483 见《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456号文件，第105和114段。 [↑](#footnote-ref-483)
484. 484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79号文件。 [↑](#footnote-ref-484)
485. 485 《海上生物资源养护问题国际技术会议报告，1955年4月18日至5月10日，罗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55.II.B.2）。 [↑](#footnote-ref-485)
486. 486 在1952年第四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的提议决定使用“领海”而不是“领水”一词。见《195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163号文件，第37段。大会在其相关决议中继续在专题标题中使用“领水”一词。 [↑](#footnote-ref-486)
487. 487 见《195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53号文件；《1953年……年鉴》，第二卷，A/CN.4/61和Add.1号文件；《1954年……年鉴》，第二卷，A/CN.4/77号文件；《1956年……年鉴》，第二卷，A/CN.4/97号文件；以及特别报告员在A/CN.4/93号文件中对有关领海制度的临时条款提出的修改（《1955年……年鉴》，第二卷）。 [↑](#footnote-ref-487)
488. 488 见《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71和Add.1和2号文件；《1956年……年鉴》，第二卷，A/CN.4/97/Add.2和A/CN.4/99和Add.1-9号文件；以及A/CN.4/90和Add.1-6号文件，载于《195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934号文件，附件。 [↑](#footnote-ref-488)
489. 489 见《195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53号文件。 [↑](#footnote-ref-489)
490. 490 关于专家们的报告，见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的增编附件。见《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61/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490)
491. 491 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77号文件。 [↑](#footnote-ref-491)
492. 492 为便于委员会在有关领海专题的工作中使用，秘书处出版了《联合国法律丛书》中的一卷，题为“有关领海制度的法律和条例”（ST/LEG/SER.B/6，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57.V.2）。 [↑](#footnote-ref-492)
493. 493 见《195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159号文件，第33段。 [↑](#footnote-ref-493)
494. 494 见《195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159号文件，第27和28段。 [↑](#footnote-ref-494)
495. 495 见《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日内瓦，1958年2月24日至1958年4月27日》，第七卷，第五委员会（内陆国自由出入海洋问题）（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58.V.4，第七卷），附件，A/CONF.13/C.5/L.1号文件。 [↑](#footnote-ref-495)
496. 496 按照1964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大会于1965年2月10日决定召集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以审议内陆国的过境贸易问题，并将其工作的结果载入一项公约和它可能认为适宜的其他文书。联合国内陆国家过境贸易会议于1965年6月7日至7月8日在纽约举行，五十八个国家的政府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内陆国家过境贸易公约和两项决议，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97卷，第3页。 [↑](#footnote-ref-496)
497. 49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50卷，第58页。该会议通过了有关历史性水域的第七号决议，作为通过《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7条第6款的后续行动，根据这一决议，公约对海湾所规定的制度“不应适用于所谓的‘历史性’海湾。另按照这一决议，大会1959年12月7日第1453 （XIV）号决议请国际法委员会：

     “……一俟其认为适宜时着手研究历史性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之法律制度问题，并就此事提出该委员会认为适当之建议。”

     国际法委员会请秘书处对这一专题着手进行初步的研究，并在1962年第十四届会议上决定将这一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但是，没有规定开始审议这一专题的日期或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秘书处对这一专题的研究转载于《196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43号文件。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967年第十九届会议上审议了是否开始研究该专题。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将所发表的观点概述如下：

     “大多数委员们对积极地着手审议这些专题中的任何一个的时机是否成熟仍有疑虑。这两个专题规模都相当大，都引起了一些政治问题。在目前无论开始审议其中的哪一个，势将严重延误完成业已开始研究的重要专题的工作”（见《196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6709/Rev.1号文件，第45段）。 [↑](#footnote-ref-497)
498. 49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50卷，第82页。 [↑](#footnote-ref-498)
499. 49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50卷，第169页。 [↑](#footnote-ref-499)
500. 50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99卷，第311页。 [↑](#footnote-ref-500)
501. 50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16卷，第205页。 [↑](#footnote-ref-501)
502. 50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59卷，第285页。 [↑](#footnote-ref-502)
503. 503 见《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日内瓦，1960年3月17日至4月26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0.V.6），附件，A/CONF.19/L.15号文件，附件。 [↑](#footnote-ref-503)
504. 504 1970年，秘书处公布了《联合国法律丛书》中的一卷，题为“有关领海、毗邻区、大陆架、公海和捕鱼及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国家立法和条约”（ST/LEG/SER.B/15，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0.V.9），接着在1974年、1976年和1980年又出版了三卷，题为“有关海洋法的国家立法和条约”（ST/LEG/SER.B/16，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4.V.2；ST/LEG/SER.B/18，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6.V.2；和ST/LEG/SER.B/19，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80.V.3），主要目的是为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和最新的信息。 [↑](#footnote-ref-504)
505. 50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833卷，第3页。 [↑](#footnote-ref-505)
506. 506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8号文件；《1951年……年鉴》，第二卷，A/CN.4/46号文件；《1952年……年鉴》，第二卷，A/CN.4/57号文件；《1957年……年鉴》，第二卷，A/CN.4/109号文件；《1958年……年鉴》，第二卷，A/CN.4/113号文件。 [↑](#footnote-ref-506)
507. 507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9号文件；以及A/CN.4/68和Add.1和2号文件，载于《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456号文件，附件一。 [↑](#footnote-ref-507)
508. 508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35号文件；以及A/CN.4/29、A/CN.4/36和A/CN.4/92号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55.V.1）。 [↑](#footnote-ref-508)
509. 509 见《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456号文件，第57段。 [↑](#footnote-ref-509)
510. 510 见《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456号文件，第55段。 [↑](#footnote-ref-510)
511. 511 见《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2456号文件，第15-52段。 [↑](#footnote-ref-511)
512. 512 见《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13号文件。 [↑](#footnote-ref-512)
513. 513 见《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859号文件，第15和22-43段。 [↑](#footnote-ref-513)
514. 514 见《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859号文件，第17段。 [↑](#footnote-ref-514)
515. 515 见《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859号文件，脚注16。 [↑](#footnote-ref-515)
516. 516 见《195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91号文件；《1958年……年鉴》，第二卷，A/CN.4/116/Add.1和2号文件。 [↑](#footnote-ref-516)
517. 517 A/CN.4/114和Add.1-6号文件，载于《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859号文件，附件；以及A/CN.4/116号文件。 [↑](#footnote-ref-517)
518. 518 见《195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98号文件。另外，秘书处出版了《联合国法律丛书》中的一卷，题为“有关外交和领事特权和豁免的法律和条例》，供委员会在有关外交交往和豁免的工作中使用（ST/LEG/SER.B/7，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58.V.3），1963年又出版了一卷作为补充（ST/LEG/SER.B/13，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3.V.5）。 [↑](#footnote-ref-518)
519. 519 见《195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91号文件。 [↑](#footnote-ref-519)
520. 520 见《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859号文件，第53段。 [↑](#footnote-ref-520)
521. 521 见《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859号文件，第50段。 [↑](#footnote-ref-521)
522. 522 见《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3859号文件，第51和52段。 [↑](#footnote-ref-522)
523. 52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6，A/4007号文件。 [↑](#footnote-ref-523)
524. 524 见《联合国外交交往和豁免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61年3月2日至4月14日》，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1.X.2）；同上，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2.X.1）。 [↑](#footnote-ref-524)
525. 52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00卷，第95页。 [↑](#footnote-ref-525)
526. 52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00卷，第223页。 [↑](#footnote-ref-526)
527. 52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00卷，第241页。 [↑](#footnote-ref-527)
528. 528 关于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见《195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08号文件；《1960年……年鉴》，第二卷，A/CN.4/131号文件；《1961年……年鉴》，第二卷，A/CN.4/137号文件。 [↑](#footnote-ref-528)
529. 529 A/CN.4/136和Add.1-11号文件，载于《196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4843号文件，附件一。另外，秘书处出版了《联合国法律丛书》中的一卷，题为“有关外交和领事特权和豁免的法律和条例”，供委员会在有关外交和领事交往和豁免的工作中使用（ST/LEG/SER.B/7，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58.V.3），1963年又出版了一卷作为补充（ST/LEG/SER.B/13，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3.V.5）。 [↑](#footnote-ref-529)
530. 530 见《196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4843号文件，第37段。 [↑](#footnote-ref-530)
531. 531 见《196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4843号文件，第27段。 [↑](#footnote-ref-531)
532. 532 见《联合国领事关系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3.X.2）；同上，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4.X.1）。 [↑](#footnote-ref-532)
533. 53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96卷，第261页。 [↑](#footnote-ref-533)
534. 53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96卷，第469页。 [↑](#footnote-ref-534)
535. 53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96卷，第487页。 [↑](#footnote-ref-535)
536. 536 见《196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5209号文件，第168和169页。 [↑](#footnote-ref-536)
537. 537 见《196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5509号文件，第50段。 [↑](#footnote-ref-537)
538. 538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8，A/5759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538)
539. 539 关于詹姆士·L. 布赖尔利的报告，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23号文件；《1951年……年鉴》，第二卷，A/CN.4/43号文件；《1952年……年鉴》，第二卷，A/CN.4/54和Corr.1号文件。关于H.劳特帕赫特的报告，见《195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63号文件；《1954年……年鉴》，第二卷，A/CN.4/87和Corr.1号文件。关于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的报告，见《195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01号文件；《1957年……年鉴》，第二卷，A/CN.4/107号文件；《1958年……年鉴》，第二卷，A/CN.4/115和Corr.1号文件；《1959年……年鉴》，第二卷，A/CN.4/120号文件；《1960年……年鉴》，第二卷，A/CN.4/130号文件。关于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的报告，见《196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44和Add.1号文件；《1963年……年鉴》，第二卷，A/CN.4/156和Add.1-3号文件；《1964年……年鉴》，第二卷，A/CN.4/167和Add.1-3号文件；《1965年……年鉴》，第二卷，A/CN.4/177和Add.1和2号文件；《1966年……年鉴》，第二卷，A/CN.4/183和Add.1-4号文件以及A/CN.4/186和Add.1-7号文件。 [↑](#footnote-ref-539)
540. 540 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9号文件；以及A/CN.4/175和Add.1-5号文件和A/CN.4/182和Add.1-3号文件，载于《196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6309/Rev.1号文件，附件。 [↑](#footnote-ref-540)
541. 541 见《195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21号文件；《1963年……年鉴》，第二卷，A/CN.4/154号文件；《1965年……年鉴》，第二卷，A/5687号文件；《1966年……年鉴》，第二卷，A/CN.4/187号文件。另见A/CN.4/31号文件、A/CN.4/37号文件和A/CN.4/L.55号文件。另外，秘书处出版了《联合国法律丛书》中的一卷，题为“有关缔结条约的法律和惯例以及条约法精选书目”（ST/LEG/SER.B/3，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52.V.4）。 [↑](#footnote-ref-541)
542. 542 见《195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4169号文件，第18段。 [↑](#footnote-ref-542)
543. 543 见《196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5209号文件，第17段。 [↑](#footnote-ref-543)
544. 544 见《196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6309/Rev.1号文件，第22和38段。 [↑](#footnote-ref-544)
545. 545 见《196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6309/Rev.1号文件，第36段。 [↑](#footnote-ref-545)
546. 546 见《196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6309/Rev.1号文件，第28-35段。 [↑](#footnote-ref-546)
547. 547 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8.V.7）；同上，《第二届会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0.V.6）；同上，《第一和第二届会议，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0.V.5）。 [↑](#footnote-ref-547)
548. 54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55卷，第331页。 [↑](#footnote-ref-548)
549. 549 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和第二届会议，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0.V.5），A/CONF.39/26号文件。 [↑](#footnote-ref-549)
550. 550 见《196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29号文件。 [↑](#footnote-ref-550)
551. 551 见《196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4425号文件，第38段。 [↑](#footnote-ref-551)
552. 552 见《联合国外交交往和豁免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61年3月2日至4月14日》，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1.X.1），第45-46页和89-90页。 [↑](#footnote-ref-552)
553. 553 见《196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66号文件；《1965年……年鉴》，第二卷，A/CN.4/179号文件；《1966年……年鉴》，第二卷，A/CN.4/189和Add.1和2号文件；《1967年……年鉴》，第二卷，A/CN.4/194和Add.1-5号文件。 [↑](#footnote-ref-553)
554. 554 A/CN.4/188和Add.1-4号文件以及A/CN.4/193和Add.1-5号文件，所有这些文件均载于《196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6709/Rev.1/和Rev.1 Corr.1号文件，附件一。 [↑](#footnote-ref-554)
555. 555 见《196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47号文件；《1963年……年鉴》，第二卷，A/CN.4/155号文件。 [↑](#footnote-ref-555)
556. 556 见《196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66号文件。 [↑](#footnote-ref-556)
557. 557 见《196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79号文件。 [↑](#footnote-ref-557)
558. 558 见《196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94和Add.1-5号文件。 [↑](#footnote-ref-558)
559. 559 见《196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6709/Rev.1和Rev.1/Corr.1号文件，第32和35段。 [↑](#footnote-ref-559)
560. 560 见《196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6709/Rev.1和Rev.1/Corr.1号文件，第33段。 [↑](#footnote-ref-560)
561. 561 瑞士于2002年9月10日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footnote-ref-561)
562. 56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400卷，第231页。 [↑](#footnote-ref-562)
563. 56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400卷，第339页。 [↑](#footnote-ref-563)
564. 564 在1968年第二十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修改该专题的标题，将“政府间”改为“国际”，但不改变其含义。 [↑](#footnote-ref-564)
565. 565 见《196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61和Add.1、A/CN.4/L.103和A/CN.4/L.104号文件。 [↑](#footnote-ref-565)
566. 566 为了协助委员会就这一专题开展工作，秘书处出版了《联合国法律丛书》中的两卷，题为“有关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特权和豁免的法律文本和条约条款”（ST/LEG/SER.B/10，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0.V.2；和ST/LEG/SER.B/1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1.V.3）。 [↑](#footnote-ref-566)
567. 567 见《196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95和Add.1号文件；《1968年……年鉴》，第二卷，A/CN.4/203和Add.1-5号文件；《1969年……年鉴》，第二卷，A/CN.4/218和Add.1号文件；《1970年……年鉴》，第二卷，A/CN.4/227和Add.1和2号文件；《197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41和Add.1-6号文件；A/CN.4/L.136、A/CN.4/L.151、A/CN.4/L.166、A/CN.4/L.171和A/CN.4/L.173号文件。 [↑](#footnote-ref-567)
568. 568 A/CN.4/221及Add.1和Corr.1、A/CN.4/238及Add.1和2、A/CN.4/239和Add.1-3及A/CN.4/240和Add.1-7号文件，载于《197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8410/Rev.1号文件，附件一。 [↑](#footnote-ref-568)
569. 569 见《196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L.118及Add.1和2号文件；《1968年……年鉴》，第二卷，A/CN.4/L.129号文件，以及A/CN.4/L.162/Rev.1、A/CN.4/L.163、A/CN.4/L.164、A/CN.4/L.165及A/CN.4/L. 167号文件。 [↑](#footnote-ref-569)
570. 570 关于工作组的报告，见A/CN.4/L.174和Add.1-6及A/CN.4/L.177和Add.1-3号文件。 [↑](#footnote-ref-570)
571. 571 见《197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8410/Rev.1号文件，第39和60段。 [↑](#footnote-ref-571)
572. 572 见《197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8410/Rev.1号文件，第57段。 [↑](#footnote-ref-572)
573. 573 见《197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8410/Rev.1号文件，第51和52段。 [↑](#footnote-ref-573)
574. 574 见《197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8410/Rev.1号文件，第40-56段。 [↑](#footnote-ref-574)
575. 575 见《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75年2月4日至3月14日》，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5.V.11）；同上，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5.V.12）。 [↑](#footnote-ref-575)
576. 576 见《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75年2月4日至3月14日》，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5.V.12）；A/CONF.67/16号文件。 [↑](#footnote-ref-576)
577. 577 见《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75年2月4日至3月14日》，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5.V.12）；A/CONF.67/15号文件。 [↑](#footnote-ref-577)
578. 578 自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以来，该项目内容仅限于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观察员地位。 [↑](#footnote-ref-578)
579. 579见《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04号文件。 [↑](#footnote-ref-579)
580. 580见《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11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580)
581. 581 见《198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70号文件；《1985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91和Add.1号文件；《198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01号文件；《198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24号文件；《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38和A/CN.4/439号文件。 [↑](#footnote-ref-581)
582. 582 见《198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增编，A/CN.4/L.383和Add.1-3号文件。 [↑](#footnote-ref-582)
583. 583 见《198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24号文件；《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38和A/CN.4/439号文件。 [↑](#footnote-ref-583)
584. 584 小组委员会收到了秘书处起草的研究报告，发表在《196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49和Add.1、A/CN.4/150和A/CN.4/151号文件。 [↑](#footnote-ref-584)
585. 585 见《196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5509号文件，附件二。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也收到了秘书处起草的一个研究报告。见《196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57号文件。 [↑](#footnote-ref-585)
586. 586 见脚注597。 [↑](#footnote-ref-586)
587. 587 关于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的报告，见《196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202号文件；《1969年……年鉴》，第二卷，A/CN.4/214、Add.1和2号文件；《1970年……年鉴》，第二卷，A/CN.4/224和Add.1号文件；《197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49号文件；《1972年……年鉴》，第二卷，A/CN.4/256和Add.1-4和A/CN.4/L.184号文件。关于弗朗西斯·瓦莱特爵士的报告，见《197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78和Add.1-6号文件。 [↑](#footnote-ref-587)
588. 588 A/CN.4/275和Add.1和2、A/CN.4/L.205和A/9610/Add.1和2号文件，转载于《197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9610/Rev.1号文件，附件一；以及A/CN.4/L.213号文件。 [↑](#footnote-ref-588)
589. 589 见《196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200和Add.1和 2号文件；《1969年……年鉴》，第二卷，A/CN.4/210号文件；《1970年……年鉴》，第二卷，A/CN.4/225和A/CN.4/229号文件；《197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CN.4/243和Add.1号文件。另外，秘书处出版了《联合国法律丛书》中的一卷，题为“有关国家继承的资料”，其中包含主要与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有关的信息（见ST/LEG/SER.B/14，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8.V.5）。1972年又出版了其一个补编，作为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文件（A/CN.4/263号文件）。 [↑](#footnote-ref-589)
590. 590 见《197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9610/Rev.1号文件，第43和85段。 [↑](#footnote-ref-590)
591. 591 见《197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9610/Rev.1号文件，第84段。 [↑](#footnote-ref-591)
592. 592 见《联合国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的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77年4月4日至5月6日和1978年7月31日至8月23日》，第三卷，会议文件，第一届和续会（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9.V.10），会议报告（1977年届会），A/CONF.80/15号文件，第26段。 [↑](#footnote-ref-592)
593. 593 见《联合国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的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77年4月4日至5月6日和1978年7月31日至8月23日》，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8.V.8）；同上，第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9.V.9）；同上，第三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9.V.10）。 [↑](#footnote-ref-593)
594. 594 1990年4月23日纳米比亚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footnote-ref-594)
595. 59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946卷，第3页。 [↑](#footnote-ref-595)
596. 596 见《联合国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的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77年4月4日至5月6日和1978年7月31日至8月23日》，第三卷，会议文件，第一届和续会（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9.V.10），A/CONF.80/32号文件，附件。 [↑](#footnote-ref-596)
597. 597 在1968年第二十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从该专题的标题中删去来源一词，以避免关于这个题目的划分含糊不清，并采用“条约以外事项的国家继承”作为新的标题。 [↑](#footnote-ref-597)
598. 598 见《196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204号文件；《1969年……年鉴》，第二卷，A/CN.4/216/Rev.1号文件；《1970年……年鉴》，第二卷，A/CN.4/226号文件；《197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47和Add.1号文件；《1972年……年鉴》，第二卷，A/CN.4/259号文件；《1973年……年鉴》，第二卷，A/CN.4/267号文件；《197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82号文件；《197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92号文件；《1977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01和Add.1号文件；《197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13号文件；《197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2和Add.1和2号文件；《198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33号文件；《198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45和Add.1-3号文件。 [↑](#footnote-ref-598)
599. 599 A/CN.4/338和Add.1-4号文件，载于《198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一。 [↑](#footnote-ref-599)
600. 600 见《197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232号文件。另外，除了题为“有关国家继承的资料”的《联合国法律丛书》中的一卷及其补编（见上文）外，秘书处还出版了《联合国法律丛书》中单独的一卷，专门包含各国政府提供的有关条约以外事项的国家继承的资料（ST/LEG/SER.B/17，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7.V.9）。 [↑](#footnote-ref-600)
601. 601 见《198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1和87段。 [↑](#footnote-ref-601)
602. 602 见《198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6段。 [↑](#footnote-ref-602)
603. 603 A/CONF.117/5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603)
604. 604 见《联合国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83年3月1日至4月8日》，第二卷，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的简要记录（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94.V.6），A/CONF.117/14号文件。 [↑](#footnote-ref-604)
605. 605 见《联合国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83年3月1日至4月8日》，第二卷，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94.V.6），A/CONF.117/15号文件。 [↑](#footnote-ref-605)
606. 606 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按照大会1971年12月3日第2780 （XXVI）号决议转交给委员会的各会员国的意见（A/CN.4/253和Add.1-5号文件，载于《197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8710/Rev.1号文件，附件）、一份载有乌拉圭代表团起草的公约草案案文的工作文件（A/C.6/L.822号文件）以及委员会的一位委员，里查德·D. 卡尼撰写的一份工作文件（见《197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L.182号文件）。 [↑](#footnote-ref-606)
607. 607 A/CN.4/L.186号文件。 [↑](#footnote-ref-607)
608. 608 A/CN.4/L.188和Add.1及A/CN.4/L.189号文件。 [↑](#footnote-ref-608)
609. 60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90，A/9407号文件。 [↑](#footnote-ref-609)
610. 61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035卷，第167页。 [↑](#footnote-ref-610)
611. 611 1973年12月14日第3166 （XXVIII）号决议第6段要求该案文始终与其所附着的公约一起公布。 [↑](#footnote-ref-611)
612. 612 工作文件和安德列·乌什托尔的报告见《196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L.127号文件；《1969年……年鉴》，第二卷，A/CN.4/213号文件；《1970年……年鉴》，第二卷，A/CN.4/228和Add.1号文件；《1972年……年鉴》，第二卷，A/CN.4/257和Add.1号文件；《1973年……年鉴》，第二卷，A/CN.4/266号文件；《197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80号文件；《1975年……年鉴》，第二卷，A/CN.4/286号文件；和《197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93和Add.1号文件。尼古拉·A. 乌沙科夫的报告见《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09和Add.1和2号文件。 [↑](#footnote-ref-612)
613. 613 A/CN.4/308和Add.1、Add.1/Corr.1和Add.2以及A/CN.4/L.268号文件列入《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 [↑](#footnote-ref-613)
614. 614 见《197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269号文件。 [↑](#footnote-ref-614)
615. 615 见《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09和Add.1和2号文件。 [↑](#footnote-ref-615)
616. 616 A/CN.4/L.266号文件。 [↑](#footnote-ref-616)
617. 617 A/CN.4/L.264号文件。 [↑](#footnote-ref-617)
618. 618 A/CN.4/L.265号文件。 [↑](#footnote-ref-618)
619. 619 A/CN.4/L.267号文件。 [↑](#footnote-ref-619)
620. 620 A/CN.4/L.270号文件。 [↑](#footnote-ref-620)
621. 621 见《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5和74段。 [↑](#footnote-ref-621)
622. 622 见《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7-72段。 [↑](#footnote-ref-622)
623. 623 见《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3段。 [↑](#footnote-ref-623)
624. 624 大会1980年12月15日第35/161号决议、1981年12月10日第36/111号决议、1983年12月19日第38/127号决议和1985年12月11日第40/65号决议。 [↑](#footnote-ref-624)
625. 625 见《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4段。 [↑](#footnote-ref-625)
626. 62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32-33和259段。 [↑](#footnote-ref-626)
627. 627 A/CN.4/L.155号文件转载于《197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8410/Rev.1号文件，第89段。 [↑](#footnote-ref-627)
628. 628 见《197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CN.4/250号文件也转载于同上，第二卷（第一部分），A/8410/Rev.1号文件，附件。 [↑](#footnote-ref-628)
629. 629 见《197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258号文件；《1973年……年鉴》，第二卷，A/CN.4/271号文件；《197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79号文件；《1975年……年鉴》，第二卷，A/CN.4/285号文件；《197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90和Add.1号文件；《1977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98号文件；《197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12号文件；《197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19号文件；《198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7号文件；《198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41和Add.1号文件和《198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53号文件。 [↑](#footnote-ref-629)
630. 630 A/CN.4/339和Add.1-8号文件转载于《198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二；以及A/CN.4/350和Add.1-6、Add.6/Corr.1和Add.7-11号文件转载于《198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 [↑](#footnote-ref-630)
631. 631 A/CN.4/L.161和Add.1和2号文件；以及《197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CN.4/277和A/CN.4/281号文件。 [↑](#footnote-ref-631)
632. 632 按照委员会在该专题方面的工作惯例，有关组织有联合国和应邀派观察员出席联合国编纂会议的政府间组织。 [↑](#footnote-ref-632)
633. 633 见《198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3和57段。 [↑](#footnote-ref-633)
634. 634 非正式协商共同主席编写的非正式总结载于A/C.6/40/10号文件。 [↑](#footnote-ref-634)
635. 635 见《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86年2月18日至3月21日》，第二卷，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94.V.5），A/CONF.129/15号文件。 [↑](#footnote-ref-635)
636. 636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十个国际组织签署了该公约。 [↑](#footnote-ref-636)
637. 637 国际组织交存的正式确认书或加入书未计入该公约生效所需的文书数目内。到2007年1月31日，共有12个国际组织交存了正式确认书或加入书。 [↑](#footnote-ref-637)
638. 638 见《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维也纳，1986年2月18日至3月21日》，第二卷，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94.V.5），A/CONF.129/14号文件。 [↑](#footnote-ref-638)
639. 639 工作组的报告见A/CN.4/305号文件。 [↑](#footnote-ref-639)
640. 640 见《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3和84段。 [↑](#footnote-ref-640)
641. 641 见附件五，C节（1）。 [↑](#footnote-ref-641)
642. 642 见附件五，D节（1）。 [↑](#footnote-ref-642)
643. 643 见附件五，E节（1）。 [↑](#footnote-ref-643)
644. 644 见附件五，H节。 [↑](#footnote-ref-644)
645. 645 A/CN.4/L.285号文件。 [↑](#footnote-ref-645)
646. 646 见《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37-144段。 [↑](#footnote-ref-646)
647. 647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六章，B节至D节。工作组的报告见A/CN.4/L.310号文件。 [↑](#footnote-ref-647)
648. 648 见《198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35号文件；《198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47和Add.1和2号文件；《198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59和Add.1号文件；《198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74和Add.1-4号文件；《198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82号文件；《1985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90号文件；《198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00号文件；和《198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17号文件。 [↑](#footnote-ref-648)
649. 649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1和Add.1-7号文件；《198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56和Add.1-3号文件；《198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72和Add.1和2号文件；《198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79和Add.1号文件；《198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09和Add.1-5号文件；和《198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20号文件。 [↑](#footnote-ref-649)
650. 650 见《197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00号文件以及A/CN.3/WP.4和5号工作文件。 [↑](#footnote-ref-650)
651. 651 见《198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17号文件。 [↑](#footnote-ref-651)
652. 652 见《198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0和72段。 [↑](#footnote-ref-652)
653. 653 见《198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6段。 [↑](#footnote-ref-653)
654. 654 A/CN.4/L.279/Rev.1号文件。报告第三节载于《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0段，附件。 [↑](#footnote-ref-654)
655. 655 见《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9、180和188-190段。 [↑](#footnote-ref-655)
656. 656 颂蓬·素差伊库先生的报告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3号文件；《198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31和Add.1号文件；《198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40和Add.1号文件；《198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57号文件；《198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63和Add.1号文件；《198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76和Add.1和2号文件；《1985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88号文件；和《198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96号文件。小木曾本雄的报告见《198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15号文件；《198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22和Add.1号文件；和《199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31号文件。 [↑](#footnote-ref-656)
657. 657 A/CN.4/343和Add.1-4号文件转载于题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资料”的《联合国法律汇编》某卷（ST/LEG/SER.B/20，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81.V.10）；和《198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10和Add.1-5号文件。 [↑](#footnote-ref-657)
658. 658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3号文件。 [↑](#footnote-ref-658)
659. 659 见《198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06和407段。 [↑](#footnote-ref-659)
660. 660 见《199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3和28段。 [↑](#footnote-ref-660)
661. 661 见《199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5段。 [↑](#footnote-ref-661)
662. 662 工作组的报告见A/C.6/47/L.10号文件。 [↑](#footnote-ref-662)
663. 663 工作组的报告见A/C.6/48/L.4号文件。 [↑](#footnote-ref-663)
664. 664 A/C.6/49/L.2号文件。 [↑](#footnote-ref-664)
665. 665 见A/49/744号文件，第3-7段。 [↑](#footnote-ref-665)
666. 666 《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81-484段。 [↑](#footnote-ref-666)
667. 667 工作组的报告见A/C.6/54/L.12号文件。 [↑](#footnote-ref-667)
668. 668 工作组的报告见A/C.6/55/L.12号文件。 [↑](#footnote-ref-668)
669. 669 A/C.6/55/L.12号文件。 [↑](#footnote-ref-669)
670. 670 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2号》（A/57/22）。特设委员会收到的文件，见同上，第7段。 [↑](#footnote-ref-670)
671. 67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2号》（A/57/22）。第8-13段。 [↑](#footnote-ref-671)
672. 67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2号》（A/58/22）。附件一。 [↑](#footnote-ref-672)
673. 67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2号》（A/58/22）。特设委员会收到的文件见同上，第7段。 [↑](#footnote-ref-673)
674. 674 重新编号（以前是第18条）。 [↑](#footnote-ref-674)
675. 675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2号》（A/58/22），附件二。 [↑](#footnote-ref-675)
676. 67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22号》（A/58/22），第12段。 [↑](#footnote-ref-676)
677. 677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22号》（A/59/22），附件一。 [↑](#footnote-ref-677)
678. 678 委员会指出，这类资料大多已于1963年发表在根据大会1959年11月21日第1401（XIV）号决议编写的秘书长题为“关于国际河流的利用和使用的法律问题”的报告中（见《197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5409号文件），以及《联合国法律丛书》题为“关于国际河流航行以外目的的利用的法律案文和条约规定”一卷中（ST/LEG/SER.B/12，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3.V.4）。 [↑](#footnote-ref-678)
679. 679 大会1970年12月8日第2669 （XXV）号决议请秘书长继续大会决议案一四零一（十四）所发动之研究，以便就该问题编写一份法律方面的“补充报告书”，工作时须计及最近国家惯例与国际裁决方面对国际水道法之适用以及政府间及非政府方面对于此项问题之研究。秘书长于1974年提交了补充报告，该报告载于《197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CN.4/274号文件。 [↑](#footnote-ref-679)
680. 680 A/CN.4/283号文件转载于《197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9610/Rev.1号文件，第五章，附件。 [↑](#footnote-ref-680)
681. 681 理查德·D. 卡尼的报告见《197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95号文件。斯蒂芬·M. 施韦贝尔的报告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0号文件；《198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32和Add.1号文件；和《198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48号文件。延斯·埃文森的报告见《198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67号文件；和《198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81号文件。斯蒂芬·麦卡弗里的报告见《198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93号文件；《198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99和Add.1和2号文件（在其第二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讨论了“共有的自然资源”概念，后来委员会将该概念作为一个独立专题来讨论。见第三部分B，第3节）；《1987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06和Add.1和2号文件；《198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12和Add.1和2号文件；《198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21和Add.1和2号文件；《199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27和Add.1号文件；和《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36号文件。罗伯特·罗森斯托克的报告见《199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51号文件；和《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62号文件。 [↑](#footnote-ref-681)
682. 682 见《197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94和Add.1号文件；《197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14号文件；《197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4号文件；《198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9和Add.1号文件；《198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52和Add.1号文件；和《199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47和Add.1-3号文件。 [↑](#footnote-ref-682)
683. 683 除上述文件外，另见《1971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CN.4/244/Rev.1号文件；《1973年……年鉴》，第二卷，A/CN.4/270号文件；以及A/CN.4/L.241号文件。 [↑](#footnote-ref-683)
684. 684 该假设载于如下说明中：

     “水道系统是由河流、湖泊、运河、冰河、地下水等水文组成部分合成，由于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这些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单元，因此，任何影响到系统一部分水域的使用都可能会影响到另一部分的水域。

     “‘国际水道系统’是指其组成部分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水道系统。

     “如一国水域的某些部分既不影响对另一国水域的使用，也不受使用另一国水域的影响，则这些部分不应被视为包括在国际水道系统内。因此，如系统内水域的使用互有影响，则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该系统成为国际系统，所以，水道的国际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见《198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0页。 [↑](#footnote-ref-684)
685. 685 见《199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51号文件。 [↑](#footnote-ref-685)
686. 686 见《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62号文件。 [↑](#footnote-ref-686)
687. 687 “不相连的封闭地下水”一语被设想为一个共同的蓄水层，它是一个独立的水源体，不通过河流系统对“共同的终点”提供水，也不从任何现存的地表水体接受大量的水。见《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62号文件，附件，第38段。 [↑](#footnote-ref-687)
688. 688 见《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8和222段。后来，委员会在“共有的自然资源”专题下处理了跨界地下水问题（下文第三部分B，第3节）。 [↑](#footnote-ref-688)
689. 689 见《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9段。 [↑](#footnote-ref-689)
690. 690 全体工作组的报告见A/51/624和A/51/869号文件。 [↑](#footnote-ref-690)
691. 691 按照公约第36条第3款，特别是为了公约生效的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交存的任何文书不应计入在各国交存的文书之内。 [↑](#footnote-ref-691)
692. 692 在委员会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完成了关于“国家继承及其对自然人和法人国籍的影响”专题的初步研究之后，委员会关于该专题的研究继续在本标题下进行。 [↑](#footnote-ref-692)
693. 693 在会议上，委员会分别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报告（A/CN.4/467和A/CN.4/474号文件）。 [↑](#footnote-ref-693)
694. 694 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工作组的报告见转载于《199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的A/CN.4/L.507号文件，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就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工作组的工作向全体会议提交的口头报告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8-87段。 [↑](#footnote-ref-694)
695. 695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8段。 [↑](#footnote-ref-695)
696. 696 A/CN.4/480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696)
697. 697 A/CN.4/493和Corr.1号文件。 [↑](#footnote-ref-697)
698. 698 A/CN.4/497号文件。 [↑](#footnote-ref-698)
699. 699 A/CN.4/L.572号文件。 [↑](#footnote-ref-699)
700. 700 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2、43、47和48段。 [↑](#footnote-ref-700)
701. 701 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4段。 [↑](#footnote-ref-701)
702. 702 A/CN.4/489号文件。 [↑](#footnote-ref-702)
703. 703 见《199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60-468段。工作组的报告见A/CN.4/L.557号文件。 [↑](#footnote-ref-703)
704. 704 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5段。 [↑](#footnote-ref-704)
705. 705 2001年，委员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决定将该专题标题修订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footnote-ref-705)
706. 706 委员会还收到了F. V. 加西亚·阿马多尔委员提交的备忘录（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80号文件）。 [↑](#footnote-ref-706)
707. 707 见《195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96号文件；《1957年……年鉴》，第二卷，A/CN.4/106号文件；《1958年……年鉴》，第二卷，A/CN.4/111号文件；《1959年……年鉴》，第二卷，A/CN.4/119号文件；《1960年……年鉴》，第二卷，A/CN.4/125号文件；和《1961年……年鉴》，第二卷，A/CN.4/134号文件和增编。 [↑](#footnote-ref-707)
708. 708 A/CN.4/152号文件转载于《196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5509号文件，附件一。 [↑](#footnote-ref-708)
709. 709 照会和罗伯托·阿戈的报告见《196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96号文件；《1969年……年鉴》，第二卷，A/CN.4/217和Add.1号文件；《1970年……年鉴》，第二卷，A/CN.4/233号文件；《197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17/Add.2号文件和A/CN.4/246和Add.1-3号文件；《1972年……年鉴》，第二卷，A/CN.4/264和Add.1号文件；《197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91和Add.1和2号文件；《1977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02和Add.1-3号文件；《197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07和Add.1和2号文件；《197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18和Add.1-4号文件；及《198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18/Add.5-7号文件。威廉·里普汉的报告见《198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30号文件；《198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44号文件；《198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54和Add.1和2号文件；《198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66和Add.1号文件；《198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80号文件；《1985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89号文件；《198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97和Add.1号文件。加埃塔诺·阿兰焦-鲁伊斯的报告见《198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16和Add.1号文件；《198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25和Add.1号文件；《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40和Add.1号文件；《199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44和Add.1-3号文件；《199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53和Add.1-3号文件；《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61和Add.1-3号文件；以及A/CN.4/469和Add.1和2号文件；及A/CN.4/476和Add.1号文件。詹姆斯·克劳福德的报告见A/CN.4/490和Add.1-7号文件；A/CN.4/498和Add.1-4号文件；A/CN.4/507和Add.1-4号文件；以及A/CN.4/517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709)
710. 710 见《198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28和Add.1-4号文件；《198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42和Add.1-4号文件；《198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51和Add.1-3号文件；《198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62号文件；《198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14号文件；以及A/CN.4/488和Add.1-3号文件及A/CN.4/492号文件。 [↑](#footnote-ref-710)
711. 711 见《196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165和A/CN.4/169号文件；《1969年……年鉴》，第二卷，A/CN.4/208和A/CN.4/209号文件；《197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15号文件（与解除不法行为情形，如“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有关的国家实践、国际判例和理论调查）；及《198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18/Add.8号文件（阿戈先生的报告中引述了主要著作清单）。 [↑](#footnote-ref-711)
712. 712 见《196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217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712)
713. 713 见《196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7610/Rev.1号文件，第80段。 [↑](#footnote-ref-713)
714. 714 见《197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CN.4/233号文件。 [↑](#footnote-ref-714)
715. 715 见《197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9010/Rev.1号文件，第36-57段。 [↑](#footnote-ref-715)
716. 716 关于委员会根据工作组的建议在二读时通过的该专题审议准则，见《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61段。工作组的报告见A/CN.4/L.538号文件。 [↑](#footnote-ref-716)
717. 717 A/CN.4/490和Add.1-7号文件。 [↑](#footnote-ref-717)
718. 718 见《199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41-330段。 [↑](#footnote-ref-718)
719. 719 见《199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31段。 [↑](#footnote-ref-719)
720. 720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44段。 [↑](#footnote-ref-720)
721. 721 转载于《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49、55、60和67段。 [↑](#footnote-ref-721)
722. 72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68段。 [↑](#footnote-ref-722)
723. 72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69、70、76和77段。 [↑](#footnote-ref-723)
724. 724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72和73段。 [↑](#footnote-ref-724)
725. 725 见《197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A/9010/Rev.1号文件，第39段。 [↑](#footnote-ref-725)
726. 726 工作组的报告见A/CN.4/L.284和Corr.1号文件。报告第二节转载于《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8段，附件。 [↑](#footnote-ref-726)
727. 727 罗伯特·Q. 昆廷-巴克斯特的报告见《198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34和Add.1和2号文件；《198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46和Add.1和2号文件；《198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60号文件；《198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73号文件；和《198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83和Add.1号文件。胡利奥·巴尔沃萨的报告见《198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94号文件；《198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02号文件；《1987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05号文件；《198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13号文件；《198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23号文件；《199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28和Add.1号文件；《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37号文件；《199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43号文件；《199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50号文件；《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59号文件；以及A/CN.4/468号文件和A/CN.4/475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727)
728. 728 见《198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378号文件；以及A/CN.4/481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728)
729. 729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国家惯例调查”（ST/LEG/15号文件，后来略做修订后在A/CN.4/384编号下重新印发，转载于《198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增编））和“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的各种责任制度概览”（A/CN.4/471号文件）。 [↑](#footnote-ref-729)
730. 730 A/CN.4/L.470号文件。 [↑](#footnote-ref-730)
731. 731 见《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44-348段。 [↑](#footnote-ref-731)
732. 732 A/CN.4/L.510号文件。 [↑](#footnote-ref-732)
733. 733 A/CN.4/L.533和Add.1号文件，转载于《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一。 [↑](#footnote-ref-733)
734. 734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9段。 [↑](#footnote-ref-734)
735. 735 见《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65-167段。 [↑](#footnote-ref-735)
736. 736 A/CN.4/L.536号文件转载于《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65-167段。 [↑](#footnote-ref-736)
737. 737 A/CN.4/L.487和Add.1号文件；A/CN.4/501和A/CN.4/510号文件。 [↑](#footnote-ref-737)
738. 738 A/CN.4/509和A/CN.4/516号文件。 [↑](#footnote-ref-738)
739. 739 A/CN.4/L.556号文件转载于《199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脚注12。 [↑](#footnote-ref-739)
740. 740 A/CN.4/510号文件。 [↑](#footnote-ref-740)
741. 74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91、92、97和98段。 [↑](#footnote-ref-741)
742. 74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94段。 [↑](#footnote-ref-742)
743. 743 在2006年12月4日第61/36号决议中，大会决定将在2007年第六十二届会议回到该专题以及危险活动造成的越界损害案件中的损失分配问题上。 [↑](#footnote-ref-743)
744. 744 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08段。 [↑](#footnote-ref-744)
745. 745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517段。 [↑](#footnote-ref-745)
746. 74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441-457段。 [↑](#footnote-ref-746)
747. 747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519段。 [↑](#footnote-ref-747)
748. 748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166段。 [↑](#footnote-ref-748)
749. 74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170段。 [↑](#footnote-ref-749)
750. 750 A/CN.4/531、A/CN.4/540和A/CN.4/566号文件。 [↑](#footnote-ref-750)
751. 75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442-457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170-171段和A/CN.4/L.661和Corr.1号文件。 [↑](#footnote-ref-751)
752. 752 A/CN.4/543号文件。 [↑](#footnote-ref-752)
753. 753 A/CN.4/562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753)
754. 754 A/CN.4/540号文件。 [↑](#footnote-ref-754)
755. 755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175和176段。 [↑](#footnote-ref-755)
756. 75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173段。 [↑](#footnote-ref-756)
757. 757 A/CN.4/566号文件。 [↑](#footnote-ref-757)
758. 758 A/CN.4/562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758)
759. 75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66和67段。 [↑](#footnote-ref-759)
760. 760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62和63段。 [↑](#footnote-ref-760)
761. 761 见《199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01段。 [↑](#footnote-ref-761)
762. 762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二，增编1。 [↑](#footnote-ref-762)
763. 763 见《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1-189页。 [↑](#footnote-ref-763)
764. 764 见《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0段和《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段。 [↑](#footnote-ref-764)
765. 765 A/CN.4/484、A/CN.4/506和Corr.1和Add.1、A/CN.4/514和Corr.1和2（只有西班牙文）、A/CN.4/523和Add.1、A/CN.4/530和Corr.1（只有西班牙文）和Add.1、A/CN.4/538、A/CN.4/546和A/CN.4/567号文件。 [↑](#footnote-ref-765)
766. 766 见《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2-189段；《199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08-109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91-92段。 [↑](#footnote-ref-766)
767. 767 见A/51/358和Add.1；A/CN.4/561和Add.1和2和A/CN.4/575号文件。大会在1998年12月8日第53/102号决议中，请各国政府提交与外交保护最密切相关的国家立法、国内法院决定和国家惯例，以便今后能协助委员会开展有关该专题的工作。 [↑](#footnote-ref-767)
768. 768 A/CN.4/506和Corr.1和Add.1、A/CN.4/514和Corr.1和2（只有西班牙文）、A/CN.4/523和Add.1、A/CN.4/530和Corr.1（只有西班牙文）和Add.1和A/CN.4/538号文件。 [↑](#footnote-ref-768)
769. 769 见以下条款草案的建议：第2条（威胁或使用武力）、第4条（在由严重违反绝对法规范的行为造成伤害时行使外交保护的职责），A/CN.4/506和Corr.1号文件；第12条（用尽当地补救办法规则是关于违反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国际不法行为的一项程序性先决条件）和第13条（关于因违反国内法而拒绝司法的用尽当地补救办法规则），A/CN.4/514和Corr.1和2（只有西班牙文）；第15条（举证责任）、第16条（“卡尔沃”条款），A/CN.4/523和Add.1；以及第23至25条（国际组织的保护与外交保护），A/CN.4/538号文件。在2004年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委员会没有接受将下列内容列入该专题范围的建议：管理国或管理国际组织行使的保护；外交保护权的授予和求偿权的转让；以及国际组织的保护和外交保护。见A/CN.4/538号文件。在2005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委员会同意特别报告员在A/CN.4/546号文件中所载的其第六次报告中得到反映的不应将“干净的手”原则列入条款草案的结论。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231段。 [↑](#footnote-ref-769)
770. 770 在2003年第五十五届会议上，委员会设立了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由第17条第2款特别报告员担任主席。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90-92段。 [↑](#footnote-ref-770)
771. 771 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设立了一个由特别报告员担任主席的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磋商小组，审议草案第9条。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166段。2002年第五十四届会议也设立了一个由特别报告员担任主席的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磋商小组，讨论对船员或机组人员以及企业公司人员和股东的外交保护问题。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113段。 [↑](#footnote-ref-771)
772. 77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59和60段。 [↑](#footnote-ref-772)
773. 77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57段。 [↑](#footnote-ref-773)
774. 774 A/CN.4/567号文件。 [↑](#footnote-ref-774)
775. 775 A/CN.4/561和Add.1和2以及A/CN.4/575号文件（在二读通过条款草案后发行）。 [↑](#footnote-ref-775)
776. 77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43、44、49和50段。 [↑](#footnote-ref-776)
777. 777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46段。 [↑](#footnote-ref-777)
778. 778 按A/CN.4/1/Rev.1文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48.V.1（1））重新发行的A/CN.4/1号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48.V.1）。 [↑](#footnote-ref-778)
779. 779 核试验（澳大利亚诉法国，新西兰诉法国），《1974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53和457页。 [↑](#footnote-ref-779)
780. 780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二，增 补3。 [↑](#footnote-ref-780)
781. 781 见《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2段。 [↑](#footnote-ref-781)
782. 782 A/CN.4/486；A/CN.4/500和Add.1；A/CN.4/505；A/CN.4/519；A/CN.4/525和Add.1、Corr.1、Corr.2（只有英文和阿拉伯文）和Add.2；A/CN.4/534；A/CN.4/542和Corr.1（只有法文）、2和3；A/CN.4/557和A/CN.4/569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782)
783. 783 各国政府对1999年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发给各国政府的调查表的答复，见A/CN.4/511号文件。该文件载有截止2000年7月6日所收到答复文本。各国政府对2001年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发给各国政府的调查表的答复，见A/CN.4/524号文件。 [↑](#footnote-ref-783)
784. 784 见《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5-210段；《199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2-200段；《199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77-597段；《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20-621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254段；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303-308段；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245-247段；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327-332段；和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173-176段。 [↑](#footnote-ref-784)
785. 785 工作组制定了向各国发送调查表的指导方针，要求它们提供资料并询问它们在单方面行为领域的实践以及它们对于委员会研究该专题的某些方面的立场。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90-595段。 [↑](#footnote-ref-785)
786. 786 见《199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81段。 [↑](#footnote-ref-786)
787. 787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304-308段。 [↑](#footnote-ref-787)
788. 788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247段。这一清单包括下列要点：日期；行为者/机关；行为者/机关的权限；形式；内容；背景和情境；目的；对象；对象的反应；第三方的反应；根据；实施；修改；结束/取消；法律范围；法官或仲裁官的判决；评论；和文献。 [↑](#footnote-ref-788)
789. 78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329段。 [↑](#footnote-ref-789)
790. 790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173-175段。 [↑](#footnote-ref-790)
791. 791 A/CN.4/569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791)
792. 79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176-177段。 [↑](#footnote-ref-792)
793. 79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170段。 [↑](#footnote-ref-793)
794. 794 见《200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29段。 [↑](#footnote-ref-794)
795. 795 见《200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31段。 [↑](#footnote-ref-795)
796. 79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492-494段。 [↑](#footnote-ref-796)
797. 797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493段；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12段；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298段；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442段；和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37段。 [↑](#footnote-ref-797)
798. 798 研究小组相继提交的报告转载于国际法委员会每年的年度报告中。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495-513段；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15-435段；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00-358段；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445-493段；和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41-251段。 [↑](#footnote-ref-798)
799. 79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512段。 [↑](#footnote-ref-799)
800. 800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512段。 [↑](#footnote-ref-800)
801. 80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30段。 [↑](#footnote-ref-801)
802. 80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447-448段。 [↑](#footnote-ref-802)
803. 80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51段。 [↑](#footnote-ref-803)
804. 804 A/CN.4/L.682和Add.1和Corr.1号文件。 [↑](#footnote-ref-804)
805. 805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39段。 [↑](#footnote-ref-805)
806. 806 在1995年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委员会得出结论，该专题的标题应修订为上述标题，而不是“与对条约的保留有关的法律和实践”。 [↑](#footnote-ref-806)
807. 807 见《1993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27-430段和第440段。 [↑](#footnote-ref-807)
808. 808 见《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81段。 [↑](#footnote-ref-808)
809. 809 A/CN.4/470号文件。 [↑](#footnote-ref-809)
810. 810 见《199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87段。 [↑](#footnote-ref-810)
811. 811 见《199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88段。 [↑](#footnote-ref-811)
812. 812 见《1995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89段。 [↑](#footnote-ref-812)
813. 813 A/CN.4/477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813)
814. 814 A/CN.4/478号文件。在1999年第五十一届会议上一份订正本作为A/CN.4/478/Rev.1号文件发行。 [↑](#footnote-ref-814)
815. 815 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37段。 [↑](#footnote-ref-815)
816. 816 见《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57段。 [↑](#footnote-ref-816)
817. 817 见《199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8段。 [↑](#footnote-ref-817)
818. 818 A/CN.4/491和Corr.1（只有英文）和Add.1、Add.2和Corr.1、Add.3和Corr.1（只有阿拉伯文、法文和俄文）、Add.4和Corr.1、Add.5和Add.6和Corr.；A/CN.4/499；A/CN.4/508和Add.1-4；A/CN.4/518和Add.1-3；A/CN.4/526和Add.1-3；A/CN.4/535和Add.1；A/CN.4/54；及A/CN.4/558和Corr.1、Add.1和Corr.1和2（只有法文和阿拉伯文）和Add.2号文件。 [↑](#footnote-ref-818)
819. 819 A/CN.4/574号文件中所载的第十一次报告在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提交，审议工作推迟到2007年第五十九届会议。 [↑](#footnote-ref-819)
820. 820 委员会在1998至2006年间通过的准则草案案文及其评注案文分别见：《199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40段；《199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70段；《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63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157段；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103段；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368段；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295段；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438段；和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159段。 [↑](#footnote-ref-820)
821. 82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334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75段和《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370和509段。 [↑](#footnote-ref-821)
822. 822 大会1996年12月16日第51/160号决议、1998年12月8日第53/102号决议、1999年12月9日第54/111号决议、2000年12月12日第55/152号决议、2001年12月12日第56/82号决议和2002年11月19日第57/21号决议、2003年12月9日第58/77号决议、2004年12月2日第59/41号决议和2005年11月23日第60/22号决议。按照大会2006年12月4日第61/34号决议，该专题的工作将在2007年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上继续进行。 [↑](#footnote-ref-822)
823. 823 见《200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26-728和729（1）段。关于这一专题的提纲，见同上，附件（1）。 [↑](#footnote-ref-823)
824. 824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18、461-463、517和519段。 [↑](#footnote-ref-824)
825. 825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465-488段。委员会请秘书处每年将委员会报告中有关的一章发给国际组织，以征求意见并要求它们提供它们认为可以提供给委员会的任何相关资料。见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和Corr.1），第488段和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52段。在2003年12月9日通过的第58/77号决议中，大会请秘书长邀请各国和国际组织提交它们与该专题相关的实践的资料，包括某一国际组织成员国可能被视为对该组织的行为负责的情事。 [↑](#footnote-ref-825)
826. 826 A/CN.4/532、A/CN.4/541、A/CN.4/553和A/CN.4/564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826)
827. 827 A/CN.4/545、A/CN.4/547、A/CN.4/556和A/CN.4/568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827)
828. 828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90段。草案第1至3条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54段；草案第4至7条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72段；草案第8至16[15]条评注见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206段；和草案第17至30条评注见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91段。 [↑](#footnote-ref-828)
829. 82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47-48和51段。 [↑](#footnote-ref-829)
830. 830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201段。 [↑](#footnote-ref-830)
831. 831 大会2000年12月12日第55/152号决议、2001年12月12日第56/82号决议、2002年11月19日第57/21号决议、2003年12月9日第58/77号决议、2004年12月2日第59/41号决议和2005年11月23日第60/22号决议。按照大会2006年12月4日第61/34号决议，该专题的工作将在2007年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上继续进行。 [↑](#footnote-ref-831)
832. 832 见《200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29（3）段。关于这一专题的提纲，见同上，附件（3）。 [↑](#footnote-ref-832)
833. 83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20、518和519段。 [↑](#footnote-ref-833)
834. 834 A/CN.4/533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834)
835. 835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76-381段。 [↑](#footnote-ref-835)
836. 83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81段。 [↑](#footnote-ref-836)
837. 837 A/CN.4/539和Add.1和A/CN.4/551和Corr.1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837)
838. 838 A/CN.4/555和Add.1号文件。 [↑](#footnote-ref-838)
839. 839 委员会在2003年第五十五届和2004年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分别收到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以及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水文地质协会）的地下水专家的非正式介绍；在2005年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委员会还收到了关于瓜拉尼含水层系统项目的非正式技术介绍。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8/10），第373段；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80段；和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32段。 [↑](#footnote-ref-839)
840. 840 草案第1条（范围），第2条（用语），第3条（含水层国的主权），第4条（公平合理利用），第5条（与公平合理利用相关的因素），第6条（不对其他含水层国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第7条（一般合作义务），第8条（数据和资料的定期交流），第9条（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保全），第10条（补给区和排泄区），第11条（防止、减少和控制污染），第12条（监测），第13条（管理），第14条（既定活动），第15条（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合作），第16条（紧急情况），第17条（武装冲突期间的保护），第18条（与国防或国家安全有关的数据和资料）和第19条（双边和区域协定和安排）。这些条款草案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言），包括第1和2条；第二部分（一般原则），包括第3至8条；第三部分（保护、保全和管理），包括第9至13条；第四部分（影响其他国家的活动），包括第14条；和第五部分（杂项规定），包括第15至19条。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75和76段。 [↑](#footnote-ref-840)
841. 84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73段。 [↑](#footnote-ref-841)
842. 842 大会2000年12月12日第55/152号决议、2001年12月12日第56/82号决议、2002年11月19日第57/21号决议、2003年12月9日第58/77号决议、2004年12月2日第59/41号决议和2005年11月23日第60/22号决议。按照大会2006年12月4日第61/34号决议，该专题方面的工作将在2007年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上继续进行。 [↑](#footnote-ref-842)
843. 843 见《200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26-728和729（2）段。 [↑](#footnote-ref-843)
844. 844 见《200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2）。 [↑](#footnote-ref-844)
845. 845 第73条。 [↑](#footnote-ref-845)
846. 846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64段。 [↑](#footnote-ref-846)
847. 847 A/CN.4/552和A/CN.4/570和Corr.1号文件。 [↑](#footnote-ref-847)
848. 848 A/CN.4/550和Corr.1和2号文件。 [↑](#footnote-ref-848)
849. 84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112段。 [↑](#footnote-ref-849)
850. 850 大会2000年12月12日第55/152号决议、2004年12月2日第59/41号决议和2005年11月23日第60/22号决议。按照大会2006年12月4日第61/34号决议，该专题方面的工作将在2007年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上继续进行。 [↑](#footnote-ref-850)
851. 851 见《199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54段。 [↑](#footnote-ref-851)
852. 852 见《200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26-728和729（4）段。 [↑](#footnote-ref-852)
853. 853 见《200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4）。 [↑](#footnote-ref-853)
854. 854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64段。 [↑](#footnote-ref-854)
855. 855 A/CN.4/554和A/CN.4/573号文件。第二次报告的审议工作推迟到2007年第五十九届会议。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52段。 [↑](#footnote-ref-855)
856. 856 A/CN.4/565号文件。 [↑](#footnote-ref-856)
857. 857 大会2000年12月12日第55/152号决议、2004年12月2日第59/41号决议和2005年11月23日第60/22号决议。按照大会2006年12月4日第61/34号决议，该专题方面的工作将在2007年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上继续进行。 [↑](#footnote-ref-857)
858. 858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第362-363段。 [↑](#footnote-ref-858)
859. 85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9/10），附件。 [↑](#footnote-ref-859)
860. 860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0/10），第500段。 [↑](#footnote-ref-860)
861. 861 A/CN.4/571号文件。 [↑](#footnote-ref-861)
862. 862 大会2004年12月2日第59/41号决议和2005年11月23日第60/22号决议。按照大会2006年12月4日第61/34号决议，该专题的工作将在2007年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上继续进行。 [↑](#footnote-ref-862)
863. \* 大会1947年11月21日第174 （II）号决议。本出版物以前各版转载的章程文本有以下文字差别。第6条中的“履历”改为“资历表”；第11条中的“出缺”改为“临时出缺”；第18条第2款中的“必须和合适”改为“必须或合适”，以及第20条（b）项中的“结论确定以下各点”改为“涉及以下各点结论”。本版转载大会第174 （II）号决议通过的章程文本，它没有上述改动。 [↑](#footnote-ref-863)
864. 大会1981年11月18日第36/39号决议修正的案文。 [↑](#footnote-ref-864)
865. 大会1981年11月18日第36/39号决议修正的案文。 [↑](#footnote-ref-865)
866. 大会1955年12月3日第985 （X）号决议修正的案文。 [↑](#footnote-ref-866)
867. 大会1955年12月3日第984 （X）号决议修正的案文。 [↑](#footnote-ref-867)
868. 大会1950年12月12日第485 （V）号决议修正的案文。 [↑](#footnote-ref-868)
869. 大会2006年11月16日第61/411号决定。 [↑](#footnote-ref-869)
870. 均为委员各自任职期间的国名。 [↑](#footnote-ref-870)
871. 任期内包括的年份相当于《国际法委员会年鉴》中所列一位委员任期的年份。 [↑](#footnote-ref-871)
872. 自1997年5月17日起“扎伊尔”更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footnote-ref-872)
873. 自1991年12月24日起，在联合国内使用“俄罗斯联邦”替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footnote-ref-873)
874. 1958年2月24日的信件通知秘书长埃及和叙利亚建立一个单一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71年9月2日的信件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埃及）。 [↑](#footnote-ref-874)
875. 1958年2月24日的信件通知秘书长埃及和叙利亚建立一个单一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71年9月13日的信件通知秘书长叙利亚的正式名称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footnote-ref-875)
876. 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事从1990年10月3日起生效，两个德国统一组成一个主权国家。从1990年10月3日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联合国内以“德国”的国名行事。 [↑](#footnote-ref-876)
877. i 伊盖先生当选后不久去世。 [↑](#footnote-ref-877)
878. j “达荷美”于1975年12月1日改国名为“贝宁”。 [↑](#footnote-ref-878)
879. k 1982年11月14日的信件通知秘书长以后使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一正式名称。 [↑](#footnote-ref-879)
880. l 自1993年1月1日起，“捷克斯洛伐克”改名为“捷克共和国”。 [↑](#footnote-ref-880)
881. \* 见《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34/10号文件，第11-13段。 [↑](#footnote-ref-881)
882. \* 国际法委员会1949年第一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宣言草案的评注，见《194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转载的案文见大会1949年12月6日第375 （IV）号决议附件。 [↑](#footnote-ref-882)
883. \* 国际法委员会1950年第二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各项原则的评注，见《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 [↑](#footnote-ref-883)
884. \* 国际法委员会1954年第六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条款草案的评注，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 [↑](#footnote-ref-884)
885. \* 国际法委员会1996年第四十八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各条款草案的评注，见《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footnote-ref-885)
886. \* 国际法委员会1954年第六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条款草案的评注，见《195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 [↑](#footnote-ref-886)
887. \* 国际法委员会1958年第十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示范规则的评注，见《195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 [↑](#footnote-ref-887)
888. \* 国际法委员会1978年第三十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条款草案的评注，见《1978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footnote-ref-888)
889. \* 国际法委员会1989年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条款草案和任择议定书草案的评注，见《198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footnote-ref-889)
890. \* 国际法委员会1994年第四十六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条款草案的评注，见《1994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footnote-ref-890)
891. a 1949年12月9日大会第351A （IV）号决议。 [↑](#footnote-ref-891)
892. b 见安全理事会1993年2月22日第808 （1993）号决议和1993年5月25日第827 （1993）号决议。 [↑](#footnote-ref-892)
893. c 《联合国行政法庭给付偿金的判决的后果，咨询意见，1954年国际法院报告》，第62页。 [↑](#footnote-ref-893)
894. d S/25704号文件，附件。 [↑](#footnote-ref-894)
895. e 例如，见1994年4月14日大会第48/251号决议。 [↑](#footnote-ref-895)
896. f 由大会1950年12月15日第388 A （V）号决议和1952年1月29日第530 （VI）号决议分别设立。 [↑](#footnote-ref-896)
897. g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76卷，第3页。 [↑](#footnote-ref-897)
898. h 大会1957年11月14日第1145 （XII）号决议，附件。 [↑](#footnote-ref-898)
899. i 见LOS/PCN/SCN.4/WP.16/Add.4号文件。 [↑](#footnote-ref-899)
900. \* 国际法委员会1999年第五十一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条款草案的译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4/10）。转载的案文见大会2000年12月12日第55/153号决议附件。 [↑](#footnote-ref-900)
901. a 大会1948年12月10日第217 A （III）号决议。 [↑](#footnote-ref-901)
902. b 见大会1966年12月16日第2200 A （XXI）号决议，附件。 [↑](#footnote-ref-902)
903. c 大会1989年11月20日第44/25号决议，附件。 [↑](#footnote-ref-903)
904. d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89卷，第14458号。 [↑](#footnote-ref-904)
905. e 同上，第1946卷，第33356号。 [↑](#footnote-ref-905)
906. f 见A/CONF.117/14。 [↑](#footnote-ref-906)
907. \* 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条款草案的译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所转载的案文见大会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的附件。 [↑](#footnote-ref-907)
908. \* 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的工作报告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条款草案的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 [↑](#footnote-ref-908)
909. \* 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条款草案的译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66段）。所转载的案文见大会2006年12月18日第61/36号决议的附件。 [↑](#footnote-ref-909)
910. \* 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条款草案的译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所转载的案文见大会2006年12月4日第61/35号决议的附件。 [↑](#footnote-ref-910)
911. \* 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的案文，曾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还载有条款草案的译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 [↑](#footnote-ref-911)
912. \* 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注意到的这些结论（结论应与研究小组主席定稿的分析性研究一起阅读，后者见A/CN.4/L.682和Corr.1号文件）并将其作为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部分提交大会。该报告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61/10，第251段）。 [↑](#footnote-ref-912)
913. 1 两项规范对某一情况有效的含义是，两者分别适用于该情况所包含的事实。两项规范适用于某一情况的含义是，它们对处于该相关情况中的法律主体具有约束力。 [↑](#footnote-ref-913)
914. 2 与单一条约内条款有关的适用，见比格尔海峡仲裁案（阿根廷诉智利）《国际法案例汇编》，第.52卷（1979年），第141页，第36、38和39段；C‑96/00案，Rudolf Gabriel，2002年7月11日判决，ECR（2002年）I-06367，第6398-6399页，第35-36段以及第6404页，第59段；Brannigan和McBride诉联合王国，1993年5月28日判决，欧洲人权法院，A辑（1993年），第258号，第57页，第76段；De Jong、Baljet和van den Brink诉荷兰，1984年5月22日判决，欧洲人权法院，A辑（1984年），第77号，第27页，第60段；Murray诉联合王国，1994年10月28日判决，欧洲人权法院，A辑（1994年），第300号，第37页，第98段和Nikolova诉保加利亚，1999年3月25日判决*，*欧洲人权法院，1999-II，第25页，第69段。不同文书之间的适用，见马夫罗马蒂斯在巴勒斯坦的特许权案，《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A辑，第2号（1924年），第31页。一条约和非条约标准之间的适用，INA公司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Iran-US C.T.R，第8卷，1985-I，第378页。特殊和一般习惯之间的适用，见关于通过印度领土之权利的案件（葡萄牙诉印度）（案情实质），《196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6页起，见第44页。法院说：“因此，若法院认定，两国之间有为当事方所接受、可据以制约彼此关系的明确规定的做法，为了确定特定权利和义务的目的，法院必须对该做法赋予决定性的效力。这一特定习惯必须比任何一般性规则优先。” [↑](#footnote-ref-914)
915. 3 见尼加拉瓜境内和外来的军事及准军事活动案（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案情实质），《198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4页起，见第137页，第274段，法院说：“通常，条约规则由于是特别法，若一国已经根据条约提供解决这种求偿的手段，就不应当根据习惯法规则提出求偿。” [↑](#footnote-ref-915)
916. 4 因此，见尼加拉瓜案，同上，第14页起，见第95页，第179段，法院指出：“……显然，习惯国际法继续存在、并且与国际条约法分离适用，即使这两类法律具有相同的内容”。 [↑](#footnote-ref-916)
917. 5 进行核武器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40页，第25段，法院描述人权法和武装冲突法之间的关系如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护在战时并不停止，除非实施该公约第4条……但是，对于是否任意剥夺生命的检验随即属于由适用的特别法，即旨在管理敌对行为的适用于武装冲突中的法律予以确定的范围。因此，在战争中使用某种武器使得特定人命丧失是否可视为违反公约第6条的任意剥夺人命行为，只能按照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决定，而不能从公约本身的条款予以推论”。 [↑](#footnote-ref-917)
918. 6 “一般国际法”没有公认的定义。但是，为了上述结论的目的，只需提到其合理的对应部分来界定何谓“一般”，即：何谓“特别”，也就足够了。实际上，律师们通常能够提到它所在的境况来实行这种区别。 [↑](#footnote-ref-918)
919. 7 根据《保护大西洋东北部海洋环境公约》第9条获得资料的争端案（爱尔兰诉联合王国），（最后裁决，2003年7月2日），《国际法案例汇编》，第126卷（2005年），第364页，第84段，法庭认为：“即使从那时以后，[保护大西洋东北部海洋环境公约]也必须遵守当时与当事国的特别法可能不一致的相关强制法。” [↑](#footnote-ref-919)
920. 8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第76段。见关于美国驻德黑兰的外交和领事工作人员（美利坚合众国诉伊朗）案，《198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40页，第86段，法院说：“总之，外交法规则构成自足制度，一方面规定接受国给予外交使团便利、特权和豁免的义务，另一方面，又预见到他们可能受到使团成员的虐待，详细说明了接受国可用于对付任何此类虐待的手段”。 [↑](#footnote-ref-920)
921. 9 见S. S. “温布尔登”案，《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A辑，第1号（1923年），第23-24页指出，1919年《凡尔赛条约》中关于基尔运河的规定：“……同[德意志]帝国国内航道需要遵守的不同规定不只一个……基尔运河向与德国维持和平的所有国家的军舰和过境交通开放，但只有同盟国和联系国……才能够自由进出德国的其他航道。因此，基尔运河的规定是自足的”。 [↑](#footnote-ref-921)
922. 10 因此，班科维奇诉比利时等，2001年12月12日的决定，可否受理的问题*，*欧洲人权法院，2001年第十二期，第351页，第57段，欧洲人权法院彻底审查了《欧洲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和一般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如下：“法院记得：公约的基本原则不能凭空解释，也不能在真空中适用。法院在审查同其权限有关的问题和随后按照国际法指导原则确定国家责任时，虽然它必须铭记公约作为一项人权条约的特征，也必须考虑到国际法的任何有关规则。公约应该尽量按照与形成其一部分的其他国际法规则一致的方式予以解释”。

     同样，见韩国――影响政府采购的措施（2000年1月19日），WT/DS163/R，第7.96段，世贸组织的上诉机关指出世贸组织涵盖各协定和一般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如下：“我们注意到，《解决争端的谅解书》第3条第（2）款要求我们根据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国际法规则，设法在特定争端中阐明世贸组织各项协定的现有规定。但世贸组织协定与习惯国际法的关系更加宽广。习惯国际法通常适用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只要世贸组织条约协定未‘退出’习惯国际法，习惯国际法就适用。换言之，只要没有冲突或前后不一的情况或在某个世贸组织所涵盖的协定中表示适用情况不同，我们就认为国际法习惯规则适用于世贸组织条约和世贸组织条约的拟订工作。” [↑](#footnote-ref-922)
923. 11 见石油平台案（伊朗诉美利坚合众国）（案情实质），《2003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41段，国际法院引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谈到双边条约和一般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如下：“此外，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所反映的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解释必须考虑到‘适用于当事方间关系的任何有关的国际法规则’（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丙）项）。法院不能接受这样的论点：1955年条约第二十条第一款（丁）项的实行完全不以国际法相关规则为转移……因此，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国际法有关规则的适用形成1955年条约委托国际法院的解释任务的一个整体部分……”。 [↑](#footnote-ref-923)
924. 12 乔治·潘松案（法国诉墨西哥合众国）1928年4月13日裁决，《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五卷，第422页。据指出，就条约本身没有以明文规定或以不同方式予以解决的问题向当事方引述了一般国际法原则。 [↑](#footnote-ref-924)
925. 13 见印度领土的通过权案件（葡萄牙诉印度）（初步反对意见），《1957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25页起，见第142页，法院说：“解释的规则是，政府发布的文件必须从原则上解释为根据现行法律（而不是以违反它的方式）生效或有意生效”。 [↑](#footnote-ref-925)
926. 14 这条传统规则是胡贝尔法官在帕尔马斯群岛案（荷兰诉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要求情况中陈述的，1928年4月4日的裁决，《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卷，第829页起，见第845页：“……法案事实必须依照与其同一时期的法律、而不是在争端产生或未能解决时有效的法律进行评价……使产生权利的行为服从于权利产生时有效的法律的同一原则，要求权利的存在，换言之，它的不断显现，应遵循法律演变所需的条件”。 [↑](#footnote-ref-926)
927. 15 见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匈牙利诉斯洛伐克），《1977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7页起，见第67–68页，第112段，法院认为：“缔约方将这些变化的规定插入了条约，从而承认了调整项目使之适应新的情况的潜在必要性。所以，条约不是静止的，应可随时修订，以适应新出现的国际法规范。通过第15和第19条，新的环境规范可以纳入《联合合同计划》”。

     在2005年5月24日的莱茵铁路公司仲裁案（比利时诉荷兰）中，引起争执的不是概念或普通术语，而是关于铁路的营运和生产设备方面的新技术发展。用发展的观点进行解释，以确保根据条约的目标和宗旨予以有效的适用。法庭在第82和第83段中认为：“1839年《分离条约》的目标和宗旨是要解决会使得比利时和荷兰的稳定分开复杂化的许多困难问题：第十二条的目标和宗旨是要根据1842年《边界条约》指定的路线提供从比利时到德国的运输联系。这个目标不是固定期限内的目标，它的宗旨是‘商务交通’。因而断定，即使在没有明确措词，这些工程，由于可能经常符合当代商务的需要，除了恢复以往的功能以外，仍然是比利时应该能够要求的运输权利的伴随物。因此，第十二条的全部，基于缔约国权利和义务的审慎均衡，在原则上仍然适用于比利时要求进行的修改和现代化”，仲裁案文载于<http://www.pca-cpa.org>。（上次访问网站日期为2006年7月14日）。 [↑](#footnote-ref-927)
928. 16 见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 （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6页起，见第31页，第53段。法院说，“神圣托管”概念顾名思义是在演变的。“因此，就此而论，该公约缔约方必须被视为已经予以接受。因此，在检视1919年的制度时，法院必须考虑到其后半世纪中所发生的变化，而其解释不能不通过《联合国宪章》和习惯国际法而受到其后法律情况的影响。而且，国际文书必须按照在解释时占优势的整个法律制度予以解释和适用”。

     关于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匈牙利诉斯洛伐克），《1997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76-80页，第132-147段，国际法院说：“国际法院希望指出，最新制定的环境法规范对条约的执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缔约方可通过协议将它们……纳入……条约中。这些条款不包含具体的履约义务，但要求缔约方在履行它们的义务时确保多瑙河的水质不受损害，自然环境得到保护，并在就需要在联合合同计划中加以规定的手段达成一致时考虑新的环境规范……”。 [↑](#footnote-ref-928)
929. 17 关于先后规范之间冲突的案例法不多。但是，一项条约冲突的情况出现于Slivenko等诉拉脱维亚案（2002年1月23日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欧洲人权法院，2002第二期，第482-483页，第60-61段，欧洲人权法院在该案中认为，不能援引拉脱维亚和俄罗斯之间先前的一项条约以限制《欧洲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的适用：“把《欧洲人权公约》第57条第（1）款与第1条合看可以预示，一个国家批准该公约，就要求当时在其境内实行的一切法律应当符合该公约……法院认为，同样的原则必须适用于在批准公约之前已经缔结而且有可能与该公约某些规定相左的国际条约的任何条款。” [↑](#footnote-ref-929)
930. 18 此外，第38条（d）款提到“司法判决和各国最优秀国际法专家的教导，作为确定法律规则的辅助手段。” [↑](#footnote-ref-930)
931. 19 科孚海峡案（联合王国诉阿尔巴尼亚），《1949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2页。 [↑](#footnote-ref-931)
932. 20 进行核武器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咨询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79段。 [↑](#footnote-ref-932)
933. 21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一项条约如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抵触则无效。为本公约的目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指各国组成的国际社会作为整体所接受，并承认为不许减损，且只能由嗣后具有同样性质的一般国际法规范方可加以更改的规范。 [↑](#footnote-ref-933)
934. 22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40条评注，第（4）-（6）段。另见第26条评注，第（5）段。又见刚果境内武装活动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200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64段。 [↑](#footnote-ref-934)
935. 23 洛克比空难事件引起的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诉美利坚合众国）（临时措施），《1998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42段和关于洛克比空难事件引起的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诉联合王国）（临时措施），《1992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39-40段。 [↑](#footnote-ref-935)
936. 24 见《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六项。 [↑](#footnote-ref-936)
937. 25 国际法院认为：“……应当从基本上区分一国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和在外交保护领域面对另一国而起的义务。依据其性质，前者是所有国家关注的事项。鉴于所涉权利的重要性，可以认为所有国家在这些权利保护中都有合法利益，它们就是普遍义务。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公司案（比利时诉西班牙）（第二阶段）《197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3页起，见第32页，第33段。或者，根据国际法学会所下的定义，普遍义务是“一国在任何既定讼案中根据一般国际法对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鉴于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和它对于遵守的关注，如果这项义务被违反了，所有国家都可以采取行动”。国际法学会，“国际法中的普遍义务和权利”，克拉科夫会议，《2005年国际法学会年鉴》，第1条。 [↑](#footnote-ref-937)
938. 26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6/10），《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48条第1款（b）项。这方面包括《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共同的第一条。这四项公约都是在1949年8月12日通过的。 [↑](#footnote-ref-938)
939. 27 国际法院指出，“例如在当代国际法中，这些义务来自宣布侵略行为和灭绝种族行为为非法，也来源于有关人身基本权利的原则和规则，包括不受奴役和种族歧视的保护。一些对应的保护权利已经列入一般国际法体系。……具有普遍性质或准普遍性质的国际文书则授予另外的一些权利。”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公司案（比利时诉西班牙）（第二阶段）《1970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3页起，见第32页，第34段。另见东帝汶案（葡萄牙诉澳大利亚），《199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90页起，见第102页，第29段。又见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案，咨询意见，《2004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55和第159段（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作为普遍义务规定的“……一些义务”以及自决权利）。关于将禁止灭绝种族行为作为一项普遍义务，见关于适用《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南斯拉夫），初步反对意见，判决，《199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595页，载于第31段和刚果境内武装活动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2006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64段。在Furundzija案中，禁止酷刑既被界定为一项强制性规范，亦被作为一项普遍义务，见检察官诉Anto Furundzija案，1998年12月10日判决，案件编号：IT-95-17/1，第二审判分庭，《国际法案例汇编》，第121卷（2002年），第260页，第151段。 [↑](#footnote-ref-939)
940. 28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同上。 [↑](#footnote-ref-940)
941. 29 这些义务载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指导原则条约》第1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10卷，第205页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36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834卷，第396页。 [↑](#footnote-ref-941)
942. 30 国际法学会，“国际法中的普遍义务”，克拉科夫会议，《2005年国际法学会年鉴》，第1条（b）款。 [↑](#footnote-ref-942)
943. 31 “我认为，在海洋管辖区存在所有权的情形下，无论划归大陆架或（辩论中）划归渔业区，都有普遍义务，即：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可以提出反对”，奥达法官的个别意见，格陵兰和Jan Mayen 间区域的海洋定界案（丹麦诉挪威），判决，《1993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38页起，见第100页，第40段。另见德卡斯特罗法官的个别意见，载于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 （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6页起，见第165页：“……一种类似于法律地位有时与之产生混淆的物权限制在各国相互间和针对所有国家实施”。又见Skubiszewski法官的不同意见，东帝汶案（葡萄牙诉澳大利亚），《199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90页起，见第248页，第78-79段。 [↑](#footnote-ref-943)
944. 32 厄立特里亚国政府诉也门共和国政府（第一阶段：领土主权和争端的范围），仲裁法庭，1998年10月9日，《国际法案例汇编》，第114卷（1999年），第1页起，见第48页，第153段。 [↑](#footnote-ref-944)